

BERTIL LINTNER

中國的印度 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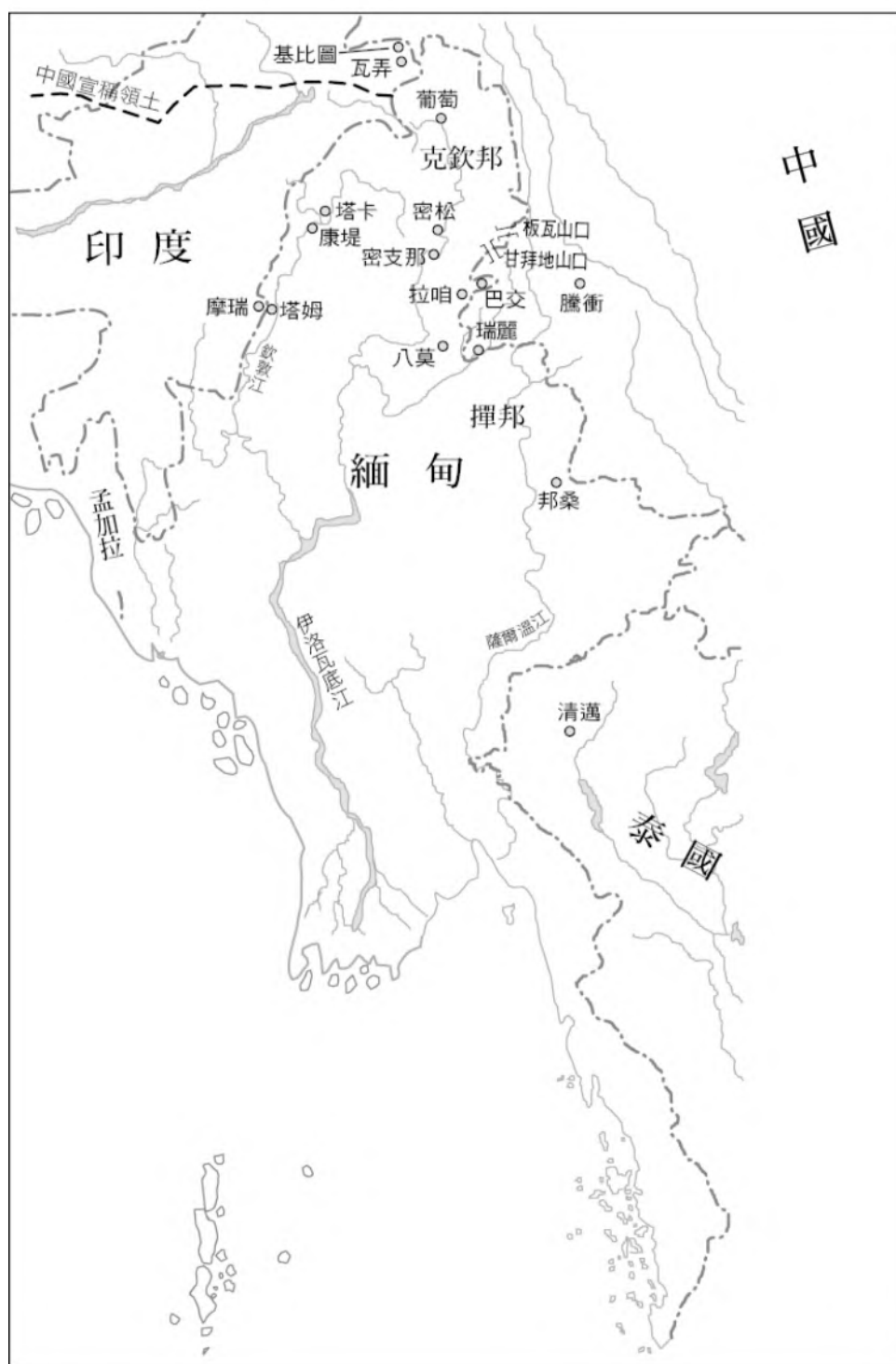
世界屋脊上的衝突
亞洲兩大區域強權的角力

CHINA'S INDIA WAR

COLLISION COURSE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柏提爾·林納——著 林玉菁——譯





前言與誌謝

我對喜馬拉雅邊界爭議的興趣始於一九六七年。當時我是個十四歲的瑞典少年，手寫一封信寄到斯德哥爾摩的印度大使館，詢問爭議的相關訊息；年紀輕輕就已經對國際事務深感興趣。我十分好奇，究竟邊界爭議是如何導致一九六二年那場短促卻傷亡慘重的戰爭呢？

我收到一箱回覆，箱內有整疊的白皮書，其中包含了新德里與北京信件和正式聲明的複本，以及詳細的折疊式地圖，描繪出印度與中國各自主張的領土區域。我開始對區域地理有些了解，並從印度觀點建立了對衝突的基本認識：中國對喜馬拉雅地區發動了大型攻擊，印度是中國侵略的受害者。

戰爭結果以印度大敗收場。然而出乎許多人意料的是，中國並未持續占有東部的占領區。中國將印度軍隊逐出多數爭議區域後，便沿著喜馬拉雅山脊，撤退到舊的實質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之後。儘管今日的中國官方地圖仍標示此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印度的行政管理與軍事人員卻可以重回這些區域，僅有在西邊的拉達克（Ladakh），實質控制線的微調傾向中國的利益。

數年後，我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讀到一本書《印度對華之戰》（India's China War），作者是澳洲英文記者奈維爾·馬克斯韋爾（Neville Maxwell），他針對這衝突呈現完全不同的觀點。馬克斯韋爾認為，雖然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是由中國發動攻擊，戰爭卻是因印度挑釁所起。印度獨立後的首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提出「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後，印度便沿著實質控制線建立一連串軍事據點，甚至越過控制線。

馬克斯韋爾的論點基於一份外洩的印度機密報告，這份《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是由兩位資深印度軍官亨德森·布魯克斯中將（T.B. Henderson Brooks）和普里敏德拉·辛格·巴格特准將（Premindra Singh Bhagat）撰寫。報告內容當然支持馬克斯韋爾的論點，亦即這

場戰爭是由印度所挑起，中國僅是反擊並重申中印邊界的領土主權。中國主要是尼赫魯敵意政策下的無辜受害者。

同時，根據馬克斯韋爾的說法，印度對實質爭議區域並無主張之權利。這些區域只印在一九三〇年代英屬印度政府單方面發行的部分（但非全部）地圖中，並於一九四七年後，全面印在獨立印度政府發行的地圖裡。在此之前的正式地圖中，英屬印度的北方邊界與中國地圖上所展現的邊界並無二致，兩者同樣位於阿薩姆平原的喜馬拉雅山腳丘陵。

英國、西藏與中國代表於一九一三與一九一四年，曾在可俯瞰北印平原的高地上，時為英屬印度政府夏都的西姆拉（Shimla）召開會議，欲解決西藏地位及邊界問題。然而馬克斯韋爾、阿拉斯泰爾·蘭姆（Alastair Lamb）及其他西方學者皆主張，這幾次會議並沒有共識，因為中國拒絕接受英國與西藏的提案。

我當時認為馬克斯韋爾的書十分具有說服力；不僅文筆流暢、充滿細節，同時提供了詳盡的注釋。當我對此議題涉獵得愈深入，也發現這本書對許多的西方及亞洲學者、決策者影響深遠。

毫不意外地，中國領導人對馬克斯韋爾的著作讚譽有加。在一九七一年北京的正式宴會中，中國總理周恩來與巴基斯坦總理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由主桌一同起立，前往外國記者座位區。當時馬克斯韋爾也在那兒，周恩來上前向他致意，周恩來透過翻譯說：「馬克斯韋爾先生，你的書講出了真相，令中國受益。」¹

就連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也印象深刻，在他的著作《論中國》（On China）一書中，表明對印度的前進政策不予認同。²馬克斯韋爾³在二〇一四年的訪問中表示，一九七一年《印度對華之戰》在美國上市時，季辛吉曾讀過此書。

它改變了他（季辛吉）對中國的想法，並將書推薦給尼克森（總統），這些現在都記載在尼克森——季辛吉——毛澤東談話紀錄中（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季辛吉訪問北京時，周恩來傳給我私人訊息，說季辛吉告訴他：「這本書讓我知道可以跟你們打交道。」

但進而廣泛閱讀中印衝突的相關資料後，我開始了解到，馬克斯韋爾對一九六二年戰爭一連串的因果事件描述，完全禁不起嚴格審視。首先，尼赫魯的前進政策是為穩定整條中印邊界，西起拉達克，東至東北邊境特區（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過去為阿薩姆邦政府下的行政機構，現在屬於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此政策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新德里的會議中決定，此時離戰爭爆發不到一年。這會議由尼赫魯主持，與會者包含國防部長梅農（Vengalil Krishnan Krishna Menon）、情報局長穆立克（Bhola Nath Mullick）、外交部長迪賽（M. J. Desai）以及新任陸軍總司令塔帕（Pran Nath Thapar）。

這顯然是場最高層級的重要會議。然而，會後下達軍隊的指令並非侵略性，而是「（在拉達克阿克賽欽〔Aksai Chin〕區域）盡可能由現有據點向前巡邏。此舉意圖建立防止中國持續前進的據點，同時掌握對方可能已於我國領土建立的任何據點」。4而西段阿薩姆平原上已建立的新據點，僅駐有相對小型且裝備不足的軍力，並且多數來自準軍事組織「阿薩姆步槍隊」（Assam Rifles）。

因此與其說是印度挑釁中國，更可主張為新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的侵略行為。一九五〇年，中國派出數萬軍隊入侵當時仍為事實獨立的國家：西藏。此後，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之間不再有西藏扮演緩衝角色，雙方領土在歷史上首度直接接壤。

一九五〇年代，中國在阿克賽欽區域修築了一條公路。雖然中、印兩國皆宣稱擁有這塊領土，但此區明顯由中國管控，因為印度是在將近一年後，才發現了這條穿越阿克賽欽最高點、連接中國新疆到西藏的新藏公路。由於阿克賽欽除了犛牛游牧民外，並無任何定居人口，因此中國得以在不受注意的情況下建造公路。

但西藏卻不同，其平民遭屠殺，佛寺僧院被毀壞。中國在西藏的鎮壓引發了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拉薩起義，最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鎮壓了抗爭行為，殺害數百名僧侶與平民，並導致上萬難民穿越喜馬拉雅山脈，前往印度尋求庇護。其中包含西藏的精神領袖：神王達賴喇嘛。

中國在西藏起義前（特別是起義後）於西藏各地建立軍事據點，其中包含鄰近印度領土的區域。中國建造通往印度東方的新路，直達東北邊境特區的中印邊界上，這很難不令人認為，中國版「前進政策」（雖然並非如此稱呼）比印度版更加積極且具侵略性。

馬克斯韋爾認為，中國決定攻擊的可能日期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因為印度在多拉（Dhola）建立哨所，激化邊界東段的緊張局勢。在此之前一切仍舊『平靜』」。5根據某些地圖，多拉位於印度與西藏邊界的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以北，此邊界是一九一四年英屬印度與西藏政府代表在西姆拉會議中同意的。當時中國代表只簽下開頭字母，但未正式簽署協定，因為中國並不承認西藏是獨立國家。此議題後續未獲解決，也影響邊界情勢發展的正常化。

一九五九年拉薩起義後，中國開始在麥克馬洪線對側與沿線進行各種動作，我不清楚馬克斯韋爾對此是否蓄意無視或一無所知。沒有任何嚴肅的軍事分析師會認為，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中國對印度的大規模戰爭（或開戰前數日發生的戰鬥），會是在人民解放軍跨越邊界（東段的麥克馬洪線及三千公里外西段拉達克實質控制線），前一週或數週所做的決策。

中國對這場戰爭的準備明顯遠早於一九六二年十月，甚至比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尼赫魯提出前進政策的會議更早。即使當地已有新建道路與軍事基地，仍需要運輸數萬名人民解放軍及許多噸補給，包含軍事重裝備，進入世界上最崎嶇難行的地理區域。毛澤東總共派出八萬名人民解放軍進入拉達克及喜馬拉雅山東側，發動對印度的攻擊6，因此必須建立且穩固通往西藏後方基地的補給線。

而跨過邊界後，中國軍隊明顯熟稔印度軍隊駐紮地的地形與地勢，並清楚如何發動攻勢。由於當時中國還無法獲取衛星影像或以偵察機得到空中影像，完全得倚靠在地潛伏的特務蒐集情報，在這種地勢崎嶇且缺乏道路的東北邊境特區，必定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不過中國特務潛伏對象主要是藏語社群，幾乎無法進入以非藏語部落為主的東北邊境特區大部分地方。

因此，中國發動攻擊的區域有經過仔細選擇，而且實際上相當侷限，這與包含印度在內的多數研究認定不同。一般常誤解，人民解放軍穿越了東北邊境特區多數區域，並直抵巴魯克旁（Bhalukpong）低地，此地為現今阿魯納恰爾邦與阿薩姆邦的交界。巴魯克旁遭到棄守，人民解放軍與印度軍的最後交火，是在魯巴（Rupa）以南、靠近邦迪拉（Bomdila）的查庫（Chakhu）。在東部的人民解放軍並未超過瓦弄（Walong）太多；從中央區域入侵蘇班西里（Subansiri）與桑朗（Siang）的武力相對較弱。

這些區域都有一個共同點，在地人口主要是藏語族群或使用藏語相關方言，是戰前得以進行人際情報收集的地區。當解放軍進入東北邊境特區，透過藏人翻譯，可與這些留在當地的居民溝通。雖然印度軍隊由東北山區的所有據點撤出，但解放軍並未進入由密什米人（Mishmis）、阿帕塔尼人（Apatanis）、尼伊希人（Nyishis）及其他非藏語部落為主的區域。由於戰爭開始前的謹慎計畫並未得到此地情資，這些部落可能被認定為具潛在敵意的敵方。

中國在一九六二年十月發動攻擊前，還採取了其他準備措施。印度軍隊的約翰·達爾維准將（John Dalvi）與部分軍隊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遭俘虜成為戰犯，直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才獲釋。他的著作《喜馬拉雅失策：印度最毀滅性軍事災難背後的憤怒事實》（Himalayan Blunder: The Angry Truth about India's Most Crushing Military Disaster）記載了整段經歷。達爾維被俘送往另一側之後，得以觀察中國如何謹慎準備對印度的閃電攻擊。他發現中國已經建立可容納三千人的戰犯營，同時印度所有主要語言的翻譯員也於一九六二年三至五月間送往拉薩。遠在攻擊發生前，不僅有上萬名軍隊事先遣入區域熟悉邊界山脈高度，還招募數千名藏人挑夫，並沿著邊界建立臨時軍火供應站。更明顯的是，達爾維發現中國興建了一條可承重七噸貨車的道路，直上麥克馬洪線附近的馬曼（Marmang）。綜合種種觀察，達爾維最後寫下：「並非意外，更絕非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之後才決定。這是中國冷酷算計的謀劃之舉。」⁷

雖然做成最終決定的時間點，確實可能是在解放軍行動的前一週（從軍事策略角度思考的確說得通），但重要的是，印度軍隊在次大陸最偏遠角落建立哨站，實在與一九六二年戰爭毫無關聯。此事或許可視為託詞，即使如此也相當薄弱。毛澤東更在戰爭前後告訴尼泊爾與蘇聯代表團，重點從來不是麥克馬洪線或邊界爭議。中國認為印度對西藏有所圖謀，而後者在一九五〇年代，正逐步納入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之中。⁸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拉薩起義爆發後三週，達賴喇嘛正翻山越嶺前往印度，當時的中國政軍領袖鄧小平，明白在會議中表達了中國立場：「等時候到了，我們會跟他們（印度）清算總帳。」⁹美國安全與南亞議題專家布魯斯．里德爾（Bruce Riedel）認為：「也許早在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就決定將對尼赫魯採取強硬行動。」¹⁰

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南亞分析師趙蔚文，曾在一九六二年戰後寫道：「印度熱切希望持續英國在西藏的事業。」而尼赫魯本人「則懷抱黑暗心理」。趙蔚文認為，這些因素導致尼赫魯在一九五九年表現出「游移不決的態度」。美中關係學者高龍江（John Garver）則引述他的話：「黑暗心理導致尼赫魯放任『反中勢力』不管，試圖在西藏煽動騷亂，以此『推翻中國中央政府的統治』。」¹¹

根據高龍江的研究，毛澤東本人也現身一九五九年三月的會議，並表示印度「在西藏做壞事」，因此需要有所處置。毛更進一步告訴在場的中國核心領導，中國此刻不應公開譴責印度。相反地，要給印度足以吊死自己的繩子，「多行不義必自斃」。¹²中國等待處理印度的時機到來，但首先需要邊界另一側的精確情報。

中國情報行動專家尼可拉斯．艾夫第米亞迪斯（Nicholas Eftimiades）揭露，中國早在軍事侵略前兩年，已開始派遣特務進入東北邊境特區與其他區域。「透過潛伏在邊境公路盜匪、挑夫與馬隊中的特務，解放軍收集關於印度軍事作戰序列、地形地勢特徵，以及軍事戰略等情報。」艾夫第米亞迪斯指出，這些特務「隨後在攻擊行

動中，引導人民解放軍穿越邊境區域……佯裝為藏人的低階軍官早已事先偵查行動區域」。13

「軍事侵略前兩年」，表示至少是在尼赫魯提出「前進策略」的前一年，因此「印度的區域行動挑釁中國出兵」此一說法就更難站得住腳。此外，經過數年準備後的最終行動日期：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更是精挑細選。此日期與古巴飛彈危機同時發生，而中國透過與蘇聯領導人的關係早已事先知情。隨著蘇聯在古巴布置飛彈，可以肯定美國必然無力旁顧遠在喜馬拉雅山脈中發生的戰事。14

由於當時中蘇關係逐漸惡化，蘇聯領袖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並未親自告知毛澤東，蘇聯正遣送飛彈前往古巴。如里德爾書中所寫：「直到開戰前兩天，毛才告知莫斯科，中國將與印度開戰。」15然而，根據英國分析師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記載，當時中國駐莫斯科大使劉曉「提前告知北京赫魯雪夫的計畫，中國可能早已知曉，因為他們在古巴擁有極好的情報來源」。16

中國在東北邊境特區的情報蒐集工作，可能早在一九五九年鄧小平指示將與印度「清算總帳」前就已展開。根據一九五二年的一份情資報告，當時一個反對達賴喇嘛的西藏異議教派，被送入印度擔任「間諜與煽動者」。報告指出這教派「在（一九五〇年）占領西藏的行動中，擔任（中國的）第五縱隊」。17

中國顯然正準備與印度進行一場長期衝突。然而，一九六二年之後卻轉成代理人戰爭，由印度境內的反抗勢力進行鬥爭。看似不可能的夥伴包含在印度極東山丘地帶的基督徒部落那迦人（Nagas）。那迦人在費佐（Angami Zapu Phizo）的領導下，高舉武器反抗新德里政府，並立即獲得印度頭號敵手，巴基斯坦的軍事援助。此外，那迦反抗軍也獲許在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設立營地，由此向印度發動攻擊。費佐本人則由東巴基斯坦借道瑞士前往英國，在肯特郡的流亡寓所持續與那迦丘陵的指揮官保持聯繫。

一九六二年六月，那迦反抗軍指揮官之一的莫烏．格韋增（Mowu Gwizan）在前往倫敦與費佐會面的途中，停留喀拉蚩（Karachi），並

在巴基斯坦接待的介紹下認識了「中國友人」，後者承諾給予那迦人援助與支持。¹⁸會議之後，那迦人集結一百三十二名兵力，在一九六六年十月從那迦山區出發。他們在數個月的時間裡徒步跋涉，穿越緬甸北部叢林，於一九六七年一月抵達雲南，接著在當地接受政治與軍事訓練。一九六七年底，第一批受訓的那迦人帶著中國製突擊步槍、機關槍與火箭發射器返回印度。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六年間，有超過七百名那迦反抗軍前往中國受訓，帶著大批武力回去對抗印度軍隊。繼那迦人之後，同樣來自東北邊境山區的米佐人（Mizo）反抗軍也跋涉前往中國；他們同樣接受軍事訓練，並帶著中國武器返回山區家園。一九七〇年代，另一群來自曼尼普爾（Manipur）的反抗軍，則在西藏接受中國政治與軍事訓練。

一九六二年戰爭前，人民解放軍已獲取部分發動越境決定性攻擊的經驗。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二月，數千名中國軍隊跨過中緬邊界，追擊中國國民黨餘軍。這批軍隊在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內戰敗北後，便撤退到緬甸偏遠的東北山區，運用跨越中緬邊界的庇護，向中國境內發動襲擊。由於緬甸也希望驅逐這群入侵者，因此兩國軍隊合作發起攻擊行動，在緬甸代號為「湄公河戰役」（Mekong River Operation），中國則稱之為「中緬聯合勘界警衛作戰」（Burma Border Surveying and Security Operation）。

然而作戰結果僅有部分勝利，多數國民黨餘軍逃過一劫並退往泰國邊界，這也暴露出解放軍的弱點：難以在陌生地形環境中開展作戰。雖然參與聯合作戰的部隊與一九六二年攻擊印度的部隊不同，但可以合理推測，中國的戰略制定者從此役中獲取教訓，因此一年後得以在喜馬拉雅山區發動更為成功的作戰。¹⁹

若是如此，《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又是怎麼回事呢？這份報告始終列為機密文件，不過我在二〇一三年時從一名資深印度記者那裡取得了複本。一年後，馬克斯韋爾決定將之公諸大眾。他將報告的電子文件檔公布在網路上，香港報紙《南華早報》則以標題「奈維爾·馬克斯韋爾公布文件，顯示一九六二年邊界戰中，印度

挑釁中國開戰」報導此事。報導甚至令人驚訝地宣稱：「（該）記者像史諾登（Edward Snowden）一樣，揭露了一九六二年戰爭的來龍去脈，強化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宣示。」²⁰

我認為一個人必須擁有強大的想像力，才能從《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導出，印度是一九六二年戰爭的侵略者，而中國是受害者的結論。「誰攻擊誰」或「誰該為戰爭負責」等問題，甚至不在這份報告討論的範疇裡。這份報告主要探究了戰爭的四個領域，以此了解印度為何挫敗，分別是：訓練軍備的可能缺失、指揮體系、軍隊體能、各階層指揮官影響下屬的能力。²¹

基本上，除了「印度並未準備好面對戰爭，自然無法抵禦中國攻擊」外，《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內容並未延伸太多。它指出印度指揮架構的弱點，政府與軍隊間缺乏有效合作，但絕對沒說印度應該為戰爭負責，也未質疑整體前進政策。²²

馬克斯韋爾將報告公諸於世後，看起來顯然缺乏有趣內容，許多印度記者與研究者開始猜想，是否可能有第二份報告或第一份報告的附錄，以提供更多訊息。然而令許多人失望的是，這份報告內容確實不如馬克斯韋爾或其他人所宣稱。或者如《印度時代雜誌》（Times of India）前助理編輯維格斯（B. G. Verghese）在二〇一二年所寫：「這份報告展現出政治與軍事上普遍的天真糊塗、矛盾對立，以及缺乏計畫與控制。《亨德森報告》中沒什麼需要保護的軍事機密，只有待隱藏的政軍自負及愚蠢。」²³當我開始審視《印度對華之戰》書中的注釋後，發現馬克斯韋爾所寫，與引用資料實際所說確實有出入。

讀過馬克斯韋爾後，我轉向閱讀英國學者阿拉斯泰爾．蘭姆的著作，他曾大量書寫中印與中巴邊界爭議。雖然蘭姆的書籍文章比馬克斯韋爾對邊界議題與一九六二年戰爭的書寫來得學術，仍有嚴重缺失及合理批評。一九六八年，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政治學教授李奧．羅斯（Leo E. Rose）對蘭姆的兩冊巨著《麥克馬洪線：中印涉藏關係史，一九〇四至一九一四年》（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曾如

此評論：「當議題涉及當今政治爭議時，學術客觀性與特別請願間的界線必然更為狹小，一如這篇研究所充分體現。」無疑地，羅斯對蘭姆的作品如此寫道：

在當今中印喜馬拉雅東段邊界爭議中，形成中國觀點的論述，這並非不受歡迎。中國確實有其道理，而比起北京政府，蘭姆先生以更清晰而有說服力的方式呈現此觀點。但不熟悉這片鮮為人知邊界的非專家讀者，必須明確意識到，作者在評估分析事件與結論時有其特別偏向。²⁴

對我來說，蘭姆對地圖細節及劃界等相關次要議題幾近癡迷，同時模糊了更大的地緣政治圖像。當我進一步研究相關議題時，更明晰了解到這其實遠超越邊界爭議；而中國從未意圖持有戰爭期間占領的區域，這塊他們宣稱是屬於中國的領土。

中國軍隊一九六二年從占領區域中撤軍，實際上令軍事史家及眾人感到不解，一般猜測可能是因為嚴冬即將到來，或是後方漫長的補給線中斷了軍事行動。即使有這些困難，中國事實上可以進一步往下推進，來到阿薩姆核心區及布拉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平原。在這個區域裡，氣候將不成問題，同時能擁有大量糧食。他們可以輕易掌握山脈以南的德茲普（Tezpur）小城，此地機場狀況良好，而印度軍隊及行政機關已棄城離去。

在一九五〇年代韓戰之後，中國開始積極發展空軍，因此在對印戰爭時已擁有數千架飛機（包含運輸機）。這些飛機部分由蘇聯輸入，其他則是經過授權在中國製造。²⁵雖然並無跡象顯示一九六二年時中國曾派機進入西藏（當時西藏僅有五個可運作的機場），或許是人民解放軍缺乏空軍駕駛，但美國情報單位相信：「若中國空軍可從緬甸進行任務，或是掌握布拉馬普特拉河谷的機場，能力將大幅提升。」²⁶美國報告也指出，對印作戰時，亦可運用中國西南省分雲南與四川的機場。

然而中國意圖並非征服占有土地，這不是中國領導人決定攻擊印度時的本意，而是在地緣政治上發出重要一擊，這已足夠。尼赫魯這

位一九五〇年代不結盟運動的主要推動者遭到羞辱，再也不是亞非新興獨立國家的領頭羊；他從一九五五年印尼萬隆的歷史性會議後，一直扮演這個角色。經過一九六二年戰爭，中國取代印度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第三世界」一詞也是由中國無所不能的毛澤東主席提出，以此取代舊有的不結盟概念。而第三世界的領袖，自然是毛澤東所帶領的中國。

中國領袖決定與印度「算帳」（引述鄧小平的話），並動用戰爭準備的時機點，必須放入當時中國內政問題的脈絡來理解。一九五八年，毛發動災難性的「大躍進」，意圖帶動中國現代化。一九六一年，約有一千七百萬至四千五百萬人死於毛的政策之下；大躍進帶來了饑荒，而非預期的任何快速工業化進程。

毛不但失去聲望，甚至面臨可能下台的處境，他深覺需要重掌權力，而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團結國家（特別是軍隊），共同對抗外侮。印度是個「軟」目標，它在一九五九年才剛提供因反中侵藏起義失敗而出逃的達賴喇嘛政治庇護，並允許西藏神王在北印度的麥克羅甘己（McLeodganj）建立流亡政府；此外還有中國不承認的邊界爭議。

馬若德在中國文化大革命起源的詳實歷史著作中寫道，中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間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毛澤東的世界觀中，中國革命是一連串全球事件的一部分，並且有著雙向影響。然而馬若德也指出，中國軍事行動與內政的連結經常隱而不顯。根據其說法：「中國參與一九五〇年爆發的韓戰，讓中國共產黨領袖得以發起愛國行動，團結身後的人民。」²⁷

韓戰爆發於一九五〇年，正好是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後一年，並持續至一九五三年。當時中國新統治者首要之務在於鞏固權力，並為尚未獲全民愛戴的政權贏得支持。因此數萬人上街頭舉行反美示威，同時估計在韓戰方興未艾的半年中，有七十一萬人被標籤為舊政權相關的反革命者，遭到處決或被迫自殺。²⁸

災難性大躍進後的情勢有些雷同。一場勝仗對毛及其支持者來說有如天賜大禮。雖然戰爭與毛重新掌權之間的直接關聯，仍有待中國

內部文件證實，但毛確實在一九六二年戰後重新掌握了黨與國家的大權，部分敵人遭到清算，部分仍存活。因此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發起偉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一步將所有政治對手消滅，並在中國上升到接近神的地位。

考慮到中國的區域野心與當時的內政情勢，任何嚴肅的觀察家與分析師都很清楚，邊界爭議不過是發動一九六二年戰爭的藉口。然而同時我們也須謹記，中國的態度一向認定自己是對的，任何挑戰中國說法的企圖，都會被視為「挑釁」。不論出於任何原因，只要不為中國所喜的條約都視為「不平等」，因此也不會遵守。

身為專長亞洲區域安全議題的記者，不難察覺中印邊界爭議與南中國海主權爭議之間的相似性。今日的中國也許比一九六二年時更為開放，意識型態也比較不僵硬，不過它對待鄰居的方式仍然不變。

中國從未控制或統治印度東北任何區域，但今日卻如此宣稱，並在地圖這樣標記；這與南中國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島²⁹的情勢發展驚人相似。中國在地圖上以大U字型，宣稱將斯普拉特利群島幾乎全數納入領土；今日台灣、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與汶萊均宣稱擁有全部或部分島嶼。而根據北京說法，「挑釁」的是這些國家，而非中國。

中國發言人堅稱，根據十五至十六世紀的明代文件證實，中國統治整個南中國海地區。然而此說絕非事實。明朝皇帝對海洋事務並不上心，在十五世紀中國短暫的海權時期，探險家鄭和帶領艦隊航向南亞、東南亞、印度次大陸、阿拉伯半島，甚至遠及東非海岸。鄭和的助手馬歡留下詳細紀錄與地圖，羅列東南亞與印度洋超過七百個地名，包含安達曼（Andamans）、尼可巴（Nicobars）、馬爾地夫與拉克沙兌普（Lakshadweep）等島群中的偏遠小島嶼。³⁰

中國製圖家十分清楚斯普拉特利群島的存在與位置，馬歡也提到它們，但並不如紀錄中的其他地方詳細。原因十分簡單：斯普拉特利群島並非島嶼，而是捉摸不定的沙洲淺灘與暗礁，古代水軍必須繞行以避免沉船。然而，此一事實並無法阻止中國做出驚人宣言，最近同

時更透過在淺灘暗礁建立人工島嶼，實質鞏固其主張。任何反對意見都將被視為干涉中國內政。

二〇一六年七月，海牙的國際仲裁法院回應菲律賓提出的指控時，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發現中國對南中國海並無可信的「歷史權利」。法庭指出並無證據證明，中國曾行使此種專屬主權性質的權利。北京政府對此則憤怒回應，宣稱判決是場「鬧劇」，並宣布中國在海洋中的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不受判決影響。³¹中國官媒《人民日報》刊出措辭嚴厲的社論，堅稱仲裁庭「忽略基本事實」，「踐踏」國際法，因此「中國政府與人民堅定（反對）判決，不承認也不接受」。³²

喜馬拉雅山區也許不會爆發另一場戰爭，但中國在南海的不妥協態度與行徑，極可能導向另一場區域衝突，而且比今日所見更加嚴重。此外，中國更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水壩建造者。許多河流由西藏、雲南流往下游國家，中國常未先諮詢這些國家便建壩攔水，甚至有計畫將西藏的水大規模導向中國核心地帶。

西藏就如同西方非政府組織Maptia所指出：

是世界獨特的大量淡水提供者，透過河流進入中國與十幾個下游國家。西藏是亞洲河流的主要源頭，此外更透過支流注入其他河川（例如恆河），地球上找不到任何類似情況。我們只有一個西藏，沒有備援，也沒有第二次機會。³³

還有事實獨立的台灣，是否真如北京宣稱，是中國的一部分呢？再一次，在這些議題上，中國認為抱持其立場以外的意見，都是干涉內政。

由於今日地緣政治現實牽涉甚廣，我們更需要回頭研究喜馬拉雅山區衝突的緣起與發展。如今中印仍舊是強大的區域對手，而兩者之間的敵意，開始於半個世紀前的喜馬拉雅山區。

有關邊界爭議的研究使我前往阿魯納恰爾邦、錫金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北部地區；也曾進入緬甸的克欽族領域、中國雲南省、尼泊爾

與不丹。倫敦大英圖書館館藏的印度辦公室檔案（India Office Records）是資訊的寶庫。記者身分無法進入西藏，但我詳細研究中國文獻與地圖，試圖找出北京主張的背景與歷史紀錄。研究途中曾有許多人提供協助，由於人數眾多無法一一誌謝，而且因為議題敏感，多數要求保持匿名。

即使如此，我想感謝魯巴的多吉．堪卓．騰多（Dorjee Khandu Thongdok）。中國攻擊魯巴時，他逃出故鄉，後來也寫下這段故事。我在達旺（Tawang）遇到兩名還記得一九六二年中國占領他們家鄉的藏人。一位瓦弄村民與我分享戰爭期間發生的事。大吉嶺有名年長藏人，比我認識的任何人都還清楚邊界情況。還有錫金甘托克（Gangtok）的地方官員。在西孟加拉邦北部的西里古里（Siliguri），我遇見阿比吉．馬遵達（Abhijeet Mazumdar），他是已故拿撒爾人（Naxalite）運動領袖查魯．馬遵達（Charu Mazumdar）的兒子。過去我也無數次訪問印度東北地區的那迦、米佐與曼尼普爾反抗軍，他們曾經在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前往中國受訓。同時，我也有機會訪問了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sam）反抗軍，包含最高領袖阿拉賓達．拉吉科瓦（Arabinda Rajkhowa）與派瑞許．巴魯亞（Paresh Barua）。在尼泊爾，我拜訪退休記者作家卡納克．馬尼．迪克西（Kanak Mani Dixit），以及其他當地媒體與研究區域暴力衝突的國際組織；同時也造訪了尼泊爾南部的難民營，此地從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就收容許多來自不丹的尼泊爾裔難民。在不丹，我有機會與數位政府官員討論中國相關議題，然而對方希望維持匿名。西藏專家朱利安．吉林（Julian Gearing）協助我探索錯綜複雜的西藏派系這困難任務；喜馬拉雅山區的佛教世界常令外來觀察者感到撲朔迷離。同時，我也想感謝阿拉斯泰爾．蘭姆。二〇一六年一月我在大英圖書館進行研究時遇到蘭姆教授。雖然我不同意蘭姆的論點與結論，但他慷慨分享資訊，甚至送了我一些相關書籍。我從未試圖聯繫奈維爾．馬克斯韋爾，除了《印度對華之戰》，我還讀了他另一本較不為人所知的著作《中國邊界的解決與衝突》（China's Borders: Settlements and

Conflicts)，以及過去數年發表在《經濟政治週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的文章。³⁴

當然，面對中印爭議如此炙手可熱的衝突性議題，充斥許多相互矛盾的歷史與當代紀錄，我們很難達到完全精確無誤。但我盡一己之力，在此呈現衝突的完整細緻樣貌：衝突為何及如何開始；衝突轉變後的樣貌；衝突在當今亞洲現實中所代表的意義。倘若有任何事實出入，那麼都是我的責任，與任何口述或書面資料來源無涉。

¹ Debasish Roy Chowdhury, 'Neville Maxwell discloses document revealing that India provoked China into 1962 border w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scmp.com/news/asia/article/1461099/neville-maxwells-revelation-reveals-india-was-hiding-nothing-over-its-1962> (accessed on 3 April 2016).

² Henry Kissinger, *On China* (London: Penguin, 2012), pp. 187 - 9.

³ Debasish Roy Chowdhury, 'Neville Maxwell: The full transcrip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1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461102/neville-maxwell-interview-full-transcript> (accessed on 3 April 2016).

⁴ Bruce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Tibet, the CIA, and the Sino-Indian War*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India, 2016), p. 88.

⁵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1972), p. 380.

⁶ Eric S. Margolis, *War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229.

⁷ John P.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the Angry Truth About India's Most Crushing Military Disaster* (Dehra Dun: Natraj Publishers, 2010) pp. 152 - 4.

⁸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p. 98.

⁹ Quoted in 'The Politico-Diplomatic Prelude Part-2', P.J.S. Sandhu, Bhavna Tripathi, Ranjit Singh Kalha, Bharat Kumar, G.G.

Dwivedi, Vinay Shankar (eds.), 1962: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2015) p. 24.

¹⁰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p. 101.

¹¹ John 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90 - 1.

¹² For Garver's excellent study of the 1962 War, see his essay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p. 93.

¹³ Nicholas Eftimiades,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lford, Essex: Frank Cass, 1994), pp. 90 - 91.

¹⁴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pp. 105 - 7, 114, 119.

¹⁵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p. 107.

¹⁶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 - 1966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7.

¹⁷ 'A Tibetan Communist Plot', Kenneth de Courcy (ed.) Intelligence Digest: A Review of World Affairs, New York, October 1952, p. 4.

¹⁸ Author's interview with Mowu Gwizan, Kohima, 18 October 1985.

¹⁹ For an account of the Mekong River Operation, and a list of the PLA unit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campaign, see this unusually detailed account in Wikipedia: 'Campaign at the China - Burma border (1960 - 61)',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mpaign_at_the_China%E2%80%93Burma_border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²⁰ Chowdhury, 'Neville Maxwell discloses document revealing that India provoked China into 1962 border war', 2014.

²¹ V.K. Singh, Leadership in the Indian Army: Biographies of Twelve Soldier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2011), p. 280.

²² See the Henderson Brooks - Bhagat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wp-content/uploads/2014/03/TopSecretdocuments2.pdf>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For a reference to the Forward Policy, see p. 8 and p. 10,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it is obvious that politically the “Forward Policy” was desirable and presumably the eviction of the Chinese from Ladakh must always be the eventual aim’.

²³ B.G. Verghese, ‘50 Years after 1962: A Political Memoir’, South Asia Monitor, 23 Sept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pragati.nationalinterest.in/2012/10/50years-after-1962/> (accessed on 15 March 2017).

²⁴ Leo E. Rose,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5’, Pacific Affairs, Vol. 41, No 1 (Spring), 1968, pp. 132 - 3.

²⁵ Li Xiaobing,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7), pp. 109 - 10, 125.

²⁶ ‘The Chinese Air Threat’, P.J.S. Sandhu, Bhavna Tripathi, Ranjit Singh Kalha, Bharat Kumar, G.G. Dwivedi, Vinay Shankar (eds.), 1962: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2015), p. 119.

²⁷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p. 297.

²⁸ Philip Short, Mao: A Life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9), pp. 435 - 6.

²⁹ 譯者注：西方稱為斯普拉特利群島（Spratly Islands），華人稱之為南沙群島，越南稱為長沙群島。

³⁰ Ma Huan, Ying-h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Bangkok: White Lotus, 1997). This is a reprint of a work compiled in 1935 by the Chinese scholar Feng Ch’ eng-chun.

³¹ The ruling can be found at <https://www.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2165479-phl-prc-press-release.html> (accessed on 18 September 2016). See also Tom Phillips, Oliver Holmes, and Owen Bowcott, ‘Beijing rejects tribunal’s ruling in South China Sea case’, The Guardian, 12 July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jul/12/philippines-wins-south-china-sea-case-against-china> (accessed on 20 July 2016).

³² Phillips et al., ‘Beijing rejects tribunal’ s ruling in South China Sea case’ . The response from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 available at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379492.shtml

(accessed on 20 July 2016).

³³ See <https://maptia.com/michaelbuckley/stories/stealing-tibet-s-rivers> (accessed on 30 May 2016).

³⁴ These books and articles are listed in the Select Bibliography.

第一章 未必是邊界爭議

棒山口（Bumla Pass）位於海平面五千公尺之上的喜馬拉雅山東翼，盤踞在分隔印度次大陸與西藏高原的崎嶇山巔。更加高聳銳利的山峰在一段距離外，沿著形成今日中印間實質控制線的分水嶺拔地而起。此高地空氣稀薄，鄰近並無人居，唯一冒險來這裡的當地人是半游牧犛牛牧民。夏季的高山坡地由青草取代白雪，放牧季節他們會帶上牲口，在中印掌控的領土間自由來去。

其他訪客若無印度政府核發的特別通行證，就不得進入棒山口。這裡是高度軍事警戒區，通往山口的狹窄道路上，行駛的幾乎都是軍用卡車與吉普車。山口南方邊緣設有一群厚實建物：會議廳、瞭望台及警哨。一塊告示板標誌出印度控制結束的地點，牌上顯示印、中兩國國旗及一句話：「兩大古老文明鄰國。印度與中國，進步的夥伴。」³⁵位在中印邊界上的棒山口，是少數能讓兩國軍官會面討論共同議題或歡慶彼此國慶的地點。中國在會面時會搭設帳棚，活動結束後隨即拆卸；面向山口的對側則沒有任何實體建物，因為對中國來說，那將代表承認山峰就是兩國之間的正式邊界。

這是麥克馬洪線，以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會議的英國主要談判官，亨利·麥克馬洪（Henry McMahon）命名。英國與西藏承認這條邊界，但後續的中國政府並不承認。一九六二年戰爭最決定性的一場戰役就發生在棒山口。

那場戰役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清晨爆發，山口北側的中國軍隊向印度軍隊發動強大砲火，爆炸照亮夜空，響聲在山稜間迴音繚繞。天亮之後，中國已取下最近的印度據點，當時那裡是由準軍事組織「阿薩姆步槍隊」的三十名成員負責防守；十七人當場死亡，十三位存活者則遭俘虜。另一支較強的錫克軍團則駐紮在離山口實際地點一段距離以外的地方，他們發動強力反擊直至彈盡援絕，最後不得不撤退。³⁶

中國人民解放軍帶著六個步兵團與一個獨立營的總軍力，以壓倒性的武力開始往前推進，過程並未遇到太多阻礙。印度在此區域駐有數百名軍士，但配備落後，而且從南方阿薩姆平原到此處的補給線漫長險阻，僅有吉普車與馱獸隊能上到達旺，當時東北邊境特區西北段的主要城鎮（如今東北邊境特區已成為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解放軍在達旺並未遭到抵抗，因為印軍在棒山口之役後已連夜撤退。達旺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落入解放軍之手。

實際上，中國對邊界印度據點的攻擊始於十月十九日，當時達旺西北方的印度據點已遭砲擊。次日中國接著對棒山口以西、靠近不丹邊界的塔格拉山脊（Thagla Ridge）發動猛烈砲火與步兵攻擊；當天早晨同一時間，其他中國軍團則攻擊印度次大陸的另一側，印度在喀什米爾西北角拉達克地區的據點。因此戰爭並非限於東北邊境特區（雖然東部前線的損失最為慘重）。在塔格拉山脊，解放軍幾乎殲滅整個印度軍隊第七旅，並俘虜指揮官約翰·達爾維准將。印度無力抵抗解放軍較強的火力攻擊，其東北邊境特區西段防線一片混亂。

對解放軍來說，想提供軍隊補給並不像印度軍隊那麼艱困，因為中國在攻擊前數年已經鋪設道路通往此區。在東翼有好幾條路直通實質控制線，直接面向對側的印度東北邊境特區；在西翼也早已建好一條穿越阿克賽欽的公路，連接新疆與西藏。

隨著塔格拉山脊與棒山口的印軍防衛潰散，人民解放軍可以直下達旺。海拔高三〇四八公尺的達旺屬於高山區域，由於在更高山峰與邊界隘口的籠罩下，是一處相對肥沃的谷地。解放軍取得達旺附近區域後，數千名挑夫、建築工、推土機和重工具，開始源源不絕跨過棒山口。中國採用每日三班輪調不休的方式，僅花十三天就穿越極端崎嶇的山區地形，建出一條將近四十公里的道路，連接了棒山口與達旺。人民解放軍的卡車此時可開抵達旺，此處成了中國的主要補給基地。接著解放軍往南推進，目標是達旺南方七十八公里處、位於戰略位置的色拉山口（Sela Pass）。經過一場激鬥後，色拉山口也落入中國手中。十一月十九日，勢如破竹的中國軍隊來到達旺以南一百七十

公里的邦迪拉，當時人民解放軍距離阿薩姆與肥沃的布拉馬普特拉河平原，僅有數天路程。

隨著中國入侵東北邊境特區的極東角落，戰爭開始擴大。十月二十二日，中國對基比圖（Kibihtoo）的印度據點發動攻勢，此地位於瓦弄小城以北，靠近緬甸邊境。經過一段休戰時期，人民解放軍於十一月十三日再度往前推進，三天後攻下瓦弄，並奪下當時印度稱為蘇班西里與桑朗邊境分區（Subansiri and Siang Frontier Division）的數個村莊。此區域位於東北邊境特區的中段，北方緊鄰實質控制線。

印度側陷入一片驚慌。由於不敵人民解放軍的優勢軍力與火力，東北邊境特區的防衛完全崩潰，印軍從整個區域撤退。許多人相信解放軍會直下阿薩姆，奪取油田、茶園、苧麻莊園及其他資源。即使布拉馬普特拉谷地的駐軍城市德茲普早已疏散，印度只能等著看似無法避免的喜馬拉雅崩潰發生。

中國的攻勢不僅在印度東方邊界東北邊境特區與西藏間的據點。查穆與喀什米爾邦（Jammu and Kashmir）東北角的拉達克阿克賽欽區域，一處偏遠的印度據點也遭到攻擊。十分鐘後，中國地面部隊展開戰鬥，此據點隨即被攻下。根據印度消息來源，該據點的防衛武力並沒有任何砲火或迫擊砲，僅用小型軍火從開放壕溝反擊。³⁷防衛連中沒有任何印度士兵活著或成功逃離戰場。六十八人中有三十六人死亡，其他人則受傷或被俘。

隨著一開始在拉達克的成功，中國也往前推進，從北、南、東三方向區域中其他印度據點發動多面攻擊。戰前中國就在此區進行綿密的情報蒐集，加上在占據西藏的數年間，中國軍隊預備對印度的戰爭，已然習慣此地高度。同時，他們顯然也受過訓練，學習如何破壞尚未全面建構完成的印度防衛網絡。³⁸

十月底時，中國軍隊已占領上印度河谷地東翼岡底斯山脈（Kailash Range）的多數戰略地點，包含了空喀山口（Kongka Pass）及通往班公措（Pangong Lake，超過四千公尺的高山內陸鹹水

湖）的區域。四個營的印度軍力遭到殲滅，其他則由高原據點撤出。休兵一段時間後，中國重整軍力強化防線，並輸入更多補給。十一月十八日，中國再次出擊，同樣運用多面向攻擊，包圍擊潰區域裡僅存的印度據點。

然而就在隔日，當人民解放軍抵達邦迪拉時，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官邸召見駐北京的印度代辦班納吉（Purnendy Kumar Banerjee）。周恩來告訴班納吉，中國將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布熄火停戰，並將所有軍隊撤到實質控制線以北二十公里的據點。之後中國履行承諾，戰爭就此結束。人民解放軍在數週內撤回山脈另一側的中國控制區。

此舉不僅震驚印度，更令全球許多政治軍事觀察家訝異。究竟是什麼原因驅使中國發動攻擊，造成了如此短暫卻殘酷血腥的戰爭？根據中國的紀錄，印度死傷人數為四千八百九十七人，被俘者為三千九百六十八人；新德里國防部公布的傷亡數字則是一千三百八十三名軍人陣亡，一千零四十七名傷者，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在戰鬥中失蹤，被俘者數字則與中國公布相同，為三千九百六十八人。人民解放軍的傷亡數字遠低於印度軍隊，根據中國資料，死者七百二十二人，傷者一千六百九十七人，沒有軍士遭俘。正如美國軍事史學者伍爾澤（Larry Wortzel）與中國學者程鋒（Cheng Feng，音譯）所指出，此為「戰爭史上少見之事」。³⁹

然而，中國的攻擊不應視為全然意外之舉。中國入侵印度宣稱所有的領土，可追溯到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除了知道一九五七年中國已在西部建造一條一百七十九公里、穿越阿克賽欽的公路；中印邊界首次衝突發生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巡邏武力攻擊東北邊境特區的朗久（Longju）哨所。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拉達克的空喀山口發生駁火事件。朗久衝突導致印度兩人陣亡，空喀山口衝突則有十七名印度士兵死亡。中國宣稱此舉為「自衛行動」；另一方面，印度表示遭到中國「猛烈的突然攻擊」。⁴⁰

想了解一九六二年戰爭起源及中印衝突與敵對關係，關鍵在仔細觀察棒山口告示板上所寫的字句。即使板上寫著應該扮演「進步夥

伴」的兩個「古老文明鄰國」，但從兩國歷史、社會結構與政治文化來看，我們很難想像比中國與印度更加迥異的文化。

許多世紀以來，印度興衰榮敗的王國與帝國，總是擁有諸多語言與不同宗教的高度多元國家。多數語言都有自己的拼音文字，各不相同。即使到了今日，「多元中團結」仍是印度立國的理念。沒有任何單一宗教、語言或政治團體能夠獨占權力，而這正是印度得以長久維持民主制度的原因。

另一方面，中國長久以來則由單一族群（漢人）主宰的帝國統治。數世紀來，漢人征服（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吸納）了其他少數民族。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的確是由滿人建立，與前代統治者相比，清朝時（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二年）國家呈現部分多元文化性格。其他非漢人王朝（遼、金、元）可能也是例外。雖保有部分族群認同，滿人菁英同時也習得所有傳統中國統治者的表象。他們使用標準中文，到了十九世紀，滿語幾乎在中國消失。即使如此，反清運動領導人之一的孫逸仙醫師，仍在一九〇四年寫下運動目標之一：「驅逐韃虜」（即滿人）。⁴¹一九一二年清朝遭推翻，孫逸仙醫師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此後數十年，許多滿人後代試圖掩飾自己的族裔出身，順應漢人習慣與文化。⁴²

中國各地方言互有相異，其中部分如廣東話、客家話與福建話可能無法相通，而且與「標準」中文相當不同，但以語素（logogram）而非拼音文字為主的書寫系統，仍舊適用於全國各地。在政治文化上，中國長期由權威性思想體系主導，包含過去的儒家或共產主義，或今日の後共產極權資本主義。

這並不表示中國社會必然與民主價值不相容。台灣正是一個明顯案例，展現出中國文化國家也能擺脫極權專制，成為亞洲最蓬勃發展的民主國家之一。然而，一九六二年中印衝突期間的中國卻是殘暴獨裁政權，背後更有漫長的極權統治歷史。即使一九八〇年代「走資派」鄧小平啟動開放市場改革，為中國帶來了驚人的經濟自由化，這點仍舊沒有改變。

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獨立後，仍維持英國統治時代引進的許多制度，例如民選國會與專業司法體系。英國離開後，這些制度發展完全走向民主，而非由外國勢力掌控，逐漸成為擁有許多政黨的議會民主政體。印度軍隊現今雖全數由印度人指揮，仍深受英國殖民時代的軍團傳統影響。指揮體系維持不變，以族群為基礎的軍隊編制也獲保留，並加入新的編制。最重要的是，印度從獨立之初便建立了軍隊由文人政府控制的原則。

英屬印度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與亞歐的英國軍隊並肩作戰。印度獨立之後，其軍隊也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包含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前往中東，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前往剛果，一九五〇年印度曾將一組醫療隊派往韓國。衝突結束後，科丹德拉·蘇巴亞·提馬亞中將（Kodendera Subayya Thimayya）出任聯合國成立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主委。提馬亞中將被朋友及一般大眾暱稱為「提米」，他受訓於英國桑德赫斯特軍事學院，二戰期間是英屬印度軍隊中唯一的步兵旅指揮官。提馬亞獲得英國皇室頒發傑出服務勳章，並在報導中表彰其對抗日本的精采表現。

一九五四年，印度派遣一個步兵營與支援人力前往印度支那（包含越南、寮國與柬埔寨），協助監督停火及戰犯遣返。這次行動並未涉及戰鬥，主要任務是在印度支那監督執行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議（1954 Geneva Accord）。印度持續與加拿大、波蘭人員共同推動工作，直到一九七三年。⁴³

印度在一九四七年甫獨立之際，其軍隊在邊境與巴基斯坦因喀什米爾問題展開一場艱苦戰爭，而維安武力也用來統一部分拒絕加入獨立印度的前大公國。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印度派軍隊前往鄰近緬甸的東北邊境，鎮壓那迦山地的分離主義反抗軍，後來演變成與當地部落游擊隊的長期拉鋸戰。一九六一年，印度軍隊接收印度西海岸上的三個葡萄牙飛地：果亞（Goa）、達曼（Daman）與迪烏（Diu），緊接而來的是一九六二年與中國的衝突，以及自一九四七年後再次與巴基斯坦展開戰爭。

整體而言，印度軍隊是遠離政治的專業軍隊，其主要目標在於保衛國家疆界，以及捍衛民選政府認定的國家安全利益。即使是退休軍官，也傾向成為智庫的安全分析師，而非從政。

另一方面，戰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理想典型，則展現在虛擬士兵雷鋒的個人形象上。⁴⁴這名臉頰紅潤的謙遜人物會一手拿扳手修理軍用卡車，另一手拿著毛主席的著作。他的目標，以他的話來說，就是「為黨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⁴⁵雷鋒的故事與神話在今日看來也許滑稽，但中國歷經了政治變遷卻也未曾改變。即使到現在，中國依然將三月五日定為「學雷鋒紀念日」。

不論有無雷鋒其人，人民解放軍正如其名所暗示，是在一九二〇年代第一次國共合作末期設立，以意識型態驅動的「人民軍隊」。在周恩來、賀龍與朱德的領導下，部分國民黨軍隊在南昌起義中反叛國民政府，雖然遭到鎮壓，但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被稱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的共產黨武力正式成立。這支軍隊後續簡稱為「紅軍」，曾多次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紅軍從中國南方江西舊部展開漫長的軍事撤退，前往北方陝西省的延安，獲得進一步強化。這段廣為人知的「長征」，在三百七十日中穿越了九千公里。最終抵達延安的八千人中，有七千人來自一九三四年十月從南方出發、原本有八萬六千名軍士的隊伍。疾病、飢餓、政府軍戰鬥及當地軍閥勢力等，都讓紅軍損失慘重。

在延安防禦良好的新基地裡，紅軍被改造為一支難以對付的武力。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戰爭中，紅軍曾與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合作。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國共內戰再次爆發，此刻這支革命軍以「人民解放軍」聞名。就在二戰剛結束、內戰方興之際，共產黨軍隊已擁有超過九十萬正規軍與兩百萬民兵。⁴⁶

之後國民黨戰敗，蔣介石逃亡至台灣島，他的中華民國政權也帶著「有朝一日光復大陸」的無望渴念，在島上持續下去；然而這期望未曾實現。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在數十萬歡呼

群眾之前，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說：「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⁴⁷

中國官方歷史盛讚毛澤東為軍事天才，實際上不過是個迷思，更是一九六〇年代圍繞著毛而發展出來的個人崇拜之一。毛澤東是政治而非軍事領袖，紅軍與人民解放軍的實際創建者與指揮官是朱德（出身中國南方雲南四川省的軍閥，在南昌起義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朱德的革命事業起於中國最有力的祕密結社之一，他曾是哥老會的袍哥，還沉溺於鴉片，直到一九二〇年代初期才前往上海接受治療。形塑了游擊戰操作原則的並非毛澤東，而是朱德（儘管他的人品可疑），使下面這段簡要箴言傳揚於世：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⁴⁸

直到一九五四年，朱德才卸下人民解放軍元帥的職務，此後擔任數項黨政職，之後於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鬥爭清算。毛澤東雖非軍事領袖，但他對共產黨軍事原則的貢獻，則來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於中共中央委員會提出的知名口號：「槍桿子裡面出政權」。⁴⁹這句話從此成為全世界革命運動的指導原則。（而自從馬克思本人提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後，支持其他國家革命就成了馬克思主義的信條。）

一九六二年在喜馬拉雅山區發生衝突的兩支軍隊與其指揮官，迥異之處正如南轅北轍，這是戰爭中極重要卻遭忽視的面向。這是兩個文明間的衝突，而非只是「爭奪喜馬拉雅偏遠山巔控制權」或「中印界線究竟該怎麼劃」的戰爭。

以色列學者亞可夫·維茲伯格（Yaacov Y. I. Vertzberger）認為尼赫魯未能認清中印之間的文化與歷史差異，因此粗糙地誤判中國的意圖。尼赫魯的觀點存在著客觀、普世接受的國際法律體系，認為若印度以地圖與條約支持自己的主張，中國終將承認印度在法理上站得住腳。相反地，中國從未在意過國際法，不論是當時（如維茲伯格的一九八〇年代研究指出），或者更晚如近期的南中國海爭議所見。根

據維茲伯格的研究，尼赫魯同時也未能完全了解「印度爭取獨立及中國擊敗日本與國內反動勢力（國民黨）這兩個過程的根本差異」。50

印度透過公民不服從運動爭得獨立，血腥暴力不多，也因此讓殖民政權與獨立運動形成類似相互友好尊重的關係；另一方面，毛澤東與共產黨的經驗則截然不同。根據維茲伯格所述：「因此，印度可以在思想上拒絕英國殖民主義，卻仍採用英國人留下的部分表象，如政治文化、邊界與地緣策略思考。」51尼赫魯「接納英國的地緣策略思考，因為對他來說，過去與現在是延續的」。52然而對中國來說，延續這概念並不存在。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贏得勝利前，與外國勢力簽訂的任何條約，確實可被視為「不平等條約」，因此新政權並不須履行。毛澤東本人早在一九二五年，就於九項基本原則中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53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當印度外交官與學術研究者忙著起草各式白皮書，欲證明印度對於邊界爭議的詮釋禁得起歷史檢視時，中國正在備戰。54對中國來說，邊界問題訴諸法律途徑，不過是場「虛偽騙局」。55維茲伯格認為，履行「不平等殖民條約」對中國毫無意義，因此也從未承認麥克馬洪線。中國仍主張今日阿魯納恰爾邦多數區域屬於中國，並持續在所有正式地圖中，劃定中印邊界在山腳邊。

支持中國說法的人（包含馬克斯韋爾與蘭姆）指出，這也約莫是英屬印度時代及部分印度獨立後的地圖所劃的邊界之處。諷刺的是，援引舊地圖與條約的馬克斯韋爾與蘭姆其實與尼赫魯同樣誤判，只是導出不同的解讀。即使是中國說法的狂熱支持者，也難以宣稱在舊地圖上確實存在中印國際邊界，並由中印（或英屬印度）的移民關稅官員把守關口。認定英屬印度時代西藏就是中國一部分的人，也難以論證這區域是在拉薩治下。

英國國家廣播公司孟加拉語服務前總監馬赫穆德·阿里（S. Mahmud Ali），在其討論中印衝突頗具權威性的著作中指出，直到一九五一年，東北邊境特區是由「西藏喇嘛治理」。56這是對當時現實狀況的重大誤解。沒有任何西藏喇嘛曾統治過中國宣稱所有的區域。

西藏收稅官駐紮在達旺及最西側的少數地方，喜馬拉雅山巔附近的少數村落也曾繳納土地稅，這是中央集權西藏政府能抵達的最遠極限。今日中國政府稱阿魯納恰爾邦為「藏南」，這是過去從未存在的概念。

除了間諜外，中國人在一九六二年戰前曾出現此地的唯一紀錄，是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二年間。清帝國末年，中國曾派遣軍隊入藏，這次侵藏是由趙爾豐領軍，因其殘暴鎮壓藏人的行徑，被稱為「趙屠夫」。一九一〇年，趙爾豐的軍隊抵達拉薩，根據歷史學家約翰．羅蘭（John Rowland）的紀錄，「當神王（達賴喇嘛）與隨從騎馬出逃錫金時，一小群藏兵為其斷後。」⁵⁷達賴出逃印度，受到加爾各答英屬印度政府的庇護。

趙屠夫於一九一一年離藏，前往四川鎮壓叛變，結果反遭革命軍逮捕處決。然而部分中國官員直到一九一二年才離開西藏，並穿過喜馬拉雅山脈，抵達後來成為東北邊境特區的極東區域。他們在瓦弄的東南方豎立邊界柱之後撤退。

一九一四年一月，這些邊界柱由英國行政官歐卡拉罕（T. O' Callaghan）移除。除此之外，他還穿過分水嶺，進入藏邊的力馬（Rima）與當地西藏官員面議，但並未見到任何中國勢力。⁵⁸

歐卡拉罕移除邊界標記的前一年，弗雷德里克．馬士曼．貝利上尉⁵⁹與亨利．特雷斯．摩謝德（Henry Treise Morshead）帶領英國探險隊，前往測繪瓦弄以西及西北區域。他們發現西藏官員對於英國入侵此區（甚至西藏本土）有所警覺。

貝利留下與西藏官員的交涉紀錄⁶⁰中寫道：

他問我們是否將在米培（Mipi）或洛希特河谷（Lohit Valley）駐軍。我說密什米人區域的瓦弄已派駐一名軍官。他問我們是否也會在西藏駐軍，我向他保證無此意圖。我不清楚他是否相信。他只是回說西藏唯一的外國人經驗是中國人，而他們很殘酷。

趙屠夫的屠戮記憶仍深植藏人心中。顯然當時此區並無中國行政官員，他們在一九一二年占藏結束時已隨軍隊撤出。除了明顯反中之外，藏人認為山巔是行政管理的界線。

但馬克斯韋爾對邊界標誌重要性及邊界位置有不同詮釋，「中國……在一九一〇年豎立標誌，藏人堅持邊界在此，而非上游二十公里處的麥克馬洪線。」⁶¹我不清楚馬克斯韋爾是在什麼基礎上，宣稱西藏與中國針對邊界爭議有某種共識。這可能性並不高，而且實際上這些標誌也不過只存在了兩年出頭。

一九五〇年中國入侵西藏，大幅改變整個區域的地緣政治。直到那時之前，西藏與印度的關係向來比中國來得親近，卻再也不是事實存在的獨立國家。印度的內政部長瓦拉拜·巴特爾（Vallabhbhai Patel），是當時政府中少數理解這項改變背後重大意涵的人。巴特爾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去世，他在死前一個月曾致信尼赫魯：

我們必須思考此刻面臨的新情勢，西藏消失帶來的後果，如我們所知，是中國的擴張已到我們門口。歷史上，我們很少憂慮東北邊界。喜馬拉雅山一向視為北方入侵者無法穿越的障礙。友善的西藏也很少製造麻煩。中國因為內部分裂的緣故，從未騷擾我們的邊界。⁶²

然而尼赫魯身為理想主義者，並無法理解北京共產黨新統治者的思想，仍持續相信要與中國建立友誼關係。在他的想法中，印度與中國同樣是從壓迫中崛起的國家，應該與亞非其他獨立解放的國家攜手合作。因此在一九五〇年代，中印關係在印地語（Hindi）口號「中印兄弟之邦」（Hindi Chini Bhai Bhai）中蓬勃發展。

一九五四年印度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與印度的通商和交通協定》，首度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⁶³不過印度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就實質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正式同意中國（而非西藏）政府將印度駐拉薩代表團的地位改為總領事館。⁶⁴印度也是首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共產國家之一，大使層級的外交關係始於一九五〇年四月一日。

中印兄弟之邦的關係本應在一九五四年協定的前言中穩固底定，其中包含五項和平共處原則，在印度稱為《五德條約》（Panchsheel Treaty），panch代表五，sheel則是梵文中的美德之義。這五項原則是：

- （一）互相尊重領土主權
- （二）互不侵犯
- （三）互不干涉內政
- （四）平等互惠
- （五）和平共處

中國當時仍然弱小，因此印度及其深受敬重的政治家尼赫魯，在舊殖民帝國如英、法等西方強權崩毀後，成為了亞非新興國家的領袖。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個亞非新近獨立國家在印尼萬隆會面時，尼赫魯的《五德條約》也成為不結盟運動的基礎。

在果園環繞、荷蘭人興建的運河與殖民風格別墅中，印尼總統蘇卡諾（Sukarno）接待一群亞非國家領袖，包含陰晴不定的柬埔寨王子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引領時代的埃及總理納瑟（Gamal Abdul Nasser）、錫蘭（今日的斯里蘭卡）的約翰．科特拉瓦拉爵士（John Kotelawala）、巴基斯坦總理柏格拉（Muhammad Ali Bogra）及緬甸總理吳努（U Nu）。當黑色禮車載著各國貴賓抵達萬隆的會議廳時，許多人對「殖民主義」的憂慮遠大於共產主義。

在尼赫魯堅持邀請下，中國的周恩來也出席會議，不過他差點無法成行。尼赫魯派到香港載運周恩來前往雅加達的印度國營航空「喀什米爾公主號」，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墜落南中國海。國民黨特務在機上放置炸彈，目標明顯就是周恩來；然而周因為行程延誤並未登機。空難三天後，周恩來先飛往緬甸仰光，會見尼赫魯與吳努，才又繼續到萬隆出席會議。

一九五四年六月至一九五七年一月間，周恩來訪問印度四次。尼赫魯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前往北京，不只會見周恩來，還有偉大領袖毛

主席。正如《紐約時報》所說，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非共產國家元首第一次訪華。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所述，「市中心與機場間的六英里間，擠滿了密不可破的人牆，鼓掌歡呼，並持續高喊著中文標語：『和平萬歲！』」⁶⁵

然而，隨著中國侵藏暴力血腥逐步升高，西藏的情勢更加危急。根據西藏反抗軍恩珠倉．貢布札西（Gompo Andrugtsan）的記載：「中國人收取大量金錢稅收，當地人遭到隨意拘捕，公開處決，以儆效尤。僧院遭到毀壞，僧侶們無故遭到關押處決。」⁶⁶

這段期間的衝突，導致西藏東部一向強悍獨立的游牧民族康巴人起義反擊，他們運用手邊任何武器伏擊中國軍車隊伍。康巴反抗軍吸引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注意，並空投資源進入西藏；部分的康巴人逃出西藏，並在美國控制的太平洋島嶼塞班島接受訓練。印度西孟加拉邦北方的噶倫堡（Kalimpong）成為祕密行動與情報蒐集的基地。

美中關係學者高龍江在其中印衝突著作中引述：

史蒂芬．霍夫曼（Steven Hoffman）對於此時期印度決策過程的細膩研究中（總結）：「一九五八或一九五九年的印度政府，對於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主要動作究竟了解多少仍不得而知……（印度國安首長波拉．納特）穆立克在回憶錄中堅稱，尼赫魯認為武裝西藏反抗勢力乃自殺之舉，且毫無益處；他堅持和平、非暴力反抗才是最好的方式。（西藏史學家）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也認為尼赫魯與其他印度領袖直到一九六二年戰爭後，才得知美國支持西藏武力反抗的活動。」⁶⁷

另一方面，其他作者如肯尼斯．康伯伊（Kenneth Conboy）與詹姆士．莫里森（James Morrison）則認為，尼赫魯與穆立克至少知道基本樣貌，並且默許中情局的行動。⁶⁸

中國無法理解西藏人對於被占領的憤恨，因此認定印度支持西藏反抗運動。一九五九年拉薩起義失敗後，達賴喇嘛出逃印度，中印關係進一步惡化。三月十七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之中，

強調西藏起義與印度政府之間的關聯，並且進一步懷疑英、美與印度同謀支持叛亂分子，而「叛亂指揮中心就設在噶倫堡」。69

至此，中印兄弟之邦已蕩然無存，鄧小平認為該給印度一個教訓。中國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入侵朗久與十月攻擊空喀山口，可能都是為了測試印度的防衛。美國學者唐諾·札哥利亞（Donald Zagoria）在中俄衝突的詳盡著作中，提供了一九五九年中國突擊的另一種解釋，再次展現中印衝突主要並不在於邊界劃定或遵守合約。他引述一九五九年十月，波蘭代表團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而訪問北京的紀錄：

波蘭人……認為中國共產黨對被摒除在高階談判外的憤怒，是北京當局決定要掀起中印邊界爭議的背後動機。十月在喀什米爾的事件中，好幾名印度士兵死於伏擊，這被認為是給印度、蘇聯與西方的警告，世界重要議題的解決，必須透過與北京直接談判。70

同時有件事也漸趨清晰，那就是毛澤東與中國的世界觀，和尼赫魯的不結盟主義、不涉入他國內政的理想截然不同。西方在冷戰期間形塑的三個世界模型，意指美國與盟友所屬的第一世界；蘇聯與衛星國所屬的第二世界；最後是中立、不結盟的第三世界國家。毛的三個世界模型則並非如此，對他來說，美、蘇屬於第一世界；日本、歐洲、加拿大則形成第二世界；亞、非、拉丁美洲則是第三世界。

中國自然渴望成為第三世界領袖，將印度從一九五〇年代就霸占的寶座奪過來，成為亞洲新近獨立國家的主要聲音。中國國家社科院研究員王宏偉在研究之中曾指出：「印度在併吞超過五百六十個縣之後，派軍進入喀什米爾，遂行擴張主義……自從印度中產階級菁英踏上當代亞洲歷史的舞台爭奪霸權後，中國必須展現優於印度的軍力，而一九六二年即達此目的。印度從未由此潰敗中恢復，尼赫魯本人在一九六四年死於失望與沮喪之中。而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成為多數第三世界革命者的標竿。如毛澤東曾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一九六二年戰爭也強迫印度放棄不結盟路線，首先尋求美國的支持，接著與中國的新敵人蘇聯結盟。當一九七一年印度軍隊干涉東巴基斯坦，協助反抗軍成立孟加拉時，不干涉內政從此走入歷史。聖雄甘地的非暴力理想已讓路給軍事化的印度；不但擴張軍隊規模，甚至在一九七四年五月試爆核彈。中國確實勝利，印度不再是第三世界追尋的典範，新典範已經變成中國。

即使快速掃視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後發動的戰爭歷史，也顯示出邊界爭議從來不是北京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導原則。除了一九五〇年代入侵西藏及轟炸台灣海峽上由國民黨掌控的金門與馬祖群島（這兩者皆是為了奠定新共產黨政府對於合法領土的主權），中國發動的戰爭全都有其意識型態動機，為了展現面對敵國的軍事優勢，以及展現對社會主義同志的團結支持。至於對國際疆界的尊重與否，從來不在其考慮之列。

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數十萬中國「志願軍」進入朝鮮半島支持北韓共產主義政權，對抗美國支持的南韓。韓戰於一九五三年簽訂停戰條約，產生目前仍舊分裂的兩個國家，北方是中國的盟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及南部親西方的大韓民國。韓戰裡由於中國訴諸「人海戰略」，亦即招募派遣一波又一波無經驗的士兵，直接面對南方的子彈砲轟，因此傷亡極為慘重。估計約有十五萬兩千名中國人死於韓戰，三十八萬三千人受傷。不過這也是中國軍事力量第一次受到認可；當政治狀況需要時，它將毫不遲疑以重大傷亡達成目的。

在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一年穿越邊界進入緬甸作戰的「湄公河戰役」後，中國在同一區域展開策略上更具冒險性的行動。一九六八年一月，數千名中國軍隊再次穿越邊境進入緬甸；這次則是與緬甸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Burma）叛亂武力共同作戰的「志願軍」。緬甸共產黨自一九四八年緬甸獨立開始，即對政府軍發動武裝鬥爭。一九五〇年代以來，超過一百四十名緬共流亡黨員住在邊界對面的中國。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奈溫將軍（Ne Win）出人意料地奪取首都仰光政權後，他們開始獲得中國大量協助。西方學者一般認定，由於

一九六七年六月仰光的排華暴動，催化中國決定援助緬共。但就如同中印邊境爭議一般，這也不過是讓中國採取行動的藉口。

緬共幹部一九六三年就已開始偵測邊界區域，尋找合適的滲透路線。同時他們也經介紹，認識一群一九五〇年代初期撤退到中國的克欽族反抗軍。由於多數緬共成員是都市知識分子，這群好戰的克欽部落戰士將成為緬共軍的核心。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初，中國「志願軍」仍然是緬共軍力的主力，多數都是來自中國的年輕紅衛兵，深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教育啟發，其中也不乏較具經驗的解放軍軍官及政委。

中國對緬甸共產黨的支持一直持續到鄧小平上台。政治上鐵桿、經濟上改革開放的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代改變北京的涉外政策，從支援革命運動轉向與鄰國建立雙向商貿關係。然而中國從未完全放棄緬共，因為後者仍是有用工具，能讓中國在緬甸內部發揮影響力。

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國與蘇聯爆發邊界戰爭，表面上看來是為了爭奪烏蘇里江上的某些沙灘地。然而，就如同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衝突，其政治動機遠比邊界來得更重要。北京欲向第三世界展現革命中國的強大，甚至足以對抗「蘇聯修正主義叛徒集團」（中國在一九六〇年與莫斯科關係破裂後，即以此稱呼蘇聯領袖）。中國才是世界所有受壓迫人民的真正領袖，而非蘇聯。

直到越南戰爭於一九七五年五月結束前，中國對北越與南越的共黨游擊隊提供大量援助。然而，中越之間幾世紀的不信任導致關係惡化，河內政府逐漸向蘇聯靠攏。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九年一月，越南入侵中國在中南半島的主要盟國柬埔寨，正好成為北京給區域鄰國另一場「教訓」的機會。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國軍隊跨境進入北越；他們與一九六一年進入緬甸追擊國民黨的軍隊來自同個軍團。然而這次的解放軍跨境戰役，並不如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來得成功。越南的反擊造成中國軍隊重大傷亡。雙方皆未贏得勝利，而這也是人民解放軍最後一次進行此類戰役。此後，人民解放軍將重心放在建立更現代化的專業軍隊，而非過往的「人民軍隊」。

然而回到一九六二年，那時人民解放軍仍是由中共政委領導，是以意識型態驅動的組織。同時印度（特別是尼赫魯本人）顯然並未了解這點。尼赫魯對周恩來的信心也明顯受到誤導。深諳多種當地方言的英國西藏事務專家喬治．派特森（George Patterson）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著作《北京與德里》（Peking Versus Delhi）⁷²中提到：

周恩來有較不為人知的一面，他迷人、聰明、甚至「溫和」的外表是用來贏得友誼、影響他人的工具。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委員與特務組織負責人顧順章背叛共產黨，向漢口警方投降。當時周恩來親自帶領一組人去勒斃顧順章一家，包含僕人與嬰兒。

雖然顧順章本人逃過一劫，但在他逃亡時，黨也做出懲處顧家的決定。到了一九三五年，顧順章對國民黨當局不再有用時，他也遭到處決。同時間，周恩來對共產黨裡真實或猜測認定的叛徒，曾執行過許多類似的清算謀殺行動。周恩來與令人懼怕的特務頭子康生同樣強硬，而後者在一九六〇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以殘暴聞名。

更重要的是根據中國文獻顯示，周恩來對於來自尼赫魯展現的喜愛之意，並沒有投桃報李之心。中共一向認為尼赫魯是中產階級民族主義領袖，與社會主義沾不上邊，甚至早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建國前，就有對印度總理的抨擊。根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由中共文化委員會出版的雜誌《世界知識》的一篇文章稱，尼赫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出刊的雜誌宣稱：「尼赫魯是尾隨帝國主義者之後的丑角，認定自己是亞洲人民的領袖……國家獨立運動的叛徒，下流惡棍……以及帝國主義的忠實奴才，帝國主義者將尼赫魯當作蔣介石的替身。」⁷³

周恩來及其同志於中文出版品上的發表，在「中印兄弟之邦」年代背後所做的批評，雖然尼赫魯毫無所悉，美國中央情報局對中國想法卻相當清楚。最近才解密的一九六三年三月二日中情局最高機密報告⁷⁴中寫道：

中國的外交努力是場五年的偉大詐騙計畫，主要由周恩來策劃與執行。周恩來展現出溫和傾向，以及對中印友好關係的真誠期望，玩

弄了尼赫魯的亞洲反帝國主義心態。周的策略是在與尼赫魯的對話與溝通中，避免明白表達中國對邊界的宣示，同時也避免撤回任何會改變中國地圖的宣示。一九五四年十月在北京的會面，周和尼赫魯站在同一陣線，主張共產中國「尚未有時間重新審視」國民黨地圖，以此留下暗示，卻沒明白表示這些地圖會被重新審視。一九五六年十一至十二月訪問新德里時，周試圖讓尼赫魯留下一種印象：北京可能接受麥克馬洪線。然而他的言語依舊模稜兩可，猶如左手讓出，右手收回。

同一份中情局報告也提到，緬甸前總理巴瑞（Ba Swe）曾於一九五八年致信尼赫魯，警告他在中印邊界議題上要「謹慎」應對周恩來。同時，緬甸也與中國進行共同邊界協商，最後在一九六〇年簽訂協議劃界，結果對緬甸不利。

根據報告，「尼赫魯在回覆中宣稱周恩來是『誠信之人』，足以信賴。」⁷⁵當人民解放軍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大舉跨越喜馬拉雅山時，尼赫魯與印度為這份信任付出了相當重大的代價。

部分分析師與史學家認為，中國願意透過雙方各自讓步達成和解。中國願意放棄對東北邊境特區的主張，以此交換印度承認中國對阿克賽欽的實質控制；畢竟中國就是以這種方式去解決與緬甸、尼泊爾及巴基斯坦的爭議。然而這類主張並未區別北京與小型鄰國（如緬甸、尼泊爾）的關係、中國和重要策略同盟巴基斯坦的關係，以及中印爭議實際上遠超越地圖劃線、邊境標界之舉。同時就如我在前面所述，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國已然崛起，意欲和印度一爭亞太新近獨立國家領袖的地位。

今日又呈現出全新情勢：中印雙邊貿易額（經由海路，而不是關閉邊界）蓬勃成長，二〇一五至二〇一六年，達到七百零七點三億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對中貿易赤字為五百二十六點八億美元。中國從印度進口礦產、鐵礦與棉花，印度則買進電子設備、電腦硬體及化工產品。⁷⁶

然而中印的敵對關係並未結束，彼此之間依舊有深刻的不信任。對中國而言，阿魯納恰爾邦仍舊是「藏南」，來自此區的旅行者，他們的中國簽證是浮釘在護照上。對中國來說這些人並非外國人，而是來自被印度占領的中國領土；然而此舉除了羞辱印度與印度人外，並無實際意義。

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並未停止支持印度東北動亂地區的反抗軍。那迦人、阿薩姆人與曼尼普爾人都能在中國美其名為「黑市」的交易中買到武器。主要組織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的領導人派瑞許·巴魯亞住在中國城鎮中，行動自如。中國可能自認只是效法印度庇護達賴喇嘛之舉，允許別國的敵人住在自己國中。然而達賴喇嘛與巴魯亞並不同，他並非一群武裝反抗軍的領袖。⁷⁷

如今棒山口與喜馬拉雅其他隘口可能已歸於平靜，但中國即將於西藏的布拉馬普特拉河上興建一連串水壩的計畫，再度引發了疑慮。布拉馬普特拉河在西藏及中國地圖上稱為雅魯藏布江。二〇一五年十月，西藏東南方的藏木水壩正式啟用；在布拉馬普特拉河進入印度之前，中國還預計在幹流與支流上興建其他二十七座水壩。此計畫自然引起爭議，因為中國並未事先徵詢下游受影響國家（印度與孟加拉）的意見。⁷⁸這種對待鄰國的態度同樣也展現在湄公河流域：中國預計在境內的湄公河上游興建一系列水壩，而且未事先徵詢下游流經的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與越南。

中、印兩國雖然邊界緊張，但今日的摩擦中心卻不在喜馬拉雅山區，而是在印度洋上。中國正建立通道，指向過去印度認為無衝突可能的「自家湖泊」。中國希望能密切掌控中東油運必須經過的海道，但這表示要挑戰印度在印度洋的霸權。近日印度與美國在印度洋的聯合軍事演習，以及日本對此表現的興趣，正顯示出新冷戰的態勢。只是這次的主要敵手是中國而非蘇聯。

而緬甸正處在紛亂核心。過去緬甸長期試圖扮演區域對手間的中立緩衝國，卻也常成為內部與國外勢力角逐影響力的衝突場域。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八年間，中國提供緬共大量援助，遠超過對中南半島外

任何共產運動的援助。緬甸東北沿著中國邊界區域，建立起一處廣達兩萬平方公里的基地。中國人在緬共基地中建了兩座小型水力發電站，以及一座地下電台「緬甸人民之音」（The People's Voice of Burma），從一九七一年起自中緬邊界的雲南側放送節目。這座電台後來移到緬共位於緬甸的邦桑⁷⁹總部，所有領導階級都住在中國建造的房舍中。

泰國境內少數民族克倫族（Karen）、撣族（Shan）與孟族（Mon）的反抗軍獲得允許設立基地，從泰國購買武器補給。泰國希望能在自身與歷史仇敵緬甸之間劃開一個緩衝區。歷史上緬甸曾多次入侵泰國，並於一七六七年劫掠泰國的舊都大城（Ayutthaya）。這些顧慮在現今看來也許不合時宜，但在當時卻是非常實際的考量。

在西方，靠近東巴基斯坦（後來的孟加拉）邊界處，來自緬甸若開邦（Rakhine）羅興亞（Rohingya）社群的穆斯林游擊隊，自一九四八年緬甸從英國獨立之後，就一直積極活動。印度從未支持任何緬甸境內的反抗運動，只在一九六二年奈溫將軍驅逐吳努出境時提供政治庇護。一九八八年八至九月的緬甸民主運動期間，印度當局也對民主運動人士表達道德支持。

一九八九年三至四月，一度強大的緬甸共產黨在佤族為主的低階軍官叛變中崩潰，緬甸邊界區域局勢產生了劇烈變化。佤族是緬甸東北橫跨中國邊界的獵頭族，雖然被招攬進入緬共軍隊，卻對自己以生命捍衛的共黨思想毫無所悉。緬共軍後續分裂成四支族群軍，其中佤邦聯合軍（United Wa State Army）是最強的一支。

一九八九年的緬共叛變，實際上正符合中國的利益，有中國特務積極鼓勵佤族等人反抗緬共領導。在鄧小平強調貿易與商業擴張的新政策中，堅持毛路線的緬共舊領導班子，反而成為中國一大負擔。

緬共叛變之後的數年中，中緬經貿關係持續成長。緬甸市場充斥來自中國的廉價消費品，從緬甸輸入中國的主要是原物料，例如柚木與礦產；年度貨物交換金額來到十億美元。中緬雙邊貿易之所以大幅成長，也是因為當時緬甸政府嚴重侵害人權，受到西方貿易制裁與杯

葛的緣故。因此中國不需面對任何競爭，輕易成為緬甸最主要的外貿夥伴。

然而中國並未放棄從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就在緬甸內部取得的掌控權。一九八九年五月，佤邦聯合軍與緬甸政府簽訂停火協議；這一方面符合中國新的商貿利益，另一方面也協助強化佤邦聯合軍。畢竟從緬共時期開始，中國與佤邦聯合軍多數領袖都有長期關係，因此佤邦聯合軍得以從中國購買大量軍火，包含重砲、地對空火箭與裝甲戰車。

今日佤邦聯合軍的火力遠比緬共時期更為強大，擁有至少兩萬名裝備精良的部隊、數千名村莊民兵與其他支援軍力。更重要的是，佤邦聯合軍的最高領袖身旁總是伴隨著中國情報官，並提供建議指導。

近幾年緬甸開始修復與西方的關係，有部分原因是中國影響力雖然舉足輕重，但也愈加難以掌控，同時西方取消了制裁。就在緬甸改善與華府關係之際，中國向佤邦聯合軍輸送更多武器，以此向緬甸政府施壓。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並無法將緬甸「輸」給美國與西方；而強大的佤邦聯合軍提供了中國策略利基，也是與緬甸政府談判時的籌碼。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緬甸總統府部長昂敏（Aung Min）前往曼德勒（Mandalay）西北方的小城蒙育瓦（Monywa），會見一群抗議由中國支持銅礦開採計畫的當地民眾，當時他公開承認：「我們害怕中國……我們不敢得罪（他們）。若他們對關閉計畫不滿，重新支持共產黨，邊界經濟將會衰退，所以你們要嚴肅思考。」⁸⁰所謂「共產黨」明顯是指佤邦聯合軍及其盟友，包含果敢（Kokang）地區的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這是另一支在東北區域的前緬共軍，確實也在二〇一五年二月發動過武裝攻擊。

可想而知，中國自然會反駁任何自己涉及衝突的說法，但事實仍舊存在：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的多數武器與大量軍火，都是來自佤邦聯合軍。根據一名高層人士的消息來源，中國採用間接方式，「在果

敢給緬甸政府一個教訓，向西方靠太近就是這下場。」⁸¹同一時間，中國也打出另一張「溫情」牌，積極參與緬甸政府與諸多民族反抗軍之間的「和平談判」。

無論中國試圖輸出革命或擴張保護商貿利益，都明顯感覺需要在緬甸境內有個穩定的立足點，而佤邦聯合軍及前緬共相關團體正是最好、最忠實的盟友。緬甸做為中國通往印度洋的「走廊」，是雲南及其他西南內陸省分對外貿易的出口，與北京的區域戰略利益有段距離。雖然中國從未在此設置任何軍事基地，但正如部分印度的觀察者所指出，中國協助緬甸提升海軍設施，這就足以令印度憂慮。

二〇一五年四月，由於緬甸政府對躲在國內的印度反抗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態度終於磨光了印度的耐性。印度軍隊穿過印緬邊界，摧毀許多阿薩姆、曼尼普爾與那迦反抗軍躲藏的營地。這些叛軍的武裝來自緬北克欽邦（Kachin State）裡前緬共區域內的祕密軍工廠。這些工廠雖位於緬甸境內，機器與技工卻都來自中國。或許中國政府對阿薩姆人、曼尼普爾人與那迦人獨立運動沒有興趣，但顯然希望讓印度疲於奔命，至少在印度仍庇護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的期間是如此。

在棒山口標語放肆宣稱「兩大古老文明鄰國」的背後，中印雙方文化與世界觀有著巨大差異，而西藏問題始終是中印衝突的核心。支持中國對邊界爭議與一九六二年戰爭說法的人，若是更仔細檢視中國援引的資料來源，不難發現劃界議題從來都不是重點。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拉薩起義反抗中國占藏的數週之後，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發布一篇文章〈西藏革命與尼赫魯哲學〉，指控印度總理採行「英帝國主義的策略野心」。⁸²

根據美國安全專家與前中情局分析師布魯斯．里德爾所說：「攻擊尼赫魯文章發表當日，周恩來在一場公開會議中指尼赫魯『繼承英國舊政策，認為西藏是個獨立國家』，而此心態是『中印衝突的核心』。」⁸³維茲伯格的結論相當正確地指出，尼赫魯與中國領導人的

世界觀截然不同，而在更現代的脈絡中，可以說中國與印度在文化與策略思考上，處於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中國認定所有印度領導人（特別是尼赫魯）想要奪取西藏，這一點也許是大錯特錯。不過中國畏懼「喪失」自己認定不可或缺的領土，這因素決定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印關係，直到此刻仍舊如此。這串事件首先開始於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當時中國歷經千年帝國統治後的衰頹，正由混亂的共和新秩序所取代。

³⁵ I visited Bumla Pass on 28 October 2015.

³⁶ Interviews with Indian army personnel at Bumla, 28 October 2015.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battle, see ‘Operations on the Kameng Frontier Division (Tawang)’, P.J.S. Sandhu, Bhavna Tripathi, Ranjit Singh Kalha, Bharat Kumar, G.G. Dwivedi, Vinay Shankar (eds.), 1962: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2015), pp. 82–3.

³⁷ ‘Operations in the Western Sector (Ladakh)’, Sandhu et al., 1962, p. 55.

³⁸ Satyanarayan Sinha, *China Strikes* (London: Blandford Press, 1964), p. 77.

³⁹ Cheng Feng and Larry Wortzel ‘PLA Operational Principles and Limited War: The Sino-Indian War of 1962’,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2010), p. 188. This is an Indian reprint of the one published by M.E. Sharpe in 2003.

⁴⁰ Sandhu et al., 1962, p. 28.

⁴¹ For the life and philosophy of Dr Sun Yat-sen, see Bernard Martin, *Strange Vigour: A Biography of Sun Yat-sen* (London and Toronto: William Haeinemann, 1944).

⁴² Email communication with Pamela Kyle Crossley, an expert on the Manchu Dynasty, 14 April 2016.

43 For a complete list of the Indian Army's peace-keeping missions, see 'India and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and Peacebuilding', available at <https://www.pminewyork.org/pages.php?id=1985> (accessed on 8 April 2016).

44 For an account of the Lei Feng myth, see Evan Osnos, 'Fact-checking a Chinese Hero', The New Yorker, 29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ewyorker.com/news/evan-osnos/fact-checking-a-chinese-hero> (accessed on 10 April 2016).

45 Fang Lizhi, The Most Wanted Man in China: My Journey from Scientist to Enemy of the Stat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6), p. 228.

46 William Wei,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Mao and the Red Army', David A. Graff and Robin Higham,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Dehra Dun: Greenfields Publishers, 2012), pp. 244-5.

47 Quoted in, for instance, Roy Rowan, Chasing the Dragon: A Veteran Journalist's Firsthand Account of the 1946-49 Chinese Revolution (Guilford, Connecticut: Lyons Press, 2004) p. 217.

48 Wei, 'Political Power Grows Out of the Barrel of a Gun', p. 235.

49 Mao Zedong,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 (Pek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p. 61.

50 Yaacov Y.I.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1959-1962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4), p. 217.

51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p. 217.

52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p. 217.

53 Wang Dong, China's Unequal Treaties: Narrating National History (Asia World,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p. 64.

54 From 1959 to 1962, the Indian government published more than a dozen White Papers with maps, documents, copies of treaties, a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Indian and Chinese governments. Several

of them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claudearpi.net/index.php?nav=documents&id=20&lang=1> (accessed on 16 June 2016).

55 Vertzberger, *Misperceptions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p. 217.

56 S. Mahmud Ali, *Cold War in the High Himalayas: The USA, China and South Asia in the 1950s* (Richmond, Surrey: Curzon, 1999), p. xxviii.

57 John Rowland, *A 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Hostile Co-Existence* (Princeton, NJ, Toronto, London: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67), p. 42.

58 James Barnard Calvin, 1984, 'The India-China Border War (1962)',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report/1984/CJB.htm> (accessed on 5 April 2016).

59 譯者注：弗雷德里克．馬士曼．貝利上尉（Frederick Marshman Bailey, 1882-1967）精通藏語，後分別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一九二六至一九二八年，兩度出任英國駐錫金政務官，負責英國及英屬印度與錫金王國、不丹王國、西藏的關係，維護大英帝國與印度在喜馬拉雅山地區的利益。一九一三年他在喜馬拉雅山區為印度測繪局繪製地圖，成為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會議中麥克馬洪線的基礎。此次探險證實，印度布拉馬普特拉河的上游是西藏的雅魯藏布江。

60 F.M. Bailey, *No Passport to Tibet* (London: The Travel Book Club, 1957), p. 71.

61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1972), p. 50.

62 Madhav Godbole, *The God Who Failed: An Assessment of Jawaharlal Nehru's Leadership* (New Delhi: Rupa, 2014), p. 312.

63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agreement, see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7807/Agreement+on+Trade+and+Intercourse+with+Tibet+Region> (accessed on 5 April 2016).

64 CIA,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Section 1: 1950-59', CIA document (2 March 1963, and declassified May 2007), available at <https://e-asia.uoregon.edu/node/2570> (accessed on 29 March 2016).

65 See <http://qz.com/404874/photos-when-indias-first-prime-minister-visited-china-in-1954/> (accessed on 5 April 2016).

66 Quoted in Yuliya Babayeva, 'The Khampa Uprising: Tibetan Resistance against the Chinese Occupation', Honours College Theses, Paper 31 (New York: Pforzheimer Honours College, 8 January 2006), p. 15, available at http://digitalcommons.pace.edu/honorscollege_theses/31/ (accessed on 7 April 2016).

67 John W. Garver, 'China's Decision for War with India in 196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00.

68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pp. 95–6, 155–6.

69 'The Politico-Diplomatic Prelude Part 2', Sandhu et al. 1962, p. 23.

70 Donald S. Zagoria,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9–196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280.

71 Wang Hongwei, *ximalayashan qingjie: zhongyin guanxi yanjiu* ('The Himalayan Sentiment: A Stud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cations, 1998), p. 55. Quoted in B.R. Deepak,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1947–1949', translated by B.R. Deepak, D.P. Tripathi and B.R. Deepak (eds.), *India and Taiwan: From Benign Neglect to Pragmatism* (Delhi: Vij Books, 2015), p. 52.

72 George N. Patterson, *Peking versus Delhi*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3), p. 51.

73 Quoted in Sandhu et al., 1962, p. 5. *Shijie Zhishi* was a Shanghai-based fortnightly founded in 1934. The de facto editor was Hu Yuzhi, a secret CCP member. The magazine moved to Hankou and then to Hong Kong in 1938, publishing there until it folded when the Japanese invaded the British colony in 1941. It resumed operations in Shanghai in December 1945, published by the CCP's

underground Culture Committee, and was banned by the KMT government in March 1949. It resumed publication after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Shanghai in May 1949, befor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proclaimed in Beijing on 1 October 1949.

74 CIA,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Section 1', pp. 2-4.

75 CIA, 'The Sino-Indian Border Dispute Section 1', p. 4.

76 Press Trust of India, 'India'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jumps to \$53 billion in 2015-2016', The Economic Times, 1 August 2016, available at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indias-tradedeficit-with-china-jumps-to-53-billion-in-2015-16/articleshow/53492853.cms> (accessed on 6 June 2017).

77 Bertil Lintner, Great Game East: Indi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Asia's Most Volatile Fronti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51.

78 Sana Hashmi, 'China Dams the Brahmaputra: Why India Should Worry', Rediff News (21 Octo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rediff.com/news/column/china-dams-the-brahmaputra-why-india-should-worry/20151021.htm> (accessed on 8 April 2016).

79 譯者注：邦桑（Panghsan）是緬甸佤邦首府，位於中緬邊境南卡江西岸，東接中國的勐阿口岸。清朝時稱班散，後稱邦桑，一九七〇年代為緬甸共產黨中央駐地。一九八九年緬共分裂，華裔領導的部隊脫離緬共，改稱佤邦聯合軍，由於華語中「桑」與「喪」諧音不吉利，因此一九九九年後改稱邦康（Pangkham）。

80 Bertil Lintner, 'Same Game, Different Tactics: The Myanmar Corridor', Irrawaddy, July 2015, pp. 14-19.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irrawaddy.com/magazine/same-game-different-tactics-chinas-myanmar-corridor.html> (accessed on 7 April 2016).

81 Lintner, 'Same Game, Different Tactics'. p. 19.

82 Bruce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Tibet, the CIA, and the Sino-Indian War (Delhi: HarperCollins India, 2016), p. 98.

83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p. 98.

第二章 界線

一九一二年對整個亞洲而言是動盪變化的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爆發，然而其他力量在這裡蠢蠢欲動。開年第一天，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宣布成立。歷經多年暗潮洶湧的不滿情緒，中國各地起事頻傳，湖北省武昌的軍事叛變終於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發。往後在共和民族主義者間稱為「雙十節」的這天，激發更大規模的起事，推翻漸趨無能的清朝統治者。

反清運動領袖孫逸仙醫師當時並不在國內，他已流亡海外數年，組織夏威夷、東南亞與日本的海外華人反對勢力。在美國冒險家荷馬·李（Homer Lea）的伴隨下，孫逸仙醫師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返抵國門，視察當代中國歷史最戲劇化的事件之一。八天後，一群來自全國的反清團體代表，一同選出孫逸仙醫師為共和國的「臨時大總統」，並在新年就職。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朝最後一任皇帝，年僅六歲的溥儀被迫退位。

然而超過兩千年的帝制走向終點，並未如革命者與改革家所想，將這廣袤赤貧的國家迎進現代繁榮的新時代，權力鬥爭與陰謀導致動亂不穩。孫逸仙醫師上任不到七週即辭去職位，並由袁世凱接任。袁世凱是名軍官，甚至夠不上民主改革的邊。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袁世凱甚至自稱皇帝，但在位僅僅八十三天。由於國內叛變層出不窮，袁世凱只能放棄帝位，並於一九一六年六月死於血液疾病，享年五十六歲。此前被迫流亡日本的孫逸仙醫師，在一九一七年共和政府重新恢復時返回中國。這時整個國家已陷入更深的混亂裡，中央政府孱弱，各地軍閥不過是地方省分控制自己封地的土匪頭子。孫逸仙醫師試著統一分裂國家但回天乏術；一九二五年三月，五十八歲的他因肝癌過世。

原本孫逸仙醫師希望能聘美國友人荷馬·李擔任中華民國首席軍事顧問，但李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心臟病發後便返回美國，並於同年十一月過世；而孫逸仙醫師的革命夥伴認為李不過是個外人，強烈反對

聘任外國人為軍事顧問的想法。雖然中國從未被殖民，但是歐洲強權在海岸租界的影響力，也造成中國人民對外來者抱持強烈恨意。

香港屬於英國，葡萄牙人占有澳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德國人據有青島。西方與日本為商業利益無情地剝削中國，外國人在中國土地上視中國人為次等公民。因此當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成立後，迅即獲得都市知識分子與鄉間貧苦農民的支持，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

改變同樣發生在一九一二年的印度，雖然過程較為平和。該年六月，倫敦國會頒布《印度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ndia Act）。一九〇五年已分裂成兩省的孟加拉（西孟加拉及新的東孟加拉與阿薩姆），再次重新劃分成三省：孟加拉省（相當於今日的印度西孟加拉邦與孟加拉國）、比哈爾（Bihar）與奧里薩省、阿薩姆省。新劃分的孟加拉不再受中央「管轄區」（presidency）統治，而是省督統管的行省。阿薩姆則獨立為一省，後續成立自己的議會，表示有必要更清楚區劃邊界。

當時的阿薩姆省包含今日印度的那迦蘭邦（Nagaland）、米佐拉姆邦（Mizoram）、梅加拉亞邦（Meghalaya）及阿魯納恰爾邦。今日印度東北還有另外兩個邦：特里普拉邦（Tripura）與曼尼普爾邦，當時都是由王公統治的大公國，並不屬於阿薩姆。由中央控制的那迦山脈特區（Naga Hills District）早在一八六六年成立，逐漸擴張至極東山脈的更大區域。一九一二年，那迦山脈特區正式併入新成立的阿薩姆省。盧謝山脈（Lushai Hills），即今日的米佐拉姆邦，也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獲得「平定」（殖民時期「占領」的同義詞），並於一八九五年成為英屬印度的一部分。今日的梅加拉亞邦包含卡西（Khasi）、詹塔（Jaintia）與加羅（Garó）山脈，是布拉馬普特拉河谷以南的高地區。由於殖民官員喜愛涼爽高原，勝過布拉馬普特拉河平原炎熱潮濕的熱帶氣候，今日梅加拉亞邦的首府西隆（Shillong），當年是整個阿薩姆省的總部。自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到一九七二年梅加拉亞邦成立為止，西隆一直是阿薩姆省的首府。

布拉馬普特拉河平原以北，置有更多山脈特區，官方的控制不像那迦、盧謝、卡西、詹塔與加羅山脈那麼嚴密，但也是阿薩姆省與英屬印度的一部分。隨著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在英國數次進入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山脈的軍事征服行動後，領袖之一的漢密爾頓·包爾少將（Hamilton Bower）於一九一二年建議，應將這些邊界區域分成三段部族掌控區域：西段、中段與東段。此舉導致阿薩姆省政府在一九一四年成立「東北邊境地域群」（North-East Frontier Tracts）。⁸⁴五年後，中段與東段合成「薩蒂亞邊境地域」（Sadiya Frontier Tract），西段的名稱則更改為「巴利帕拉邊境地域」（Balipara Frontier Tract）。

逐漸收編阿薩姆與外圍山脈區域的同時，英屬印度其他區域也正經歷行政變化。一九一一年，英王喬治五世（King George V）訪問印度，並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對國會演說，表達此行印象。由於印度是大英帝國王冠上的珠寶，伴隨著一九一二年《印度政府法案》的通過，英屬印度首都由東方的加爾各答，移往位置居中的德里。

新德里這座新城的基石，事實上是由英王喬治五世所奠定，都市設計的重責大任則交給兩位傑出的英國建築師：愛德華·路提彥（Edward Lutyen）與賀伯·貝克（Herbert Baker）。然而，由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建設進度因此延後數年。這座英屬印度的雄偉新都，直到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才正式啟用。

一九一二年對日本而言也是變動的一年。該年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去世。明治天皇從一八六七年即位，在統治期間帶領日本從封建社會轉變為工業化的世界強權。根據九月十七日的《日本廣告》（Japan Advertiser）報紙的報導，天皇葬禮有如「光之童話」一般，前面有老派「穿著外套與絲帽的紳士」與牽引靈車的聖牛，尾隨著「數百位穿戴高禮帽與金邊制服」的海陸軍士。「靈車前後形成的對比確實驚人。靈車之前是舊日本，之後則是新日本。」⁸⁵

強大的明治天皇去世後，由其兒子嘉仁繼位，年號為大正。大正天皇與其父截然不同，由於身體羸弱且受精神疾病所苦，讓他無法視

事，因此實際權力旁落到一群年長政治家的手中，得以不受天皇制衡地掌理國事。正因如此，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年天皇逝世為止的大正期間又號稱「大正民主」。不過宮廷內雖有許多政治運作空間，但並不同西方定義下的民主。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以協約國盟友身分向德國宣戰，占領德國在亞太地區的前殖民地：中國海岸上的青島，以及太平洋上的加羅林群島（Caroline Islands）、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Islands）與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青島必須在一九二二年歸還中國，但日本趁中華民國孱弱之際，擴張勢力遍及中國大陸其他部分與附近區域。日本已於一九一〇年兼併朝鮮半島，此刻又掌握了德國在滿洲與內蒙古的商業集團。

大正天皇於一九二六年過世，享年四十七歲，接著由其長子裕仁即位，是為昭和天皇。在大正天皇的弱勢統治下，日本軍部成為國家中最強的勢力，並導致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與中國的許多戰爭。此時日本正在崛起，成為亞洲的軍事與政治強權。

中國的帝制崩潰與隨之而來的國家瓦解，為中國外圍區域的附庸國家提供了重申自治或事實獨立的機會。事實上，即使是在皇帝統治下，許多附庸國早已是這種狀態。在十三與十四世紀時，蒙古部族在成吉思汗與忽必烈汗的領導下，曾征服亞洲多數區域，之後逐漸臣服中國皇帝。清朝統治時，蒙古人的領域分成直接受清朝控制的「內」蒙古及戈壁沙漠以北草原高地的「外」蒙古。外蒙古為自治區域，相當於今日的蒙古國。

早在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國民主革命爆發後的短短兩個半月，蒙古即宣布獨立。蒙古人奉行與藏人相同的佛教信仰，最高宗教領袖被稱為「博格達格根」（Bogd Gegeen）或「神聖光明者」。此刻宗教領袖成為政教合一蒙古國的「博格達汗」（Bogd Khan）或「神聖統治者」。雖然受和平佛教的僧侶統治，但蒙古人仍覺得有需要建立一支軍隊，捍衛新贏得的獨立地位，因此宣布獨立後不久便發起軍事行動，欲從中國手裡解放內蒙古。

蒙古人向俄國為新生軍隊購買武器，但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並不支持對剛成立的中華民國開戰。蒙古不知道的是，俄國就在同一年（一九一二年）與日本簽訂祕密協約，劃分各自在中國北方的勢力範圍。南滿洲與內蒙古屬於日本，而日本承認俄國在北滿洲與外蒙古的勢力範疇。⁸⁶

因此，俄國武器從未抵達蒙古，不過俄國也沒因為日俄祕密協定而準備兼併外蒙古任何區域。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三日（根據俄曆為十月二十一日），俄國與蒙古簽訂條約，承認蒙古在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內的自治權。然而在蒙古版的條約內容卻寫「獨立」，蒙古因而詮釋為俄國承認「大蒙古國」獨立。相對地，蒙古給予俄國在其境內的通商特權。

隨後簽訂的中俄條約，更進一步造成蒙古國際地位的困惑。條約中寫著蒙古在中國的「宗主權之下」，享有內部自治。⁸⁷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俄、中、蒙在布里亞特（Buratiya）的恰克圖（Kyakhta）簽訂協約；蒙古被迫承認宗主權，並同意不得與外國簽訂國際條約。⁸⁸

《恰克圖條約》簽訂前，蒙古極力試圖取得獨立宣示的承認，因此派遣代表團前往聖彼得堡，卻遭到俄國阻擋，避免蒙古與其他歐洲國家接觸；另一個前往東京的代表團，則遭日本駐滿洲哈爾濱的領事拒絕提供任何協助。

蒙古唯一的外交勝利，來自宗教上的兄弟國西藏。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一日（俄曆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蒙藏在庫倫（Urga），也就是今日的烏蘭巴托（Ulaanbaatar），簽訂了《蒙藏友好同盟條約》。蒙古由外交部長大喇嘛然丁（Da Lama Rabdan）和軍隊總司令曼萊巴特爾·達木丁蘇隆（Manlaibaatar Damdinsüren）代表。與代表西藏達賴喇嘛的阿旺·德爾智（Agvan Dorzhiev）簽訂條約。不過問題是德爾智來自布里亞特，這是使用蒙語的西伯利亞東部區域，因此實際上是俄國人。這條約的合法性始終存疑。⁸⁹

西藏也在中華民國成立的動亂首年宣布獨立，不過宣布的確實日期不明。一九一〇年初，清朝曾派遣一支遠征軍入侵西藏，試圖最後一搏，鞏固帝國宣稱既有領土的主權。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二日，中國軍隊進入西藏首都拉薩，廢除達賴十三世，後者在當時英屬印度總督明托伯爵（Lord Minto）的邀請下逃亡加爾各答。

達賴出逃印度，這對修復西藏與英國的關係有所助益。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英國曾派遣一支軍隊入侵西藏，領軍者是在英屬印度出生、於桑德赫斯特學院受訓的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榮赫鵬短暫但暴力的占領過程，導致拉薩在一九〇四年九月簽下一紙條約，給予英國在西藏龐大的利益。⁹⁰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九年間，達賴喇嘛逃亡中國與蒙古，躲避英國追擊。此刻，英藏則聯合對抗中國。

中國占領西藏的時間很短，一九一二年初清朝覆滅後，軍隊旋即撤退。但這次的占領行動中，中國軍隊歷史上首度跨過喜馬拉雅山分水嶺，進入現今為阿魯納恰爾邦最東北角的瓦弄，在瓦弄以南豎立幾個邊界標誌後就此撤退，未曾試圖設立任何行政機構。中國軍隊最終撤出西藏占領區的路線頗為諷刺，是透過到加爾各答乘船返回中國港口，因為所有由藏入中的道路已被藏兵控制。

隨著中國軍隊撤出西藏，達賴喇嘛返回拉薩，藏人也想追隨蒙古人的前例。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三日，也就是阿旺·德爾智與大喇嘛然丁、曼萊巴特爾·達木丁蘇隆在庫倫簽訂條約的一個月後，達賴十三世發表了等同獨立宣言的聲明。

首先，達賴喇嘛解釋：

數年前，四川與雲南的中國政府試圖殖民我們的土地。他們帶著大批軍隊進入西藏中部，藉口監督貿易市集。因此我與我的官員們離開拉薩，前往印度與西藏邊界，希望向滿洲（清）皇帝以電報澄清，西藏與中國的既有關係，是施主與僧侶的關係，而非一方臣服於另一方。我別無選擇必須跨越邊界，因為中國軍隊所受命令是逮捕達賴，死活不論。⁹¹

接著是對西藏國際地位的說明：

西藏是具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國家；然而科技不如其他國家先進。我們是一獨立宗教小國，為了與世界各地同步，必須保護自己的國家。在過去的外國入侵中，我們的人民也許必須面對某些困難，但都必須堅忍。為了保衛及維護國家的獨立，所有人都必須自願奉獻。居住於邊界周遭的子民必須警醒，透過特使知會政府任何可疑發展。我們的子民不應為了小事而造成兩國主要衝突。⁹²

然而，西藏的獨立宣言與蒙古一樣，也被外界勢力忽略。英國與其他國家持續承認中國為西藏和蒙古的宗主國。然而宗主權並不同於主權。宗主權一詞最初是用來定義鄂圖曼帝國與其周圍區域的關係，僅指某個區域承認宗主國的權力，因此向其支付貢金（實際上卻經常逃避支付）。因此，這實際上代表在宗主權中的內部自治，而宗主國僅掌有涉外（或許還有國防）的權力。而一九一〇年代的中國陷於動亂脈絡中，因此這是毫無意義的形式稱號。蒙古和西藏兩者就算不是法理（*de jure*）獨立，也是事實（*de facto*）獨立的國家。

為了規範西藏地位並明確邊界，英屬印度政府外交部於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邀請中國政府會同西藏政府，舉行聯合會議。三方最終在十月十三日，於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印度夏都西姆拉召開會議。

英屬印度政府首席談判官亨利．麥克馬洪是生於西姆拉的殖民官員，擔任這場會議主席。在西藏相關議題上，協同官員有前駐中國領事阿奇博爾德．羅斯（Archibald Rose）及當時英國駐錫金政務官查爾斯．貝爾（Charles Bell）。英國團中還有一位著名人物，全名是索南．汪達．萊登．拉（Sonam Wangdel Laden La），或簡稱萊登．拉，是來自錫金的不丹人，熟稔多種語言，包含藏文與英文。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間，萊登．拉曾隨榮赫鵬遠征拉薩，此次則為負責安全事務的高級警官。甫由英國返回印度的萊登．拉被遣往西姆拉，在會議最後階段擔任西藏代表團的翻譯。他於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抵達，並停留了一個多月。⁹³

西藏派出倫欽⁹⁴夏札．班覺多吉（Shédra Penjor Dorjé）代表達賴喇嘛。西藏代表團中協助談判者還有另外兩位高階政府官員：赤

門。諾布旺杰（Trimon Norbu Wangyal）與堪瓊丹巴達杰（Khenchung Tenpa Dhargyal）。根據西藏消息來源，這次會議是西藏政府不想錯過的機會。他們希望獨立宣言獲得承認，倫欽夏札與團隊事先蒐集各項佐證資料，在中英代表面前提出。⁹⁵

中國的主要代表是陳貽範，是熟稔英文並四處遊歷的外交官，曾在中國駐英國使館九年。中國政府任命陳貽範為西藏宣撫使，由副宣撫使王海平輔佐。然而陳、王二人背後的真正掌權者是陸興祺。一九一二年達賴喇嘛返回拉薩後，陸興祺在分化達賴與西藏第二掌權者，班禪喇嘛的關係上，扮演了重要角色。⁹⁶

一九一三年四月，中國政府任命陸興祺為護理駐藏辦事長官，並令其從海路經加爾各答前往西藏。由於陸興祺無法入藏，只能停留在其非常熟悉的加爾各答。他曾在十九世紀晚期就讀加爾各答的中國學院，後來在中國城的特麗塔市場街（Tiretta Bazar）成立「天益號」，經營西藏的毛皮生意。⁹⁷

在成功商人的外表下，陸興祺還是負責印藏事務的情報人員。⁹⁸ 陳貽範成為中國政府處理西藏事務的新官方臉孔，雖然中國資料中並未載明此一職位何時由陸興祺轉到陳貽範手中（倘若有正式移轉的話）。⁹⁹ 西姆拉會議期間，陸興祺、陳貽範及中國政府一直保持密切聯繫。

由於中國希望西藏被稱為中國的一部分，因此會議一開始就面臨難題。倫欽夏札雖然甚少離開家鄉，但在呈現藏方論點、反駁中國對西藏地位主張的政治掌握度，著實令中英代表團感到驚訝。倫欽夏札列出中國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二年占據西藏的過分行徑，並且毫不意外地持續要求承認西藏的獨立地位：

西藏與中國從未從屬彼此，未來也不會如此。西藏認定自己是獨立國家，神聖保護者達賴喇嘛是西藏統治者，統管所有世俗與精神事務。西藏否認一九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簽訂的《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由於西藏並未遣使參加會議，亦未簽章，因此該條約將無法對三方政府生效。¹⁰⁰

一九〇六年《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內容包含「英國應允不強占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國應允不准其他外國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內治」¹⁰¹。然而英國可以鋪設西藏與印度之間的電報線，因此西藏與外界聯繫主要是透過英屬印度，而不是中國。

一九〇六年《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可解釋為英國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但主要目的是確認西藏做為英屬印度與沙俄之間的中立緩衝區地位。因此英國並不同意倫欽夏札否認一九〇六年《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的要求：承認西藏是完全獨立的國家。此外，承認西藏獨立將違反一九〇七年《英俄條約》，其內容主要是解決英、俄兩國在波斯、阿富汗與西藏的勢力劃分爭議。¹⁰²在條約規範下，兩國都承諾除非透過中國調停，否則不得與西藏單獨訂約。至於中國方面，自然是不願意討論西藏獨立議題。

根據查爾斯．貝爾所述，英國不願同意倫欽夏札的要求還有其他原因，獨立的西藏可能尋求蒙古的協助，並且透過蒙古轉向俄國。¹⁰³就如同印度東北曼尼普爾邦報紙《因帕爾自由報》（Imphal Free Press）的編輯普拉迪普．潘竹邦（Pradip Phanjoubam）所說：「此時的英國對藏政策並非針對中國，而是對於俄國的恐懼，也就是所謂的『大博弈』（Great Game）。」¹⁰⁴

中國確實並未被視為「大博弈」中的要角，西姆拉會議之所以邀請中國出席，不過是因為一九〇七年《英俄條約》的約束。此條約根據潘竹邦所言，「基本上是英國強加於俄國之上，後者正因日本而飽嘗敗戰的羞辱」¹⁰⁵，這裡的敗戰是指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俄國必須保證不干涉西藏，然而條約內容同樣束縛著英國。西藏、阿富汗與波斯，將持續做為沙俄與英屬印度之間的中立緩衝區。¹⁰⁶

荷蘭學者凡．艾克隆（W.F. Van Eekelen）認為，當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John Jordan）「主要關心西藏轉向俄國的危險，然而英國斡旋的空間，同樣受限於一九〇七年《英俄條約》」。¹⁰⁷朱爾典建議，英國不應成為西姆拉會議任何條約的簽署國，因為這將牽涉與俄

國簽訂新條約，也建議麥克馬洪：「採取友好協助的態度，扮演誠實中介的角色。」¹⁰⁸

俄國必須小心處理。他們持續收到消息，英國在俄國清楚表明無反對之意後，依計畫召開西姆拉會議，「若各方承認的邊界獲得批准後，才必須向俄國提出正式通知。」¹⁰⁹

在九個月的談判過程中，主要爭議點在於中國與西藏的邊界如何劃定。由於許多藏人居住在遠離拉薩政治控制的區域，這些區域技術上屬於中國，而當時中國的中央政府甚至難以掌控國內較核心的區域。麥克馬洪或許是受蒙古的新安排影響，建議藏人居住區也應分「內」與「外」。外藏為傳統上由拉薩控制的區域，並持續做為自治體。內藏則是中國的一部分，將做為拉薩統治的西藏與俄國主導的外蒙古之間的緩衝區。¹¹⁰外藏包含西藏中部與西部，緊鄰中國的內藏則包含安多（Amdo）與部分康區（Kham）。¹¹¹

經過九個月漫長且時而激烈的論辯，英藏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三日簽訂條約，其上明言「大不列顛和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在西藏享有宗主權，並且承認『外藏』自治，允諾尊重該地區的領土完整，不干涉『外藏』的行政事務（其中包括達賴喇嘛的認定與坐床），『外藏』的行政事務將仍由拉薩的西藏政府掌管。」¹¹²同時條約內文還說：「中國政府允諾不把西藏變成一個行政省，大不列顛政府允諾不吞併西藏或占領其任何部分。」¹¹³

藏人並未獲得希求的獨立承認，但中國也必須允諾僅派遣「駐藏高級官員」，率領「適當衛隊」且「不得超過三百人」，同時「外藏所有官員選任，皆由西藏政府為之」。¹¹⁴

陳貽範在條約草案上署名，但最後拒絕批准此約。根據歷史學者約翰·羅蘭的觀點，陳貽範與中國政府「拒絕《西姆拉條約》的主要原因在於，中國不願放棄任何被認定為『天朝上國』既有領土的傳統態度」。¹¹⁵

雖然內、外藏建立與邊界劃分是西姆拉會議論辯的主題，會議中也討論了印度與西藏邊界。陳貽範曾署名的條約內文中，第九條即言明「為便於執行本條約，西藏疆域及內藏與外藏的分界，分別以紅、藍線繪明於所附的地圖上」。¹¹⁶紅線即是分隔西藏與英屬印度的麥克馬洪線，藍線則是內、外藏的界線。因此羅蘭認為「中國毫無理由指稱西姆拉會議並未處理印度與西藏邊界」¹¹⁷，或者是陳貽範並未同意地圖上的紅、藍線。

同時這也不像中國後續宣稱的「祕密協商在陳貽範與中國代表團背後進行」。但也許可以爭論的是，中國並未被納入印度與西藏邊界劃定的討論，因為英國與西藏認定此為雙邊議題，與中國無涉。

根據凡·艾克隆所述：

在條約內文草案定案前，英國與西藏代表已經完成印度東北邊界的討論，亦即「麥克馬洪線」。中國並未受邀參與討論，他們也未特別尋求中國同意。此線呈現在條約所附之西藏疆域及內外藏的分界地圖時，中國才得知此事。¹¹⁸

若採信中國與其支持者的觀點，麥克馬洪線則是陰謀論的結果。當英國施壓藏人接受新的邊界時，陳貽範等人都被蒙在鼓裡；在未徵詢中國意見的情況下，邊界從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的喜馬拉雅山腳，移到喜馬拉雅山頂。接著如馬克斯韋爾及蘭姆等人指稱，英藏協議出於某些不知名原因（也許是為了不觸怒中國）而被祕密收藏，之後甚至遭遺忘長達數十年。

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條約》及另外一份提到麥克馬洪線的《英藏宣言》（Anglo-Tibetan Declaration），都未出現在收錄「印度及其鄰國的條約、協定和證書」的一九二九年版《艾奇遜條約集》（Aichison's Treaties）之中，這份輯錄自一八六二年開始，以系列方式出版。然而，根據馬克斯韋爾與蘭姆的觀點，當西姆拉會議與英藏邊界協定納入一九三八年再版的一九二九年版《艾奇遜條約集》，出版日期則訂在一九二九年。原本的一九二九年版據稱由流通

市場收回。¹¹⁹換句話說，對馬克斯韋爾與蘭姆而言，這是明顯的欺騙。

一九六二年，中國政府在一本名為《中印邊界問題》的書中，提出中國的西姆拉會議內容及後續：

英國代表在會議之外，即中國中央政府代表背後，透過與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祕密交換信件，劃出惡名昭彰的「麥克馬洪線」，試圖將中國九萬平方公里土地納入英屬印度。中國政府拒絕承認這條不合法的『麥克馬洪線』，自當時至今所有的中國政府皆然。正因如此，一九三六年（原文如此）以前，英國政府不敢公開將此線劃在地圖上。不合法的麥克馬洪線完全是將英帝國主義加諸中國人民之上。¹²⁰

馬克斯韋爾宣稱，麥克馬洪在西姆拉會議之後即調離印度，暗示也許是因為他在一九一四年的「作為」。¹²¹事實上，麥克馬洪不只能說印地語及波斯語，還通曉阿拉伯語，因此於一九一五年升任為英國駐埃及高級專員，這很難稱得上是懲戒甚或降調。麥克馬洪以埃及為基地，協助組織阿拉伯反抗軍對抗鄂圖曼帝國，於一九一六至一九一七年成功爭取到獨立。

馬克斯韋爾同時寫道：「直到一九三五年，一位名為歐拉夫·卡洛（Olaf Caroe）的德里官員，在舊文件中發現與藏人簽訂的條約，並開始運作政府讓此線成為印度實質的東北邊界前，所謂的『麥克馬洪線』根本無人聞問。」¹²²

同時根據馬克斯韋爾的說法，卡洛「歷經困難終於成功讓此線（麥克馬洪線）出現在某些正式地圖上；他也安排假造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會議出現在《艾奇遜條約集》上的紀錄，好看起來與會各方對於新的『麥克馬洪線』達成協議」。馬克斯韋爾宣稱，直到此刻「英屬印度政府才開始緩慢將行政機構推往麥克馬洪劃下界線的山巔」。¹²³

在邊界議題上，相較於馬克斯韋爾，蘭姆採取較為仔細的學術態度，不過他也指責卡洛「假造」文件，並在自己的紀錄中修改邊界。蘭姆指出，卡洛並不容易「說服政治人物，存在著領土安全的嚴重情

勢，這片領土雖然技術上屬於英國，但大英帝國的統治者卻遺忘超過二十年。這片領土倘若真的如此重要，為何會不在正式記憶之中？」

124

然而其他學者並不同意蘭姆，或至少認為他對這事件的詮釋微弱且具爭議。無庸置疑地，英藏之間確實在西姆拉簽訂邊界條約，如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李奧·羅斯及許多其他學者所記錄。羅斯除了批評蘭姆過度擁抱支持中國立場外，同時指出英國學者在麥克馬洪線的書寫上更精確的弱點。羅斯在兩大主要議題上挑戰蘭姆。其一，蘭姆宣稱西藏政府並非獨立，因此無法在未經中國同意的前提下簽訂條約，羅斯認為蘭姆：

忽略西藏政府已在一九一三年正式宣布自中國獨立的事實，並於西姆拉會議中在全藏建立有效政權……（蘭姆）在簡短段落中忽視英國與西藏政府是否有權就印度與西藏邊界簽訂條約的問題。但我們可以合理爭論，英藏政府是在權限中採取行動；就麥克馬洪線一事而言，中國未能批准條約，並不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性。125

此外，陳貽範確實有在劃界條約所附的地圖上簽名。

其二，蘭姆在書中一處注釋中，提出西藏於《西姆拉條約》裡承認中國的「宗主權」，羅斯如此認為：

究其分析主線來說，這點相當耐人尋味。他明顯承認西藏政府至少能代表西藏人民做出此類承諾。但他沒有注意到，這條文（根據條約內容）「必須」在中國批准條約後才會生效。由於中國並未批准條約，因此整個討論並不實際。126

羅斯的另一個論點是，蘭姆的論點奠基在英中與英俄簽署的條約，將限制英國在西藏行動的能力。而羅斯認為「也許有人爭論英國與西藏達成協議時，已違反了這兩項條約（英中、英俄），並震驚地認定在極端不同情況中簽署的條約，在國際法之下是為無效。然而反對此詮釋的前例比比皆是」。127

西姆拉會議之中與之後實際發生的事，也遠比中國版本的詮釋更直接且缺乏戲劇性。當陳貽範與中國代表忙著處理西藏地位及中國內地與西藏邊界的劃分時，西姆拉會議的紀錄中明顯可見，他們對印度與西藏邊界何在其實缺乏概念。陳貽範懊悔缺乏西藏各邊界的精確地圖。¹²⁸根據潘竹邦報導，陳貽範「在麥克馬洪詢問時並不清楚印度邊界何在，隔天才提出回覆，並使用法國地圖為證據」。¹²⁹

此外，關於《西姆拉條約》與麥克馬洪線的細節並未立刻公諸於世這件事，應該視為英國的謹慎與忽略，而非如中國宣稱的「恐懼」，或是馬克斯韋爾與蘭姆所說的祕密欺瞞。西姆拉會議後，第一次世界大戰旋即爆發，比起印度遙遠邊境的邊界劃分，英國顯然有更重要的優先議題。

印度確實就西藏問題與俄國簽訂條約，這件事也不應忽視；這是倫敦外交部的重要考量。¹³⁰然而，一九一七年俄國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蘇聯成立後情勢有所改變。此刻，一九〇七年《英俄條約》已然失效。

同時，事實也非馬克斯韋爾、蘭姆與中國所稱，在一九三〇年代前，喜馬拉雅山巔邊界線從未出現在英國或其他地圖上。遠在明確邊界的地圖細節成為現實前，分水嶺、山川河流就已成為國與國之間的分界；而喜馬拉雅山巔（而非南方的山腳）長久以來就是西藏高原與印度次大陸的分界線。

後來成為英國駐拉薩特使的英國駐錫金政務官查爾斯．貝爾，在一九二四年的經典作品《西藏的過去與現在》（Tibet: Past and Present）中，隨附的折疊地圖顯示出，印度與西藏邊界位於喜馬拉雅山巔，或者說大致沿著麥克馬洪線。¹³¹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的《中國地圖》（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出版於一九〇八年，西姆拉會議的五年前，其中的西藏地圖顯示的邊界是沿著喜馬拉雅分水嶺。一九一二年三月，倫敦皇家地理學會出版的《地學雜誌》（Geographical Journal）地圖也是如此。甚至部分在中國刊印的地圖，也將邊界劃在喜馬拉雅山巔，其中包含一九一七年

中國政府使用的官方郵務地圖，以及同年在上海出版的《最新中國商業政治地理大全》（The New Atlas and Commercial Gazetteer of China）。¹³²

西段邊界的劃分甚至比東段更模糊不清，主要是因為當地人煙稀少，缺乏跨越山區的貿易往來。然而拉達克是由奉行藏傳佛教的西藏部族組成的獨立王國，與西藏及不丹維持往來關係。一八三四年，拉達克被來自旁遮普平原的錫克帝國（Sikh Empire）武力兼併，六年後完全失去獨立地位。一八四六年，拉達克被納入查穆與喀什米爾大公國，後者於阿姆利澤（Amritsar）簽訂條約，承認英國在印度帝國中的至高權力。¹³³高聳山脈及所謂的「自然環境」成了拉達克、中國及西藏控制的北方區域間的分界。但對「自然環境」如何定義，各方意見不一。

根據一八四六年《阿姆利澤條約》（Treaty of Amritsar），鄰近西藏的北界，應由英屬東印度公司聘任專員，會同查穆與喀什米爾大公古拉伯·辛格·多格拉（Gulab Singh Dogra）共同訂定。一名英屬印度測量局官員威廉·詹森（William H. Johnson）成為大公之下的拉達克總督。一八六五年，他提出一條穿越阿克賽欽的邊界，接通此區最高的崑崙山脈。一八九七年，這條邊界由英國倫敦的軍事情報處長約翰·阿爾達少將（John Ardagh）向英國政府提出。後續，這條線就稱為「阿爾達——詹森線」（Ardagh-Johnson Line）。¹³⁴

中國從未承認阿爾達——詹森線。一八九二年，一名中國巡邏官曾經在喀喇崑崙山口豎立了幾座邊境標誌，這座山口是自古以來新疆與拉達克之間的商隊路線。從此之後，中國持續宣稱拉達克的阿克賽欽大部分區域應屬於中國。英國對中國進入這塊偏遠無人居住區域一事並不關心，但為了在擴張的沙俄帝國與西藏間建立另一塊緩衝區，一八九三年又劃了一條新邊界「馬繼業——寶訥樂線」（MacCartney-MacDonald Line），將多數阿克賽欽區域都劃入中國境內。這個新邊界是以英國駐新疆主要城市喀什（Kashgar）的領事馬繼業（George MacCartney）與當時英國駐清公使寶訥樂爵士（Claude MacDonald）

為名。竇訥樂更為知名的作為是，在一八九八年為香港殖民地向中國談判，取得新界九十九年租約。此租約於一九九七年到期，整個香港回歸中國統治。

根據印度資料，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英國政府接受以阿爾達——詹森線（而非馬繼業——竇訥樂線）做為正式邊界。¹³⁵此線也是今日所有地圖上的印度邊界，中國主張則大致沿著馬繼業——竇訥樂線。英國殖民時期地圖上的西段邊界，遠比東段更為模稜兩可，然而在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前夕所出版的地圖，印度領土確實包含了阿克賽欽及今日的阿魯納恰爾邦。¹³⁶矛盾的是，部分較早的殖民時期地圖中，拉達克邊界標示著「未定界」。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間，英屬印度政府曾數度遣使西藏，要求劃定拉達克與西藏的邊界，然而未果。¹³⁷因此至少到一九四三年前，這段邊界在地圖上多以虛線方式標注。

另一方面，中國地圖的對外疆界也不精準，其中想像力最為豐富的莫過於中華民國地圖，至今仍在台灣使用。雖然中華民國只存在於台灣與數個附近小島，但使用的地圖仍展現一九一二年建國時所宣稱的中華民國疆界。這張地圖上唯一修正的部分，是在一九四五年納入台灣，因為台灣從一八九五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都受日本統治。

在正式地圖上，西藏自然也是屬於中華民國，此外還有蒙古國、俄羅斯的圖瓦共和國（Republic of Tuva）、阿克賽欽、阿魯納恰爾邦、緬甸最北側克欽邦孫布拉蚌（Sumprabum）以北區域、南中國海島群及釣魚台列嶼。釣魚台列嶼位於東海，日本也宣稱擁有主權，並稱為尖閣諸島。

中華民國從未承認蒙古獨立，這也是之前蒙古多年無法加入聯合國的原因。直到一九六一年，蘇聯威脅中華民國若再次動用否決權，也將否決所有甫解放殖民的新興非洲國家加入聯合國，因此才讓蒙古加入聯合國。當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代表中國席次，並擔任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直到一九七一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

蒙古在一九一一年宣布獨立後，也經歷了一些重大變化。一九二一年俄國紅軍進占蒙古之後，政教合一的舊國家不復存在。這波入侵是由前沙俄軍隊中將在俄羅斯遠東區域的恐怖統治所引起，他的名字是羅曼．費歐多洛維奇．馮．恩琴——史登伯格（Roman Fyodorovich von Ungern-Sternberg），這人若生在今日，應該會被認定心理變態而入獄。馮．恩琴——史登伯格以「瘋狂男爵」聞名，也信奉麾下蒙古騎兵的喇嘛佛教，並從佛教導師那裡習得輪迴轉世概念。他堅定相信殺害無力反抗者是為了他們好，可以讓被殺者在下一世更加強壯。

一九二〇年秋天，馮．恩琴——史登伯格帶領一支六千人的雜牌軍，包含前沙俄騎兵團、當地哥薩克人與蒙古騎兵進入蒙古。一九二一年一月當他入侵庫倫時，「各年齡層、種族與信仰難以計數的孩子們都被砍成碎片、刺刀刺穿、槍殺、勒斃、絞殺、釘死或活埋。」¹³⁸

馮．恩琴——史登伯格在蒙古自稱「全俄皇帝」，誓言鋪出一條從庫倫通往莫斯科的「恐懼大道」，並將吊死「共產黨人與猶太人」。¹³⁹他也宣稱將帶領軍隊一路直入西藏，並相信自己的「帝國」將與達賴喇嘛簽訂條約。

莫斯科新的共黨政府顯然視馮．恩琴——史登伯格為威脅，不單是因為他所帶來的災難。日本是馮．恩琴——史登伯格的主要後台，並視之為擴張北亞、中亞勢力的有用工具，特別是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擊敗帝俄之後。日本公開支持馮．恩琴——史登伯格的「大蒙古」計畫，並將其納入保護國。雖然不清楚征服西藏是否在計畫之中，但在日本的支持下，馮．恩琴——史登伯格的猖狂行徑已引起新德里與倫敦的關注，並重視強化英屬印度北方邊防的需求。

最後終結了馮．恩琴——史登伯格恐怖統治的，並非英國或任何外國勢力，而是俄國共產黨。一九二一年七月，一萬名紅軍進入庫倫，逮捕並處決馮．恩琴——史登伯格，蒙古成為了莫斯科的附庸國。蒙古不同於其他共產黨統治的中亞區域，當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宣布成立時，蒙古並未成為聯邦的一部分。由於當時蘇聯與中華民國關係友好，兼併蒙古將會破壞中蘇關係，因

此蘇聯採行自認妥協的解決方式，讓蒙古成為一個「人民共和國」，是蘇聯之外的第二個共產國家，而中華民國所有地圖，仍持續將蒙古包含在疆界之中。

今日的圖瓦共和國是俄羅斯聯邦的一部分，也是另一個由俄國共產黨統治，但中國卻宣稱為其所有的區域。它與蒙古一樣成為正式獨立國家，當時名為「坦努圖瓦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Tannu Tuva）。於一九二一年八月建國，至一九四四年消失在地圖上。由於圖瓦面積較小，戰略位置也不如蒙古重要，遂被蘇聯所併。但圖瓦也如同蒙古，今日仍出現在中華民國的地圖上。

中華民國官方地圖或許可視為與現實脫節，但台北當局仍舊維持這份地圖，倘若承認蒙古為獨立國家，那麼又該如何處理台灣？台灣島上有強烈呼聲要脫去中華民國舊名，改採台灣共和國。若台灣獨立，中國則威脅入侵。雖然一八九五年以來，台灣受大陸政權統治時間僅僅四年，從一九四五年脫離日本統治回歸中國，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國民黨政府逃往台灣為止；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仍認為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國民黨也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指的是中華民國，不過此觀點並未獲得台灣民族主義的民進黨人士認同，後者自二〇一六年五月成為執政黨，並希望台灣脫離大陸成為獨立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印製的地圖，不合現實的出入自然比中華民國地圖少，但仍舊包含一些從不屬於中國，或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國後占領的區域。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並未宣稱擁有蒙古與圖瓦，但新的中國共產政府自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就占領西藏與阿克賽欽，其地圖也包含台灣、今日的阿魯納恰爾邦、南中國海斯普拉特利群島及釣魚台列嶼。

中共政府剛上台時宣稱，將「重新審閱過往政權與外國勢力簽訂的條約，予以承認、廢止、修訂或重新談判」。¹⁴⁰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三年期間，中國與緬甸、尼泊爾、蒙古、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簽訂新的

邊界條約，但未包括印度與蘇聯。直到一九九一年、二〇〇三年及最終的二〇〇八年條約簽訂後，中蘇之間才解決領土爭議。

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簽訂的條約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過去對緬甸最北角克欽邦的領土宣示，雖然此地從未在中國統治之下。一九六〇年條約進一步要求，為交換中國的「讓步」，以及緬甸對克欽邦邊界兩百二十平方公里的南碗指定區¹⁴¹主權，中國將取得中緬邊界上的三個克欽族村落：片馬（Hpimaw）、古浪（Gawlum）及崗房（Kangfang），以及緬甸東北佤族山區的班洪——班老區域（Panghung-Panglao）。克欽邦村落區域約為一百五十二平方公里，而割讓中國的佤族區域為一百八十九平方公里。¹⁴²

以國際標準來看，這筆交易並非不公平。不過傳聞迅速在緬甸少數民族區域的克欽邦中擴散：克欽領域的廣大區域已割讓給中國。因此克欽人在一九六一年發動叛變，直到今日仍未休止。除了與中國的邊界條約外，緬甸政府於一九六〇年決定將佛教定為國教一事，也讓以基督徒為主的克欽族人大為不滿。克欽人開始爭取獨立，或者至少是真正自治的政府。

從區域觀點來看，中緬在一九六〇年簽訂的邊界條約與印度衝突有關，因為兩國區劃的邊界延續了麥克馬洪概念，亦即分水嶺的概念。緬甸的北方邊界事實上是麥克馬洪線的延續，而中國顯然並未視其為某種古老、殖民時期「不平等條約」或「帝國主義政策」的延續，這是中國政府在討論中印邊界與其他領土爭議時一貫訴諸的說法。

緬甸邊界可能對印度有另一種影響，因而讓英國在一九三〇年代採取行動穩固麥克馬洪線。當時稱為Burma的緬甸（Myanmar），在十九世紀三次英緬戰爭後，成為英屬印度的一省。然而在一九三五年《印度政府法案》的規劃下，緬甸將成為另一個殖民地。此事於一九三七年發生，根據潘竹邦的說法，這可能是「歐拉夫·卡洛急忙在《艾奇遜條約集》中發布麥克馬洪線的原因之一。一九三八年他最終在爭議狀態下所做之事，（正因為）緬甸即將脫離印度」。¹⁴³

英國在緬甸極北之處的統治，雖然比殖民地其他部分來得微弱，但確實延伸到北方分水嶺，因此穩固麥克馬洪線確實說得過去。一份解密的一九五九年美國中情局文件顯示：「雖於一九一四年劃定麥克馬洪線，此後在延伸山區行政控制方面，幾乎沒有任何作為。」¹⁴⁴英國雖然忽視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的山區，但並非毫無作為。同一份中情局文件也指出，雖然多數地區未設治，「一九〇〇年前，英國人曾與不同山區部族簽訂條約，避免他們劫掠平地居民。」¹⁴⁵

這些接觸並非沒有意義。遠征軍進入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山區，部落居民不只劫掠低地，也會來此購買高地無法取得的日用品。除了今日阿魯納恰爾邦西北角的達旺區域與極東的瓦弄主要是與西藏進行交易外，山區部落居民與外界的任何接觸，都是透過南下平原，而非北上穿過世界最高的山岳。同時也如前述，倘若這些部落民有熟悉任何外界的語言，通常是零碎的阿薩姆語而非藏語，當然更非中文。

然而，不只馬克斯韋爾與蘭姆的著作中出現困惑與明顯的矛盾，許多其他西方學者宣稱存在於麥克馬洪線旁近與下方，所謂的內部與外部界線也是如此。部分內容是真的，但許多都是虛構，不只是誤解，更是對印度北方邊界實際情況的扭曲。馬克斯韋爾宣稱存在著「事實邊界」：「布拉馬普特拉河廣大平原由此開始向喜馬拉雅山腳丘陵上升……英屬印度稱此統治極限為『外部界線』，並禁止任何未經許可的穿越行為。」¹⁴⁶

這完全是謬論。一八七三年的《孟加拉東部邊界規範》（Bengal Eastern Frontier Regulation）之下同時立法，在阿薩姆平原與附近山區之間建立所謂的「內部界線」（Inner Line）；但行政當局明白表示：「此線並不代表領土邊界，僅是行政區域界線……同時也未決定外側區域的主權。」¹⁴⁷

如同潘竹邦指出的，一八七三年是茶葉種植在阿薩姆各地快速擴張的年代，「茶葉投機分子渴望爭奪更多土地」¹⁴⁸，因此爭相進入山區。投機客與尋求利益的大眾間缺乏控制的溝通，代表「政府將損失大筆稅收」¹⁴⁹。另一方面，對殖民當局來說，內部界線是避免所謂

「野蠻部族」劫掠低地的必要之舉。內部界線外的領土在一九一九年《印度政府法案》中列為「除外地區」（excluded areas）、「部分除外地區」（partially excluded areas）及「落後區域」（backward tracts）。但這些仍是英屬印度的一部分，而非外國土地。

《內部界線規範》（The Inner Line Regulation）仍舊在印度東北部分地區施行，此法同時也避免低地人民永久定居在界線以北的區域。不是來自東北山區數邦的印度公民，需要申請特別許可才能進入那迦蘭、米佐拉姆、阿魯納恰爾邦與錫金。非印度公民在進入那迦蘭、米佐拉姆與曼尼普爾前，必須向印度當局登記；欲進入阿魯納恰爾邦與錫金，則需要申請特別許可。

內部界線很明確，但從未有任何正式的外部界線。那只是幾位西方學者想像中的虛構。蘭姆在其著作《中印邊界：邊界爭議起源》（The China-India Border: The Origins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中，甚至在一幅地圖上標出「一九一四年前外部界線」。150雖然部分古老書籍與紀錄提及外部界線，但正如潘竹邦指出：「英屬印度政府否認有任何正式外部界線，任何外部界線指涉，應該大致為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所劃的麥克馬洪線。」151若真有任何外部界線，就該是喜馬拉雅山巔；沒有任何理由在內部界線與麥克馬洪線之間再劃第三條線。

在蘭姆的地圖上，外部界線沿著山腳，或者說在內部界線以北數公里處。兩條如此相近的平行界線，實在毫無道理。馬克斯韋爾甚至更進一步在《印度對華之戰》中宣稱，一九一〇年「即將退休的總督明托伯爵比（孟加拉副總督）更大膽，提議外部界線應延伸包含所有部落區域……（新總督）哈汀（Hardinge）採納明托的提案，認為外部界線應向北推展」。152

此處再次暗示了存在一條正式的外部界線。問題在於馬克斯韋爾在此條注釋寫著：「哈汀給克魯（Crewe）」，這讓人有一種印象，認為此言是摘自一九一一年印度總督查爾斯。哈汀對英國的印度事務大

臣羅伯特．克魯——密爾恩爵士（Robert Crewe-Milne）的直接通訊。然而他援引摘文的來源並不是這麼說。

根據《印度對華之戰》的注釋，摘文引自《阿薩姆鄰近邊界區域歷史：一八八三至一九四一年》（History of the Frontier Areas Bordering Assam From 1883-1941），作者羅伯特．瑞德爵士（Robert Reid）曾於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擔任阿薩姆總督，其中提到：

我們不提議在既有內部界線與新的外部邊界之間建立第三條中界線，但在考慮部落領域行動的過程中，可能有必要在合適地點，例如往西藏的通商路線，設立石碑以標明我方控制終點，並向部落民說明這類標誌的目的。¹⁵³

哈汀在電報中提到了「外部界線」，但認為並無需要，因為當時正在討論更為精確的新邊界。然而在蘭姆與馬克斯韋爾版本的歷史中，這個不精確的「外部界線」反成正式的外部界線。根據潘竹邦所述，內部界線與喜馬拉雅山巔之間的區域確實存在，「但在任何現實意義上，是被視為荒野『無人』之地，等待正式宣示所有權。在此案例中，是透過麥克馬洪線。」¹⁵⁴

馬克斯韋爾同時給人一種印象，阿薩姆以外的土地是屬於中國，並指出印度感到威脅，因為「中國在印度邊界地區積極活動」，而這正是英國想向北擴張的原因。¹⁵⁵然而中國除了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二年短暫占領西藏時期，曾在瓦弄邊緣的偏遠區域設立幾個邊界標誌外，並沒有任何官員或軍隊靠近印度北部邊界的紀錄。馬克斯韋爾同時認為達旺「無庸置疑屬於西藏／中國」，看起來像是藏人與中國人一起快樂地統治這裡。¹⁵⁶部分中國商人確實可能在二十世紀初進入或穿越達旺，但中國官員從未前往此地。同樣令人誤解的還有馬克斯韋爾說的「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中國勢力在西藏突然垮台」¹⁵⁷。事實上，他所指的是中國在這兩年裡短暫而失敗的占據西藏行動。

殖民進入今日阿魯納恰爾邦的行動，是來自其他更直接的考量，例如部落民族時常劫掠阿薩姆低地，以及茶商希望向布拉馬普特拉河

以北山區擴張茶葉種植範圍。英屬印度政府支付內部界線以北數位部落酋長高額費用，避免他們劫掠平原地區，造成部落與殖民權力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酋長依靠英國抵禦外來者，而英國則透過每年補助款來換取部落忠誠。

喜馬拉雅山脈另一側的西藏，自一九一三年達賴十三世宣布獨立後，維持事實獨立長達數十年。甚至正如西藏專家華倫·史密斯（Warren W. Smith）所指出：「清（帝國）與西藏的關係本質上是兩國關係，或是帝國與半自治國家之間的關係，而非中央政府與外圍省分的關係。」¹⁵⁸

隨著中國在西藏有限影響力的結束，藏人此時終於可以建設一個真正較為獨立的國家。西藏與英屬印度的邊界已然明確，如同西姆拉會議中西藏代表倫欽夏札致麥克馬洪的信件所述：

為免將來紛擾，印度與西藏的邊界需要清楚劃定，我已將您二月提送的地圖送往拉薩等候命令。此刻我收到來自拉薩的命令，因此同意兩份地圖上以紅色標記的邊界。這兩份地圖由您署名，並依貝爾先生轉交您在三月二十四日信件中所列條件為限。我已簽名並封緘兩份地圖，自存一份，另一份於此回覆。¹⁵⁹

當然，「以紅色標記的邊界」所指的就是麥克馬洪線，而貝爾先生是指查爾斯·貝爾。

因此，就連藏人也認為宣稱麥克馬洪線為「祕密劃定」十分荒謬。至於宣稱相關文件在一九三〇年代才由卡洛「發現」，同樣會令人誤解。阿薩姆平原與麥克馬洪線之間，並沒有建立太多實質行政管理機構；然而一九二八年，內部界線以北巴利帕拉邊境地域的政治官奈維爾上尉（Captain Neville）才通知印度政府，若中國試圖掌控西藏，達旺將是個「輕易進入印度的祕密門戶」。¹⁶⁰

達旺是難以區分屬於麥克馬洪線以北或以南的部分區域之一。地圖上紅色麥克馬洪線將邊界大致放在色拉山口，位於達旺以南七十八公里。然而根據麥克馬洪線建立的原則，沿著喜馬拉雅山最高山峰劃定，並由分水嶺連接，邊界應該在達旺以北的棒山口。在西姆拉會議

的最後備忘錄中，麥克馬洪發現此事，並快速討論將達旺納入印度領土，「這將給我們天然分水嶺邊界，通往西藏最短的貿易路線，並控制過去曾以不當收取金錢與壓迫行為阻斷貿易的達旺寺廟。」¹⁶¹

「發現」麥克馬洪線部分區域的模糊狀態，其功勞不應歸於卡洛，而是英國植物學者暨探險家法蘭克．金頓——沃德（Frank Kingdon-Ward）。他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間抵達門隅（Monyul）或達旺區域，並注意到印度政府長期以來：

支付年度補助款給門隅（達旺）的事實統治者，並以為他們是獨立酋長。一開始也許如此，但最近才發現多數補助款進到錯那（Tsona-Dzong）那些（位於西藏）掌權者的口袋，然後轉到拉薩……此一做法稀釋了印度對門隅的控制……一九一四年完成的安排，門隅將成為巴利帕拉邊境地域的一部分。¹⁶²

金頓——沃德認為印度政府應為其忽視負責，「倘若印度於一九一四年掌握這片土地，就不會有今日之事。」¹⁶³並且提出解決方法，「在一九三九年，最遲一九四〇年進行有效占領。」¹⁶⁴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橫亘其中，直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達旺才進入印度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金頓——沃德的達旺之行，在英屬印度與西藏關係中造成一些問題。當地政府逮捕他，接著藏人向當時訪問拉薩的英國官員德瑞克．威廉森（Derrick Williamson）抗議。與藏人交涉後，金頓——沃德被遣返低地。經過此一事件，歐拉夫．卡洛才決定將《西姆拉條約》公諸於世。此前，只有少數邊境官員知道《西姆拉條約》。¹⁶⁵

雖有金頓——沃德事件，一九二〇及一九三〇年代間，西藏與英屬印度之間的關係一貫友好；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榮赫鵬遠征西藏、達賴出逃及藏軍羞辱潰敗之事已然被遺忘。一九二二年，英國人派遣萊登．拉（不丹籍錫金官員，曾參與榮赫鵬遠征軍，後來在西姆拉會議擔任口譯）前往拉薩建立西藏警衛隊。他的工作非常成功，英國情報官弗雷德里克．貝利（Frederick Bailey）上校在一九二四年到訪拉薩時回報：「萊登．拉為拉薩市建立一支口碑甚佳的警衛隊。」

隊員相當精幹，冬天穿著厚斜紋呢卡其制服，夏天則是黃滾邊藍色制服。」¹⁶⁶在萊登．拉的領導下，西藏警察樂隊以風笛鼓樂迎接貝利。

這些在西藏看來充滿異國風情的樂器，連同許多外國商品，都是由印度進口。往南的貿易路線，從拉薩通往錫金邊界的則里拉山口（Jelep La Pass），接著通往噶倫堡與萊登．拉的家鄉大吉嶺。由此開始，連接加爾各答的交通順暢，甚至有一條由北孟加拉平原蜿蜒爬升山區的鐵路。西藏與印度之間由電報線連接，西藏印製郵票、紙鈔，並發行自己的貨幣。西藏貨幣包含兩（srang），一兩有十錢（sho），以及更小的單位色瓦（skar）。此外還有章噶幣（tangka），為十五色瓦。貨幣政策由西藏噶廈（kashag）政府主持。與此同時也引入電力，不過規模很小；第一具電話與汽車開始出現在拉薩街頭。西藏也擁有自己的國旗。

一九二〇與一九三〇年代間，中國基本上對西藏不存有影響力，但並未就此放棄西藏。事實上，蔣介石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統一中國」，對他來說，蒙古與西藏都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並於一九二八年成立了蒙藏委員會。由於當時中國分崩離析，因此任何以武力奪取西藏的企圖都將帶來災難，這個委員會轉成類似現代用語中的「智庫」。西姆拉會議後很少有陳貽範的消息，也許因為他在文件上簽名，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同意了英國要求。然而，狡詐的陸興祺直到一九三〇年代，仍持續在背後運作蒙藏事務。¹⁶⁷

不過達賴十三世疏遠他的噶倫暨親英軍事將領擦絨．達桑占堆（Tsarong Dzasa），這事並未逃過中國的注意，一場陰謀於是展開。一九二九年底，國民政府透過北京雍和宮的掌教喇嘛與藏人建立聯繫。蒙藏委員會派遣一位年輕女性劉曼卿前往拉薩會見達賴喇嘛。她傳遞蔣介石的話：「對於西藏當前情勢深刻憂心，並且急切希望看到藏族兄弟重回民國大家庭。」¹⁶⁸

達賴的回應基本上與藏人在西姆拉的立場一致，不過也帶有與中國和解的意味。西藏是獨立國家，但只要藏人得以自行主理藏事，西

藏願意接受名義上臣服中國。雖然並未達成任何協議，但這是自一九一三年以來，西藏首次與中國重建某種正式關係。

若說藏中之間有任何友善關係，也都不長久。就在兩年後（一九三二年）藏中再次爆發戰爭，西藏軍隊試圖奪取青海與西康土地（亦即內藏的康區）。藏軍遭擊敗，中國警告藏人勿再跨越金沙江（即內藏與外藏的界線）。

次年，達賴十三世圓寂。藏學家梅爾文·戈爾斯坦（Melvyn Goldstein）認為「意志強悍、獨裁且極為獨立的達賴十三世圓寂，為中國創造新情勢，在重新建立中國對西藏的傳統控制權上看似有利」。169中國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黃慕松將軍帶領代表團，前往拉薩向已故的達賴十三世弔祭，而更精確的說法是重申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在各種策略中，黃將軍特別強調中藏之間有別於英國的共通性。

這一次仍未達成任何實質協議，然而中國獲准在拉薩駐紮一名官員及一具無線電設備，做為進一步對話之用。根據戈爾斯坦所述：「此決定反應出西藏對中政策的矛盾：拒絕放棄事實獨立，但同時也不願與中國全面決裂。中國則是抱著可能達成滿意解決的希望，又拒絕在任何重要議題上讓步。」170

一九三三年達賴十三世圓寂後，尋找新任達賴的工作旋即展開，此時中國不斷企圖誘使藏人達成某種決議。某些跡象顯示，西藏第二重要的喇嘛（當時駐南京的流亡班禪喇嘛）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的工具。雖然班禪返回西藏的可能性會對英國產生影響，但後者仍清楚表達歡迎班禪返藏，並表示若有需要，他們很樂意扮演班禪與拉薩當局之間的中介。但中國學者林孝庭指出：「英國政府絕不會同意中國軍隊進入西藏……認為將破壞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條約》。他們透過外交管道將想法明白傳達給中國。」86此時談及《西姆拉條約》時顯然無任何「恐懼」，因為數年前卡洛「發現」了這批文件。

新任達賴喇嘛最終於一九三七年尋獲，這位兩歲男孩出生時被命名為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並於一九三九年四歲時，在喇嘛的簇擁下進入拉薩，此後在布達拉宮及羅布林卡（Norbulingka）夏宮度

過童年。由於達賴年齡幼小，因此由熱振活佛（Reting Rimpoche）代為攝政，會同噶廈政府總理政務。但這政教合一國家的高階喇嘛與官員們十分憂心國家未來，特別是達賴十三世的預言。據說達賴十三世在圓寂前，曾留下關於西藏未來的不祥預言：

這塊（宗教與政治和諧共存的）土地上，詐騙之舉將內外叢生。到那時，若我們不敢起而捍衛國土，我們的精神人物包含世系聖職（達賴與班禪喇嘛）將遭消滅無蹤；我們的拉章（轉世喇嘛居所）與僧侶的財產權威將遭剝奪。此外，由偉大三法王（松贊干布、赤松德贊與赤熱巴巾）所創建的政治體系，也將不復存在。所有人民無論高低，財產將遭奪取，也將被迫為奴。一切生命將被迫忍受無止境的痛苦，受恐懼所苦。此一時代即將到來。[171](#)

達賴十三世很清楚，西藏籠罩在中國陰影之下。後世中國對達賴十四世坐床儀式的紀錄中，國民黨政府由蒙藏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吳忠信將軍代表，於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主持坐床大典，並批准提名。然而此紀錄就像其他中國對西藏地位及邊界的宣稱一般，純屬無稽之談。英國代表巴西爾·顧爾德爵士（Basil Gould）也在坐床儀式現場，指出吳忠信不過是諸位賓客之一：

他不過是呈遞一條哈達，與英國代表在內的其他人所做之事完全相同。但是全世界都會聽到中國所言，之後還可以根據媒體紀錄，製造全然不實的歷史事件。由於西藏沒有報紙，不論英文或藏文報紙，因此也無從揭發這種造假之事。[172](#)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達賴十四世還是嬰兒，無法察覺大戰將對國家帶來的影響。西藏事實獨立、做為印度與中國之間緩衝區的微妙地位正受到挑戰。中國與英屬印度史上第一次形成同盟，要對抗共同敵人：日本。日本皇軍已占領中國東部廣大區域，並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占領了英國殖民地香港。

數萬中國部隊從中國內地經由緬甸北部，撤往印度東北。許多人駐紮在比哈爾邦的蘭迦（Ramgarh），即是位於今日的賈坎邦（Jharkhand）。英、美堅定地支持蔣介石部隊，並準備提供裝備，將

部隊送回中國戰場。此外，由於日本已切斷傳統透過緬甸及鄰國運送物資的路線，如何將補給送入中國，則是另一個主要任務。

蔣介石與盟友認為有必要從印度發展替代路線，因此與英國大使在戰時首都重慶協商後，一九四一年二月便下令興建一條新公路，從重慶所在的四川，經過西藏東南的力馬，連結印度側的瓦弄。從瓦弄，這條公路通往阿薩姆，並將因應戰時需求建設高原機場。英國大使薛穆爵士（Horace James Seymour）支持中國的計畫，並建議「在此事上，我們不可讓過時的政治思維阻礙進步」。¹⁷³意指英國支持西藏內部自治的承諾，不應干擾這項重要的策略性公路建設計畫。

但是英屬印度政府反對這項計畫，因其無法大幅助益戰況，此外，與英屬印度關係密切的西藏，其事實獨立的緩衝國家地位將受影響。在十二月日本占領香港後，英國轉而支持中國建造補給路線的計畫，但必須經由緬甸北部而非西藏。這條穿越緬甸抵達中國的公路，最後成為史迪威公路（Stilwell Road），也叫雷多公路¹⁷⁴，因為是以負責建造的美國將軍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命名，也以這條新軍事補給線在阿薩姆東北起點處的小城雷多（Ledo）為名。

雖然四川到瓦弄之間並未興建道路，中國的盟友仍施壓讓軍事補給得以透過西藏送往中國。英國派出駐錫金副政務官諾布頓珠（Norbhu Döndup）前往拉薩，試圖說服西藏政府協助英、中對抗日本。

西藏陷入兩難局面。一方面希望維持與英國、印度的友好關係；另一方面在戰爭中支持中國，將會開啟危險先例。最後拉薩的國民議會表明，西藏國土不得用以運送補給進入中國。噶廈同時也知會英國，西藏希望保持戰時中立。¹⁷⁵

然而戰爭與美國的到來，使西藏國際地位與遺世獨立的狀態受到挑戰。史迪威是蔣介石的首席軍事顧問，而蔣決心將西藏置於中國統治下。一九四二年，狡詐的蔣介石下令將領馬步芳準備入侵西藏，並宣稱若「西藏與日本合作」，則威脅會轟炸西藏。¹⁷⁶

沒有任何證據支持蔣對西藏與日本關係的想像。一九四三年，日本間諜木村肥佐生喬裝成蒙古僧侶，化名「達瓦桑波」（Dawa Sangpo）潛入西藏；但他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才抵達拉薩，當時戰爭已經結束。[177](#)

一九四二年七月，西藏終於同意非軍事物資可經由西藏轉運中國。然而此事過於敏感，因此噶廈在未經國民會議同意前，要求噶倫之一簽署協議。運輸路線經過拉薩；補給物資將透過西藏貿易公司運輸，採取穿越西藏中部的傳統馱獸貿易路線。中國則宣稱計畫在西藏沿路駐紮「技術人員」以「協助運輸」。[178](#)

藏人拒絕這項提議後，中國政府又嘗試進行另一項詭計，其交通部官員將與孟加拉北部噶倫堡的西藏貿易公司直接協商談判。英國人同意了，但藏人再次看穿中國提議背後的企圖，並宣布任何西藏貿易公司，都不得在未經拉薩當局同意前與中國協議。

同時，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提議派遣情報員進入西藏測量地形。對於「建一條從印度穿越西藏通往中國的公路」這想法，美國從未全然放棄。克服一開始的困難之後，兩位美國人伊利亞·托爾斯泰（Ilia Tolstoy）與布魯克·多蘭（Brooke Dolan）獲允進入西藏。美國的立場是支持中華民國及其領土主張，但托爾斯泰給予藏人的保證可能超過官方政策範圍。他表示會向自己政府建議，西藏應派代表出席戰後舉行的和平會議。噶廈十分興奮，視之為西姆拉會議後，首次推動國際承認西藏獨立的機會。

另一方面，英國對中國的動作疑慮漸增。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倫敦外交部向印度事務部遞交提案，認為英國應撤回過去向中國對西藏宗主權的承認。外交部在信中表示，此撤回符合英國與印度利益，因為這將一次性解決印度與西藏邊界的所有問題。[179](#)

最終英國決議，改變西藏地位政策將引發中國攻擊甚至占領西藏。無論如何，一旦二戰結束，中華民國很可能會試圖入侵西藏。但後來國民黨忙於另一段更重要的前線，也就是與共產黨的內戰。共產黨的勝利與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建國改變了一

切。那時在天安門廣大群眾面前，毛澤東發表知名承諾：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在毛澤東的鐵腕共產統治下，中國從未是真正自由的國家，然而毛卻完成蔣介石做不到的事：一統國家。中國新統治者承認共產統治蒙古的獨立地位，但政教合一的西藏卻必須回歸中國中央政府的掌控。

美國雖從未正式承認西藏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但中國政府如此主張，華盛頓也就這樣應對，以免引起蔣介石不滿。然而在共產政權即將取得中國時，美國的態度有了重大轉變。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顯然時日無多，美國駐印大使向華盛頓國務院建議，應重新考慮西藏政策。特別是如果毛澤東與共產黨成功控制中國，美國應準備視西藏為獨立國家，「若共產黨控制了中國核心，西藏將是亞洲大陸上少數非共產主義的灘頭堡。外蒙古已然脫離，共產黨在緬甸的影響力相當強盛，也正滲透新疆與內蒙古。因此西藏將具有意識型態與戰略上的重要性。」¹⁸⁰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僅十五歲的達賴十四世正式親政，成為西藏的統治者，然而他的統治卻不和平。在達賴十四世親政之前，共軍於十月七日跨過金沙江，與配備不良的弱小藏軍進行第一場也最決定性的戰役。據信大約有五千名藏軍死於這場戰役，根本可以說是大屠殺。

朵麥總管¹⁸¹阿沛·阿旺晉美（Ngapoi Ngawang Jigme）為中國所俘，之後被遣往拉薩與達賴喇嘛進行談判。經過數個月的討論，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晉美在北京簽下十七點「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這是遠在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前，中國首度承諾「一國兩制」。這項協議申明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過根據第四點所述：「對於西藏現行的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固有的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¹⁸²

然而極不祥地，人民解放軍一九五一年底在拉薩設立基地，中國占領西藏的動作已經展開。在這樣的安排下將不會有一國兩制，官方

歷史也需修正。一九五〇年代後期出版的中國宣傳冊子中，完全不提維持「西藏現行政治制度」，卻刊印人民日報一篇社論：

為保護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下令解散組織動亂的西藏地方政府……人民解放軍獲得神職與世俗西藏人民的積極支持，迅速壓制拉薩地區動亂，此刻正掃蕩其他區域的叛匪。¹⁸³

中國入侵之後，西藏人民幾乎立刻集結，高舉武器對抗新統治者。反抗軍中包含康巴部族，以及中國擊潰的藏軍餘部。中國的報復既快又狠，反抗軍疑犯遭到逮捕並槍決，寺廟遭劫掠，中國在西藏各處展開恐怖高壓統治。

如今西藏處於中國直接統治下，從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開始，中國就成為印度的永久近鄰，此事過去從未發生。法國學者貝海妮絲·居約——荷沙爾（Bérénice Guyot-Réchard）在《影子國家：印度、中國與喜馬拉雅，一九一〇至一九六二年》（Shadow States: India, China and the Himalayas, 1910-1962）書中寫道：「一九五一年的最後一個月，人民解放軍出現在麥克馬洪線以北。自一九一〇年代後未曾見過中國軍隊的察隅（Dzayül），很快出現整群軍事營地、總部與碉堡，其中兩個靠近印度邊境。大約與此同時，軍隊也開始來到達旺以北。」¹⁸⁴

從一開始，美國身為甫建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頭號敵人，必須小心應對此情況，因為蔣介石在最終潰敗後撤退到台灣，舊的中華民國也在台灣延續下去。蔣的政權持續在聯合國（包含安理會）代表中國，更是美國親近的盟友，此刻共同對抗中國共產黨。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樣，也認為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入侵西藏後的種種陰謀，涉入其中的各色人物，幾乎讓過去大博弈時代相形失色。中國進入東部康區鞏固對西藏的控制後，美國也開始展現對西藏議題的興趣。一九五一年春天，美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館年輕的中情局情報員賴瑞·達利（Larry Dalley），曾與城內外交圈兩名年輕女士聯繫，希望尋求中國對西藏企圖的資訊。其中之

一是白瑪次珍公主（Pema Tseudeun），是錫金王儲巴登頓珠（Palden Thondup）的長姐。白瑪次珍公主是令人驚豔的喜馬拉雅美女，嫁給西藏貴族，被社交圈稱為庫庫拉公主（Coocoola）。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少女時代的公主已結交兩位美國戰略情報局駐拉薩專員：托爾斯泰與多蘭。她與丈夫在拉薩擁有大片莊園，然而中國的入侵迫使他們返回錫金，接著搬到加爾各答。¹⁸⁵

達利的另一位聯絡人是庫庫拉的妹妹，同樣迷人的白瑪曲西（Pema Choki）公主，朋友都叫她庫拉（Kula）。庫拉公主同樣嫁給西藏貴族，公公是噶倫堡西藏貿易代表處的高官。達利詢問兩位公主，西藏是否需要美國提供協助，通往喜馬拉雅山另一側反抗勢力的管道就此開啟。

根據美國學者肯尼斯·康伯伊與詹姆士·莫里森的研究：

一九五二年六月，庫庫拉帶著達賴喇嘛的口訊聯繫領事館。她剛從拉薩訪視完婆家返回，雖然並未親自面見達賴喇嘛，她由庫拉的公公堯西宇妥扎薩（Yurok Dazza）處獲得訊息。他當時也在拉薩，遊走於政府高層之間。庫庫拉引述達賴的話，當解放的吉時到來，他希望美國能提供物資援助與支持。¹⁸⁶

隨著西藏各地對中國占領的不滿持續發酵，一九五四年九月，年輕的達賴喇嘛受邀前往北京，表面上是帶領西藏代表團前去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第一部憲法。年僅十九歲的達賴會見中國當時所有重要領袖：毛澤東、周恩來與鄧小平。所有官媒上都刊登微笑的達賴與看似和善的中國主人合照，然而毛澤東卻以宗教是毒藥等話語侮辱這位精神領袖。毛同時也告訴達賴，一個全新的組織「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一九五一年的《十七點協議》保證下已經成立。西藏人無須再管理西藏事務。

當達賴喇嘛返回拉薩，他發現中國已開闢通往西藏的新路，包含通往印度邊界村莊的公路，而境內的人民解放軍比他去北京之前還多。達賴喇嘛十分憂慮，意識到中國首次入藏以來，他所深愛國家享

有的任何自主，很快都將要消失。中國是新的統治者，比起過去未曾真正統治整個西藏的清帝國及國民黨，共產黨對於宗教的寬容更少。

一九五六年，達賴喇嘛前往印度朝聖時曾經有個機會。當時尼赫魯邀請他前往菩提迦耶（Bodh Gaya）參加佛誕日慶典，當地的大菩提寺（Mahabodhi）為此重新整修。達賴喇嘛率領五十五人的西藏代表團從錫金進入印度，卻驚訝地發現周恩來也在印度進行正式訪問。

西藏議題受到討論，尼赫魯在新德里會見達賴喇嘛，表示若達賴喇嘛決定逃離中國控制的西藏，印度將不提供庇護。印度總理認為印度與中國新建立的友好關係，對整個區域的政治穩定更為重要。最後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如他兩位官方預言家所建議。¹⁸⁷

我們並不清楚，達賴喇嘛對於此刻正在形成的反抗勢力是否知情；又或者尼赫魯對加爾各答中情局幹員與兩位錫金女士的籌謀是否知情。一九五二年九月，駐加爾各答美國總領事加里·索蘭（Gary Soulen）與庫庫拉公主前往錫金健行並測量地形。返回印度之後，他聯繫了當時的印度情報局長穆立克；比起尼赫魯，穆立克更深受古老殖民傳統影響，是一位積極的政治人物。他與達賴喇嘛流亡印度的兩位兄長建立起聯繫。兩位之中較年長者是土登晉美諾布（Thubten Norbu），當時已透過隱密組織「自由亞洲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與中情局建立關係。較年輕者是住在大吉嶺的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噶倫堡就在大吉嶺附近，位於西藏與印度間的主要溝通路線上，因此成為祕密活動的中心，幹員由此穿越邊境收集「敵方軍隊活動」，以及反抗中國的地方游擊隊情報。¹⁸⁸

一九五六年，康區的反抗席捲西藏東部，一群亟欲參戰的康巴人集結在噶倫堡，問題是該如何在尼赫魯與印度政府背後將這些人送出印度。結論只有一條通道：經過不丹與東巴基斯坦之間的狹窄印度領土。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巴基斯坦已成為美國的親近盟友，比中立的印度更願意接納華府的檯面下提案。一九五四年，巴基斯坦加入了反共防衛組織「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成員國包含澳洲、紐西蘭、法國、泰國、菲律賓及

美國。西亞在一九五五年也成立了類似組織「中部公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由英國、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組成。

接著，一九五九年三月爆發拉薩起義，反抗中國占據西藏。當時達賴喇嘛受中國邀請，前往拉薩近郊的人民解放軍基地觀賞戲劇演出。他得到指示：不帶傳統武裝侍衛，這點令達賴周圍的人起疑，懷疑中國企圖綁架達賴喇嘛，傳言散布至整個拉薩。數千人包圍達賴喇嘛宮殿，防止他離開住所或被人民解放軍帶走。

人群在三月十二日湧現街頭，重申西藏獨立，人民解放軍與西藏反抗軍之間開始發生衝突。人民解放軍在達賴夏宮羅布林卡範圍內發射砲火。十七日，兩陣砲火轟炸羅布林卡，促使達賴喇嘛周圍的人準備從拉薩出逃。

這場起義遭到人民解放軍的無情鎮壓，然而達賴喇嘛在反抗軍的護持下，於夜色濃重的清晨三點成功逃出城外，目的地是印度邊界。在達賴出逃的過程裡，中情局究竟出了多少力至今仍有爭議，但確實在達賴離開西藏首都數日後，他們就清楚達賴喇嘛正變裝前往印度。達賴喇嘛一行人在山區行進時，遇到西藏內部攜帶著無線電設備的中情局西藏反抗軍。他們將訊息傳到位於沖繩的美軍基地，此地自二戰最後階段占領行動後都未交還日本。中情局同時也得知，達賴喇嘛在前往印度邊境途中已否認「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點協議》。[189](#)

中情局訓練的西藏無線電操作員傳來的訊息，促使他們要求印度，在達賴抵達印度邊境前便給予庇護。中情局駐新德里辦事處主任直接面見尼赫魯並提出這要求。由於拒絕請求可能對美印關係帶來負面影響，經過漫長的辯論後，總理最終同意了要求，並為此突破層層限制。梅琳達·劉 (Melinda Liu) 在一九九九年四月號《新聞週刊》(Newsweek) 中報導：「中情局訓練的藏人甚至以十六釐米攝影機拍下這段冒險過程，精神領袖騎在一匹棕馬上，其上有刺繡精美鞍袋，帶著隨從穿越西藏荒涼山岳地帶，而後方的人民解放軍緊追不捨。」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達賴喇嘛一行人穿越邊界，進入到兼則馬尼（Khenzeman）與吉美塘（Zeimithang）之間的最後隘口，就位在達旺的西北方。身患痢疾的達賴喇嘛由此進入優美的達旺山間綠色谷地，印度政府官員與軍方人員在此迎接，他終於安全了。達賴喇嘛一行人持續下行，前往阿薩姆平原的德茲普，媒體大陣仗地在此等待。二十四歲的西藏神王終於逃離共產中國，立刻成為世界新聞。

達賴喇嘛從德茲普搭火車前往德拉敦（Dehra Dun），再改搭汽車到喜馬拉雅西部山區避暑地摩蘇里（Mussoorie），會見尼赫魯與其他印度領袖。他們為西藏領袖選擇了新的落腳地：麥克羅甘己，這處更小的山區避暑地位於今日的喜馬偕邦（Himachal Pradesh），自一九六〇年代以來就是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

隨著達賴喇嘛一行人在印度落腳，中情局也可以開始對西藏反抗軍進行援助。達卡（Dhaka）北部庫米朵拉（Kurmitola）有一處廢棄機場，是英國人在二戰期間所建，現在成為空投西藏的前線基地，也是西藏反抗軍轉送沖繩、菲律賓克拉克空軍基地及太平洋塞班島的據點，這些都是中情局在亞太地區祕密任務的總部。中華民國、韓國、寮國與越南的突擊隊也都在此受訓。

西藏祕密行動的代號是ST CIRCUS，空中行動代號則是ST BARNUM。根據康伯伊與莫里森所述，由於飛機必須在未經印度許可的狀況下飛越領空，因此必須考慮到加爾各答的雷達偵測。不過中情局確實有事先進行研究：

……並且知道印度系統沒有補償功能，因此若B—17以喜馬拉雅山塊做為雷達屏障，即可逃過偵測。往北飛越錫金，第一批空投飛行員最遠可以飛到（西藏境內的）布拉馬普特拉河，往東穿越西藏高原到康區執行第二批空投，接著往西南穿越印度領土，返抵東巴基斯坦。

191

為了掩飾美國的參與，所有飛行員都是在美國獲得庇護的反共波蘭人，以防飛機遭到偵測或擊落時露餒。

新疆的穆斯林游擊隊及緬北祕密營地中的民族主義共產黨士兵，也都得到了中情局的援助。這是一場針對中國的祕密戰爭，但如同康伯伊與莫里森所指出：「在西藏行動中，中情局極力排除中華民國參與。」¹⁹²同時美國是否真的支持西藏獨立，這點也啟人疑竇；這些行動的有限範疇，主要目的似乎在於騷擾中國，令其軍隊分心。

不論原因為何，當科羅拉多州萊德維爾（Leadville）附近的赫爾營（Camp Hale）特別訓練機構設立後，一群關係緊密的中情局幹員負責西藏計畫，也對這群獨特的藏人產生情感。後來他們在回憶中談到，這群嚴肅的西藏佛教徒會一邊小心拯救掉進茶杯中的蒼蠅，一邊表達殺害中國人的強烈渴望。在赫爾營中，這群藏人接受游擊戰爭及祕密行動的訓練，包含間諜攝影、摩斯密碼與埋設地雷等。

一切的細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訓練完全結束後才揭露。根據一九九九年梅琳達·劉的《新聞週刊》封面報導：

訓練在極機密的情況下進行。美國官員假造赫爾營進行最高機密核能研究計畫的故事，並且對入侵者下達格殺勿論的命令。一九六一年，有四十八名美國公民在不經意間看到十五名穿著迷彩服的亞洲人，在護衛下登上窗戶完全遮蔽的C-124環球霸王運輸機，因而遭到暫時拘留。國防部長羅伯特·麥納瑪拉（Robert McNamara）私人介入，阻止《紐約時報》刊出報導。¹⁹³

美國派來訓練藏人的幹員都非常年輕，卻要擔負顛覆地球上人口最多國家的重責大任，其中有些人是蒙大拿州的空中救火員，尋求冒險的無畏青年。西藏任務之後，許多人加入中情局在寮國對抗共產反抗軍的祕密戰爭。二十多歲的前美國陸軍上士湯瑪士·佛斯邁爾（Thomas Fosmire）正是其中一員，並曾擔任泰國邊境巡警顧問。寮國任務後他便待在越南，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越共軍隊進入西貢。另一位中情局幹員約翰·勞斯（John ‘Ken’ Knaus）是中國語言學者，曾在史丹佛大學主修哲學，後來寫了一本書，記錄他與這些藏族游擊隊在科羅拉多訓練營的生活。他對於最後讓藏人失望一事感到懊

悔與愧疚，「我們的參與導致他人失去生命，一切都是為了我們的主要冒險行動」。194

此外還有多采多姿、以小名「東尼．波」知名的安東尼．波修尼（Anthony Poshepny）。他是前美國海軍，二戰期間在對日最後戰役的硫磺島一戰中受傷，因此於一九五一年加入中情局，成為民兵專員。韓戰期間他在敵後作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曾試圖在蘇門答臘煽動反印尼總統蘇卡諾的起事，但沒有成功，並因武力不足被困在島上；後來他與一名同伴搭著拖網漁船逃出蘇門答臘，登上前來等待的美國潛艇。在赫爾營中，東尼．波負責訓練藏族游擊隊，甚至陪伴他們前往東巴基斯坦機場，由此搭機空降西藏。195

西藏任務之後，東尼．波直接前往寮國訓練反共游擊隊，這是一支由他與其他中情局幹員招募部落民所組成的祕密軍隊。他在寮北山區建立自己的屬地，很快因為殘暴而惡名昭彰。他懸賞獎勵取得敵人耳朵，若能連同紅星共產黨帽，則可獲得更高酬賞。據說他將敵人斬首，會把首級插在刺刀上，以此鼓舞部屬士氣。精神失常的東尼．波成為一九七九年好萊塢電影《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中的叛逃綠扁帽上校寇茲的原型。這可能是達賴喇嘛心靈啟示的最極端版本。

同時，由前英國殖民地分切成世俗但以印度教徒為主的印度聯邦與巴基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後，印度人正忙著鞏固領土。前英屬印度治下的大公國可以決定想加入哪個國家。以穆斯林為主卻有著印度教大公的查穆——喀什米爾選擇加入印度，掀起了巴基斯坦與印度間的衝突，至今仍未停歇。海德拉巴的穆斯林尼贊196則決定加入巴基斯坦，這是很不可思議的決定，因為海德拉巴位於南印度，離任何一塊巴基斯坦土地都十分遙遠。當時負責整合這些大公國的印度內政部長瓦拉拜．巴特爾，派出警力以確保海德拉巴不會有任何脫離印度的嘗試。

「警察行動」持續了五天，最終海德拉巴並未成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然而，另一位穆斯林統治者，古賈拉特邦朱納賈德（Junagadh）的納瓦伯197也選擇加入巴基斯坦。等到印度軍隊介入後，納瓦伯逃往

巴基斯坦，朱納賈德則在一九四八年二月的公投中，以絕大多數的同意票加入印度。

印度還有其他非屬英國的殖民地問題。法國擁有加爾各答北方、呼格里河岸上的昌德納加（Chandanagar，當時拼法為Chandernagore）；南方馬拉巴海岸上的瑪黑（Mahe），即現在的瑪耶茲（Mayyazhi）；普督切利（Puducherry），即現在的旁迪切里（Pondicherry）；卡萊伊卡（Karaikal），即現在的卡利卡（Karikal）；以及印度東海岸上的亞南（Yanam）。法國並不打算在印度獨立後繼續擁有這些飛地，特別是印度支那已分裂成數個獨立國家：一九五三年的寮國與柬埔寨、一九五四年的越南。昌德納加於一九五一年加入印度，其他四個法國屬地則於一九五四年轉由印度統治，最終在一九六二年成為印度聯邦的一部分。

葡萄牙統治印度西海岸上的果亞、達曼與迪烏、達德拉與納加爾哈維利（Dadra and Nagar Haveli）則較為頑固。內陸的達德拉與納加爾哈維利飛地，在當地人請求下於一九五四年加入印度。但葡萄牙拒絕放手果亞和達曼與迪烏。印度決定派出軍隊，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發動「勝利行動」（Operation Vijay，Vijay為勝利之意）。印度總共動員四萬五千名部隊，毫無困難地擊敗葡萄牙屬地中的四千名陸海軍。這三塊前葡萄牙殖民地也成為印度聯邦的領土。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果亞成為印度第二十五邦，而達曼與迪烏仍舊是聯邦屬地。

那迦山地的部族反抗行動卻沒有消停的跡象。他們從邊界對側的緬甸藏身地與東巴基斯坦吉大港山地群（Chittagong Hill Tracts of East Pakistan）的基地，持續向印度發動唐吉訶德式抗爭，欲爭取那迦國的獨立。即使抗爭看起來毫無成功的可能，卻也將印度的警備力量牽制在這片充滿敵意的偏遠區域。

新德里欲將族群與地形多元歧異的廣袤領土融為一體，並努力維護邊界，包括今天的阿魯納恰爾邦。英國最終於一九四三年決定合併內部界線與喜馬拉雅山之間的山地區域，創造出「東北邊境地域

群」。印度獨立後通過一套法律，管理阿博（Abor）與密什米山地特區行政事務。道路與行政管理開始進入過去與外在世界（即阿薩姆平原）極少接觸的村莊社區。

達旺是個問題。多年任職喜馬拉雅山區印度行政官的納里·羅斯通吉（Nari Rustomji）在著作《著迷的邊境：錫金、不丹與印度的東北邊境》（*Enchanted Frontiers: Sikkim, Bhutan and India's North-Eastern Borderlands*）中寫道：

令我們特別焦慮的是卡門邊境分區（Kameng Frontier Division）最西北角的達旺，位於一萬四千英尺色拉山口的對側。雖然達旺無疑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南，因此屬於印度領土，但數代藏人對此區域都有很強的情感連結，部分原因在於此地為達賴六世的出生地。達旺大佛寺掌教有時候是從拉薩附近知名的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喇嘛中選出。此地文化與西藏和印度的聯繫同樣深遠。

198

羅斯通吉與手下邊境官員決定該是表明達旺歸屬的時刻，而這件事在一九五〇年中國入侵西藏後，便顯得特別重要。英國在一九三八年派遣戈登·萊福特（Gordon Lightfoot）上尉領軍在達旺插旗，雖然此後並未有重大事件，但印度仍記得奈維爾上尉早在一九二八年就提出的警告。若中國試圖掌控西藏，而此刻顯然他們已經採取行動，達旺將是個「輕易進入印度的祕密門戶」。199

達旺當地人口主要是門巴人（Monpa），雖使用與藏語相關的語言，但並不認為自己是藏人。萊福特遠征之後，阿薩姆政府祕書處彙整的一份機密報告中提及，門巴人「處於一種接近奴役的狀態……（同時）非常態性西藏法庭對英裔門巴人施以嚴刑……西藏政府官員不定時下令……殺害英國區域的居民，甚合領主心意」。200除了對當地人施以嚴刑外，當地藏人官員主要收稅上繳位於西藏的錯那寺。因此萊福特進入達旺時，門巴人毫不猶豫地支持他對抗西藏領主。

阿薩姆省祕書處報告認為，西藏政府應從達旺撤出藏人官員，英國應在該區建立長期治理，但因一九三九年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未

有動作。直到印度獨立三年半後的一九五一年二月，準軍事組織「阿薩姆步槍隊」的支隊跨越色拉山口，進入平靜的達旺。這個支隊是由拉連瑙·「鮑伯」·卡亭少尉（Ralengnao ‘Bob’ Khathing）領軍，他是來自曼尼普爾的黨庫（Thangkhul）部落那迦人。根據羅斯通吉所述：「鮑伯進入達旺，對他們（門巴人）來說是真正的解放，讓他們不再受到奴役，或是在壓力之下被迫出售自己的農畜產。」²⁰¹

然而矛盾的是，當達旺新的印度行政機關不再收稅時，反而讓當地人感到困惑。因此最終卡亭必須對每個門巴家戶課徵每年五盧比的房屋稅，以證明他們確實是印度公民，不再受到西藏統治。²⁰²

邊界對面的西藏，雖然首批人民解放軍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進入拉薩，但直到一九五一年九月才完全控制首都。因此當卡亭接收達旺時，噶廈仍舊是西藏首都掌權者，藏人向拉薩的印度代表抗議，卻無功而返。相對地，新德里開始緊縮所有麥克馬洪線附近的區域。在過去未設治的區域引進行政建置；重組阿薩姆步槍隊；進行邊境巡防偵測工作；沿著邊界開始派駐情報偵防單位；招募非軍事警力；在主要道路山徑上設置警哨。

一九五四年一月，東北邊境地域群轉成東北邊境特區，在劃定界線的歷史性西姆拉會議四十年後，印度的掌控終於直上麥克馬洪線。

⁸⁴ Pradip Phanjoubam, *The Northeast Question: Conflicts and Frontiers* (New Delh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34.

⁸⁵ Excerpts from the article were reproduc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on 13 October 1912, available at <http://query.nytimes.com/mem/archive-free/pdf?res=9D05E3DB1F3CE633A25750C1A9669D946396D6CF> (accessed on 14 April 2016).

⁸⁶ For a comprehensive history of Mongolia, see C.R.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8).

⁸⁷ For the text of the Russo-Chinese Agreement 1912, see www.claudearpi.net/maintenance/.../1913Russo-ChineseAgreement.pdf (accessed on 16 April 2016). Reproduced from Pradyumna P. Karan,

The Changing Face of Tibet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6), pp. 87 - 8.

88 ‘Treaty of Kyakhta 1915’, available at [https://www.revolvy.com/main/index.php?s=Treaty%20of%20Kyakhta%20\(1915\)](https://www.revolvy.com/main/index.php?s=Treaty%20of%20Kyakhta%20(1915)) (accessed on 12 June 2017).

89 For the text of the treaty, see <https://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mongtib.htm> (accessed on 16 April 2016) and 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7), pp. 320 - 1. See also Matteo Miele, ‘A Geopolitical reading of the 1913 Treaty Between Tibet and Mongolia’, *Tibetan Review*, Jan - Feb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tibetanreview.net/a-geopolitical-reading-of-the-1913-treaty-between-tibet-and-mongolia/>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6).

90 The British were allowed to trade in Yadong, Gyantse, and Gartok; the border between Tibet and Sikkim was delineated; Tibet was not to have relations with any foreign power other than Britain; and the Tibetans were forced to pay an indemnity of 7.5 million Indian Rupees to the British. For the text of the treaty, see <http://www.tibetjustice.org/materials/treaties/treaties10.html>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91 For Tibetan and English versions of the declaration, see <http://www.tibetjustice.org/materials/tibet/tibet1.html> (accessed on 12 June 2017). See also, Tsepon W.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Delhi: Paljor Publication, 2010 [a reprint of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38.

92 Shakabpa, *Tibet*, pp. 339 - 40.

93 For a book about the life of Laden La, see Nicholas and Deki Rhodes, *A Man of the Frontier: S.W. Laden La (1876 - 1936: His Life and Times in Darjeeling and Tibet)* (Kolkata: Mira Bose, 2006). Laden La’s role at the Shimla conference is mentioned on pp. 30 - 31.

94 譯者注：倫欽（Lönchen）為西藏政府中，地位在達賴之下，噶倫之上的最高行政官。

95 Norbu Tsering, 'The Simla Convention of 1914—an appraisal', 9 November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phayul.com/news/article.aspx?id=34200>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96 For Lu Xingqi and his role, see Parshotam Mehra, *Essays in Frontier History: India, China, and the Disputed Border*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8. See also Ravinder Makhaik, 'The 1913-14 Shimla Convention, McMahon Line and the Disputed India-China border', *The Hill Post*, 5 Dec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hillpost.in/2011/12/1913-14-shimlaconvention-mcmohan-line-and-the-disputed-india-china-border/36974/> (accessed on 16 April 2016).

97 Tan Chee-beng,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Abingdon: Routledge, 2012), p. 222.

98 Mehra, *Essays in Frontier History*, p. 59.

99 Ya Hanzhang, *The Biographies of the Dalai Lama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1), pp. 307-9. On page 307 it says that 'in April 1913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ppointed Lu Xingqi commissioner for Tibet', and on page 309 Ivan Chen is referred to as 'Commissioner for Tibetan Affairs' when the Shimla Conference opened on 13 October 1913. Whatever the case, Lu was a chief intelligence officer charged with Indian and Tibetan affairs. Chen had to report to, and seek advice from, Lu before and during the Shimla Conference.

100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p. 54.

101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p. 305.

102 For the text of the 1907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see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pp. 307-8, and http://avalon.law.yale.edu/20th_century/angrusen.asp (accessed on 10 May 2016).

103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New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92), pp. 148-9.

104 Pradip Phanjoubam, 'How McMahon Drew His Line, and Why China Wants It Changed', *The Wire*, 20 May 2015, available at

<https://thewire.in/2108/how-mcmahon-drew-his-line-and-why-china-wants-it-changed/>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For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border issue, see Pradip Phanjoubam, ‘Neville Maxwell’ s “Facts” and Silenc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51, no. 46, 12 Nov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epw.in/journal/2016/46/discussion/neville-maxwells-factsand-silences.html> (accessed on 18 November 2016).

105 Pradip Phanjoubam, ‘How McMahon Drew His Line and Why China Wants It Changed’ .

106 ‘Anglo-Russian Entente: United Kingdom-Russia [1907]’, available at <https://global.britannica.com/event/anglo-russian-entente> (accessed on 14 April 2016).

For the text of the clauses regarding Tibet in the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 see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 - 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2007), pp. 829 - 31.

107 W.F. Van Eekele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4), p. 14.

108 Van Eekele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p. 14.

109 Van Eekele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p. 14.

110 John Rowland, A 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Hostile Co-Existence (Princeton, NJ, Toronto, London: D. Van Nostrand Company, 1967), p. 47.

111 van Walt van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 p. 55.

112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 - 1951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833.

113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 - 1951. pp. 833.

114 Rowland, A 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pp. 33 - 6.

115 Rowland, A 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p. 49.

116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 - 1951, p. 835.

- 117 Rowland, A History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p. 49.
- 118 Van Eekele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pp. 16 - 17.
- 119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72), p. 44, and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Hertingfordbury, Hertfordshire: Roxford Books, 1989), p. 280.
- 120 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 (Enlarged Ed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2), pp. 10 - 11.
- 121 Neville Maxwell, 'The Deadlocked Deadlock: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16, No. 38, 19 September 1981, pp. 1548.
- 122 Maxwell, 'The Deadlocked Deadlock: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p. 1548.
- 123 Maxwell, 'The Deadlocked Deadlock: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p. 1548.
- 124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p. 429.
- 125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p. 133
- 126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p. 133.
- 127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 - 1950, p. 133.
- 128 Mehra, Essays in Frontier History: India, China, and the Disputed Border, p. 72.
- 129 Phanjoubam, 'How McMahon Drew His Line, and Why China Wants It Changed' .
- 130 W.F. Van Eekelen, 'Simla Convention and McMahon Line', 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 Vol. 54, No. 2, 1967, p. 180: 'The Foreign Office ... maintained its opposition to separate signing with Tibet on the ground that it would amount to tearing up the Anglo-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
- 131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 132 For reproductions of old and more recent maps of the Indo-Tibetan border, se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India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0).

133 John Bray, 'Introduction: Locating Ladakhi History', John Bray (ed.), Ladakhi Histories: Loc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New Delhi and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and Indraprastha Press, 2011), p. 1.

134 Steven A. Hoffman, 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p. 11-12.

135 K.L. Rao, History of the Indian Army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16), p. 183.

136 See, for instance, Bina D'Costa, 'Partition: the price of freedom and the price paid by women', South Asia Masala, 6 August 2009, available at <http://asiapacific.anu.edu.au/blogs/southasiamasala/2009/08/06/partition-the-price-of-freedom-and-the-price-paid-by-women/> (accessed on 20 May 2016).

137 George N. Patterson, Peking Versus Delhi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3), p. 192.

138 Jasper Becker, The Lost Country: Mongolia Revealed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92), p. 75.

139 Becker, The Lost Country, p 134.

140 Francis Watson, The Frontiers of China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6), p. 9.

141 譯者注：南碗指定區（Namwan Assigned Tract），中國稱為猛卯三角地。

142 For a map of the border and the areas which were ceded to China, see Josef Silverstein, Burma: Military Rule and the Politics of Stagnation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74.

143 Pradip Phanjoubam, 'Why Removing the Historical Baggage of McMahon May Be More Important for China than the Line itself, The Wire, 26 May 2015, available at <http://thewire.in/2015/05/26/for-china-removing-the-historical-baggage-of-the-mcmahon-line-may-be-more-important-than-the-line-itself-2509/> (accessed on 10 May 2016).

- 144 'The Sino-Indian Border' , 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Summary, 17 December 1959, p. 17.
- 145 'The Sino-Indian Border' , p. 17.
- 146 Neville Maxwell, 'Olaf Caroe' s Fabrication of the "McMahon Line' ' '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51, Issue No. 32, 6 August 2016, p. 100.
- 147 Edward Gait, A History of Assam (Guwahati,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2011), p. 335.
- 148 Phanjoubam, The Northeast Question, p. 79.
- 149 Phanjoubam, The Northeast Question, p. 80.
- 150 Alastair Lamb, The China-India Border: The Origins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24. Maps showing 'the Outer Line' can also be found online on Wikipedia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cMahon_Line (accessed on 12 June 2017).
- 151 Phanjoubam, The Northeast Question, p. 110.
- 152 Maxwell, India' s China War, pp. 30, 32.
- 153 Robert Reid, History of the Frontier Areas Bordering Assam from 1883 to 1941 (Guwahati,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1997), pp. 227 – 8.
- 154 Phanjoubam, The Northeast Question, p. 112.
- 155 Maxwell, India' s China War, p. 34.
- 156 Maxwell, India' s China War, p. 30.
- 157 Maxwell, India' s China War, p. 34.
- 158 Warren W. Smith, China' s Tibet?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Toronto, Plymouth U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p. 8.
- 159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 – 1951, p. 841.
- 160 H.K. Barpujari, 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Vol. III: Inner Line to McMahon Line (Guwahati: Spectrum Publications, 1981), p. 236.

- 161 Van Eekelen, Ind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order Dispute with China, p. 182.
- 162 Barpujari, 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Vol. III, p. 236.
- 163 Quoted in Barpujari, 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Vol. III, p. 236.
- 164 Barpujari, 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Vol. III, pp. 236 - 7.
- 165 Barpujari, 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Vol. III, p. 238.
- 166 Rhodes and Rhodes, A Man of the Frontier, p. 39.
- 167 Mehra, Essays in Frontier History, p. 59.
- 168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 - 1951, pp. 214 - 215.
- 169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 - 1951, p. 223. 85.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 - 1951, p. 245.
- 170 Lin Hsiao-ting, 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 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 (Vancouver, Toronto: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6), p. 91.
- 171 Arjia Rinpoche, Surviving the Dragon: A Tibetan Lama's Account of 40 Years under Chinese Rule (Emmaus, Pennsylvania: Rodale Books, 2010), p. vii.
- 172 Charles Bell, Portrait of a Dalai Lama (London: Wisdom Publications, 1987, reprint, first published in 1946 by Wm. Collins, London), p. 454.
- 173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 - 1951, p. 379.
- 174 譯者注：雷多公路（Ledo Road），中國稱中印公路。
- 175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 - 1951, p. 382.
- 176 Yangdon Dhondup and Hildegard Diemberger, 'Tashi Tsering: The Last Mongol Queen of "Sogpo" ' (Henan)', Inner Asia, vol. 4, issues 1 - 2,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Mongolia and Inner Asia Studies, 2002, p. 204.

177 For a fascinating account of Hisao Kimura's exploits see Hisao Kimura, *Japanese Agent in Tibet*, as told to Scott Berry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0).

178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387.

179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399.

180 Quoted in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607.

181 譯者注：朵麥又稱朵麥基巧，管轄中國昌都地區的軍政事務。昌都地處康區，一九〇四年清朝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對康區的藏族土司進行「改土歸流」，藏人土司的領地不斷被蠶食。之後中華民國成立，在昌都設川邊特別區，讓噶廈政府非常不滿。一九一八年，西藏以武力奪取昌都，設置朵麥基巧。當時西藏與川康關係緊張，擔任朵麥基巧的官員官階很高，與噶倫屬於同一級別。

182 The full text of the 17-point agreement is available at <http://www.friends-of-tibet.org.nz/17-point-agreement.html> (accessed on 12 June 2017). Ngapoi Ngawang Jigme, who passed away in Beijing in 2009 at the age of 99, became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n 1964. In an interview with *Asiaweek* magazine (20 October 2000), he predicted that 'nothing will change' when the present Dalai Lama dies, 'Without a Dalai Lama for 40 years, we've done quite well', available at http://www.tibet.ca/cms/en/library/wtn/archive/old?y=2000&m=10&p=16_2 (accessed on 13 June 2017). Many Tibetan exiles condemned Jigme as a traitor and collaborator. See Jasper Becker, 'Interview with Ngapoi Ngawang Jigm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4 April 1998, available at http://www.tibet.ca/en/library/wtn/archive/old?y=1998&m=4&p=8_4 (accessed on 12 June 2017).

183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Tibet* pp. 17-18.

184 Bérénice Guyot-Réchard, *Shadow States: India, China and the Himalayas, 1910-19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03.

185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two Sikkimese princesses and their CIA contacts, see Ken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Press, 2002), pp. 21 - 23.

186 Conboy and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p. 23.

187 Conboy and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p. 35.

188 For Gyalo Thondup's own account of his activities in Kalimpong, see Gyalo Thondup and Anne F. Thurston, *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 (London, Sydney, Auckland, Johannesburg: Rider, 2015).

189 Conboy and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pp. 91 - 2.

190 Melinda Liu. 'When Heaven Shed Blood', *Newsweek*, 19 April 1999, available at <http://www.newsweek.com/when-heaven-shed-blood-164864> (accessed on 13 June 2017).

191 Conboy and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p. 61.

192 Conboy and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p. 103.

193 Liu, 'When Heaven Shed Blood'.

194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p. 325.

195 Richard Ehrlich, 'Death of a dirty fighter', *Asia Times Online*, 8 July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east_Asia/EG08Ae02.html (accessed on 13 June 2017).

196 譯者注：尼贊（Nizam）是海德拉巴（Hyderabad）阿沙夫·賈王朝（Asaf Jah）穆斯林統治者的頭銜，創立人喀瑪爾烏丁汗（Mir Qamar-ud-Din Siddiqi）原為蒙兀兒帝國統治德干地區的總督，在蒙兀兒中央式微後，於一七二四年自立為王，統治延續至一九五〇年。

197 譯者注：納瓦伯（Nawab）是蒙兀兒皇帝冊封南亞穆斯林大公國統治者的頭銜，其職責是維護帝國主權，並掌理大公國內事務。

198 Nari Rustomji, *Enchanted Frontiers: Sikkim, Bhutan and India's North-Eastern Borderlands* (Calcutta, Delhi, Bombay, Mad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25.

199 Barpujari, Problem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Vol. III, p. 236.

200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the Governor of Assam, No. 3851-G.S., dated the 7th September 1938: Report on the Tawang Expedition, 1938', The British Library's archives, London.

201 Rustomji, Enchanted Frontiers, p. 127.

202 Shiv Kunal Verma, 1962: The War That Wasn't: The Definitive Account of the Clash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New Delhi: Aleph Book Company, 2016), p. 11.

第三章 入侵

中國的攻擊並非完全出乎意料。印度早已觀察到邊界對面進行大規模建設；在主要攻擊前夕，印度軍隊與人民解放軍曾有過數次衝突，包含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九日對多拉與兼則馬尼的砲轟。然而十月二十日及其後數日間，中國攻勢的完整統籌與猛烈程度令印度國安機制與國際觀察家震驚。當日破曉，火炮與迫擊砲向塔格拉山脊對側猛烈轟炸。

根據約翰·達爾維准將的紀錄所述：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上午五點整，第三橋對面的中國軍隊發射兩枚閃光信號彈，隨之而來的是超過一百五十支槍與重迫擊砲的轟炸，出現在塔格拉山脊的順向坡上……那是關鍵的一刻。那刻塔格拉山脊不再是一片土地，而是測試、衡量並淨化印度對外防衛政策的冶金爐。²⁰³

達爾維稱之為「審判日：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²⁰⁴中國對達旺北方印度據點的全面攻擊持續進行著。

西方的阿克賽欽前線上，戰鬥在一片由北往南的廣袤土地上展開，範圍大約長達六百公里。然而中國軍隊往南突進的勢力集中在一片相對窄小的區域，由西至東約為二十公里。²⁰⁵人民解放軍的多數攻擊，似乎都集中於驅逐印度政府「前進政策」下建立的哨所駐軍，而非奪取領土。根據印度軍事分析師的觀點：「中國在西段的目標有限。他們已經占領多數阿克賽欽高原，並在此興建連接西藏與新疆的西部新藏公路。此戰目的在於移除印度哨所，他們認定已經跨越了一九六〇年宣布的界線。」²⁰⁶就如東北邊境特區的情勢，中國並不想深入印度領土。

阿克賽欽高原過去與現在同樣幾乎無人居住，因此中國得以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興建新藏公路，而印度直到完工後一年才發現此事。阿克賽欽一詞意指「白石沙漠」，高度約在海拔四千三百至六千九百

公尺之間。過去，部分的拉達克牧民以此地為夏季牧地，因此成為喀什米爾羊毛貿易路線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此區幾乎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商業活動。過去存在的古老貿易路線都是次要因素，唯一的谷地（若可以稱之為谷地）是由新疆流向查穆與喀什米爾邦的奇普查普河（River Chip Chap）。在一九六二年戰爭中，中國軍隊攻下河谷中數個印度據點，從此掌握了此區。

一九六二年戰爭大戲，在西段戰鬥的數週中，可以發現中國清楚掌握了印度的位置，以及每個據點的人數和擁有何種武器。如同東段的東北邊境特區一般，中國在阿克賽欽地區也透過行動自由的調查小隊，在荒原上不受察覺地進行戰前的情資蒐集。

東段的爭議焦點，是印度在南卡曲河峽谷（Namka Chu gorge）的多拉哨所，此地位於達旺西北方，是印度、不丹與西藏交界處。此哨所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建立，根據《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的內容，哨所位置「根據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月版之前的地圖，是標在麥克馬洪線以北。據信此舊版由我國外交部交予中國，以標明麥克馬洪線。同時據悉我國試圖於我方地圖上更正錯誤，然中國不予接受」。207無論如何，中國對印度地圖並不在意；其目的根本不在此，而是為了給印度一個教訓。

《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中的這段話，與馬克斯韋爾和他人認定「印度為挑釁者，對多拉哨所挑起一九六二年戰爭」這主張相去甚遠。中國軍隊在九月八日跨過南卡曲，包圍峽谷中的印度前哨，並摧毀河上兩座橋。附近的多拉哨所獲得增援，整個九月中兩側的砲火持續不歇。中國向哨所投擲手榴彈，導致三名印度軍人掛彩，除此以外並無傷亡。208

最終攻擊於十月二十日登場，印度軍隊發現前一夜中國已切斷所有電話線。準備攻擊時，中國軍隊也占領了印度防線後的高地，因此能在早晨向下發動攻擊。從俯視南卡曲河的塔格拉山脊發動砲火猛攻後，中國摧毀了所有印度砲擊據點及附近武裝。數小時內，中國攻占印度邊境哨所，以及多拉與兼則馬尼，印度守軍不是戰死就是遭俘

虜。中國的攻擊戰力估計有兩千名，而這些據點的印度守軍僅有六百名。[209](#)

中國同時對其他據點發動攻擊，附近的第二拉吉普聯隊（2nd Rajput Regiment）受到重創。五百一十三名戰鬥成員中，有兩百八十二人當日戰死，八十一人受傷被俘，另外遭俘的九十人則未受傷；僅有屬於後援的六十人逃出戰場。另一支也在附近的廓爾喀步兵連則損失八十人，四十四人受傷，一百零二人遭俘虜。第七旅在十月二十日那命運的早晨，總共損失了四百九十三人。[210](#)人民解放軍對多拉與塔格拉前線作戰總共派出至少一萬人，並且配備了重砲與遠比印軍先進的武器設備。[211](#)

印度防線崩潰後，第七旅旅長約翰·達爾維准將遭中國俘虜將近七個月。他以極為苦澀的筆觸記載了大量細節，描述指揮體系如何崩潰，以及印度軍隊配備低落的情況。他引述一名軍隊同袍的話：他們的「任務是政治而非軍事行動的防衛。南卡曲河畔遭屠殺的軍隊防線過長，人數不足，難以補給也無法守衛」。[212](#)

除了觀察中國為印度戰俘興建的營地外，達爾維也發現「中國從一九六二年五月就開始認真備戰」，這時間遠早於多拉哨所事件。[213](#)這裡的重點在於「認真」，所有可得證據都指向一個事實：情資蒐集與建設工程都始於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中國開始想挑戰印度做為亞非新獨立國家的領袖地位之時。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出走印度，這更刺激了中國，並從思考與印度一戰的可能性，轉向付諸實際行動。

達爾維同時也引述並調侃中國的說法：

中國告訴全世界：「十月二十日清晨七點（北京時間），印度的攻擊武力在強烈砲火掩護下，向克節朗河（Kachileng River）與兼則馬尼的中國邊防軍隊發動大規模攻擊。」可憐的中國軍隊竟被兩支在射程以外、只有四百發子彈的帕拉手槍，逼迫到得自我防衛的地步！

[214](#)

馬克斯韋爾的說法比起中國雖然比較不極端，不過他對一九六二年事件過程的傾中描述，同樣啟人疑竇；然而他的說法在後續諸多戰爭邊界爭議討論中，仍受到廣泛引用，其中甚至包含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

東北邊境特區的東段戰爭與拉達克的戰役十分不同。中國軍隊在拉達克前線並未遭遇太多平民，但在東北邊境特區卻占領數個城鎮村莊，因此與平民互動成了重要議題。從棒山口往下的道路建設完成後，中國軍隊以達旺為補給基地。顯然人民解放軍不僅在事前派出特務蒐集重要情資，其軍官士兵也受過心理戰訓練。

當中國開始攻擊邊境時，達旺多數門巴人與藏人皆逃離當地。他們從親友與商販處聽說了人民解放軍為西藏帶來的災難，因此當然會感到害怕。然而解放軍一直具有雙重性格，做為意識型態驅動的共產黨武力，它無法容忍異議或對統治權的挑戰；然而做為「人民軍隊」，它理應對「受壓迫大眾」溫和相待。根據毛澤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共產黨士兵理應「不拿群眾一針一線」。[215](#)

英國傳教士作家喬治·派特森描述對部分參與西藏占領中國士兵的觀察：「行為上一絲不苟、潔身自重，並未壓迫西藏人民。士兵即使是在藏召妓，也可能遭受重罰。曾有一名中國士兵被藏族婦女指控性侵，因而遭到長官射殺。」[216](#)西藏部分地區也建有醫院與提供中藏雙語課程的學校。

然而，這類友善行為背後有著對藏人的隱藏企圖。根據派特森所言：

隨著引進這些造福民眾的必要改革，一項不祥的要素逐漸浮現，這些新建設並非在全國廣泛施行，而僅限於由西藏通往印度沿線城市村鎮地區的主要道路。事實上，它們不過是通往印度邊界的輔助措施；政府並未試圖發展主要道路以外的區域。[217](#)

這些發展在一九五〇年中國入侵西藏後一兩年開始，表示早在一九五九年鄧小平與毛澤東誓言將與印度「算帳」前，[218](#)中國就已開始準備沿著邊界的行動。

更重要的是，根據派特森所述，「在東藏地區，他們的行為經常延續共產黨模式」²¹⁹，而不是新秩序。東藏是康巴人的家園，也是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首波爆發武力反抗中國占領之處。一九五八年，中國政權開始強迫中央省分的藏人往「人民公社」集中，占領者與被占領者的關係持續惡化。²²⁰

中國軍事史學者李小兵訪問人民解放軍無線電兵李維恆（Li Weiheng，音譯），描述中國士兵入藏時遭遇的敵意，特別在一九五九年的拉薩起義之後，「李維恆中士回憶入藏時，他與同袍感覺彷彿進入外國。宗教及語言隔閡，分離主義宣傳，以及落後經濟，在軍隊與當地藏人間造成了看似難以跨越的隔閡。」中士告訴李小兵，入藏解放軍有個規範是未經允許不得與藏人說話。「村落與連隊小組間的溝通都必須由……連長透過村落長老進行，其中有個長老會說中文。」²²¹

李中士在西藏服役的前六個月僅造訪村落兩次。首次造訪是與同袍到村中看醫生，因為對方拒絕進入中國軍營，堅持軍人必須來此就醫。李中士可以「感受到環境中的敵意。孩子逃進家中……也看不見女人。幾個坐在屋前的西藏男人手中持刀，一言不發地盯著李中士。李覺得幸好在一九五九年叛變後所有藏族的武器都遭沒收。沒有人可以合法擁有槍枝」。²²²

李維恆中士第二次造訪村落的經驗則有所差異。這次是在一九六二年戰爭期間，村落下方山腳設了一座暫時關押印度戰俘的營地。「大批印度戰俘來到，超過營地警戒單位可處理的數量……（李）驚訝發現許多西藏村民探望印度戰俘，帶來水、食物與牛奶……甚至看到那名老醫者照顧生病、受傷的印度士兵。」²²³李所屬的排向營地指揮官抱怨，因為後者曾經下令，不許藏人接觸印度士兵，「然而他無法提供食物給如此大量的戰俘。基於妥協心態，他允許藏族婦女、兒童探望印度戰俘。」²²⁴

即使在明顯充滿敵意的群眾包圍下，人民解放軍為對印之戰招募、教育足量的藏族間諜與翻譯，似乎也沒有遭遇困難。我們常會遺

忘一件事，就是某些藏人（尤其是反對西藏中古封建體系者）確實與中國站在同一邊，至少在占領行動初期的確如此。一群由汪杰平措（Bapa Phuntso Wangye）領導的年輕人，在一九三九年成立了小小的西藏共產黨；然而他跟其他革新的藏人一樣，在一九五〇年代的發展中醒悟過來，因而招致了中國的疑慮。汪杰平措於一九五八年遭羈押，一九六〇年入監。²²⁵然而其他深諳中文的藏人仍為中國服務，人民解放軍在十月二十日攻擊前幾個月，動員了屬於社會另一階層的數千名挑夫，這些是從南藏各處村莊裡，在槍下招募來的農民。

在達旺，幾乎所有人民都撤離，印度軍隊也撤出該區，人民解放軍自然選擇採取「親善」路線，避免對抗仍留在城裡的少數人。根據少數留在達旺的藏人辛杰（Singye）說，那時中國軍隊在與當地人互動中，極盡親善之能事。²²⁶達旺雖不屬於西藏核心區，但達賴六世是一六八三年生於此地的門巴人，於一六九七年成為達賴喇嘛，統治西藏直到一七〇六年失蹤為止，傳說他是被中國康熙皇帝的盟友所殺。因此，達旺對藏傳佛教徒有其特殊意義，中國人必須謹言慎行。

根據辛杰的說法，達旺知名的佛寺並未如部分謠言所說，遭到中國軍隊毀壞或劫掠。人民解放軍保護這座寺廟，並將步槍交給一名資深僧侶，讓他可以對抗劫掠者。印度軍隊與多數當地人離城後，劫掠者開始在此橫行，甚至從西藏的納塘寺（Rethang Monastery）派來一名喇嘛，帶領並參與達旺的宗教儀式。中國軍隊將屋主逃難後留下的閒置民宅上鎖，避免劫掠。印度落入中國手中的飛機空投食物，則再次分配給當地人，「這是我們給您們的禮物。」中國軍官如此說。²²⁷

中國當然也有使用比較粗魯的方式，向當地人表示比起印度軍人與來自南方平原的行政官，自己才是值得信任且認同的人。邊境區域住民回憶，中國軍官給他們看蓄鬍、戴著頭巾的錫克教徒照片，說：「我和這個人，誰是你兄弟？」²²⁸比起旁遮普人，中國人當然看來更像達旺當地人。

然而留在當地的居民仍是相對少數。數萬人往南方平原逃難或跨越東方邊境前往不丹。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國擊破達旺南方

色拉山口的印度防線，令各地一片驚慌。一天之後，當解放軍的某個單位以側翼迂迴直抵邦迪拉鎮時，許多印度人都相信，中國將直驅南下占領阿薩姆。

其中之一是來自邦迪拉附近魯巴小鎮的多吉·堪卓·騰多。他與家族在數天中跋涉穿越高山，身上僅有藏族傳統的糌粑（一種青稞粉混合奶茶的粥狀食物）果腹。抵達平原後，他們被卡車載往布拉馬普特拉河谷的臨時難民營。巴蘭普（Barampur）、迪普（Diphu）與丹西利（Dansiri）成立了三座臨時難民營，供難民們住在小屋與軍營中。

229

邦迪拉當地多數為舍朱奔人（Sherdukpens），與門巴人相近，也是使用藏語相關方言，但仍有些許不同。人民解放軍明顯停留在此地，因為再繼續往南推進，他們將無法透過藏語翻譯與當地人溝通；更重要的是，在一九六二年戰爭前幾年的準備中，人民解放軍的間諜無法蒐集到此地以南的情報。一九六二年十月與十一月的東西兩段戰爭中，他們對到此為止所入侵地域的資訊詳盡程度十分驚人。古迪爾·辛格上校（Gurdial Singh）在魯巴被俘並持續被盤問山麓的所在位置。²³⁰巴魯克旁低地位於東北邊境特區的山麓低處，雖遭棄守，卻從未被占領。

印度軍隊由所有先前戰鬥區域的據點中撤出，而布拉馬普特拉河畔的駐軍城鎮德茲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在十一月二十日前盡都逃出城外。火車與卡車滿載大包小包往西逃難的民眾，以躲避即將到來的中國入侵。監獄與醫院都門戶大開，病患與犯人只能自力求生，而這造成一大問題，由於德茲普設有一間大型精神病院，突然間有一些重度精神疾病患者在街頭流竄。至於銀行，則是將紙鈔燒盡後關閉。²³¹

不過這些驚慌卻是誤導所致，因為人民解放軍並無意用東段與西段的攻擊模式占領阿薩姆。十月二十二日中國對邊境上的基比圖小鎮發動攻擊，可能是為了將所有印度軍隊推回其南方二十公里處的主要基地：瓦弄。中國對瓦弄的最終攻擊發生在十一月十六日，並因擁有

此地與附近地形地勢的重要情報而占上風。瓦弄之役由四面發動攻擊，其中也包含後方。這片區域的當地民族是梅約人（Meyor），他們使用藏語方言並信仰藏傳佛教。

中國占領瓦弄後，東北邊境特區極東角落的印度防線全面崩潰。根據一名印度作家所說：「瓦弄淪陷，代表著哈尤良（Haiyuliang）陷落，之後就是德茲普。從德茲普開始，就是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地，因此德茲普之後，就是丁蘇吉亞（Tinsukia）。」²³²然而這一切並未發生。中國軍隊並未跨越瓦弄南方的亞普克河（River Yapuk），這裡是中國在地情報蒐集的界線。亞普克河以南屬於密什米人的領域，所使用的語言截然不同。

中國軍隊對東北邊境特區中段蘇班西里與桑朗的攻擊，是在十月二十一日展開，而主要攻勢則是在十一月十六日發動。此處的印度守軍與東北邊境特區各地守軍一樣，在人力與設備均不足的情況下艱困防守，最終不敵火力更為強大的中國軍隊。這裡是傳統白馬崗²³³的一部分，白馬崗跨越兩國邊境，但大部分落在印度境內。直到一九五〇年代前，西藏稅收官員曾活躍於此，因此蒐集此地情報對人民解放軍來說並非難事。²³⁴然而中國並未占領任何超過此區的領土；白馬崗以南屬於阿帕塔尼人（Apatanis）與尼伊希人（Nyishis），他們的語言雖與藏語有關，但還沒近到能相互理解的程度。

藏語與部分當地方言的相近，讓中國特務得以收集在地情資，並以此選擇暫時占領區。由中國行動的速度與精確來看，這是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即人民解放軍展開攻勢前就已完成的工作。解放軍一進入此區，當地人大都逃到南方平原，從單純戰事的角度來說，中國軍官能仰賴藏語翻譯與少數留在當地者溝通。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國單方面宣布停火後，其軍隊便開始撤退，人們也逐漸返家。辛杰記得中國軍隊打包列隊，沿著他們所鋪設的棒山口至達旺公路離去，軍用卡車上載著設備器具。此時已是十二月，四十九天的占領行動終於劃下句點，中國軍隊返回麥克馬洪線以北的營地與基地。

多吉．堪卓．騰多與家人此刻終於能返回魯巴家鄉。從阿薩姆平原返回丘陵上的家園時，他們看到燒毀的坦克車與汽車、彈藥帶、迫擊砲、步槍與陣亡或撤退士兵遺留的頭盔。抵達村莊時有一陣奇異的靜默，眼前等待他們的是空蕩蕩的房子，直到數週之後，他們的生活才返回常態。²³⁵騰多挖苦地說，戰爭前兩國總理（尼赫魯與周恩來）的肖像還掛在當地學校的牆上。²³⁶

然而中國對東北邊境特區所精選區域的占領結束後，並不表示在地有任何實質改變，麥克馬洪線成為中國慣稱的「實質控制線」，印度則持續稱之為「傳統邊界」。然而印度卻大受打擊，從此尊嚴掃地，沒人想再提起「前進政策」；尼赫魯本人則從未從這羞辱與被中國背叛的感覺中復原。

尼赫魯認為自己受到嚴重的誤解，其他人則認為尼赫魯太過相信周恩來的甜言蜜語，以致落入圈套，認定中國是印度的朋友。但中國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宣稱尼赫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與蔣介石一樣是革命敵人的「忠實奴才」。²³⁷

平心而論，對於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代中國在其背後的批評，尼赫魯似乎一無所悉。他的前進政策並非為了挑釁中國，而是為重申印度認定的傳統疆界。印度建立新哨所，並針對拉達克與東北邊境特區偏遠地區進行巡邏，填補邊界防衛的漏洞，以制衡中國往前推進。印度只有在認定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發現新中國的軍營時，才會採取行動。

曾經參與一九六二年色拉山口之役的印度軍官古迪普．辛格．克雷爾中校（Gurdip Singh Kler），在戰後曾寫下一段話：「我們許多人都將前進政策比為警察行動，是將中國推出我們的領土，並且認為這項行動不會導致戰爭。」²³⁸同時他也認為，當時雖提出徵募新的軍事單位，其中部分確實也成立，「但軍隊武器、設備與彈藥的資金都不足」，在此情況下，「我們必須對付世界最強國家之一」是項「奇異」之舉。²³⁹

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隨著中國持續強化邊界山區의 軍事據點，印度決定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八日發動代號為「來克亨」（Leghorn）的軍事行動，保護其宣示領域。印度軍隊在南卡曲河北方的僧崇（Tsengjong）建立橋頭堡，卻於十月十日遭人民解放軍攻擊。印度軍隊撤退，補給卻嚴重不足，而空投補給又落在錯誤地點，致使部隊僅剩數日存糧，許多士兵僅餘五十發子彈。當十天後中國軍隊跨越塔格拉山脊發動攻擊時，印度的迫擊砲與彈藥仍在轉運途中。[240](#)那時雖然無法確定此區域內的解放軍數量，但確實比沿著麥克馬洪線擴散的印度軍隊多出許多。

從事後來看，許多書寫都談論到印度的情報失誤，印度政府對中國從一九五九年開始沿著邊界進行的大規模建設一無所悉。然而尼赫魯的情報局長穆立克確實不斷警告政府，中國有許多沿著邊界及跨越邊界的動作。「一九六〇年九月，我們提交另一份報告，指出中國沿西藏邊界的廣泛活動，以及多起新的入侵行為。同時提到中國沿著拉達克東南方邊界區域出現新的活動，而這裡是過去一向平靜的區域。」[241](#)

然而穆立克也並非毫無責任，《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引述情報局長（明顯是指穆立克）的話：「對我們新成立的哨所，中國應該不會有反應；即使有能力，也不會採取武力對抗。」[242](#)這是非常明顯的重大誤判。

在東段，中國已推進並穿越印度希望串聯修補的「邊防漏洞」，這動作甚至發生在尼赫魯的「前進政策」之前，問題在於尼赫魯拒絕相信中國確實正準備向印度開戰；出於對中印友誼的堅實信任，他忽略一九五〇年代末期西藏動亂的報告。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親藏的派特森受到尼赫魯本人在印度國會下議院的演說警告，「他將街頭流言信以為真」。[243](#)派特森因為傳布關於西藏情況的「誇張誤導報告」[244](#)而被問罪，更遭威脅將會被逐出印度。

當尼赫魯指控派特森散布不實訊息時，動亂已在拉薩爆發。這位心碎的總理必須在三月十九日另一場下議院演講中承認動亂為真，而

且中國子彈確實擊中拉薩的印度總領事館。中國明顯認定印度有參與起義，因此要求外交官在進一步通知前必須留在總領事館中。派特森寫下：「不論印度如何認定中國的友誼與親善，中國對印度的親善顯然不屑一顧。」²⁴⁵即使如此，尼赫魯仍在演講之中加上一句：「印度無意介入中國內政，我們與中國關係友好。」²⁴⁶

一九五九年三月，隨著達賴喇嘛在起義失敗後出逃印度，尼赫魯被迫重新評估這段友誼。中國官方公開指責印度為動亂背後的黑手，其國營官媒刊登一段報導：「印度擴張主義者與英帝國主義者，尚未放棄入侵西藏與奴役西藏人民的野心。」指出這場偉大陰謀論的「指揮中心」位於西孟加拉邦北部的噶倫堡，並宣稱英帝國主義者與印度擴張主義者聯合此地的西藏「叛國派系」，製造「一連串叛國顛覆活動」。²⁴⁷

藏人與美國合作，從噶倫堡收集情資，同時某些西藏反抗軍接受美國中情局援助與訓練，這並非祕密；但從當時尼赫魯的聲明來看，令人相當質疑他是否知情。更驚人的是，雖然尼赫魯決定給予達賴喇嘛政治庇護，卻仍相信中國實際上是友善鄰國，兩國間的任何問題都能和平解決。直到最後一刻，他才認真看待中國軍隊在邊界對側進行大規模建設的報告，並決定推動規劃粗劣的「前進政策」以對抗中國。許多人都認為尼赫魯並非全心擁戴這決策，因為不論什麼目標，執行政策的工具與必要資源都付之闕如。

馬克斯韋爾大膽用來「證明」印度是一九六二年侵略者的《亨德森·布魯克斯——巴格特報告》中指出：「『前進政策』顯然是政治風向，並假設把中國逐出拉達克將是最終目標。此事雖無疑義，然而重要的是，當時我們是否有軍力推動此一政策。」²⁴⁸這份目前仍被列為機密的報告繼續談到：

一九六〇年底，中國在西藏的建設大幅增加，這已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軍事情報評論中提出，因此有必要重新評估我方的戰力與任務……（同時）衝突發生時，若有面對中國攻擊的統合計畫，我方軍隊對應可能較為平衡，不會產生最後一刻才填補缺口的狀況。²⁴⁹

令人驚訝的是，除了馬克斯韋爾與蘭姆外，許多西方作家也接受中國的粗糙宣傳，相信他們對邊界衝突與相關議題的華麗詮釋，甚至一九六二年戰爭的起因。這很可能是因為蘭姆與其他接受中國觀點者，在呈現這看法時就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羅斯教授所說：「比北京政府更清晰、更有說服力。」。250換句話說，他們所展現的中國觀點，其實減去了「印度擴張主義者」、「英帝國主義者」與「西藏的叛國顛覆派系」等瘋狂言語。

這套一九六二年戰爭成因的扭曲詮釋中，認為開戰時刻是由印度軍隊在多拉哨所附近的行動，以及中印在十月中的部分衝突所決定。然而有一樁遠離印度次大陸的事件反而更能合理解釋，為何中國認定十月二十日是適合發動攻擊的日子。該事件即是發生在十月二十二至十月二十八日的古巴飛彈危機。

從中國的觀點來看，在美國總統甘迺迪忙著面對即刻的國安危機之際，此時對印度發動戰爭的確是神來一筆，因為美國將無法直接支援戰爭中的印度，即便支持，也將有損印度不結盟的承諾。十月二十六日，當戰爭在喜馬拉雅山區爆發時，尼赫魯史無前例地訴求國際的同情與支持。251

三天後，當古巴飛彈危機大致結束時，美國駐印大使加爾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與尼赫魯閉門會議後，美國確實決定提供軍事援助。美蘇簽訂祕密協定，美國將撤除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盟國土耳其東部的飛彈基地，蘇聯則同意撤回部署古巴的彈道飛彈。

在加爾布雷斯傳遞的訊息中，甘迺迪同意「無後續條件」提供印度武器。252根據報導，尼赫魯也向美國要求戰機；十一月十九日，印度向美國尋求全面防衛干預。253後來此事雖未發生，但一艘美國航空母艦已駛向孟加拉灣，一隊運輸機也抵達印度。254一般相信甘迺迪已同意提供印度一百萬發機關槍彈藥、四萬枚地雷與十萬發迫擊砲彈藥；而《時代雜誌》的報導甚至認為美國提供更加龐大的武器彈藥，並配有美軍人員與維修團隊。255然而這些都太少也太晚。當西方軍事協助抵達時，中國早已達成其目的。

不過中國並沒有放過譴責尼赫魯的機會，說他是「美國帝國主義走狗」及「國際反中運動的卒子」。256根據英國分析師馬若德所述，十月二十七日刊登在官方報紙人民日報上一萬五千字語帶刻薄的文章內容，「與一九六〇年北京的反蘇維埃論辯一致，也預示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的反蘇維埃論調，因此顯示這是對莫斯科意識型態鬥爭的武器，而非對印度的軍事鬥爭。」257

中國除了譴責尼赫魯向美國尋求軍事援助外，也希望藉此打擊蘇聯；在衝突前，蘇聯比任何西方強權都更接近印度，更是中國在「第三世界」掌控上的主要競爭對手。這競爭始於一九五〇年代，而首度浮上檯面的，是一九六〇年在羅馬尼亞共黨統治的國會中，蘇聯領袖赫魯雪夫與彭真（中國中央政治局領導之一）發生爭執。赫魯雪夫指毛澤東為「民族主義者、冒險主義者及分裂者」，中國則譴責赫魯雪夫「封建思想、獨斷獨裁」，甚至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主義叛徒」。258赫魯雪夫的回應是從中國撤回一千四百名蘇聯專家與技師，並對這世上人口最多的共產國家取消超過兩百項計畫。

蘇聯在中印衝突之初的態度十分審慎。雖然赫魯雪夫同情印度，卻也無法對中國過度強硬。另一方面，以傾蘇立場聞名的印度國防部長梅農，被迫為一九六二年戰爭印度缺乏防備擔責，在十月三十一日辭職。尼赫魯本人在危機中短暫代理國防職責。戰前即長久提供印度防衛設備的蘇聯，發現自己的立場實在兩難。根據身兼印度記者與中印關係專家的摩罕·羅摩（Mohan Ram）所述，蘇聯曾懇請中國停止軍事行動，並提供調停，同時間印度也預備接受調停。「他們極力試圖避免印度向美、英尋求協助。若是如此，維持印度中立的多年努力將功虧一簣。感謝中國侵略，資本主義者將提供軍火給印度。」259

根據羅摩的另一則消息，蘇聯也憂心梅農將從印度政府退出。羅摩引述蘇聯的回覆表示：「中國侵略的結果是，我們失去印度領導圈中最忠實的一位朋友，因為他向來仰賴我們的協助。」260

在一九五九年的中印邊界衝突中，赫魯雪夫決定保持中立，而這觸怒了中國。隨著中印緊張局勢在一九六二年升溫，中國向蘇聯領導

者呼籲「譴責印度中產階級為帝國主義走狗」卻被拒絕。²⁶¹相反地，十二月十二日戰爭終結時，赫魯雪夫站出來支持印度，並說：「我們絕無法接受印度會向中國開戰的想法。」²⁶²最終，中國迫使印度向美國求援，並將蘇聯打入同樣的反中陣營，這確實是中國成為第三世界領袖的神來之筆。

根據馬若德所述：「尼赫魯在緊急時刻向西方求援的做法，就算沒有破壞印度做為不結盟國家的形象，也降低其在共產世界與第三世界的地位……北京同時也向充耳不聞的莫斯科表明，選擇印度而不選中國做為夥伴，這是何等的的不智。」但馬若德認為更重要的是，一九六二年中印不斷攀升的緊張局勢，最終導致了十月爆發的衝突，是「向其他共產世界盟友展現，武裝馬列主義的旗幟再次飄揚於北京上空」。²⁶³一九六二年的中國，毛澤東重返高峰，成功挑戰印度與蘇聯，最終成為第三世界進步革命力量的領袖。

學者與分析師們不斷臆測，中國為何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布片面停火，並撤退至麥克馬洪線後的先前據點。部分人士猜想美國的介入是原因之一，其他人則認為若中國不停止入侵印度領土，蘇聯威脅將採取行動。印度軍事分析師則指出，事實上喜馬拉雅山區寒冬將至，因此很難從西藏內部的運輸基地，維持漫長而脆弱的補給線。

然而，這些解釋都跟中國的一九六二年戰爭期間的整體政策與策略野心視野不一致。這場戰爭是懲戒印度的有限度行動，目的是將之從不結盟運動的領袖寶座上揪下來，並迫使蘇聯在一九六〇年開始擴大的國際共產運動內部衝突中選邊站。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中國曾意圖保留一九六二年十至十一月占領的區域。中國希望展現軍事力量與優勢，而透過撤軍更突顯對鄰居與世界的「善意」，表明自己並非意圖奪取他國領土的侵略強權。在這些背景上，中國成為衝突的贏家，而成為第三世界領袖的大道已然開啟。

古巴飛彈危機也許解釋了中國為何決定在十月二十日攻擊印度，將一九五九年以來擘劃已久的計畫付諸行動。不過其實還有其他內政因素，促使他們加快對印度發動閃電攻擊；當時毛澤東歷經一九五〇

年代末期大躍進政策的重大挫敗後，正籌謀重新取回中國共產黨最高領袖的位置。

他必須想辦法邊緣化、中立或贏取黨內對手的支持。其中批判毛政策者包含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以及最重要且具影響力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彭德懷是中國革命與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韓戰英雄，他從韓戰經驗學得教訓，致力於改革人民解放軍，成為一支參照蘇聯軍隊制度、更為專業的武力。然而這與毛澤東信念中的「人民軍隊」相違背，毛認為人民軍隊應該由意識型態驅動，學習偉大主席著作。毛心目中的理想士兵，體現在稍晚創造出來的虛構人物雷鋒身上，這位忠誠戰士期許「為黨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264

一九六二年戰爭的意識型態面向，以及做為當時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工具，在馬若德對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中國的研究中多有著墨。「至今仍未能回答的問題是，若毛澤東持續處於退休狀態，劉少奇與周恩來是否會選擇用如此血腥的方式教訓尼赫魯？從他們對『三和一少』概念的支持來看，也許不會。」265

「三和一少」是由毛的前同志暨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提出的概念，意指「三項和平行動與一項減少」，也就是與帝國主義（美國）、修正主義（蘇聯）、反動派（印度）維持和平，並減少對世界革命力量的援助。266

根據中蘇關係專家拉欽科（Sergey Radchenko）的分析，可以了解到毛澤東極力反對此一觀點：

毛澤東提到國家安全與國家尊嚴。他要讓全世界知道中國不會被嚇退，北京對印度的嚴厲警告並非虛張聲勢。他知道人民解放軍已有能力給予印度軍隊震撼一擊，伸張中國的區域霸權。光是國家安全思考與對榮耀的想像，就足以與印度一戰。267

早在一九五九年，印度就被中共高層領袖一致認定為主要區域敵手，因此適合做為聯合內部、清除黨內「修正派」及其他「不良分子」的藉口。當印度在喜馬拉雅山區面對具高度紀律且優異精良的戰

爭機器時，並不清楚中國才勉強熬過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之一，而這結果源自於毛澤東的災難性政策。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接收中國後，大小地主的土地都遭沒收，分發給較貧困的農民，為避免引起全面的反對聲浪，此時尚未實施土地公有。政策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開始轉變，農民被迫納入農業合作化；到了一九五八年，政府全面廢除土地私有，最終誕生了中國標誌性的人民公社，有千萬農民在此共同勞動，以達成通常不切實際的產值。早在大規模運動之前，中國共產黨即決定以共產主義取代舊的宗教信仰，這表示古老廟宇遭毀棄，傳統節慶受禁止，人民家裡的舊偶像則以毛澤東、朱德及其他共黨領袖的肖像取代。

這些施政引來反對聲浪；在共黨統治初期，新經濟政策的批評甚至來自黨內。在非常基本的層面上，政府甚至無法掌握農收，確保人民有足夠的糧食果腹。毛澤東的反應是發起「百花齊放」運動²⁶⁸，不僅開放批評，甚至鼓勵批評。事後回顧，毛澤東似乎是希望等到繁花盛開以便摘下。當批評聲音浮現出來，隨後就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發起的「反右運動」中被逮捕。結果至少有五十萬人受害，幸運者僅失去工作或房舍，不幸者則因此入獄，甚至被處決。

對於改變中國農村社會生活，以及清算基進政策批評者，毛澤東有個更遠大的計畫，他希望中國成為現代工業化國家。政策的起源可追溯至一九五〇年代中期，當時毛澤東開始倡議高速工業成長，類似蘇聯在一九三〇年代史達林治下的成功。但是這與當時的主要經濟學者陳雲倡議穩健逐步工業化及全面平衡政策背道而馳。陳雲試圖緩和主席提出後來被稱為「大躍進」的瘋狂計畫，但最終未果。這項政策被認為是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²⁶⁹

毛澤東不願接受其他意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他訪問蘇聯時，因為受到史普尼克號（Sputnik）近期發射進入太空所激勵，宣稱：「東風壓倒西風」。²⁷⁰同時蘇聯的大規模鋼鐵生產，以及赫魯雪夫承諾將於十五年內超英趕美，也讓他印象十分深刻。毛希望中國能夠效法，同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社論上，「大躍進」一詞正式出

現。毛澤東的期望比蘇聯更為大膽，他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中共第八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宣布，中國將採行「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271目標是在七年內超越英國，十五年裡趕上美國。

全國千百萬的人民動員起來，欲將中國轉變為世上最現代化、工業化的國家。首要之務是製造鋼鐵，然而在缺乏粗鋼的情況下，各種鐵工具、鐵片到鐵釘門把都遭熔冶，期望達成目標；同時還發起耗費資源的灌溉水利建設以增加農業產量。國營媒體則發布國內四處大規模進展的亮麗報導。

河南省因為達成了看似驚人的成就，因而成為大躍進政策的標竿。光是在商丘縣一地，百萬人在「戶戶是工廠，家家叮噹響」272的口號下進入家庭作坊工作。河南省三萬八千四百七十三個公社併成一千三百五十五個大社，平均每社擁有七千兩百戶居民。根據官媒報導，穀物生產、畜養豬隻與農田水利計畫蓬勃發展。一九五八年十月，省政府宣布河南省同時有五百七十七萬人，超過二十二萬個冶煉爐煉鋼。273

其他省分也報導了類似但不如河南驚人的躍進成果。在「三面紅旗」口號總結下，中國正走在毛澤東所預想成為工業化國家的道路上，亦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274然而這一切不過是假象。人民公社建築在先前由個別農民擁有的土地上，因此為國家及黨辛苦耕種以交換政府配給，對他們來說毫無吸引力。由於動員煉鋼的千百萬農民不再耕種農田，結果並不意外，河南的穀物產量在大躍進期間實質下降。275在毛澤東大量動員人力投入工業化的要求下，舊的糧食配輸網絡也遭到破壞，而中國仍舊是落後的農業社會。即使在一九四九年共黨勝利後成立的合作社中，絕大多數民眾仍依賴田地生存。

一九五九年初，北京中央政府收到河南模範省的報告，許多人民「罹患腫病或死於飢餓」。276其中一封日期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署名「劉堤圈車站南北的群眾」的信，特別栩栩如生，令人動容：

春節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裡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兩縣交界處各村都有人死亡，有人是排隊買東西時一頭栽在地上就死了，有人是在田野裡挖野菜就倒下死了。²⁷⁷

中國各地都是同樣或更糟的情況。各地人民死於飢餓，人吃人的報告頻繁出現。光是在河南省信陽一地，就有至少二十起以上吃人肉的事件。一名十八歲女孩將五歲表弟淹死並吃掉；另一位十四歲姐姐也在飢餓之下，吃了弟弟的肉。²⁷⁸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間，安徽省有六十三起吃人肉事件。一對夫妻掐死八歲的兒子，然後將他煮熟吃掉；同一省中有個男人挖出屍體，吃了一部分，並將剩下的當豬肉賣掉。²⁷⁹這些並非單一事件，中國多數省分都有類似事件的紀錄，不過整體災難的全面影響，直到最近幾年才暴露出來。部分區域也有零星反抗事件，但都迅速遭到鎮壓，有數百名甚至數千名的反抗者與領導人遭到軍警處決。²⁸⁰

而中國轉型為工業化國家的運動也慘痛失敗。冶煉爐出產的鋼鐵完全無法使用；為了農業現代化而在農村興建的灌溉溝渠、堤防與水庫皆品質低落。長期研究大躍進的香港大學教授馮客（Frank Dikötter）曾說：「愈來愈多調查團隊報告確認，原料、工具與機械都被棄置甚至蓄意破壞。例如石家莊鋼鐵廠的半數引擎經常當機。」²⁸¹馮克認為「發展出浪費的文化，光是洛陽三間工廠，就積聚超過兩千五百噸廢金屬卻文風不動。在瀋陽，銅鎳熔液在廢金屬堆間肆意散流」。²⁸²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在一片混亂之中，中國共產黨於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議程要務自然是大躍進。然而西藏動亂甫遭鎮壓，達賴喇嘛已出走印度，因此該議題也被提起。會議之前，周恩來已指責英、美支持拉薩起義。根據周的說法，做為邊界國家的印度自然也參與其中。

鄧小平在上海會議中複述周的發言，但認為北京公開譴責印度的時機尚未成熟。²⁸³雖不清楚中國何時將與印度「算帳」，但這是所有人都認同的議題。相對於毛澤東推行的經濟政策，鄧小平與劉少奇皆

傾向較為實際的做法。不過面對處理西藏及共黨領袖認定的國家安全議題上，鄧與毛都是強硬派，問題只在於何時給印度「一個教訓」。

即使在西藏與印度議題上達成共識，毛澤東仍深陷危機。大躍進的失敗動搖了他的領導地位，上海會議更贊成毛由共和國國家主席（亦即國家實質元首）之位退下，轉由較溫和的劉少奇擔任。但毛澤東仍是中共主席，同時也盡其所能在幕後持續掌控局勢。

所有領導高位者都會面臨的問題就是「無法信任地方屬下」。各地為了掩蓋大躍進帶來的災難，或是為了逃避失敗懲處，送往北京報告中的農作收成數字都經過造假。由於這些假造數字過於浮誇，就連毛也不相信。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會議後，毛以黨內通信的方式譴責「純粹浮誇」，並要求據實回報產量。[284](#)

周恩來受過良好教育，不難理解情勢發展，事實上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就率先發起運動，反對毛的「冒進」想法。但就在毛透過中共中央委員會輾壓政策的同時，周或許是認為自己的高層領導地位不再穩固，很快就轉向了；甚至還在一九五八年三月針對自己反對毛的快速工業化主張，發起了「自我批評」，「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事實上傷害了群眾的積極性……當時我沒有認識，但後來了解到這是對社會主義建設帶方向性的動搖和錯誤。」[285](#)

這裡我們看到那位一九五〇年代造訪印度時，留給大眾穩重成熟印象的政治家，在黨的審判者面前所做的自我羞辱。周恩來無疑仍對毛澤東快速推進中國工業化的計畫存疑，但在大躍進漸形苦澀的權力鬥爭中，他同時也是求取生存的機會主義者。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在江西山城廬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時，此一趨勢愈來愈明顯。

中國學者楊繼繩寫道：「既要維護『三面紅旗』，又要解決『三面紅旗』造成的惡果，周恩來的內心是矛盾的。這種矛盾心態，造成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決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286](#)從事後來看，當周恩來與尼赫魯討

論邊界及其他中印未決議題之時，印度政策制定者根本不可能從周的身上獲得任何可靠回應。

周恩來的機會主義態度，使他從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掀起的清算中全身而退。會議中遭鬥爭出局的最重要領袖是彭德懷，他在七月十三至七月十四日曾寫下一封批評大躍進的私人信函。用字遣詞雖極度謹慎，並提到「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就是無庸置疑的」²⁸⁷，毛仍認定這是對他個人與政策的攻擊。不過毛澤東犯了個錯誤，就是將彭的信函在黨中流傳，這表示其他批評聲音也將隨之而起。身為黨內老兵暨中央政治局成員的張聞天就發出了批評意見，以中共內部允許發聲的標準來說是個批評。

毛澤東的回應快速而猛烈，彭德懷、張聞天與其他相關人士皆被打為「右派」與「反革命分子」，並在廬山會議期間與之後遭到清算。張聞天遭控「與外國勾結」，意指蘇聯；在被要求坦承「罪狀」時，有好幾桶髒水從他頭上潑下。²⁸⁸九月，毛澤東的心腹林彪取代彭德懷成為國防部長（不過後續他也將遭到鬥爭清算）。毛似乎在這場權力鬥爭中贏得了勝利，但他的地位仍未穩固。

毛澤東的統治激起廣大的不滿。大躍進造成的饑荒規模在中國史上前所未見，正確的死亡人數難以統計。馮客相信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有四千五百萬人「非必要」死亡。²⁸⁹楊繼繩則引用中國學者蔣正華的研究，將數字大幅下修至一千七百萬。²⁹⁰無論大躍進期間實際餓死人數是多少，這都是一場空前浩劫。相比之下，二十世紀印度最嚴重的災害是一九四三年的孟加拉饑荒，死亡人數大約為三百萬人。

即使已清除主要政敵，周恩來也舔舐著傷口並謹守黨的路線，毛澤東仍被在廬山會議前後不得不面對的反對勢力困擾著。究竟黨內還有多少「右派」與「修正主義者」？誰是可信任的？會議剛結束，毛又發起另一波凶猛的「反右」運動，讓剩下的批評者全都閉嘴。人民解放軍真正的建立者老將朱德，在廬山會議中透過小批彭德懷，希望以此來保全彭。朱德譴責彭德懷一事已滿足毛澤東對他的期待。朱德

失去中央軍委會副主席職位，卻得以保留部分比較不重要的國家職務與黨職。

此刻，毛澤東很可能決定透過西藏議題與印度邊界爭議，強化自己在黨與國家中被動搖的地位。廬山會議於八月十六日結束，同月二十五日就有一隊人民解放軍向東北邊境特區邊界上的朗久發動意外攻擊，接著就是十月二十一日在拉達克的空喀山口駁火。由毛澤東任命掌管軍隊的林彪顯然奉令行事，人民解放軍若是由較專業的彭德懷掌理，這些攻擊會否發生還是個疑問。另一方面，一九五九年中國在戰場上的成就與一九六一年進入緬甸，特別是一九六二年戰爭的勝利，確實受益於彭德懷採取的軍官專業化政策，軍隊指揮體系因此更有效率。而這些成果將因林彪的掌理反轉；在林彪之下，雷鋒概念得到發揚，並於政治與意識型態上成為一種全國信仰，今日仍然可見。[291](#)

毛澤東攀回絕對權力高位的行動才剛剛開始。一九六一年，大躍進隨著三年內死去的所有人命一同埋葬。除了千百萬死於飢餓的人外，還有許多人遭到黨狂熱分子毆打至死，或是被羅織顛覆或其他不實罪名而被處決。一切結束之後，大躍進的政治遺產是讓毛澤東決定，將要以其個人統治取代過去黨集體領導的原則，他的統治將不受評論或挑戰。從此刻起，他不會再容忍任何對統治或個人的批評。

然而他的政治重返之路尚未結束。此刻的他是否能倖免於黨內的陰謀詭計？毛的私人醫生兼密友李志綏多年後在所寫的主席傳記中曾提到，大躍進之後，毛澤東在黨內的支持度正在消退，他「對農業危機感到沮喪，也對黨內菁英感到憤怒，此刻他逐漸難以控制後者」。

[292](#)

接著一九六二年到來。根據李醫師的記載，「一九六二年是毛澤東政治上的轉捩點。一月，毛召開另一次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他在黨內的支持度來到最低點。」[293](#)在會議上，國家主席劉少奇公開指責饑荒是「人禍」[294](#)，並希望能平反那些因反對大躍進而清算的領袖，此舉導致毛澤東不滿。

阿諛奉承的林彪持續擁毛，毛主席本人則開始更激烈地反擊對手，主張「社會主義之下也有階級」²⁹⁵，因此「階級鬥爭」必須繼續，於是任命惡名昭彰的強硬派特務頭子康生，負責清算更多「修正主義者」，例如中共內部的反毛派。康生與江青密不可分，這位女演員在一九三八年成為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他們與林彪攜手，成為毛澤東重掌權力的工具，宣傳毛派獨特的共產主義，以及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開始推動的個人崇拜。

印度邊界爭議正是轉移權力鬥爭注意力的有效工具，更是能堵上對手與批評者嘴巴（甚至將其收編）的議題。這也能解釋為何與印度一戰的最終準備階段始於一九六二年初。林彪就位指揮作戰，毛澤東與這位忠心耿耿的解放軍指揮官結成同盟，對印戰爭才能付諸實現。²⁹⁶隨著中國在戰爭的最終勝利，毛的極左路線也在中國內部獲得上風。黨內任何尚存的反對聲浪在這波清算後，最終歸於寂靜。

此刻，毛的視野與野心無疑超越了中國邊境。他不只想做中國領導人，也希望成為世界所有革命運動的領袖，而此事在一九六二年擊敗印度後成真。兩年後尼赫魯在受中國羞辱的痛苦中憂憤離世。達爾維准將在一九六二年戰爭與戰後的紀錄中寫道：「少了尼赫魯，印度不再是不結盟世界的道德領袖。一九六二年之前，印度即使貧困且缺乏軍事能力，還是能發揮強大的影響力。在被中國攻擊後，借用對尼赫魯最不友善的批評來說，就是印度被『砍成片片』。」²⁹⁷

中國受到對印戰爭勝利的激勵，再次統一於毛澤東之下。喜馬拉山區戰場的餘燼中，誕生出一個更為好戰的中國。轟炸式的革命語彙對北京電台廣播與《人民日報》文章而言並非新鮮事，但中國媒體的修辭比以往更具戰鬥性。而訊息主要傳遞的對象，是在對抗「帝國主義」、「修正派」與「反動派」鬥爭中，毛澤東希望跟自己站在同一邊的世界各地革命者。²⁹⁸

摩罕．羅摩在傑出的一九六二年戰爭前後研究中指出，到了一九六七年中，中國「認為在激化的國際階級鬥爭中，革命情勢『大好』」，同時革命之火已在「第三世界」烽煙四起。²⁹⁹羅摩引述一篇

《人民日報》的文章，針對當時蘇聯總理柯西金（Alexei Kosygin）及其「終結戰爭」的主張發動猛烈攻擊，並譴責為「美蘇反對革命鬥爭之偉大共謀」。最後《人民日報》總結：「世界充斥火藥味……管他媽的戰爭『已死』論！」³⁰⁰

²⁰³ John P.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The Angry Truth About India's Most Crushing Military Disaster* (Dehra Dun: Natraj Publishers, 2010), p. 364.

²⁰⁴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p. 364.

²⁰⁵ P.J.S. Sandhu, Bhavna Tripathi, Ranjit Singh Kalha, Bharat Kumar, G.G. Dwivedi, Vinay Shankar (eds), 'Operations in the Western Sector (Ladakh)', 1962: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Delhi: Vij Books, 2015), p. 67.

²⁰⁶ Sandhu et al., 'Operations in the Western Sector (Ladakh)' in 1962: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p. 67.

²⁰⁷ The Henderson Brooks - Bhagat Report,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wp-content/uploads/2014/03/TopSecretdocuments2.pdf> (accessed on 15 April 2016), p. 54.

²⁰⁸ Sanjay Sethi, 'Confrontation at Thag La: Indo China War 1962', *Scholar Warrior*, Autumn 2013, p. 118.

²⁰⁹ G.S. Bhargava, *The Battle of NEFA: The Undeclared War* (Bombay, New Delhi, Calcutta, Madras, London, New York: Allied Publishers, 1964), p. 96.

²¹⁰ Sandeep Unnithan, '1962 Indo-China war veteran Brigadier Lakshman Singh shares his experience', *India Today*, 18 Octo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i-led-40-men-to-safety-brigadierlakshman-singh-82/1/225265.html> (accessed on June 1, 2016) and 'Battle of Namka Chu, 10 Oct - 16 Nov 1962', available at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service-selection-board/battle-of-namka-chu-10-oct-16nov-1962/347589408614911/> (accessed on 1 June 2016).

- [211](#) Cheng Feng and Larry M. Wortzel, 'PLA Operational Principles and Limited War: The Sino-Indian War of 1962,' Mark A. Ryan,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Armonk, NY: Sharpe, 2003), pp. 182 - 6.
- [212](#)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p. 377.
- [213](#) Feng and Wortzel, 'PLA Operational Principles and Limited War' , p. 152.
- [214](#)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pp. 376 - 7.
- [215](#) Louise Chipley Slavicek, *Great Military Leaders of the 20th Century: Mao Zedong* (Philadelphi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4), p. 37.
- [216](#) George N.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0), p. 88.
- [217](#)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88.
- [218](#)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86 - 7 and 99 - 100.
- [219](#)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88.
- [220](#) John Powers,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20.
- [221](#) Li Xiaobing,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7), pp. 202-03.
- [222](#) Li,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 pp. 203 - 4.
- [223](#) Li,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 p. 204.
- [224](#) Li,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 p. 204.
- [225](#) See Melvyn C. Goldstein,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denschuh,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untso Wangy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 [226](#) Interview with Singye (name changed for privacy), Tawang, 28 October 2015.
- [227](#) Interview with Singye, Tawang, 28 October 2015.

- 228 Interviews, with local residents, Tawang, 27 – 29 October 2015.
- 229 Interview with Dorjee Khandu Thongdok, Rupa, 26 October 2015.
- 230 E-mail communication with Shiv Kumar Verma, the author of 1962: The War That Wasn’ t (New Delhi: Aleph, 2016), 18 March 2016.
- 231 Interview with Tilottoma Misra, Guwahati, 23 October 2015. Also see Brij Mohan Kaul, The Untold Story (Bombay, Calcutta, New Delhi, Madras: Allied Publishers, 1967), p. 427.
- 232 Mrinal Talukdar, Sino-Indian Conflict, translated by Deepika Phukan (Guwahati: Kaziranga Books, 2014), p. 216.
- 233 譯者注：白馬崗（Pemako）位於印度與西藏之間，是藏傳佛教蓮花生上師的隱密聖地。蓮花生上師曾言，此為藏人面臨困境之際的皈依所。中國於西藏境內置墨脫縣。
- 234 Interview with Tsering (name changed for privacy), Darjeeling, 12 March 2016. Tsering is the son of a Pemako aristocrat from the Tibetan side of the border.
- 235 Dorjee Khandu Thongdok, War on Buddha: A Book on Chinese Aggression 1962 (Rupa, Arunachal Pradesh, 2012), pp. 18 – 19.
- 236 Thongdok, War on Buddha, p. 3.
- 237 Sandhu et al., 1962, ‘The Politico-Diplomatic Prelude Part-1’ , p. 5.
- 238 Gurdip Singh Kler, Unsung Battles of 1962, (New Delhi, London, Hartford WI: Lancer Publishers, 1995), pp. 94 – 5.
- 239 Gurdip Singh, Unsung Battles of 1962, pp. 95.
- 240 Sethi, ‘Confrontation at Thag La: Indo China War 1962, p. 120.
- 241 B.N. Mullik, My Years with Nehru: The Chinese Betrayal (Bombay, Calcutta, New Delhi, Madras, Bangalore, London, New York: Allied Publishers, 1971), p. 307.
- 242 The Henderson-Brooks Bhagat Report, p. 8.
- 243 Quoted in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167.
- 244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166.
- 245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161.

246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176.

247 Quoted in Patterson, Tibet in Revolt, p. 182.

248 The Henderson Brooks - Bhagat Report, p. 10.

249 The Henderson Brooks - Bhagat Report, p. 32.

250 Leo E. Rose, 'Review: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 by Alastair Lamb', Pacific Affairs, Vol. 41, Issue no, 1, Spring 1968, p. 132. See also Introduction and Acknowledgements.

251 Paul M. McGarr, The Cold War in South Asia: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1945 - 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57.

252 Mohan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Delhi, Bombay, Bangalore, Kanpur, London: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73), p. 122.

253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 123.

254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1.

255 Ramachandra Guh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New Delhi: Picador India, 2012), p. 340. Time claimed that Washington sent 60 planes loaded with US\$5 million worth of automatic weapons, mortars, and land mines, and that 12 C-130 Hercules transport planes flew Indian troops to the battle zones; see 'India. Never Again the Same', Time, 30 November 1962, available at <http://content.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829540,00.html> (accessed on 27 September 2016). This is most likely an exaggeration of the extent of US military assistance to India in 1962. However, according to Bruce Ried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responded very quickly to Nehru's request for armaments. U.S. Air Force (USAF) Boeing 707 aircraft, flying from bases in Europe and Thailand, began airlifting weapons and ammunition to India; by November 2, eight flights a day were each bringing in twenty tons of supplies to Calcutta. USAF C-130s then

transported the arms from Calcutta to airfields near the front lines ... the Royal Air Force (RAF) also soon began airlifting supplies to India, and London was consulting with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Canada on providing aid from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See Bruce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Tibet, the CIA, and the Sino-Indian War* (New Delhi: Harper Collins, 2016), p. 121.

256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p. 310.

257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p. 310.

258 Quoted in Alan Axelrod.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A New Look at the Past* (New York: Sterling Publishing Co., 2009), p. 213. For the ideological conflict betwee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see also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p. 101–6.

259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p. 130–31.

260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 131.

261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 127.

262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 133.

263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311–12.

264 For an account of the Lei Feng myth, see Evan Osnos, ‘Fact-checking a Chinese Hero’, *The New Yorker*, 29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newyorker.com/news/evan-osnos/fact-checking-a-chinese-hero> (accessed on 10 April 2016).

265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3, p. 312.

266 Sergey Radchenko, *The Suns in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 to 1967* (Washington and Stanford: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8.

267 Radchenko, *The Suns in Heavens*, p. 28.

268 This was a campaign that was launched after Mao Zedong had said in a speech made to a session of the Supreme State on 2 May 1956

that the party should ‘let a hundred flowers blossom, let a hundred schools contend’. Referred to as ‘the hundred flowers speech’, it is mentioned and analysed in detail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51-6.

269 For an excellent account of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ee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M.E. Sharpe, 1999). Chen Yun’s criticism of Mao’s policies is outlined on pp. 63-65.

270 Teiwes and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 xviii.

271 As quoted in Teiwes and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 xx.

272 Yang Jisheng, *Tombstone: The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translated by Stacy Mosher and Guo Ji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p. 77.

273 Yang, *Tombstone*, p. 77.

274 Yang, *Tombstone*, p. 87.

275 Yang, *Tombstone*, pp. 80-81.

276 Yang, *Tombstone*, p. 81.

277 Yang, *Tombstone*, p. 81.

278 Yang, *Tombstone*, pp. 41-2.

279 Yang, *Tombstone*, p. 278.

280 For rebellion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ee Yang, *Tombstone*, pp. 465-82, and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London, Berlin, New York, Sydney: Bloomsbury, 2010), pp. 226-8.

281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p. 146.

282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p. 146.

283 Sandhu et al. 1962, ‘The Politico-Diplomatic Prelude Part 2’, p. 23.

- 284 Teiwes with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p. xxiii.
- 285 Yang, Tombstone, p. 100.
- 286 Yang, Tombstone, pp. 370 - 1.
- 287 Yang, Tombstone, p. 358.
- 288 Yang, Tombstone, p. 383.
- 289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p. x.
- 290 Yang, Tombstone, pp. 419 - 20.
- 291 In 1963, Lin Biao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a diary supposedly written by Lei Feng. Although this was done after the 1962 War, the basic concept of the loyal and ideologically motivated PLA soldier dates back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in the 1930s and 1940s. 'Lei Feng' gave a name and a persona to that concept.
- 292 Li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Man who Made Modern China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4), p. 356.
- 293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 385.
- 294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 652.
- 295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p. 652. See also Claude Arpi, 'Why Mao attacked India in 1962', Indian Defence Review, Vol. 26, Issue No. 3, July - Sept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spotlights/maos-return-to-power-passed-through-india/> (accessed on 15 June 2017): 'At the beginning of 1962, as tension was increasing on the Indian border, did Nehru realize that China was a starving nation? Very few knew that, by the end of 1961 Mao was practically out of power.'
- 296 Claude Arpi, India and Her Neighbours: A French Observer's View, (New Delhi: Har Anand Publications, 2007), p. 194.
- 297 Dalvi, Himalayan Blunder, pp. 481 - 2.
- 298 Those 'enemies', and others, are identified in Mao Zedong, 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8), pp. 8 - 23.
- 299 Ram, Politics of Sino-Indian Confrontation, p. 184.

300 The quote about ‘the smell of gun powder’ and ‘to hell with the theory of dying out of wars’ comes from a broadcast over Radio Beijing on 1 July 1967 and quoted in Mohan Ram, *Maoism in India*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71), p. 7.

第四章 戰爭結束時

戰爭才剛結束，指責遊戲接著登場，令人搖頭嘆息不止。梅農在喜馬拉雅山巔激戰時就遭撤換，這一點也不讓人驚訝。他的問題不在於本身的左傾立場，其實當時許多印度政治家都偏向左派；但身為國防部長卻低估中國威脅這件事，讓他受到許多批評。根據一九六二年戰時印度參謀總長布利吉·摩罕·高爾准將（Brij Mohan Kaul）所言，印度的情報體系「比起中國相對不利。他們系統性地派遣特務進入印度全國，特別是東北邊境特區，我們相對落後。他們的特務建立了回饋網絡」。301

即使如此，在一九六二年十月攻擊的前幾年，關於中國軍隊在東北邊境對側大幅建設的情資報告，早已大量湧入軍隊總部及梅農辦公室。梅農至少在三年前就得知中國可能會發動攻擊。302或如印度記者暨政治評論家曼科卡（D. R. Mankekar）在其著作《一九六二年的罪人》（The Guilty Men of 1962）中寫道：「從一九五九年開始，中國的敵意不斷攀升，直到一九六二年在白熱中爆發。」303

同樣根據曼科卡所述：

當時國內兩派流行思潮中，梅農引領的這派強調巴基斯坦威脅，低估中國對印度的威脅。除了意識型態上偏向中國與其他共產國家外，梅農長期以來也視巴基斯坦為自己豢養的敵手，多年以來在情緒洶湧的喀什米爾問題上，他一直扮演英勇鬥士角色，獨占前排光芒。

304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梅農在阿薩姆的德茲普（即九個月後戰爭爆發的前線據點）發布聲明：「印中邊界爭議的規模，不會導致戰爭。」305這在某個角度上是對的，因為中國並非為了實際邊界爭議而發動戰爭，但梅農未能掌握中國決定「跟印度算帳」306的更廣大地緣政治及意識型態脈絡。

某些人認為梅農是尼赫魯內閣中最具爭議性及分裂性的角色。他是尼赫魯的老友兼親信，但行動利益卻與軍隊並不一致。一九五九年，知名將軍科丹德拉．蘇巴亞．提馬亞甚至因為與梅農不合，決定辭去陸軍總司令一職。但尼赫魯拒絕接受提馬亞的辭呈，並說服他留任，直到一九六一年退休。

一位英國觀察家甚至進一步說梅農「感覺上像尼赫魯家族一份子（沒有其他部長能及得上）……事實上尼赫魯與梅農之間有如父子，可以感覺到視梅農為自己極希望擁有的兒子」。7其他西方觀點將梅農刻劃為「印度的拉斯普丁」³⁰⁷、「印度的維辛斯基」³⁰⁸與「印度的擁抱共產黨無任所大使」。³⁰⁹

在喜馬拉雅山區戰爭的高峰期，梅農的反西方立場成為議題，但當時印度別無選擇，只能轉向尋求美國支持。十月二十三日，尼赫魯正式向美國尋求支持的三天前，美國駐新德里大使加爾布雷斯通知印度外交部長迪賽，若梅農繼續擔任國防部長，將對美國軍援印度造成「較為嚴重的問題」³¹⁰，因此他必須離開。尼赫魯接管國防部一小段時間後，由印度獨立期間的重要角色查萬（Yashwantrao Balwantrao Chavan）接任部長一職。

即使尼赫魯與梅農關係親近，但兩人之間仍有嚴重歧見。尼赫魯對中國人的疑慮也許比表現出來的更多一些。早在一九五八年，據傳他在與當時即將上任印度駐北京大使的帕塔薩拉蒂（G. Parthasarathi）私下會面時，曾說：

我一點也不相信中國人。他們欺瞞成性、意見多端、驕傲又自大。持續警戒是我們的格言。你所有電報只能送給我，而非外交部。此外，今日的指示別跟克里希那（梅農）提起。你、我與他雖然有相同的世界觀與意識型態取向，但他卻誤以為世上沒有任何共產國家會跟我們不結盟國家交惡。³¹¹

這是梅農最嚴重的誤判。然而就如同高爾在關於一九六二年戰爭與後續的書中寫道：「當梅農聲望下滑，他過去對印度的諸多貢獻也為人所遺忘，只留下錯誤。」³¹²在印度政府部會首長中，梅農其實是

最傑出且精力充沛的人才之一。身為素食者，他禁酒禁菸；身為部長，他住在一間樸素木屋，小房間中充滿書籍。

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期間，年輕的梅農在倫敦大學學院及政經學院攻讀學位，他的政治學老師哈洛德·拉斯基（Harold Laski）後來形容他是「我最好的學生」。313印度獨立之後，梅農出任第一任駐英國高級專員314，之後更擔任印度駐聯合國大使。他也是一九五五年萬隆會議及不結盟運動創立背後的智囊之一。事實上，「不結盟」一詞正是一九五三年梅農在紐約聯合國的演講中提出，用來描述不與西方或蘇聯結盟的國家。然而比起華府或倫敦，梅農較親近莫斯科亦不是祕密。

一九五七年他接手國防部時，「有如一股清新空氣，吹走部長職位多年來累積的蜘蛛網與灰塵。」315梅農生性高傲，不太受上下同僚喜愛；然而根據高爾所述，「他廣泛閱讀，幾乎是一部通曉太陽底下所有事物的百科全書，包含科學、哲學、醫學、工程、歷史、政治、經濟、農業與動物。他對飛機引擎、裝甲車、潛水艇與無線設備等精密儀器有深刻認識。專家在他左右也都戰戰兢兢。」316

然而最重要的是，梅農奠定了印度自有國防工業的基礎，確保國家減少對進口的依賴，並同時重新架構印度的軍隊指揮體系。在他監管之下，位階升遷改以功績而非年資為基礎。梅農也是一九六一年對前葡萄牙殖民地果亞兼併行動的擘劃者。一九五七年，梅農寫下紐約聯合國安理會史上最長的演講紀錄；在八個小時中講述對抗巴基斯坦的主張，捍衛印度對喀什米爾的主權。五年之後他被迫離開政府，也離開執政的國大黨，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與數次選舉，直到一九七四年離世，享壽七十四歲。當時印度總理甘地夫人感嘆：「一座火山止息了。」317

下一個令人搖頭の対象則是陸軍總司令塔帕。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從德茲普飛回德里，直接前往尼赫魯官邸並向總理表明願意辭職。塔帕說印度軍隊在喜馬拉雅山區遭到擊潰並非他的責任，但

身為一名專業軍人，他必須為此挫敗負責。尼赫魯回覆會考慮，接著於次日接受了塔帕辭呈。之後塔帕申請提早退休，也獲得了許可。

塔帕生於旁遮普西部（屬於今日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並前往拉合爾（Lahore）接受教育。就跟那世代許多的軍官一樣，他也就讀桑德赫斯特的英國皇家軍事學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參與了緬甸、中東與義大利戰事，後來成為軍事行動與情報局長。塔帕的軍隊經歷優異，在一九六一年成為陸軍總司令。從軍中退下後，也曾出任印度駐阿富汗大使，時間長達五年之久。

繼塔帕之後擔任陸軍總司令的是孟加拉出身的喬都利將軍（Jayanto Nath Chaudhury）。他也是桑德赫斯特畢業生，並參與過「緬甸行動」（英國欲從日軍手中奪回殖民地，而在緬甸發起的反制行動）。當中國宣布片面停火時，喬都利剛上任陸軍總司令二天，而重整軍隊並重建破碎邊防的責任就落到了他頭上。

再來就輪到高爾將軍。他同樣也有傑出的軍隊資歷，戰爭期間擔任參謀總長暨東北區域總司令。他跟其他人一樣，也是桑德赫斯特出身，在英國軍隊傳統中成長。之後參與了二戰期間的緬甸戰事，以及一九四八年的喀什米爾戰爭。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他與提馬亞將軍都效力於聯合國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不過他與尼赫魯更親近，並被公認是極少數可能擁有政治野心的印度軍官；然而東北那場戰爭卻導致他前途中斷。

十月中旬，當第一波衝突沿著邊界發生之時，高爾就在邊境，但因為高山症感覺不適而撤回德里接受治療，直到十月二十九日才重返東北。高爾在戰場上的缺席，對敵手來說正是怯懦的跡象，便說他因「臨陣膽寒」而「裝病」。³¹⁸這其實是非常不公的指控，但在印度戰敗受羞辱後的政治環境中，他只能別無選擇地吞下苦果，申請提前退休。政府於十二月十一日接受他的退休。³¹⁹

當時高爾不過才五十歲。他最終苦澀地離開軍隊，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四日前往歐美、日本，展開為期一年的個人旅行。若非因為承擔一九六二年的戰敗指責，他非常可能不只在軍中有大好前程，甚至

還有政治上的未來發展。當時知名的美國廣播主持人威爾斯·漢根（Welles Hangen）甚至視其為「尼赫魯之後可能的印度總理接班人選」。320

此外，這場戰爭中還有一些不為人知且多數不知名的受害者，即印度華裔。印度當局懷疑這些人可能是在一九六二年戰前，提供情資給中國軍隊的「第五縱隊」，因此視其為叛國者。在一九六二年之前，中國共產黨政府確實多年派遣情報特務進入印度，這點無庸置疑，然而很少是出於印度本身的華裔族群。印度華裔是在英國殖民時期來到印度，多數住在加爾各答，擔任製皮、製鞋與木匠等工作，或是開設餐廳、美容院、商店及其他小公司。若他們有任何政治認同，也是傾向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而非北京的共產黨政府。一九六二年戰爭期間，加爾各答的海外華人協會公開表達支持印度政府，甚至呼籲切勿接受北京在十一月提出的停火「骯髒提議」。321

然而，十月二十五日發布的《外國人（中國國籍者限制）令》（Foreigners “Restriction of Chinese Nationals” Order），限制任何華裔人士在未獲得當地官員書面許可下，擅自離開村落超過二十四小時。五天後又發布了另一紙命令，政府得羈押「任何非印度裔，並且生於任何正與印度戰鬥或侵略印度之國家的公民或被統治者」。322

接著發布的是十一月三日的《外國人（收容）令》（Foreigners “Internment” Order），在此法令之下，阿薩姆與西孟加拉邦北部部分特區政府，有權力逮捕所有華裔居民，並將他們送到位於一千五百公里外的拉賈斯坦迪歐利（Deoli）收容營。一九六三年二月，根據政府紀錄，迪歐利總共收容兩千一百六十五名華裔人士，另有一百四十三名關押在當地監獄。323幾乎所有人都來自東北邊境區域。

其中一名收容人名為殷瑪絮（Yin Marsh，音譯），她生於加爾各答，長於大吉嶺，其家族在此地經營頗受歡迎的中式餐廳。她與父親、祖母、八歲的弟弟都被送往迪歐利。她在自己的書《與尼赫魯一同入監：印度華裔家庭的故事》（Doing Time with Nehru: The

Story of an Indian-Chinese Family) 中描述這段慘痛經歷。書名暗示著諷刺的巧合，下令大規模收容的尼赫魯本人，在爭取印度獨立過程中，也曾被英國人關押在迪歐利過。³²⁴

最終，沒有任何迪歐利收容人與印度華裔因間諜或其他罪名被審判。³²⁵然而在一九六三年，有兩千三百九十五名華裔（包含一千六百六十五名收容人與七百三十名親屬）被遣返中國。留在印度的人情況更加艱難，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七年間，另有七千五百名華裔離開印度，前往香港、台灣、加拿大或其他地區，甚至包含了巴基斯坦。³²⁶直到一九九八年，華裔才被允許取得印度公民身分。

這種對待華裔的方式，傷害了印度做為強盛民主國家的國際形象。一度繁盛的加爾各答華裔社群僅剩不到兩千人；在噶倫堡、大吉嶺及阿薩姆部分區域的人數更少。十九世紀，華人先民曾被英國茶園主以契約工的方式移入此地。二〇一〇年，迪歐利收容營倖存者公開要求在此地建立一座紀念碑，做為一九六二年「華裔遭受迫害的見證」，並提醒「我們失去的自由」。³²⁷

然而一九六二年戰爭的主要政治受害者，也許正是尼赫魯本人與他的不結盟主義。戰後尼赫魯的健康急速下滑，一九六三年，他花了好幾個月時間在喀什米爾高地休養生息，這裡是其先祖發跡之地。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尼赫魯在出席印度東部奧里薩邦首府布班內許瓦（Bhubaneswar）舉行的一場國大黨會議時，因心臟病發作倒在舞台上，迅速被送回新德里接受治療。國大黨與印度政府開始安排縮減他的負擔。他當時七十五歲，並不算老，但活力顯然正在快速消逝。

尼赫魯在生命終結前有兩件掛心的事，一是他與舊友謝赫·阿布拉杜拉（Sheikh Abdulla）就查穆與喀什米爾地位問題的痛苦衝突，二是東北那迦山區持續不斷的部落反抗行動，之後該區域逐漸以「印度的小越南」聞名。然而對中戰爭的慘敗傷他最深，部分歷史學者認為尼赫魯視此為中國的完全背叛，他的健康也因此惡化，並加速了死亡的到來。³²⁸如同印度學者羅摩強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指

出：「中印戰爭不只傷害了尼赫魯在印度與世界的地位，同時也影響他在國大黨內部的地位。」 329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尼赫魯經歷另一次心臟病發作，死於新德里三武館（Teen Murti House）家中，在心臟科專家搶救無效的過程中，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隨侍在側。當天下午兩點，內閣部長蘇布拉瑪尼亞姆（C. Subramaniam）向國會下議院報告：「總理已辭世，光已熄滅。」蘇布拉瑪尼亞姆借用尼赫魯在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甘地遭暗殺後的發言：「生命之光熄滅了，到處都是一片黑暗。」 330

雖然印度在戰爭中獲得部分的西方援助，但英、美提供的軍援是有代價的。印度歷史學者賈內許·庫代西亞（Gyanesh Kudaisya）記述了尼赫魯最後的歲月：

尼赫魯感到沮喪……此刻印度被迫接受外部調停，就高度爭議的喀什米爾議題與巴基斯坦展開對話。英、美政府利用喜馬拉雅危機，施壓印度向巴基斯坦讓步，以解決喀什米爾議題。尼赫魯小心經營的不結盟政策遭遇重挫，戮力經營印度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也消失無蹤。 331

國大黨政治家暨經濟學者古札利拉爾·南達（Gulzarila Nanda）暫代總理，直到六月九日夏斯特里（Lal Bahadur Shastri）宣示就職。夏斯特里是有些名望的前獨立運動鬥士，並非印度政治中的無名人物，不過他的性格溫和、言語溫文，缺乏尼赫魯的領袖魅力與世界舞台高度。

無論如何，夏斯特里帶領印度面對一九六五年的巴基斯坦戰爭，這次是由印度軍隊獲勝，因此成功重建了部分在一九六二年戰爭所失去的尊嚴。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和平條約在烏茲別克的塔什干（Tashkent）簽訂，當時此地為蘇聯的一部分，由蘇聯總理柯西金居中斡旋夏斯特里與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Muhammed Ayub Khan）的會議。一天後，夏斯特里因心臟病發死亡，這導致各種陰謀論四起。

他是否被毒殺？若然，又是誰下的手？但並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這些揣測，夏斯特里遺體被送回印度火化。

古札利拉爾．南達再次出馬暫代國家元首，直到一月二十四日，印度又有一位新總理，即尼赫魯當時四十八歲的女兒英迪拉．甘地，她將再次提升國家在區域與世界的地位。印度與華府的關係再次緊張，因為她批評美國轟炸越南。同時英迪拉也帶領印度與蘇聯建立親密關係；從印度的觀點來看，蘇聯比西方國家更值得信任。

一九六二年戰爭中，阿尤布汗曾激烈抗議英、美對印度的軍援，宣稱此舉將「擴大並延長衝突」，同時這些武器將會在喀什米爾爭議中用以對抗巴基斯坦。³³²西方不願得罪巴基斯坦這傾西方的東南亞公約組織暨中部公約組織的成員國。³³³

巴基斯坦既是兩個西方防衛條約成員國，又與中國維持親近的盟友關係，地位十分微妙；而印度與蘇聯結盟，無疑將加速原已嚴重的中印衝突。印度政策制定者顯然認為國家需要強大有決斷力的總理，而英迪拉能帶領大家穿越混亂年代中煎熬難解的南亞情勢。她是尼赫魯的女兒，此外還與聖雄擁有相同姓氏（雖然並非親屬）。

同一時間，中國的毛澤東正快速鞏固其權力。一九五九年他在廬山會議清算了部分主要政敵，緊接著各種陰謀角力持續到一九六二年。若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初曾感到抑鬱，那麼同年八月於海濱度假城市北戴河的會議中，馬若德稱為「武裝馬列主義的旗幟」再次「飄揚北京上空」時，這份抑鬱早已消散一空。³³⁴毛將大躍進的災難結果歸罪於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及其他「溫和派」頭上，「我們（指毛本人）持續討論以農業為基礎，但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的四年中……他（毛）的同志並未真正實行。」³³⁵

馬若德指出，最後一次經濟政策被轉為政治鬥爭，正是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提醒他們，接著就是四名資深元老遭到清算鬥爭。」³³⁶同樣模式在一九六二年的北戴河會議中重現。加拿大教授羅倫茲．路堤（Lorenz M. Luthi）認為當時毛澤東「在日常政策制定中，展現了一場精采的重掌權力大戲。他運用這股動力，在中國外交

關係上留下印記」。337他惡毒地譴責新敵人「蘇修分子」，並準備對印度興戰。但軍事行動的籌謀僅在毛澤東信任的追隨者間閉門討論，而沒有提上正式會議。換句話說，計畫之一就是為了邊緣化黨及國家機器中剩餘的反毛派。338邊界區域大量儲存戰爭物資及中國軍隊人數明顯增加，都是在八月二十七日北戴河會議之後幾天的事。339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喜馬拉雅山區戰事正酣，《中國青年報》（中國共青團機關報）刊載一篇文章：「過去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證明了毛澤東無庸置疑的正確性。」340更驚人的是一九六三年一月八日的另一篇文章，毛「任何時刻都比任何人更高瞻遠矚……毛主席看待問題，必然就像站在高樓頂端，俯視著底下街道。每條路、街角與拐彎都逃不過他的眼睛。他怎麼可能迷失方向呢？」341

同時間，中國的反蘇聯宣傳也進入白熱化階段。根據解密的中情局文件顯示：

（一九六二年）九月底十月初，中共發言人宣稱蘇俄共產黨已「放棄」世界革命的領導權……（同時）此領導權自然由莫斯科與赫魯雪夫轉交給北平（北京）與毛澤東，因此看似孤立的共產中國，在此刻獲得了社會主義陣營多數民眾的支持，因此將堅持與蘇聯的「不妥協」鬥爭。342

中情局文件繼續引述十一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社論，北京自稱是「國際共產運動中的最高指導權威」343，而在社論最後呼籲「所有馬列主義者堅定鬥爭現代修正主義」。344一九六二年對印戰爭的勝利，展現中國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大敗另一個亞洲強權。同時也正如預期，中國奪走印度做為亞非新近獨立國家主要代表聲音的角色。

此時正是毛澤東與他信賴的副手，包括妻子江青、國防部長林彪與情報頭子康生，開始清算黨內，並定義中國角色，不只是國際共產運動，更是整個第三世界的領袖。但首先中國需要核彈。

中國對核彈的興趣始於韓戰，當時他們發現美國考慮用原子彈嚇阻如人海浪潮般湧入朝鮮半島的中國志願軍。一九五〇年代初期，中

國在來自蘇聯的科技及技師協助下，已發展出小型武器、火箭與火砲生產。一九五五年一月，毛澤東召開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討論展開核子武器計畫。同年，人民解放軍元帥聶榮臻與中國科學院合作，在祕密地點成立核能研究所，開始發展計畫內容與方針。³⁴⁵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八年間，蘇聯與中國針對核能科學、工業與武器發展，簽訂了六項條約。³⁴⁶

一九五七年，聶榮臻前往莫斯科簽訂條約，蘇聯同意提供核能研究、飛彈發展與航太科技援助，這項承諾包含了核彈原型與相關的飛彈科技。³⁴⁷此時中蘇之間的分歧已在醞釀，但直到一九六一年才公開。不論如何，聶榮臻相信即使缺乏蘇聯協助，中國核能專案也能往前推進。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千百萬中國人處於餓死邊緣之際，另一位人民解放軍高階軍官陳士榘，將四萬名特別工兵調到新疆沙漠的乾涸鹽湖羅布泊，開始興建核彈測試地點。接著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蘇聯政府撕毀六百份中蘇合約，並告知北京將於七月二十八至九月一日間，撤回所有駐中國的一千三百九十名專家。³⁴⁸然而此舉並未嚇阻北京持續發展核能計畫，當時全面改由中國技術人員接手，並以國家軍事經費支應。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國進行第一次核彈試爆。第二次試爆則在隔年五月十四日舉行，緊接著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的第三次試爆。此時中國已躋身核彈強國之列。

關於毛澤東本人對核子武器的態度，長期以來一直有人質疑，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的全球共黨大會上，毛澤東在那場舉世知名的「美帝是紙老虎」演說中是否真的說出：「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六億人，死一半還剩三億，我怕誰去。」³⁴⁹不過二〇一三年三月，中國政府紀錄片頻道央視第九台，播出中蘇外交關係解密檔案的十八集紀錄片，追溯至毛澤東當權時期，在其中一集，毛澤東確實說出這些話。³⁵⁰

直到此時，許多人（特別是中國人）拒絕相信國家領袖如此無情。然而當知名著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的美

籍作者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在一九六五年專訪時問及此事，毛主席本人並不打算否認。「毛並未否認他說過的話，也不希望我為他反駁所謂的謠言（關於千百萬中國人在核戰中存活的能力）。」³⁵¹

一九六六年五月，也就是第三次核彈試爆的同月，毛澤東決定正是發起偉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以此肅清黨內與國家中所有的「反革命者、修正派與走資派」。³⁵²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人民解放軍老將暨總參謀長羅瑞卿遭撤去一切職務，因為他拒絕毛澤東在軍中強化意識型態訓練的主張，而這是毛與國防部長林彪熱烈追求的路線。羅瑞卿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及中央政治局委員楊尚昆都被打成「反黨派」。

整個國家陷入動亂，天天上演批鬥、群體會議甚至殺害毛的假想與實際敵人等事件。年輕好鬥的紅衛兵在鄉間流竄，他們恐嚇群眾，並毀壞寺廟及任何會令人想到革命前歲月的事物。被公開羞辱清算的高層領袖之一，是過去僅次於毛的共和國二把手劉少奇。鄧小平也被鎖定清算，下放到江西的拖拉機修配廠做工；他的兒子鄧樸方遭虐待，被丟出四樓窗戶而導致半身癱瘓，必須終生依賴輪椅。

這些清算鬥爭背後的主謀之一是康生，這名心理變態的鴉片上癮者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就在中共的情報網絡中扮演重要角色。熟悉毛澤東與整個中共領導階層的美國學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曾形容康生「黑暗、邪惡且陰狠」。³⁵³將印度的梅農稱為拉斯普丁確實太過誇大，但康生絕對配得上如此評語。根據李敦白所述：「除了自誇發現外國特務的能力外，康生總是態度疏離……（他）似乎總是戴著隱形的單片眼鏡，以優越及質疑的眼光審視他人。」³⁵⁴

曾一度受尼赫魯信賴、應屬「溫和」的周恩來，也是在中國發動恐怖統治的領導班子之一。在動盪年代中，他確保國家機器仍舊相對穩定地運作；然而在毛澤東的邪惡妻子江青持續挑戰下，周必須保持防衛，時時防範政治突襲。而為了確保自己處於文化大革命的贏家陣營，周恩來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簽署了文件，將劉少奇驅逐出黨。比起

當個精明政治家，周恩來似乎更像是個頂級的操弄者與機會主義者。

355

印度雖然歷經尼赫魯去世後好幾年的不穩定狀態，但與中國比起來，印度政治確實平靜許多，不過一九六二年戰爭也導致印度開始擴編、現代化且重新武裝所有軍隊，並為了北方邊防成立新的山區軍區。根據記者馬哥利斯（Eric S. Margolis）所言：「過往未曾探查的喜馬拉雅山區與拉達克邊境地區，開始了精確的測繪調查。爭議的喀什米爾突然再次成為高度重要戰略區，因為德里憂心中國對此山區省分有所圖謀，或是將巴基斯坦納入對北印度的聯合攻擊中。」³⁵⁶

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或一九六五年印巴戰爭，都迫使印度強化情報蒐集的能力。最終結論是在一九六八年九月，甘地夫人的政府成立新一代對外情報部門，印度內閣祕書處研究分析室（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在特務之間簡稱為RAW。第一任首長是曾任職穆立克軍情局的拉梅許瓦．納特．卡歐（Rameshwar Nath Kao），正式頭銜是印度內閣祕書處研究祕書（Secretary [Research]），這部門是祕書處的一個「處室」³⁵⁷。拉梅許瓦成為印度第一位真正的情報頭子，這組織在他之後數年的領導下，成為世界最大、最活躍的情報機構之一。

同時印度正規軍也正在強化。一九六二年戰後，印度向蘇聯購買四百輛T—54中型坦克車，雖然這在山區無用武之地，卻可以用來對付巴基斯坦。印度向美國購買F—104攔截機的企圖則未成功，因為華府不願得罪盟國巴基斯坦。然而印度早已開始興建工廠，生產蘇聯的米格二一式戰機。一九六三年，第一批米格戰機已加入印度空軍服役。³⁵⁸雖然巴基斯坦仍被視為立即威脅，但「印度領袖逐漸認定中國將成為長期對手。一九六三年，印度開始祕密展開核武研發計畫」。³⁵⁹

印度本土的國防工業是一九五〇年代由梅農擔任國防部長時建立，此時主要透過蘇聯技術專家的協助提升能力。古老的南方駐軍城市邦加羅爾（Bangalore，今日改稱Bangaluru），遠離印度邊境的紛擾，在一九五〇年代被選為本土電子業發展地點。大型研究實驗室如

國家航太實驗室與電子研發基地都設在此。一九五四年，巴拉特電子有限公司（Bharat Electronics Limited）在邦加羅爾成立，成為印度主要的國防電子企業，並於一九六〇年代持續成長。印度斯坦航空公司（Hindustan Aeronautics Limited）於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成立，其前身是一九四〇年成立的印度斯坦飛機公司（Hindustan Aircrafts）。這座在今日被稱為「印度矽谷」的城市，開始成為先進國防工業的發展中心。

雖然在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主流印度經濟以近乎痛苦的緩慢速度成長，但印蘇之間新的友誼關係，卻使印度維持相當先進的國防工業。一九七一年八月，印蘇簽訂《印蘇和平、友誼與合作條約》（Treaty for Peace,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由印度外交部長史瓦朗．辛格（Swaran Singh）與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簽訂。共產蘇聯達成了帝俄所不能及之事，將影響範圍伸進印度次大陸。

然而這卻有一個問題。印度依循其他社會主義及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路線，也獲得蘇聯的優惠支付條件待遇，並以印度製產品交換軍事設備及零件；但同時國防分析師卻認為：「過多的蘇聯設備，降低印度本土自行發展武器或尋求其他供應的動力，疏離了西方供應商。印度也無法將源於蘇聯、印度製造的武器，銷售到國際市場上，因此少了珍貴的軍事收入來源。」[360](#)

印度不難得出結論，蘇聯最終並非可靠盟友，並因此決心強化國家自行發展武器的決心，其中包含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印度的核能工業並非新創，最早在一九四四年，塔塔基礎研究院（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就開始以和平為目標的核能研究，由知名科學家霍米．峇峇（Homi Jehangir Bhaba）與拉賈．拉曼拉（Raja Ramanna）領軍。但在一九六二年戰爭之後，研究內容開始轉向印度的軍事武力發展。隨著鈾從加拿大提供的反應爐中產生後，印度開始生產核子裝置，並於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於拉賈斯坦波卡蘭

（Pokhran）試驗場試爆。雖然號稱為「和平核爆」，但這無庸置疑地表明，在中國首次試爆十年後，印度也有了核子武器的能力。

設立波卡蘭試驗場的主導者，是被視為印度核能計畫之父的拉曼拉。據報導他曾於當年二月說：「我們已準備好搔搔龍尾。」³⁶¹「龍」指的是誰完全無庸置疑。試爆成功後，現場科學家以簡短電話訊息報告總理甘地夫人：「夫人，佛陀終於微笑了。」³⁶²他們刻意將試爆日選在佛誕日這天，因此行動代號稱為「微笑佛陀」。³⁶³

印度不需擔心另一場來自中國的攻擊；事實上，中國在一九六二年戰後的策略是避免與印度發生直接衝突，反過來改採代理人戰爭。印度內部遭遇第一波由中國支持的反政府軍，是鄰近緬甸東北邊境的那迦人反抗軍，其指揮官莫烏．格韋增與其他那迦人一樣是鐵桿基督徒，一九六二年六月他在喀拉蚩的巴基斯坦接待介紹下，認識了共產中國的代表。當中國承諾願意給予那迦援助支持時，莫烏應該相當震驚。巴基斯坦為了避免激起印度的報復，因此能提供那迦反抗軍的援助有限；至於中國則沒有這類顧慮。雖然那迦人都是基督徒，但在擾亂印度上確實是相當有用的力量。

在那迦山地中，莫烏與那迦反抗軍其他領袖討論後，決定接受中國的提議。他們選出帶領第一批那迦武力前往中國的兩名領袖。提諾色里（Thinoselie Medom Keyho）是那迦反抗運動老兵，他在一九五〇年代加入那迦民族議會（Naga National Council）及反抗軍；較年輕的穆瓦哈（Thuingaleng Muivah）來自曼尼普爾，除了基督信仰外，也有受馬克思主義啟發。一九六七年一月，他們經過四個月的徒步跋涉穿越緬甸北部，並在中國邊境受到熱烈接待。在身分確認後他們被帶往雲南騰衝。而提諾色里與穆瓦哈飛往北京，入住北京飯店；跟隨他們同來中國的一百三十人，則留在騰衝附近新蓋的訓練營裡。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提諾色里與所有士兵帶著全新的自動步槍、機槍與火箭發射器，再次跋涉返回印度；穆瓦哈則留在北京。³⁶⁴

第二批那迦反抗軍在一九六八年三月抵達中國，由出身那迦民族議會政治領導群的伊薩克（Isak Chishi Swu）與軍方的莫烏領軍，此

後還有四批前往中國雲南受訓的那迦反抗軍，總數超過七百人。之後那迦山地區域爆發了印度軍隊與那迦反抗軍的激烈衝突。比起只提供舊步槍及少數機槍的巴基斯坦，中國對那迦顯然大方許多。

中國之所以超乎尋常地支持那迦民族議會，是因為考量到那迦人近乎狂熱的基督信仰。他們是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受西方傳教士影響而改信基督教。雖然那迦人抵達中國時正值文革高峰期，卻獲准在雲南訓練營中祈禱、唱詩歌。由於中國需要那迦人進行戰鬥來擾亂印度，這點比宗教信仰更為重要。

繼那迦人之後，其他印度東北區域的民族反抗軍也前往中國。同樣來自以基督徒為主的部落，渴望成立獨立國家的米佐反抗軍，也在一九七〇年代徒步穿越緬甸北部前往中國。第一批三十八人於一九七三年抵達中國，並在雲南及緬甸克欽邦邊界上的板瓦山口（Panwa Pass）對側的固東軍事據點接受訓練。第二批一百零九人則於一九七五年八月抵達中國，在雲南南部的孟海受訓。米佐反抗軍領袖拉爾登加（Laldenga）、外事祕書拉爾明登加（Lalmingthanga）及其他人也造訪中國，並且前去北京，不過他們並非徒步跋涉穿越緬甸叢林，而是從東巴基斯坦飛往中國。³⁶⁵這顯示出中國與巴基斯坦共謀支持印度的部落革命軍。拉爾登加首次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前往中國，這是由中國駐達卡領事館所安排，當時中國已承諾提供軍事援助。一九七〇年九月，拉爾登加再次來到中國會見總理周恩來，並又獲得了支持承諾。³⁶⁶

一九七六年四月，另一群來自曼尼普爾的反抗軍則經由尼泊爾前往西藏，接受中國軍隊指揮官的訓練。如同那迦人與米佐人獲得中國提供的武器，曼尼普爾人在拉薩附近的解放軍基地接受意識型態與軍事訓練。³⁶⁷返回曼尼普爾後，這群武裝勢力開始在因帕爾谷地發動恐怖統治，殺害印度軍警及所謂的「叛徒」。這支命名為「人民解放軍」（顯然受中國正規軍啟發）的新武裝團體劫掠當地銀行，並搶奪警局與其他據點的武器。這支武力在一九七九年組成政治組織，稱為「革命人民陣線」（Revolutionary People's Front），由一九七六

年在拉薩受訓的武裝分子之一比舍希瓦爾．辛格（Nameirakpam Bisheswar Singh）所領導。

根據一九六七年七月七日一份中國機密文件《中國應成為世界革命的彈藥庫》紀錄，毛澤東宣稱：「當前情勢大好。印度的那迦蘭正在與國大黨進行武裝鬥爭。」³⁶⁸毛進而強調緬甸共產黨的重要性：「緬甸的地理條件比越南更好，有更多斡旋空間……若緬甸政府選擇反對我們就更好了；我希望他們能跟我們斷絕正式關係。那樣一來，我們就能更公開支持緬甸共產黨。」³⁶⁹

毛在同場演講中繼續說：「中國不僅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也必須在軍事與技術上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當我們提供武器時，將會是刻著中文的中國武器（除了提供特定區域以外）。我們將公開支持他們；中國應成為世界革命的彈藥庫。」³⁷⁰印度對此當然並不開心，於是發出抗議，並在紐約聯合國前展示從那迦反抗軍收繳刻有中國印記武器的照片。但中國並不在意，因其已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而印度則是敵人。

一九六〇年，周恩來曾在中國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我們熱切期待中印友好關係……並深信中印人民間的傳統友誼將持續閃耀。」³⁷¹然而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黨內報告中，他明確（或許也更為誠實坦白）定義他對中印關係的看法：

蘇修主義支持印度，我們支持巴基斯坦。說到支持巴基斯坦，指的是協助對抗印度的侵略；然而巴基斯坦內政上有錯誤，例如東巴基斯坦的屠殺，也缺乏國家政策。印度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與反動派中的反動頭。因此，我們仍希望在適當時刻，與印度修復正常外交關係，以便進一步推動印度內的人民革命。³⁷²

中國相信，當時席捲印度部分鄉村區域的政治運動「拿撒爾人運動」，或正式稱為印度共產黨（馬列派），將會引發所謂的「人民革命」；至少這是中國領導在那些「印度同志」情況失控、無法達成期望前的想法。

印度共產黨是亞洲地區最大、組織最縝密的共產黨之一，卻在一九六二年戰爭後分裂。印共黨內主流路線譴責中國的攻擊；當時國際共產運動分裂為擁蘇派與少數擁中派，其中多數印共領袖是擁蘇派。一九六四年，印度共產黨（馬克思派）成立，此派的意識型態路線並非完全擁中，認為一九六二年戰爭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

然而印度共產黨中有一派公開擁護中國，並深受毛澤東革命理念啟發。這一派由查魯．馬遵達（Charu Mazumdar）與卡努．桑亞爾（Kanu Sanyal）領軍，兩者都活躍於西孟加拉邦大吉嶺的北部平原。此處的農民起義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爆發。馬遵達與桑亞爾已在此地準備了一段時間，動員茶園農工與貧農進行武裝革命。在當地一座名為拿撒爾巴利（Naxalbari）的村莊裡，一名佃農遭地主無理驅逐時，火花就此點燃。抗議的佃農遭當地主流氓毒打，引發數千位村民手持弓箭與矛頭，占領了土地建物與穀倉；基本上他們將所屬與鄰近村落當作「解放」社區來管理。

約有一萬五千至兩萬名農工參與這場運動，五月底時已達到武裝起義的規模。警察進入當地與農民發生衝突，後者則以從地主那奪來的武器彈藥反擊。中國很快就表達對叛亂的全力支持。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中國官方報紙《人民日報》一則以「印度響起春雷」為標題的社論寫道：

一聲春雷響遍印度大地。大吉嶺地區的革命農民起義反叛。隨著革命團體印度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在印度建立一片革命武裝鬥爭的紅區……無論帝國主義者、印度反動派與現代修正主義者如何合作顛覆與鎮壓，印度共產黨革命者高舉的武裝鬥爭火炬不會熄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吉嶺的火花，將讓全印度陷入火海。[373](#)

同月，印度的準軍事武力進入拿撒爾巴利。發起運動者遭到痛毆或逮捕，或兩者兼具，某些人（如馬遵達）逃走並轉入地下。動亂僅持續數個月，但對許多印度鄉村地區的政治環境帶來了長遠影響，如同蘇曼塔．巴納吉（Sumanta Banerjee）在經典著作《拿撒爾巴利之

後》（In the Wake of Naxalbari）中所寫：「暴露出當權議會左派的政治失敗，並啟動了共黨內部重新思考的過程。」 374

當時印共（馬克思派）是統治西孟加拉邦的聯合陣線（United Front）政府的一部分，對於起義行動予以譴責。留在當地的桑亞爾帶領基進派聚會，討論未來的行動方向。九月，也許是因為受到《人民日報》社論的鼓舞，他們決定透過東巴基斯坦達卡的中國外館與中國聯繫。桑亞爾跨越邊境前往東巴基斯坦，卻沒有成功去到達卡。 375

他們返回西孟加拉邦北部後再次集會，並組成由桑亞爾領軍的四人團隊，取道尼泊爾前往中國。尼泊爾邊界離拿撒爾巴利僅數公里之遙，這小隊可以搭乘公共巴士前往尼泊爾的首都加德滿都。位於加德滿都的中國大使館一開始不願承諾任何事，然而就在館員呈報北京長官之後，當時的大使親自歡迎他們前往中國。這群人甚至可以住在使館內，直到旅行的安排底定。

桑亞爾與小隊成員在大使館員的運送下來到中國邊境，但為了避開移民關卡，他們必須徒步穿越山脈，完成最後一段旅程。另一側，人民解放軍協助他們抵達拉薩附近的軍營。九月三十日，他們搭乘民用客機前往北京，也跟先前的那迦人一樣入住北京飯店，並接受安排會見人民解放軍軍官。根據桑亞爾所述：「大約有十六或十七名指揮官，參與了這場超過兩小時的馬拉松會議。他們巨細靡遺地詢問有關拿撒爾巴利的狀況；希望知道事情怎麼開始，我們有多少武器，以及後續的計畫。」 376

接下來幾週中，毛澤東接見這四位印度毛派，之後就開始了軍事訓練。他們學習如何使用自動步槍、機槍及手榴彈，以及如何設置地雷與製作爆炸物，而現場備有中文與印地文口譯員；他們也學習「毛澤東思想」，並了解該如何運用在印度脈絡中。之後他們被告知勿再聯繫加德滿都的中國使館，但另外建立一條穿越尼泊爾與不丹的路線，以供「未來合作」使用，其中包含武器供應。 377 中國保證會負擔在這條建議路線上建立祕密營地的一切費用。

十二月中，桑亞爾與小隊在中國停留三個月後，便搭乘中國軍車返回加德滿都，接著搭乘巴士回到印度。到了邊界另一側，他們就搭上往新賈爾派古利（New Jalpaiguri）的火車，前往靠近西孟加拉邦北部的西里古里。

一切看來像是印度人民革命的閃亮開始。整個一九六八年，類似拿撒爾巴利的小型衝突在印度不同地區爆發，特別是老革命重鎮，安德拉邦的斯利卡路蘭（Srikalulam）。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就在列寧百年冥誕時，印共（馬列派）成立。九天後，桑亞爾在加爾各答馬坦公園的五月節大眾遊行中宣布成立消息，由馬遵達擔任第一任總書記。印度此刻擁有本土的擁中共產黨，與印共、印共（馬克思派）截然不同，更為基進好戰。³⁷⁸北京廣播電台播放許多來自印度的革命文宣，以及馬遵達所寫的文章摘要。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年的鬥爭高峰期，印共（馬列派）吸引來自各方的支持者，從孟加拉知識分子、鄉村工作者到加爾各答的無產階級流氓。拿撒爾人「消滅」了數百名「階級敵人」，即槍殺或以棍棒毆擊致死。「紅色恐怖」的受害者包含地主、高利貸、警察與貪汙地方官員，或是任何反對印共（馬列派）的人。當時藏身於加爾各答的馬遵達，是這波「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背後推動者，桑亞爾則持續以西孟加拉邦北部鄉村地區追隨者為主，並留在當地。

一九七〇年四月九日，北京廣播電台宣布：「此刻，農民武裝鬥爭之火已經擴散至西孟加拉、比哈爾、北方、旁遮普、喜馬偕、奧里薩、阿薩姆與特里普拉等邦，特別是安德拉邦。」³⁷⁹同年稍晚，印共（馬列派）派遣資深黨工蘇林·波西（Sourin Bose）前往北京會見周恩來及康生，此時中國對印度革命者的熱情已開始消退。據說康生告訴波西，中共無法理解「拿撒爾人」的「消滅」概念，並將之比為一九二七年中共敗退後「左傾盲動主義者」在中國所用的方法。馬遵達提出的口號「中國主席是我們的主席」，也受到周恩來批評。³⁸⁰

由一九六七年反抗行動發起村落得名的拿撒爾人，這名稱廣為印度毛派所知，因為過於基進，就連毛澤東的死忠支持者，瘋狂的康生

都覺得太過。周恩來告訴波西：「我們並未否認（毛）主席是國際人物……（然而）將一國領袖視為他國領袖違反民族情感；勞動階級將難以接受。」³⁸¹

波西經由倫敦飛回加爾各答，帶回來自北京的沮喪消息。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八日加爾各答會議上，印共（馬列派）領袖同意不向支持者透露中國對他們政策的批評，以及黨內將不會得到中國在道德、物質或其他方面的任何支持。³⁸²

倘若桑亞爾能夠控制運動，中國也許或許會持續提供援助，拿撒爾人相當可能因此發展成更強大的力量。但沒多久後，派系鬥爭導致小團體分裂，中國明顯知道拿撒爾人不會成為印度政治的可靠力量，便決定拋棄他們。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六日，馬遵達遭到一位同志背叛，在加爾各答藏身處被捕，並在十二天後死於警方看守所中。印共（馬列派）並未收到任何中國援助；相反地，中國持續支持印度東北地區的那迦與米佐反抗軍。比起那群難以控制的印度毛派，這些人顯然較為可靠。

就在中國決定尋找並支持在印度內部作戰的代理人時，一九六二年戰爭後的印度，也改變對待西藏難民及西藏反抗軍的態度。雖然一九六〇年代印蘇關係逐漸親近融洽，但這並沒有阻止印度國安部門與美國中情局合作，後者自一九五〇年代起就提供西藏反抗軍祕密協助。一九六二年戰爭後，原本在美國科羅拉多州赫爾營受訓的西藏游擊隊轉移到印度，根據西藏歷史學者茨仁夏加所說：「印度在靠近德拉敦的恰克拉塔（Chakrata）建立祕密藏軍基地，藏人一般稱為二十二區（Unit 22）。」³⁸³將近一萬兩千名藏人被送到德拉敦，其中多數人都接受軍事訓練。運動領袖則是位於達蘭薩拉（Dharamsala）上方麥克羅甘己山丘的達賴喇嘛流亡政府。然而，這項運動與其說是對中國占領西藏的直接武力抗爭，最終看來比較像是情報蒐集行動。

反抗行動真正的前線基地，並非在印度內部相對短命的恰克拉塔，而是位於西藏偏遠角落、鄰近邊界的木斯塘（Mustang）。木斯塘由地方封建領主統治，有時被形容為尼泊爾內部的「半獨立西藏王

國」，其三面都被中國占領的西藏包圍。由於陸路難以抵達，因此中情局容易隱藏祕密行動。尼泊爾皇家軍隊士兵鎮守所有通往此處的山區道路及隘口。武器與其他補給品則由C—130運輸機空投，這些飛機從沖繩出發，經過印度領空，在泰國塔克林空軍基地（Takhli airbase）加油。一九六二年戰爭前，空投補給與運送游擊隊進出西藏的美國飛機，都是從東巴基斯坦的隱密機場出發，只能穿越尼泊爾與不丹間，由印度領土形成的狹長走廊。

從軍事角度來看，木斯塘不是個好的反抗基地。由於位於邊界對側，寸草不生、荒涼的藏區幾乎沒村莊可提供反抗軍食物及其他補給，也無法組織對抗中國的起義行動。接著一九七二年一月，尼泊爾新王畢蘭德拉．比爾．比克拉姆．沙阿（Birendra Bir Bikram Shah）登基，並希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隔年十二月畢蘭德拉造訪北京，中國對尼泊爾內部的西藏營地表達不滿。由於面對強大南鄰印度，為了維持相對獨立的立場，畢蘭德拉願意傾聽中國的聲音。中國則回以相對慷慨的援助。

一九七四年五月，尼泊爾與中國政府在加德滿都簽訂貿易協定；七月，尼泊爾軍隊開始針對木斯塘的西藏營地採取行動。未經太多抵抗，他們武裝即遭到卸除；這些人聽完達賴喇嘛的錄音訊息後，士氣幾乎完全消滅，達賴也許是在美國人示意下，請求他們放下武器並離開。

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國務卿季辛吉與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總統這兩位美國重要人物歷史性造訪中國後，美國對西藏反抗軍的支持劃下了句點。縱然華府與北京的意識型態迥異，但在對抗蘇聯上有共同利益，而國家安全政策顯然比意識型態更重要，因此必須犧牲西藏反抗軍。中國同意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諸多前提條件，其中一項就是停止所有對西藏的援助。

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去世，意識型態較不僵化的鄧小平上台前，中國持續支持印度東北的民族反抗運動。鄧小平在文革中被視

為「走資派」，事實上也是正確的，他引入許多自由市場改革，中國經濟因此開始快速成長。

在米佐拉姆，反抗軍與印度政府於一九八六年六月簽訂和平協定，為這塊聯邦屬地成為獨立一邦鋪路。那迦蘭在一九六三年就已獲得類似地位，然而該地與曼尼普爾持續動亂。一九七〇年代末期，舊的那迦民族議會內部爆發對武裝衝突合理性的嚴重歧見，導致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於一九八〇年一月成立。後者的主要理論領導者是穆瓦哈，他帶著混合基督教福音派教義與毛主義革命的奇異思想，由北京返回那迦蘭。不過由於穆瓦哈來自曼尼普爾而非那迦蘭，因此正式主席是來自於那迦蘭奇西里米村的塞馬部落那迦人³⁸⁴伊薩克。

一九八〇年一月三十一日發布的奇妙混雜「宣言」是由穆瓦哈起草，他先引述毛澤東強調革命組織應有「正確政策」，進而讚美「基督徒的上帝，宇宙永恆之神」。宣言中談到：「對吾等而言，我國主權存續及我國人民的救贖是社會主義；而精神救贖則仰賴永恆且無與倫比的基督。」並借用毛的語言，反對多黨體系的想法：「為達致社會主義，革命組織對人民的獨裁統治絕對無可避免。」而革命組織當然是指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並承諾將從「反動派叛徒、官僚、富人與印度毒瘤的階級迫害中」³⁸⁵解放那迦人。這類言語可能並未感動中國，一九七六年後便停止了那迦反抗軍的中國軍事訓練。然而兩者的連結並未完全斷裂。

印度東北唯一沒有任何武裝叛變行動，後來更成為單獨一邦的區域，即是當時的東北邊境特區。原因之一可能是這塊極度崎嶇山地的族群多樣性，過去幾個世紀來，數十個不同部落多半各自獨立。另一個可能的解釋是，西方傳教士從未到達此地。傳教士雖未鼓吹分離主義，但從書面文字、文學與超越泛靈的堅定信仰，進而創造出民族意識。那迦人與米佐人正是前例，他們發展出地方民族主義運動，最終轉為武裝反政府勢力。

東北邊境特區的興起，與兩位截然不同的人物有關：維里爾·艾爾溫（Verrier Elwin）與納里·羅斯通吉。艾爾溫是一名英國傳教士，娶了中印度部落女性為妻，在一九三五年改信印度教，並於印度獨立後成為公民。羅斯通吉則是印度的帕西人³⁸⁶，擔任印度公職多年，是對印度北方邊防有強烈情感的細心官員。艾爾溫是尼赫魯的密友，尼曾為其一九五七年的著作《東北邊境特區哲學》（A Philosophy for NEFA）作序。³⁸⁷艾爾溫在書中主張，即使部落民族居住區域在內部界線之外，治理重點應放在教育與經濟發展，而非孤立。

艾爾溫與羅斯通吉都造訪過整個東北邊境特區。中國掌控西藏後，他們認為刻不容緩的行動，就是在東北邊境特區建立可見的官僚及法院、警局等權力機構。主要人口中心因而開始興建地方政府辦公室、學校、圖書館、診所及醫院，同時還有手工藝訓練機構與營建業。阿薩姆新鋪設通往聯邦屬地的道路，直到一九七二年前，東北邊境特區都還是聯邦屬地。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東北邊境特區總計有一百一十三所小學、十三所中學與三所高中。³⁸⁸有鑑於此地為敏感邊境區域，為強化印度情報網絡，一九五四年印度也從當地諸多族群中的十四個部落招募特務人員，而入選受訓的主要條件是必須受過基礎教育。³⁸⁹

在艾爾溫與羅斯通吉的協助下，東北邊境特區開始初具行政實體運作的雛形；然而阿魯納恰爾邦的基礎，卻是一九六二年戰爭所定下的。羅摩克里希那教團（Ramakrishna Mission）在推動印度意識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個志願組織是由印度聖人羅摩克里希那的首席弟子辯喜上師（Swami Vivekananda）於一八九七年成立。教團遵循印度教古老的吠檀多（Vedanta）哲學，推動社會工作、教育、部落福祉與健康服務等，雖然是私人慈善組織，但在一九六〇年代進入東北邊境特區時，無疑受到印度政府（特別是國安部門）的鼓勵甚至支持。羅摩克里希那教團在整個東北邊境特區成立社區中心與學校，提供印地語及其他基本教育。教團的印度教信仰對中央政府來說，無疑比起進入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丘陵區域的基督信仰更受歡迎。內部界線的規

定不單限制外國人，也限制其他印度人，必須有特殊許可才能進入此區。

印地語在丘陵區域的傳布，並未受到東北所有人歡迎。羅摩克里希那教團活動的副產品，就是印地語取代了阿薩姆語：丘陵居民與來自布拉馬普特拉河谷的官員、商人溝通使用的語言，或東北邊境語（Nefamese），這種各部落民彼此溝通或與平原居民溝通使用的混雜阿薩姆語，逐漸成為部落間的共通語言。早在一九五七年，洛希特邊境分區（Lohit Frontier Division）的部落領袖就曾向阿薩姆邦政府提出一份備忘錄：「學生也許可以在校學習印地語……（但教學語言）必須為阿薩姆語。尊貴閣下應知，本分區七族部落，包含阿博、康堤（Khamti）、艾都（Edu）、米竹（Miju）、迪格魯（Digaru）、米利（Miri）、辛波（Singpho）與藏人，阿薩姆語是彼此間交流思想的主要語言。」³⁹⁰不論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新德里對他們的觀點有多少同情之意，但一九六二年後，東北邊境特區推廣阿薩姆語的動力遠遠比不上印地語。

東北邊境特區過去是阿薩姆邦的山岳區域，在一九七二年轉為印度聯邦屬地的阿魯納恰爾邦，並於一九八七年宣布成為獨立邦，也因此與數世紀來當地人習慣接觸的平原人口漸行漸遠。然而對印度的國安擘劃者來說，東北邊境特區的融合遠比當地人觀感更為重要。新的行政組織以梵文命名，意為「旭日之地」，新首都則定在喜馬拉雅山腳下的伊塔那葛（Itanagar），接近十五世紀由平原區域印度教國王興建的堡壘遺址。

傳統動亂東北區域下的阿魯納恰爾與其他六邦，和印度其他部分透過一條由尼泊爾、不丹與孟加拉包圍的戰略敏感廊道連接，稱為「西里古里走廊」（Siliguri Neck），或另一個廣為人知的稱呼「雞脖子」。這段廊道最窄處僅有二十七公里。一九六二年戰爭後，穩定這條廊道與東北區域的需求變得更加熱切。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美國大使加爾布雷斯會見當時的不丹總理時，得知中國軍隊已在不丹王國周圍聚集。根據前中情局幹員布魯斯·里德爾對一九六二年

危機的分析：「不丹的弱小軍隊無法阻止中國攻擊。若中國將戰線擴大至不丹，甚至更小的鄰國錫金，他們可以輕易南下，截斷印度整個東北區域，包含東北邊境特區及阿薩姆，並連結東巴基斯坦。」³⁹¹

中國在一九六二年戰爭時並無此企圖，然而中國直下西里古里走廊的可能性，始終在新德里國安擘劃者的腦中揮之不去。同時也讓他們更加深信，位於喜馬拉雅山區的兩個孤立小王國，不丹與錫金，對於印度的國防來說有著至高的戰略重要性。

³⁰¹ Brij Mohan Kaul, *The Untold Story*, (Bombay, Calcutta, New Delhi, Madras: Allied Publishers, 1967), p. 438.

³⁰² See D.R.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Bombay: The Tulsi Shah Enterprises, 1968), p. 122.

³⁰³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p. 120. 4.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p. 122.

³⁰⁴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p. 126.

³⁰⁵ Deng Xiaoping stated: 'When the time comes, we certainly will settle accounts with them [the Indians].' Quoted in 'The Politico-Diplomatic Prelude Part-2', P.J.S. Sandhu, Bhavna Tripathi, Ranjit Singh Kalha, Bharat Kumar, G.G. Dwivedi, Vinay Shankar (eds), 1962: *A View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2015) p. 24.

³⁰⁶ Paul M. McGarr, '“India's Rasputin?” V.K. Krishna Menon and AngloAmerican Misperception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1947-1964',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 22, Issue no. 2, 9 June 2011, p. 224, available at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592296.2011.576536> (accessed on 15 May 2016).

³⁰⁷ 譯者注：拉斯普丁（Rasputin, 1869-1916），帝俄時代尼古拉二世時的神祕主義者，深受皇室寵愛而掌握巨大政治影響力，後遭貴族議員合謀暗殺。

³⁰⁸ 譯者注：維辛斯基（Vishinsky, 1883-1954），蘇聯政治家、法學家及外交家，曾擔任蘇聯檢察總長，莫斯科與紐倫堡審判公訴人。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期間為蘇聯外交部長，代表蘇聯簽訂德國投降文書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 309 McGarr, ‘“India’ s Rasputin?” V.K. Krishna Menon and Anglo-American Misperception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1947 - 1964’ , p. 241.
- 310 McGarr, ‘“India’ s Rasputin?” V.K. Krishna Menon and Anglo-American Misperceptions of Indian Foreign Policy Making, 1947 - 1964’ , p. 254.
- 311 B.G. Verghese, ‘50 Years after 1962: A Political Memoir’ , South Asia Monitor, 23 September 2012, available at <http://southasiamonitor.org/detail.php?type=yearsafter&nid=3844> (accessed on 12 August 2016).
- 312 Kaul, The Untold Story, p. 429.
- 313 Quoted in R.K. Bhatnagar. ‘Was Krishna Menon a Sick Man...’ Asian Tribune, 17 October 2009, <https://archive.li/itP4> (accessed on 21 September 2016).
- 314 譯者注：英國駐大英國協國家的最高駐外機構為高級專員公署（High Commission），館長稱為高級專員（High Commissioner）；印度在倫敦亦設有對應機構。
- 315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p. 117.
- 316 Kaul, The Untold Story, pp. 204 - 5.
- 317 Bhatnagar. ‘Was Krishna Menon a Sick Man...’ .
- 318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p. 104.
- 319 Kaul, The Untold Story, p. 451.
- 320 Welles Hangen, After Nehru, Who? (London: Hart-Davis, 1963), p. 242 - 72.
- 321 Jerome Alan Cohen and Shao-chuan Leng, ‘The Sino-Indian Dispute over the Internment and Detention of Chinese in India’ , Jerome Alan Cohen (ed.), China’ s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Law: Some Case Studies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276.
- 322 Cohen and Leng, ‘The Sino-Indian Dispute over the Internment and Detention of Chinese in India’ , p. 274.
- 323 Cohen and Leng, ‘The Sino-Indian Dispute over the Internment and Detention of Chinese in India’ , p. 277.

324 Yin Marsh, *Doing Time with Nehru: The Story of an Indian-Chinese Family* (New Delhi: Zubaan Books, 2015).

325 Cohen and Leng, 'The Sino-Indian Dispute over the Internment and Detention of Chinese in India', p. 277.

326 Cohen and Leng, 'The Sino-Indian Dispute over the Internment and Detention of Chinese in India', pp. 279 - 80.

327 Rahul Karmakar, 'Chinese seek 1962 war memorial', *The Hindustan Times*, 25 October 2010, <http://www.hindustantimes.com/india/chinese-seek62-war-memorial/story-ET0Ivo6MY8sDcmqPMHpidl.html>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6).

328 See, for instance, Ainslie T. Embree (ed.) *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 Prepar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sia Society*, Vol. 3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and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88), p. 99: 'The Chinese invasion in 1962, which Nehru failed to anticipate, came as a great blow to him and probably hastened his death'.

329 Ramachandra Guha, *India After Gandhi: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New Delhi: Picador India, 2012), p. 345.

330 'Light Goes Out in India and Nehru Dies', BBC, 27 May 1964, available at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may/27/newsid_369000/3690019.stm (accessed on 5 September 2016).

331 Gyanesh Kudaisya, 'Nehru: Death of a Democrat', *History Today*, Vol. 64, Issue No. 5, May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historytoday.com/gyaneshkudaisya/nehru-death-democrat>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6).

332 Kudaisya, 'Nehru: Death of a Democrat'.

333 SEATO was set up in 1954 (and dissolved in 1977), and comprised Great Britain, France, USA, Australia, New Zealand, Pakistan,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CENTO, also called the Baghdad Pact, was formed in 1955 (and dissolved in 1979) with Britain, Iran, Iraq, Pakistan, and Turkey as its members.

334 Roderick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12.

335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p. 276.

336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p. 276.

337 Lorenz M.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19.

338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p. 219 and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p. 302 - 3.

339 MacFarquhar,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p. 303.

340 Quoted in a CIA report released in May 2007, 'Communist China's Domestic Crisis: The Road to 1964', OCI No. 1949/64, 31 July 1964, p. 130.

341 Quoted in 'Communist China's Domestic Crisis: The Road to 1964', p. 130.

342 'Communist China's Domestic Crisis: The Road to 1964', pp. 117 - 18.

343 *Communist China's Domestic Crisis: The Road to 1964*, p. 118.

344 'Communist China's Domestic Crisis: The Road to 1964', p. 118.

345 Li Xiaobing,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Army*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07), pp. 151 - 2.

346 Dennis J. Blasko, 'Always Faithful: The PLA from 1949 to 1989', David A. Graff and Robin Higham (eds),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Dehradun: Greenfield Publishers, 2012), p. 252.

347 Blasko, 'Always Faithful: The PLA from 1949 to 1989', p. 252. For the early years of China's nuclear programme, see also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The Chinese Communist Atomic Energy Program',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Number 13-2-60, 13 December 1960 (declassified in May 2004), pp. 5 - 6, available at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1095912.pdf and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348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49 - 198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9), p. 460.

349 Quoted in Peter Beinart, 'How America Shed the Taboo Against Preventive War', The Atlantic, 21 April 2017,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4/north-korea-preventive-war/523833/>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350 Ariel Tian, 'Mao's "Nuclear Mass Extinction Speech" Aired on Chinese TV', Epoch Times, 5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theepochtimes.com/n3/4758-maos-nuclear-mass-extinction-speech-aired-on-chinese-tv/?utm_expId=21082672-12.InTAplP_QWuf9wSnIRJAqg.0&utm_referrer=https%3A%2F%2Fwww.google.co.th (accessed on 20 September 2016).

351 Edgar Snow, 'Interview with Mao', The New Republic, 26 February 1965, available at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89494/interview-mao-tse-tung-communist-china> (accessed on 20 September 2016).

352 See Allan Todd, History for the ID Diploma: Communism in Crisis 1976 - 1989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48, and César Landín, 'Mao's Cult or Personality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what extent did Mao Zedong's cult of personalit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lp him to regain authority over China?', available at http://share.nanjingschool.com/dphistory/files/2013/06/Extended-Essay_February_CesarLandin-2403vg5.pdf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353 Quoted in 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e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eople's Chin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 328.

354 Byron and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p. 328.

355 Gao Wenqian, Zhou Enlai: The Last Perfect Revolutionary, translated by Peter Rand and Lawrence R. Sullivan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7), p. 180.

356 Eric S. Margolis, War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he Struggle for Afghanistan, Kashmir, and Tibe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131.

357 譯者注：印度內閣祕書處研究分析室在行政上隸屬內閣祕書長，因此不受國會監督。

358 Ravi Rikhye, *The Militarization of Mother India* (New Delhi: Prism India Paperbacks, 1990), p. 48.

359 Margolis, *War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The Struggle for Afghanistan, Kashmir, and Tibet*, p. 131.

360 Emrys Chew, 'Globalization and Military-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South Asia: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Geoffrey Till, Emrys Chew, and Joshua Ho (eds), *Globalization and Defence in the Asia-Pacific: Arms Across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58.

361 Quoted in Deepti (blogger), *When the Buddha Smiled on India*, 2 August 2010, available at <http://d-extracts.blogspot.com/2010/08/when-buddha-smiledon-india.html>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See also *India's Nuclear Program, Smiling Buddha: 1974*, available at <http://nuclearweaponarchive.org/India/IndiaSmiling.html>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362 Deepti, *When the Buddha Smiled on India*. See also E.A.S. Sarma, *Will the sparrow ever return?* Undated self-published book, p. 90, available at http://eassarma.in/sites/default/files/Will_the_sparrow_ever_return_17-3-12.pdf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363 For details about India's first nuclear test, see 'Indi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 Smiling Buddha: 1974', available at <http://nuclearweaponarchive.org/India/IndiaSmiling.html>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6) and 'Indi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The Beginning: 1944 - 1960', available at <http://nuclearweaponarchive.org/India/IndiaOrigin.html>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6).

364 Interview with Thuingaleng Muivah at Kesan Chanlam (northwestern Myanmar), 21 November 1985, and interviews with Thinoselie Medom Keyho at Kohima, 18 October 1985 and 24 December 2009.

365 Bertil Lintner, *Great Game East: The Struggle for Asia's Most Volatile Frontier*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India, 2012), pp. 340. The figures and the names of places where the Mizos were trained were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through numerous interviews with Mizo, Naga, and Kachin rebel leaders in the 1980s, 1990s, and 2000s.

366 Vivek Chadha, *Low Intensity Conflicts in India: An Analysis* (New Delhi an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 344.

367 Interview with Soibam Temba Singh (one of the Manipuri rebels who went to Tibet in the 1970s) at Pa Jau, northern Myanmar, 22 April 1985.

368 'China Should Become the Arsenal for World Revolution', Tsai Wei-ping (ed.), *Classified Chinese Communist Documents: A Selec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78), p. 454.

369 Tsai (ed.), 'China Should Become the Arsenal for World Revolution', p. 454.

370 Tsai (ed.), 'China Should Become the Arsenal for World Revolution', p. 455.

371 See <http://www.claudearpi.net/some-documents-on-the-1962-sino-indianconflict> (accessed on 19 June 2017).

372 'Chou En-lai's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December 1971', Tsai (ed.), *Classified Chinese Communist Documents: A Selec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1978), pp. 477–8.

373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People's Daily editorial, see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china/documents/peoples-daily/1967/07/05.htm> (accessed on 15 September 2016).

374 Sumanta Banerjee, *In the Wake of Naxalbari* (Kolkata: Subarnarekha, 1980), p. 118.

375 Bappaditya Paul, *The First Naxal: An Authorised Biography of Kanu Sanyal*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2014), pp. 114–15. Paul's book is based on interviews with Sanyal and has an excellent account of the Naxalbari uprising and its aftermath.

376 Paul, *The First Naxal*, p. 124.

377 Paul, *The First Naxal*, p. 131.

378 編按：至此印度共有三個共產黨組織，印共（一九二五年成立）、印共馬克思派（一九六四年從印共分裂出去）、印共馬列派（一九六九年成立，源自印共馬克思派的親中人士，作者在內文中有時會稱他們為印度毛派）。

379 Deepak Gupta, 'The Naxalites and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 Birth, Demise, and Reincarnation', *Democracy and Security*, Vol. 3, 2007, pp. 157 - 88.

380 Banerjee, *In the Wake of Naxalbari*, p. 264 and Suniti Kumar Ghosh, *Naxalbari Before and After: Reminiscences and Appraisal* (Kolkata: New Age Publishers, 2009), p. 271.

381 Ghosh, *Naxalbari Before and After*, p. 332.

382 Ghosh, *Naxalbari Before and After*, p. 272.

383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since 1947* (London: Pimlico, 1999), p. 359.

384 譯者注：奇西里米村（Chishilimi）位於那迦蘭邦中部的津內伯托縣（Zunheboto），傳統上是蘇米／塞馬那迦戰士部落的根據地，該地那迦人直到基督教傳來之前，長期有獵人頭的習俗。

385 Manifesto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 Printed by the NSCN, 31 January 1980. The manifesto is also reproduced in Nandita Haksar and Luingam Luithui, *Nagaland File: A Question of Human Rights* (New Delhi: Lancer International, 1984), pp. 111 - 38.

386 譯者注：八至十世紀間，一部分堅持信仰瑣羅亞斯德教的波斯人，不願改信伊斯蘭教而移居印度西海岸古賈拉特邦至孟買一帶。這些波斯移民在印度被稱為「帕西人」（Parsi），至今有約十萬人左右，仍信仰瑣羅亞斯德教，主要從事工商業。所有僑居印度以外地區（主要是前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與香港）的帕西人都來自印度或巴基斯坦。

387 Verrier Elwin, *A Philosophy For NEFA* (Delhi: Isha Books, 2009).

388 Bérénice Guyot-Réchar, *Shadow States: India, China and the Himalayas, 1910 - 196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131.

- 389 H.K. Barpujari, 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1873 - 1962, Vol. III: Inner Line to McMahon Line (Guwahati: Spectrum Publications, 1981), p. 287.
- 390 Parag Chaliha (ed.), 'Tribal leaders Memorandum to Governor of Assam: Re-introduction of Assamese Language in NEFA Demanded', The Outlook on NEFA (Delhi: Facsimile Publisher, 2015), p. 49.
- 391 Bruce Riedel, JFK's Forgotten Crisis: Tibet, the CIA, and the Sino-Indian War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India, 2016), p. 118.

第五章 著迷的，也是致命的邊界

西方世界中，甚至是印度次大陸以外的亞洲世界，在一九六三年前很少注意到錫金這國家。這一年錫金大公世子，亦即王儲巴登頓珠南嘉（Palden Thondup Namgyal）與二十三歲紐約大學生荷蒲．庫克（Hope Cooke）的婚禮，從此改變一切。三月二十日，錫金首都甘托克舉行婚禮。荷蒲在兩位佛教喇嘛引領下，伴隨「十英尺長喜馬拉雅號角、低鳴海螺與低音鼓的嘹亮聲響」，步入新郎所在的王室家廟大昭寺（Tsuklakhang）。³⁹²僧侶不參加婚禮，因為婚姻將導向生命與再生，這是佛教宇宙觀避免之事。大廳中點滿油燈，戶外高大竹竿上掛滿西藏祈禱旗。在場貴賓包含盛裝出席的錫金貴族、美國大使加爾布雷斯，以及其他來自新德里的外交使節。

荷蒲在自傳《時光變化》（Time Change）中如此回憶這場婚禮：「在群眾間滿場飛奔的電視與雜誌記者，為眼前的多彩與豐美折服。」此外還記載：

穿著紅色上衣與短馬靴的尼泊爾男性，演奏誇張捲曲的號角；穿著紅外套與條紋及膝裙的錫金衛隊……尼泊爾與錫金婦女則身著不同民族服飾四處穿梭，非常清楚自己對攝影師的影響。聲光令人炫目，帶著錄音器材的電影拍攝團隊，在錫金警察風笛樂隊、印度軍樂隊及演奏鼓號角的村民之間奔波。印度軍樂隊是為此場合特別商借的。³⁹³

十二月二日，婚禮結束不到八個月，頓珠的父親錫金統治者札西南嘉（Tashi Namgyal）去世。頓珠成為新任大公，荷蒲則是他的夫人；但實際加冕仍需等待王家星象師決定吉祥的日期與時間。最後加冕典禮訂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四日上午九點二十二分，比婚禮吸引更多外界注意。安德魯．杜夫（Andrew Duff）在關於錫金的傑出著作中，引用當時在場的英國女士瑪莎．漢米爾頓（Martha Hamilton）所言：「報紙千方百計將錫金浪漫化，《華盛頓郵報》的社論寫著：『美國人很清楚摩納哥因葛麗絲而獨特，現在錫金則因荷蒲而閃耀。』英國

女王伊莉莎白二世與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的賀詞也在正式程序上驕傲呈現。」[394](#)

然而頓珠小心謹慎，因為他很清楚錫金對印度的依賴。在向時任印度資訊與廣播部長的甘地夫人與其他賓客致詞時，他說：「帶著深刻敬意，我們懷念錫金真正可信的友人尼赫魯，也相信印度政府將持續向我們伸出友誼之手。」接著又說：「我們是一個小國，但對自己的制度、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深感驕傲。」強調錫金自身獨特的民族特質。[395](#)

頓珠與荷蒲在一九五九年相識於大吉嶺溫德米爾旅館的酒吧。當時荷蒲還是在學少女，而頓珠則鰥居將近三年，前來此地探望兩名就讀寄宿學校的兒子；他的年紀幾乎是荷蒲的兩倍大，但兩人相互受到吸引。後來荷蒲返回紐約繼續攻讀莎拉勞倫斯學院，兩人仍保持聯繫，兩年後便決定訂婚。一九六三年婚禮燦爛多彩的照片刊登在許多浮華雜誌上（主要是在美國，當然其他國家也有），他們被稱為「錫金的國王與王后」，看似童話成真。西方媒體熱愛這則故事，特別是其中的浪漫場景：喜馬拉雅山區風光明媚的小王國，人民奉行某種密宗藏傳佛教，山中充滿巨型蝴蝶與四百種野生蘭花。[396](#)這儼然就是異國風情的極致，或者說是最糟糕的一面。

然而，錫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地方？是一個獨立王國，就如多數西方文獻偏好的描述方式？或僅僅是尚未完全納入印度聯邦的最後大公國？在一九六〇年代，以上兩者皆不正確。錫金確實曾是獨立王國，版圖也遠較今日來得更大一些。西藏牧民與從事輪耕的絨巴族（Lepchas）從十三世紀開始定居此地，但到了十七世紀才初具國家行政規模。據信首位統治者是彭措南嘉（Phuntsog Namgyal），在一六四二年登基為第一代錫金「法王」（chogyal），而他的先祖來自藏東康區。彭措會同喇嘛讓當地絨巴族人改信佛教，他的政府設有十二位大臣，全部都來自與西藏相關的菩提亞族（Bhutia）；另外十二名絨巴族人則擔任新成立的地方行政機構首長。彭措也是南嘉王朝的創立者，並持續統治錫金直到現代。

部分現代藏學家對這段官方歷史存疑，認為彭措與其繼承者所統治的是一個結構更為鬆散的實體。十九世紀初，英國往喜馬拉雅山區的擴張（亦即威脅到錫金主權），導致他們重新構思錫金歷史，「試圖將錫金定義為一個國家」。397

讀者可自行選擇相信哪個版本的錫金歷史；不過當英國人抵達此區時，錫金確實是獨立王國，並一度包含了今日西藏境內的春丕山谷（Chumbi Valley），向西延伸至尼泊爾的阿倫河（Arun River），向南到西孟加拉邦北部；然而錫金在此的影響力，隨著法王與尼泊爾、不丹的戰爭結果而起起伏伏。大片土地落入尼泊爾廓爾喀國王手中，然而在一八一六與一八一七年簽訂的兩則條約下，部分土地又返回錫金手裡：首先是英屬東印度公司與尼泊爾的條約，其次是英屬東印度公司與錫金法王的條約。

英國人為錫金帶來根本性變化。一八二八年，一群英屬東印度公司職員解決尼泊爾與錫金的衝突之後，在錫金南方高地發現一處適合做為英國軍官與傷員的療養地。七年後，亦即一八三五年，英屬東印度公司從錫金統治者手中取得一片土地，開始興建避暑地，並照當地的時輪金剛寺（藏語Dorjeling，意為金剛之地）命名為大吉嶺（Darjeeling）。經歷與法王的衝突後，英國人取得更多土地，同時更重要的是，這片土地位於英國與鄰近的不丹之間。一八六〇年代初期，今日屬於西孟加拉邦大吉嶺市的區域，全都落入了英國人手裡，其中包含重要的貿易城鎮噶倫堡。

一八六一年，錫東南嘉法王與代表英國的阿什利·伊登爵士（Ashley Eden）在廷姆隆（Tumlong）簽訂了另一則條約，使錫金成為英國事實上的保護國。後續的政教衝突、西藏軍隊入侵，以及中國宣稱對錫金的宗主權，迫使英國於一八八九年正式將整個王國納為保護國。398大吉嶺地區興建道路甚至鐵路，連接到英屬印度帝國的首都加爾各答，而茶葉被引進高地及下方平原種植。

英國工程師兼攝影家，後來更成為作家的約翰·克勞德·懷特（John Claude White），成為首任英國駐錫金政務官，也是首位進駐

甘托克的政務官。他在此建築豪宅，重新整頓行政機構，並主持法王的政務參議會。這幢建築於一九四七年後轉成印度之家（India House），今日則做為錫金邦首長官邸。

在英國的統治之下，錫金地位與其他大公國類似，其統治者被稱為「大公」而非「法王」。正式印度官職名冊中，錫金連同其他十七個大公國，包含傑沙默（Jaisalmer）、阿爾瓦（Alwar）、吉申格爾（Kishangarh）、蘭普爾（Rampur）及不丹，都是十五響禮砲規格的大公國，同時也是英屬印度帝國的屬國。然而錫金是邊界國家，因此英國待之較其他公國略為不同。

一八八九年後立即面臨的問題是，就英國對這區域的設想計畫來說，錫金人口太少（當時僅有約三萬居民），道路建築與貨物運送的人力都不足。³⁹⁹不過這問題有個簡單的解方，即從尼泊爾進口勞力。可能算最嫻熟北方邊界區域的印度官員羅斯通吉指出：「若說英國蓄意而積極操縱尼泊爾移民進入錫金，也許言過其實了；但無庸置疑，在早期，特別是在首任駐錫金政務官克勞德．懷特的治理下，他們鼓勵並縱容移民。」⁴⁰⁰

勞力需求極大，然而錫金人很少願意被徵召，擔任甘托克或其他發展中城鎮的道路或房屋建築工人。而羅斯通吉也注意到，尼泊爾人湧入錫金同時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對抗西藏勢力的明確保證。尼泊爾人多數是印度教徒，語言也以梵語為基礎。他們的文化與生活方式，比起西藏更接近印度……英國人認為，大批基本以印度教徒為主的人口定居錫金，將能避免錫金往北向西藏尋求指引與支持的風險。⁴⁰¹

克勞德．懷特之後的政務官，在鼓勵尼泊爾移民上則較為審慎，然而已經啟動的過程無法停止。更多的尼泊爾人抵達錫金，雖然在二十世紀初人數已超越藏人與絨巴人，但湧入的人潮並未停止，許多尼泊爾人也做起各種生意。一九〇四年榮赫鵬遠征拉薩開啟了西藏貿易，他的軍隊由則里拉山口穿越邊界，後來成為西藏與英屬印度之間貿易交流的主要關口。錫金與較為孤立的東鄰不丹相比，其繁榮程度

截然不同（英國駐錫金政務官同時也負責不丹與西藏事務，雖然西藏是大得多的獨立國家）。

接著迎來的是印度獨立。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五日，「印度總統與錫金大公閣下」簽署協定，「錫金將持續做為印度的保護國，在此條約規範之下享有內政自主。」⁴⁰²獨立印度政府將負責防衛錫金並處理其外交關係，「錫金政府不得處理交涉任何外國勢力……（以及）未取得印度政府事先同意，錫金政府不得進口任何武器、彈藥、軍備或為任何目的、任何描述之戰爭材料。」⁴⁰³

大公一銜獲得保留。然而頓珠即位之時，印度同意他的提議，將頭銜改回舊稱「法王」，他的妻子荷蒲．庫克則稱為王后（gyalmo），正式尊稱為「錫金王后荷蒲拉殿下」，這是動亂的開始。荷蒲的存在帶給錫金更高的國際能見度，她帶著錫金手工藝品到紐約展售，邀請卡名義為「錫金國王王后殿下」。⁴⁰⁴在頻繁造訪美國的行程中，她接受美國記者專訪，暢談自己的喜馬拉雅童話王國。肯塔基大學甚至出版詳細的「錫金王國」地圖。

一九六三年後錫金獲得的國際注意力，以及甘托克王宮傳出的新訊號，對於國際政治情勢也有影響。錫金王家衛隊再啟，行政體系重組為更正式的架構，傳統佛教法治也整合進部分新設的司法體系。新編國歌在典禮中傳唱，國旗在政府建築屋頂上飄揚。⁴⁰⁵各方要求錫金發行自己的郵票與護照，以便海外交易使用，並接受印度以外國家的直接援助。而在政黨之中，擁王派的國家黨（National Party）甚至要求重新審閱與印度簽署的一九五〇年條約。「我們永遠都是錫金人，」國家黨領袖聶吐茨仁（Netuk Tsering）說：「我們不會與印度、西藏、不丹甚至尼泊爾合併。」⁴⁰⁶

印度開始對荷蒲的企圖逐漸提高疑慮。一九六六年，即位後僅一年，荷蒲為當地學術期刊《藏學通報》（Bulletin of Tibetology）所寫的一篇文章，讓這股緊張氣氛轉為憤怒。她認為一八三五年的條約「提供大吉嶺給英國人做為療養地，但並非直接賜予英國人所有」。荷蒲寫道，英國人「自行視為賜予，並開始管理此區……視為

印度領地的一部分」。此說法暗示了大吉嶺屬於錫金，而非西孟加拉邦。她指出，對所有屬於法王等人的土地「只有『使用權』，而非真正所有權」。407

荷蒲可能沒準備好面對文章將激起的反應。根據她本人說法，文章「捅了馬蜂窩。『莎拉勞倫斯女孩宣稱大吉嶺屬於錫金』、『甘托克的美國特洛伊母馬』、『偽裝的中情局幹員』、『美國太太籌劃導彈基地』。印度的反應極盡誹謗，而我很後悔，完全嚇壞了」。408她同時注意到，「之後，當印度報紙寫到錫金希望修改條約時，我的文章就被拋出來做進一步的抹黑。新聞報紙的攻擊似乎早已算計好，在錫金官員造訪德里協商時刊登。」409

荷蒲是無知或只是天真，這點很難判斷，不過她的文章與其他古怪舉動，確實捅穿了馬蜂窩，讓印度完全無法考慮修改一九五〇年條約。此事發生在中國威脅愈顯強烈的時刻，在這種情況下發表關於大吉嶺的文章，並鼓勵那些視為向印度要求更多獨立的嘗試，實在很難找到更不恰當的時機。

然而，印度之家與新德里官員對這些舉動感到不滿，其實並不全是荷蒲的錯。印度記者蘇南達·達塔——雷（Sunanda K. Datta-Ray）雖是法王之友，在其著作《粉碎與搶奪：錫金的兼併》（Smash and Grab: The Annexation of Sikkim）一書中談到：「在暗示國際主權地位一事上，法王或許應有責任；但荷蒲是個外人，就得背負指責。」410況且為這鮮為人知的世界角落帶來國際注意力的，正是荷蒲。

雖然擔憂中國在一九六二年戰爭中，可能會在喜馬拉雅山區打開另一道前線，但實際上錫金邊界並無戰事。然而根據現在已解密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中情局報告，當戰爭在東北邊境特區與拉達克如火如荼時，「印度軍方逐漸對在錫金對側春丕山谷裡集結的中國軍隊感到憂心。」411印度派出軍隊，強化已駐紮於錫金的小型印度武力，此為一九五〇年條約的授權之舉。

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九年間，擔任錫金迪望（dewan，相當於首相）的羅斯通吉，在其著作《著迷的邊境》中提出，位於錫金與不丹之間的狹長西藏領土：春丕山谷，在歷史上是屬於錫金的一部分。「此地住民的語言、服裝與社會習慣，與今日錫金邊界中的人民有高度相關性。」⁴¹²同時，由於氣候較溫和，這裡長期都是錫金統治者的夏宮之地。然而，羅斯通吉寫道，中國在一九五九年入侵西藏後，也「憑藉武力占領春丕山谷，以免錫金人懷有奪回舊地的夢想。中國也『透過委任當地領導人』及中國年輕一代『文化融合』的樂觀情懷，加速『去藏化』的過程」。⁴¹³

羅斯通吉一九五〇年代在錫金所見的「著迷邊境」，在他離去後不久後即轉變成緊張而危險的邊境。第一場與人民解放軍的衝突，甚至發生在一九六二年戰爭之前。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一名人民解放軍巡邏兵闖進靠近則里拉山口的錫金領土。當印度試圖將錫藏邊界視為邊界議題整體討論時，中國則認為此議題「不在討論的範疇中」。⁴¹⁴

一九六二年戰爭後，由於中國在春丕山谷聚集更多軍隊，緊張情勢升高。一九六三年一月，中國指控印度在「乃堆拉山口（Nathu La Pass）的東南、東北與北側」興建地堡、交通壕及崗哨，要求印度應拆除所有建在「中國領土」上的建設。印度則否認指控。⁴¹⁵

事實上是，一九五八年甘托克往乃堆拉山口新建了一條道路，而乃堆拉山口位於則里拉山口以北。當時錫金與西藏的跨國貿易仍持續往來。然而一九五四年簽訂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與印度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到期。當時邊界緊張持續升高，雙方自然都沒有延長協定的意願。所有跨邊交通都停止，邊界也關閉。從此印度軍隊便駐紮山口防衛邊界，同時也監視對側春丕山谷中國軍隊的動向。

中國的挑釁持續到一九六四年。八月，一名中國巡邏兵闖入乃堆拉山口，十二月又有三次中國士兵在山口的錫金側被發現。從八月的第一此闖入事件後，中國發布聲明「否認蘇聯與印度同謀製造的中國

『入侵』錫金謠言」。416這成為此後所有邊界事件的中國標準說法，而一九六〇年代期間，此類事件頻傳。

也許是為了激怒新德里，當一九六三年札西南嘉去世時，中國發送了致哀訊息，並在一九六五年四月頓珠即位時發送恭賀訊息；但都是直接送到甘托克，而非透過印度政府轉送。當時錫金的外交事務是由印度負責處理。此舉被視為承認錫金的獨立地位，並展現中國對錫金做為印度保護國的不滿。417

頓珠即位後幾個月，印巴戰爭爆發；衝突是從年初在古賈拉特邦的卡吉鹽漠（Rann of Kutch）的駁火開始，到六月在英國斡旋下停火而終結。也許巴基斯坦自視占據上風並受到鼓舞，八月初大約有三萬名巴國士兵身著平民裝束，跨越了喀什米爾的控制線，與印度防衛武力的戰鬥隨即爆發，然而多數區域都被驅回巴國。巴基斯坦對此的反應，是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跨越喀什米爾的控制線發動大規模攻擊，轟炸印度機場，行動代號「大滿貫」（Grand Slam）。然而想這樣讓印度軍隊屈服的期望很快就破滅。九月六日，印度軍隊跨越旁遮普的邊境，來到拉合爾的攻擊距離之內。

這場戰爭見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型的坦克戰之一。印度軍隊已從一九六二年敗給中國的打擊裡恢復，此刻擁有更多軍力與武器。雖然巴國軍隊確實占領印度境內的一些據點，但大滿貫行動並不如預期。為了馳援巴基斯坦，中國必須威脅要在錫金開啟另一條戰線。若中國能經由錫金、大吉嶺與西里古里，占據介於西藏及東巴基斯坦之間的廊道，整個印度東北邊境特區將與國家的其他部分失去聯結。

中國開始向北京的印度大使館遞交抗議信，接著是九月十六日的最後通牒。其中宣稱印度軍隊跨越錫金與西藏邊界，並建立了防衛設施。這並非新指控，然而這時間點卻非偶然，若印度不在三天內回應請求，中國將採取行動。信中並未說明三天後將會發生何事，卻是印度無法忽視的挑釁。中國明白表示將「強化邊防，提高警戒意識」，同時「印度政府持續犯行」將會招致一連串後果。418

目標很明確，中國公開將錫金邊界行動連結到印巴持續的戰爭上。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在九月四日訪問喀拉蚩時，宣布中國支持「喀什米爾人民的正義鬥爭」，對抗「印度殘暴統治」。⁴¹⁹部長暗示中國站在巴基斯坦這邊，因巴國僅是對印度的侵略進行自我防衛。

此時聯合國插手干涉，祕書長吳丹（U Thant）與巴國總統阿尤布汗及印度總理夏斯特里舉行會議，中國被迫展延三天的最終通牒。由於巴國軍隊大敗，阿尤布汗無法讓戰爭持續下去，於是中國在九月十八日發出新消息，宣布「願意」將期限延長到九月二十二日午夜。訊息裡透露中國政府「對喀什米爾人民追求自決權的鬥爭……以及巴基斯坦對抗印度侵略的正義鬥爭，表達全力支持」。⁴²⁰

九月二十日，一支解放軍隊伍移入東崔拉山口（Dongchui Lapass），並向該地印度士兵開槍。次日，另一支解放軍隊伍開始向乃堆拉山口的印度據點開火。然而中國向印度發動新一波戰爭的時機已過，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印度與巴基斯坦停火，並將所有士兵撤回八月五日前所擁有的據點；此決議為印、巴兩國所接受，因此中國亦無計可施。北京發布一篇遲來的奇怪聲明，宣稱印度在中國政府指定的時間前已將入侵軍隊撤回，並「拆除了侵略的軍事建設」。然而該聲明接著宣稱，「試圖重返的印度軍隊持續跨越邊界，甚至向中國邊境守衛發動武裝攻擊。顯然，印度利用錫金領土進行無止境入侵、挑釁中國的行為，製造了中國與錫金邊界的緊張。」此聲明繼續提醒眾人「事實」，亦即「眾所周知，印度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向中國發動大規模攻擊」。⁴²¹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印度總理夏斯特里簽署蘇聯斡旋的和平條約時，本來或許能使巴基斯坦給出更多讓步，當然此事頗有爭議。但英迪拉·甘地擔任印度新總理後，則開始明確標誌出新的、更有魄力的印度，她將不再忍受中國挑釁。

中國雖未發動攻擊，但一九六六年七月位於乃堆拉山口對側的中國軍隊，架設了六具強力擴音器，向對面印度駐軍不斷放送宣傳。八月也在則里拉山口架起擴音器，並將超大幅的毛澤東肖像矗立在兩個

邊界山口上，面向印度。這些伎倆對印度的士氣究竟能有什麼影響，著實令人懷疑；但騷擾價值應該更高一些，可能有干擾到部分士兵的睡眠。

中國的小規模入侵持續發生。九月十一日，公開衝突爆發，印度士兵透過擴音器宣布，他們並無意入侵西藏，即便只是一公釐。印度軍隊在宣告之後，開始沿著乃堆拉山口南側邊界架設鐵絲網。接著中國軍隊以自動步槍及輕機槍開火，殺傷了數名印度士兵。印度一側也回擊，中國再以七十六公釐與一百二十二公釐砲加倍回擊。印度亦回以砲擊，殺傷至少三十六名解放軍。

中國外交部發給印度駐北京大使館的信件指出：「切勿誤判形勢，重蹈一九六二年覆轍……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會對任何入侵的敵人予以痛擊。」⁴²²然而印度並未跨越邊境進入西藏，也未離開其邊界據點。中國在乃堆拉山口駁火之後可能理解到，此時情況已經與一九六二年不同。

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至一九七〇年代初期，錫金情勢對印度來說逐漸嚴峻：中國從北方壓境；在喜馬拉雅分水嶺以南的錫金統治者，做出更多尋求自主的動作，造成第二重威脅；在大吉嶺丘陵下方具重要戰略地位的西里古里走廊，則有拿撒爾人活動。錫金菁英階級中的陰謀，讓此敏感區域的情勢更加不穩。雖然荷蒲絕不是某些印度小報所說的中情局幹員，但她與錫金社會格格不入，並且開始有所感受。根據達塔——雷所述：「荷蒲成為喜馬拉雅山區王后的夢想，將法王與王室傳統支持者切割開來，使法王孤立於錫金社會之外。」⁴²³

荷蒲必須與另外兩名深具影響力的女性競爭地位。一位是頓珠的長姊庫庫拉公主，另一位是倫珠·多吉（Lhendup Dorji）的蘇格蘭妻子伊麗莎——瑪利亞·蘭佛——瑞（Elisa-Maria Langford-Rae）；倫珠·多吉來自古老的絨巴家族，是當地地主兼政治家。納里·羅斯通吉觀察到，「庫庫拉公主認為荷蒲是她掌握法王的競爭對手；而荷蒲很快就明確展現出，身為王后的她才是第一夫人。」⁴²⁴荷蒲與有力美國參議員的聯繫，促使庫庫拉要向其弟證明，「她也是國家的忠誠

守護者。但其向媒體界的發言，只是讓法王與印度官方已然不佳的關係更加惡化。」 425

當印度記者開始猜疑荷蒲或許與中情局有掛勾時，他們忘了庫庫拉在二戰時就結交了加爾各答的美國幹員。當時二十歲出頭的她所認識的幹員，此時可能早已退役。她在美國的主要成就，或許是安排兩位錫金婦女代表國家，出席一九六七年於紐約舉行的世界聯合婦女會議（Associated Country Women of the World），不過這對多數美國人來說並不算什麼大事。

但印度懷疑美國對錫金可能有所圖謀，則不能僅視為小報八卦消息。一九六四年中國首次核彈試爆後，一次最奇特的印美聯合情報行動在喜馬拉雅山區展開。根據計畫，要在北印度標高七千八百一十六公尺的南達德維峰（Nanda Devi）上，設立一組由核能電子發動機驅動的陸地通訊設備，蒐集西藏或新疆任何不尋常的地震活動。這具發動機名為19—C型核能輔助動力系統（System for Nuclear Auxiliary Power）包含五個部分，一個熱能源區塊、輻射能源膠囊置於核心、熱電發動機從上包圍、隔熱材料，以及外殼。 426

這並不是炸彈，而且若不裝上引信就不會爆炸。但這具設備是以輻射物質提供動力，可能會對接近的人類造成傷害，因此不該遺失在偏遠山巔的某處；結果居然還是發生了。首次攀登南達德維峰時，由於天候惡劣，大多數的設備都被拋棄。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發動機依然消失在山脈範圍中。

印度與美國合作情報行動，以及對支持西藏反抗軍的興趣，在此事件後快速消失。美國可以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但印度卻對挑釁北方近鄰的後果感到憂慮。中國涉入那迦蘭的戰爭與對拿撒爾人起義的興趣，都是印度無法忽視的警訊。縱然達賴喇嘛與流亡政府獲准留在麥克羅甘己，但印度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削減對西藏武裝反抗的支持，因此尼泊爾的木斯塘才會取代北印度的恰克拉塔，成為美國支持的西藏游擊隊重鎮。

隨著印度對中國採取更務實的態度，同時跟蘇聯建立起親近關係，錫金並非不可能成為美國在喜馬拉雅山區新的任務基地（特別是錫金若能爭取到更多自主權）。我們很難定論這些憂慮是否有所本，然而這確實影響了印度面對錫金爭取自主的態度。當然荷蒲也是個問題，這名自詡為「王后殿下」的天真美國女性，顯然是反對印度。

然而荷蒲的寶座並不穩固，甘托克王宮中持續不斷的陰謀鬥爭，進一步弱化了她的權力與影響力。比起大姑庫庫拉公主，荷蒲更強大的敵手是蘭佛——瑞。蘭佛——瑞的先生握有貴族頭銜卡齊（kazi），因此她享有查功卡齊尼（Kazini of Chakung）的頭銜。查功位於錫金西部，是蘭佛——瑞夫家的故鄉。卡齊是一群對錫金「古老選舉體系」不滿的團體，因此在卡齊尼從旁支持下（更多是在背後使力），倡議更為民主的政治秩序。⁴²⁷

一九五三年，頓珠之父札西引進溫和的君主立憲制，設立了國務院與行政院。然而此體系是透過政黨比例分配，國務院的席次在菩提亞——絨巴人與尼泊爾人社群間平均分配。這表示在憲法上，大約占全國人數百分之七十五的尼泊爾人與百分之二十五的菩提亞——絨巴人權力相當。一九五八年，這個複雜的投票體系被更複雜的方式取代；一九六七年，國務院席次由十八席增加至二十四席，然而新增的六席均由法王提名。⁴²⁸

這套不民主的體系招致許多反對，反對運動更獲得印度支持，箝制了法王、美裔王后及民族主義貴族支持者的力量。一九七三年一月的選舉爭議中，支持王室的國家黨贏得十八席中的九席，印度更進一步涉入錫金事務。兩個敵對政黨之一，卡齊的國大黨（Congress Party）宣稱有選舉舞弊，要求逮捕負責選舉的官員。當要求未果時，甘托克發起了反對法王的示威抗議，部分過程相當暴力。之後臨時解決方式的共識在五月達成，法王、印度外交部長克瓦爾·辛格（Kewal Singh）與政黨代表同意新的民主制度。在協議中，統領行政事務的行政首長將是印度人。⁴²⁹

王室權力快速崩解，而頓珠與荷蒲的婚姻也是如此，雙方都有不忠情事。八月十五日，荷蒲帶著兒女飛往紐約，而當時甘托克正在歡慶印度獨立紀念日，一切已成定局。一九七四年第一次真正民主的選舉中，卡齊的國大黨奪取新議會三十二席中的二十九席，大敗國家黨，議會在五月開議時通過的首批決議之一，即是削減法王權力。六月，部分錫金王室衛隊成員試圖阻止當選議員進入議場，但並未成功。九月四日，印度國會的下議院投票通過，將錫金變更為其「附邦」（associate state）。

北京視此為印度接管錫金之舉，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日於聯合國大會的演講中，大肆撻伐印度，同時也抓住這機會譴責蘇聯：「印度政府兼併錫金，已激起錫金及印度人民的反抗，並受到印度鄰國與世界的輿論譴責。僅有蘇聯的宣傳機器讚美印度，這正顯示了蘇修派社會帝國主義是印度擴張主義背後的指使者。」⁴³⁰

卡齊上任錫金首位民選行政首長後，卡齊尼從旁協助，一切事件快速推進。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錫金議會決議廢止法王，頓珠被實質軟禁在宮殿中。四天後舉行了一場公投，最終絕大多數人投票贊成錫金與印度合併。四月二十三日，印度下議院投票通過讓錫金成為印度聯邦的第二十二邦，於五月十六日生效。

可想而知，中國政府譴責這項行動，在四月二十九日發出聲明：「再次嚴肅聲明，中國絕不承認印度兼併錫金，並全力支持錫金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對抗印度擴張主義及捍衛國家主權的正義鬥爭。」⁴³¹

然而所謂「錫金人民」的「鬥爭」並不多。錫金與印度相對平穩的合併過程，約莫與印度對外情治機構——研究分析室的崛起同一時間。隨著反對法王的聲浪高漲，研究分析室派出幹員前往當時錫金四縣首府：甘托克、曼甘（Mangan）、南其（Namchi）與加爾辛（Gyalshing），除了蒐集情資外，也開始從幕後支持反對勢力。⁴³²根據研究員阿蘇卡·拉伊那（Asoka Raina）所述，研究分析室的幹員與當地反王室、支持民主代議政府的人民建立了緊密關係。⁴³³研究分析室不需花太多力氣，就能強化法王必須下台的想法，而且錫金的民

族組成也對舊王室高度不利。根據一九七一年人口普查，尼泊爾人占了絕大多數的十三萬四千人，絨巴族僅約兩萬五千人，而菩提亞人與相關的林布族（Tsongs）則約有兩萬三千人。⁴³⁴

儘管不費軍事干預就達成目的，與錫金合併僅被視為印度國防提升的第二大重要成就。第一大成就則是一九七一年相對血腥的孟加拉獨立建國。印度支持孟加拉解放軍（Mukti Bahini）發起的自由抗爭，從東巴基斯坦脫離獨立建國。研究分析室視此為鞏固國家東方邊界的寶貴機會，其中包含重要的戰略地點：西里古里走廊及通往西藏邊界的錫金走廊。

印度介入戰爭後，根據倫敦《泰晤士報》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報導：「印度軍隊僅花了十二天就長驅直入達卡。這項成就令人想起一九四〇年德國閃電進攻法國。戰略是一樣的：速度、強度與彈性。」⁴³⁵十二月十六日，巴基斯坦軍隊投降，並在國際壓力下，被迫於一九七二年一月八日釋放自由抗爭領袖謝赫．穆吉布．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他在一九七一年三月遭捕，之後被送往西巴基斯坦單獨監禁。此刻，拉赫曼由英國皇家空軍送回達卡，面對百萬人民的等候迎接。東巴基斯坦終於成為獨立國家孟加拉。

德里的情治單位也透過孟加拉行動，鎖定逮捕了以達卡為基地的印度東北地區反抗軍領袖。其中包含曾與穆瓦哈共同領導第一支那迦小隊前往中國的提諾色里，以及那迦民族議會高層領導之一的涅德里（Niedelie）。米佐反抗軍領袖拉爾登加當時也以達卡為基地，卻成功帶著一些人穿越邊界逃進緬甸；後來透過設在緬甸若開邦首府實兌（Sittwe）的巴基斯坦領事館，前往喀拉蚩。

失去了前東巴基斯坦基地，使米佐反抗軍接受一九六八及一九七〇年拉爾登加造訪北京時，中國所提的支持條件。一九七三年初抵達中國的第一批米佐反抗軍，是在一九七二年中離開米佐山地，循先前那迦人的途徑，徒步跋涉穿過緬甸克欽邦，最後抵達雲南。等之後孟加拉與印度反目，米佐人與其他東北區域反抗軍，才重新在孟加拉的吉大港山地群中建立訓練營與藏身地。然而此時印度的研究分析室已

在所有周邊國家廣布幹員與線人（不論親印或反印的執政黨），其中當然包括孟加拉。

研究分析室在一九六八年成立時，第一批幹員是來自印度情報局的外事科及警察系統特別單位。首任室長拉梅許瓦．納特．卡歐曾任殖民地帝國警察（一九四七年獨立後改稱印度警政署）。隨著研究分析室成長，更多人員由警政、軍隊及公務部門招募而來，更有許多印度大學畢業生。基本上，研究分析室兼具傳統建制與現代發展。

相比之下，中國的情治單位是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勝利前風雲動亂的數十年中，隨著毛澤東的革命奮鬥而形成。一九二一年七月最後一週，毛澤東與十一名同志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現為興業路）一棟不起眼的灰磚建築中，發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當年的上海分成三區，各自有其行政與執法機構。法租界警戒較為鬆散，因此是一群異議分子在城裡集會的最安全地點。英、美主導的公共租界，是由印度引進的錫克教警察嚴密控制並巡邏街道。上海的中國人區則是在國民黨手中，雖然當時並非共產黨的敵人，仍是無法真正信任的敵對勢力。

直到一九二七年前，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際組成「革命統一陣線」，然而兩者關係早在一九二五年孫逸仙去世後就開始變質。接續成為國民黨最高領袖的蔣介石是堅定反共者，他與上海青幫暱稱為「大耳杜」的杜月笙、人稱「黃麻皮」的黃金榮及其他黑幫分子過從甚密。黃麻皮同時也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長，因此得以不受法律約束從事犯罪行為。相反地，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都市無產階級中吸引了許多追隨者。上海當時是中國最工業化的都市，根據馬克思理論，應當成為共產黨的主要權力基礎。

共產黨的影響力愈來愈大，開始威脅到國民黨對上海政權的微妙掌控。大耳杜為了幫助老夥伴蔣介石，動員自己與黃麻皮的數百名手下，其中包含打家劫舍、偷拐搶騙、保鏢殺手、皮條客、乞丐小販等三教九流，他們穿著藍衫，臂上纏著中文「工」字布條，所持的槍枝則是由蔣的司令官提供。

攻擊行動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天亮前一小時發動，這群暴徒攻擊當時共黨工人民兵總部所在的建築。建築周圍的藩籬遭到一陣機槍掃射破壞。其他共黨辦公室與建築也遭到攻擊。當天結束時，共有七百名工會人士遭殺害，出動了八輛卡車，花費數小時才清運所有死者與遺留物品。國共合作隨之結束。[436](#)

一九二七年在上海的血腥鎮壓令共產黨傷亡慘重，也迫使中共將主要行動區域從城市移往更多中國人民居住的農村地區，因此這將是一場農民革命，而非由都市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鬥爭。事實上後者的人數也並不足以奪取中國政權。

南昌起義中，有部分國民黨軍隊叛變，加上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國工農革命軍（人民解放軍前身）的成立，讓中共獲得重生。雖然其主要根據地在農村地區，仍必須仰賴城市地區蒐集的情報，但一九二七年的鎮壓及共產黨的掙扎求生，都強化了中共的情報蒐集能力。

根據中國研究學者大衛．錢伯斯（David Chambers）所述，艱困的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情報蒐集能力在維護中共免於滅絕上，確實扮演了重要角色。可靠的情報確保共產黨人成功從江西突圍，展開一九三四年的長征；同時還滲透國民黨軍政組織，以致最終成功奪取政權。[437](#)當然，黨內異議聲音也受監視，並在黨中形成恐懼氣氛。

在一九四九年共黨取得政權前，中共擁有兩個情報機構：中共中央社會部與情報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六年間，這複雜的情治安全體系由惡名昭彰的康生統領；然而他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發動的「整風運動」，被毛澤東與其他黨內高層發現對黨內造成的傷害後，隨即遭到解除職務。康生發動的整風運動在一九四三年特別惡毒，關押了上千位被指為「特務」、「間諜」者，其中不乏建黨時的著名知識分子。結果約有四萬至八萬名黨員遭驅逐出黨，許多人神智不清，有些人上吊或投河、投井自殺。[438](#)

雖然不再擔任情報頭子，康生在共黨取得政權後，仍是毛澤東信任的核心集團成員兼主席親信。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國新統治者成

立了公安部，這個新的單位理應接掌社會部的國內偵防與安全職責，令後者即被廢止。然而事實上，直到一九五三或一九五四年之前，社會部仍持續在中國內部運作。

由於整個體系變得過於龐大而難以施展，因此一九五五年又成立了中共中央調查部，做為主要的文職情報機構，而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則負責軍事情報任務。兩者之上的統籌單位是鮮為人知的中共中央情報委員會。⁴³⁹

在這些全面性變革之前，又是另一波中共黨內的清算鬥爭。曾因情報偵察長才，被毛澤東譽為「延安福爾摩斯」的陳泊，被指控為英國間諜與國民黨特務，在一九五〇年被撤銷廣東省公安廳長一職，並監禁超過二十年。楊帆曾負責蒐集情資，協助一九四九年五月相對和平接管上海，後續更負責上海市的反情報工作，卻於一九五一年遭撤銷職務，並被指為國民黨特務，他在一九五五年入獄，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被釋放。前任中共情報副手的潘漢年，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曾領導對抗國民黨的情報行動，並在二戰期間對抗日本，一九五五年時遭逮捕，被指為國民黨與日本間諜，在一九七七年死於獄中。根據錢伯斯所述：「（潘漢年）是這波情治系統清算的頭號受害者，約有八百至一千名幹員遭到強制轉職、貶職或長期徒刑關押，有些人自殺以逃避審訊。」⁴⁴⁰

也許是害怕一九四三年整風清算下的黨內高層幹員反撲，康生在中共取得內戰勝利後曾一度退出公眾領域，因此逃過了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權力鬥爭。後來他在一九五六年重出江湖，掌控「外交事務」，會見外國兄弟黨的代表，並前往海外訪問。他第一次出國訪問是在三月，以中國代表團長身分前往東德，參加主政的社會統一黨（Socialist Unity Party）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在國內經常安排與毛澤東同行，康生因此重新獲得接近主席的機會，接著成為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策劃者及最殘暴的審訊者之一。他甚至在中央調查部內掀起一波徹底整肅。中調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改由軍隊接管，兩年後再由中國軍事情報機構吸收。

康生在混亂持續中愈發狂亂，整肅時指控許多過去與現在的「罪行」，例如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對日戰爭中的日本特務，或近年的蘇修特務，抑或包庇隱藏美蔣特務。⁴⁴¹當時中央調查部實際領袖鄒大鵬與身為資深情報幹員的妻子寧願自殺，也不願承受一九四三年整風運動中康生人馬所施行的審訊方式。上海公安局超過一千名幹員遭關押，其中有一百四十七人在所謂的「歷史犯行」調查中遭殺害⁴⁴²，而這數字相當於許多國家特別警力的總額。

看似如此昏庸、歷史錯綜複雜的國安機制，究竟是如何在一九六二年戰爭前後，針對印度邊界（甚至邊界以外地區）蒐集如此詳盡的情資？這至今仍舊是個謎。戰前印度的情報體系較為傳統，比起中國同儕，正如高爾准將所描述的「相對不利」。⁴⁴³不過毛澤東確實成功了，很可能是因為對他而言，成為中國與第三世界領袖同等重要。此外，印度不只是地緣政治的對手，更是敵國，這個國家在一九五九年提供達賴喇嘛政治庇護，並允許達賴在麥克羅甘己成立基地，持續倡議西藏獨立。面對印度，確實有必要做好情報蒐集工作。冷靜思考占了上風，因此有別於中共黨內指控敵人（不論真實或「假想」）的狂亂發展；當時後者正排山倒海地撕裂共產黨組織。

除了較傳統的情報組織外，負責情報蒐集任務並代表政府直接進行顛覆工作的重要角色，是由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所扮演。中聯部以地理區域劃分成十個不同局處，其中第三局負責印度、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尼與馬來西亞。⁴⁴⁴根據解密的中情局報告，其最早任務包含「進行尋找、調查，最終支持傾中分裂團體與不滿者，鼓勵他們組成所謂的『馬列主義』政黨，對抗傾蘇『修正主義』政黨。」⁴⁴⁵中情局認為，中聯部在此任務上「提供資金協助有望的團體持續活動，並針對可能獲益的區域，在中國境內提供政治與組織訓練」。⁴⁴⁶

文化大革命前，中聯部活動由鄧小平、彭真與劉少奇督導，這也表示其領導階層在一九六〇年中後期遭整肅一空。此後，中聯部由康生及其妻曹軼歐聘任並控制的一群解放軍接管；曹軼歐在意識型態上

的瘋狂程度，與康生可說是不相上下。根據中情局報告，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幾位在文革時失蹤的老將重返舞台後，新的中聯部才逐漸成形。當康生指派管理中聯部業務的申健遭到撤換之後，中情局注意到：

不久後康生的消失留下權力真空，並由北平（北京）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耿飆填補。他在一九七一年一月返回中國，三月獲提名為中聯部部長。這段期間，中聯部的軍管影響力也被削弱了。[447](#)

「新的」中聯部崛起於文革氣焰逐漸消散、中共內部更多派系鬥爭爆發之時。一九六九年三月，在中蘇烏蘇里江衝突後，毛澤東的左右手林彪正處於權力顛峰，他也是知名小紅書《毛主席語錄》的發起人，在文革中占有主導地位。然而出乎多數世界觀察家意料，林彪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突然於蒙古墜機死亡。事件實際經過依然成謎，然而在官方說法中，林彪偕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與六名部屬發動反毛政變，在失敗之後欲潛逃蘇聯。

傳說的陰謀與墜機實際發生的狀況，時至今日依舊不明，而中國官方說法是因飛機燃油耗盡。根據陰謀論者的觀點，飛機是被俄國或中國軍隊發出的火箭擊落；然而蒙古情報單位在墜機後，透過蘇聯專家協助做出的報告顯示，主因是駕駛員操控失當。據了解，飛機的三架引擎在墜毀前並未受損，倘若是因射擊墜落，則應當有損壞；飛機以時速五百至六百公里速度墜落地面，結果造成爆炸及「長時間」火災燃燒。報告認為飛機上應載有大批燃油。[448](#)

就在此時，印度干預東巴基斯坦事務，最終導致孟加拉建國。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伊斯蘭馬巴德當局在這場撕裂巴基斯坦的戰爭中，僅獲得北京的有限支持。根據另一份解密的孟加拉戰後中情局報告所述：

事實上，一九七一年中國為巴基斯坦所做的，遠少於一九六五年的印巴戰爭。這次中國並未在中印邊界上進行轉移焦點的行動。比起一九六五年，他們的邊界巡邏相當低調，避免移動轟炸機進入西藏，對於所謂的印度侵略，只做了形式上的事後抗議。中國以此方式減低

印度對中國侵略的顧慮，因為中國認為印度的顧慮，可能導致新德里允許蘇聯在南亞扮演更重要的角色。[449](#)

中國不採取行動的另一種解釋，很可能是因為內部問題。北京領導圈對林彪突然的死訊感到震驚，毛澤東本人因得知視為接班人的林彪極可能背叛了自己，據說變得相當憂鬱且閉門不出。接著毛澤東轉向他的舊同志，他過去曾厭棄的極左派。三十八歲來自上海的王洪文抵達北京，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此時毛已經病重，無法視事，主要由其妻子江青掌控權力，又帶進了宣傳專家張春橋與姚文元，後來這四個人被稱為「四人幫」。他們認為鄧小平及其溫和主張（從中共觀點來看），是他們掌權的主要威脅。鄧小平被要求進行一系列自我批評，承認許多思想錯誤，而毛澤東站在妻子與三位同夥這邊，要求中共中央委員會「徹底檢討鄧的錯誤」。[450](#)

此時，隨著革命老兵逐一離世，中共高層領導人正大批凋零。首先去世的是惡名昭彰的康生，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死於膀胱癌。在葬禮上，官媒大肆褒揚他是「無產階級革命者、馬克思理論家與光榮的反修鬥士」。[451](#)

周恩來與毛澤東因為過於虛弱而無法出席葬禮。之後周恩來先走一步，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過世，死因也是膀胱癌。毛澤東缺席葬禮，而正在重掌權力的鄧小平在一月十五日的國葬中發表演說。康生之死或許沒有太多人哀悼，但四月時有大批群眾齊集北京天安門廣場，他們追悼周恩來，並公開地批評四人幫，因此也間接批評了毛本人。這場少見又未經許可的公眾抗議，後來被警力與趕來的軍隊鎮壓。

接著輪到毛澤東了，他死於同年九月九日。毛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五月二十七日接見巴基斯坦總理阿里·布托。老主席去世後，他的官方肖像懸掛在天安門主門上，標旗上寫著：「繼承毛主席遺志，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452](#)

老主席死後，必然發生的劇烈權力爭鬥緊接而至，最終鄧小平重返舞台。毛澤東任命其忠實的追隨者華國鋒為接班人，然而他實在過

於軟弱，無法統合分崩離析的共產黨。首先遭到攻擊的是四人幫，他們在年底前就遭到整肅、逮捕，後來接受審判。

文革以來不斷上下權力舞台的鄧小平，終於在一九八〇年成為強人。趙紫陽在一九八〇年取代華國鋒成為總理，次年黨主席一職則由胡耀邦取代，這兩人皆是鄧小平的支持者。胡耀邦釋放了三百萬在文革時期受迫害者；趙紫陽則是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啟動開放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推手。至此，意識型態僵硬與政策狂亂的毛澤東時代看似結束。

鄧小平上台也帶來中國外交政策新局。三個世界理論仍舊活躍，但此時有不同的定調與重點。「中國雖是大國，但從未追尋在第三世界的特殊地位。中國並非第三世界領袖，現在與未來都不是，因為此舉將和中國與外國交往的原則相牴觸。」⁴⁵³此刻中國尋求與更多國家建立友誼關係，這與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大相逕庭。根據毛的理論，只要共同敵人是蘇聯，中國可與資本主義國家結交往來；若「世界人民彼此支持正義鬥爭⁴⁵⁴……所有國家人民都奮起。對抗美帝主義與蘇修主義鬥爭的新歷史階段已經開始」。⁴⁵⁵

懷疑論者也許會爭論，鄧小平治下的中國開始懷抱成為全球政經強國的渴望，而非世界「受壓迫大眾」的革命模範。中國對亞洲革命運動的支持，已讓位給商業合作與貿易協定。鄧小平確實體現出他在文革中的「走資派」形象，並開始將中國以農民為主的社會，逐漸轉向工業化社會。

印度與如此難以預測、變化無常的鄰國交往時，必須保持冷靜。這國家可以從建國初期的革命好戰，轉成文革年代的全然瘋狂，接著卻是割喉資本主義。一九六二年戰爭及其後續，僅是中國在世界政治地位概念上轉變的徵兆，正如毛澤東本人所說，與邊界爭議毫無關係。

這段期間的錫金，中印之間的情報戰方興未艾。然而一九六〇年代的衝突歲月已經結束，印中開始談判邊界貿易的可能性，最終於二〇〇六年六月簽署了一項歷史性協定：允許邊界貿易。七月六日，就

在邊境關閉四十四年後，乃堆拉山口重新開放邊界貿易。協定內容允許居住在兩國邊界區域的居民，交易一九九一、一九九二及二〇〇三年中印邊界貿易協定中允許的二十八種商品。⁴⁵⁶商品清單自簽訂後經過數次修正，但仍侷限在部分品項，而且貿易也非全年放行。雖然如此，大量的中國消費性商品仍湧入錫金、西孟加拉邦及印度東北各邦市場。即使在接近中國邊界的達旺或阿魯納恰爾邦，中國商品也從錫金轉運而來。

不單是中國的貿易，還有觀光業、木屋產業與在地創業，結合新德里中央政府豐厚的補助金，為錫金帶來了繁榮。錫金雖是印度最小的邦及屬地之一，但每人平均國民生產毛額是全國第三高，僅次於果亞及德里。錫金人識字率是百分之八十二點二，也是全國最高的區域之一，並且遠高於全國平均值的百分之六十八點九。⁴⁵⁷在甘托克，常能看到汽車後車窗懸掛舊錫金國旗，然而邦裡並沒有分離主義運動。就連頓珠與荷蒲的女兒，荷蒲·李珠（Hope Leezum）也由紐約返回錫金嫁給當地人。他們住在甘托克，協助管理負責經營王宮與舊王室家廟的大昭寺信託基金（Tsuklakhang Trust）。

³⁹² Andrew Duff, *Sikkim: Requiem for a Himalayan Kingdom* (Gurgaon: Random House India, 2015), p. 105.

³⁹³ Hope Cooke, *Time Change: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0), p. 107.

³⁹⁴ Duff, *Sikkim*, 2015, p. 117. ‘Monaco touched by Grace’ refers to Grace Kelly, the American actress who married Rainier III, the prince of Monaco and thus became the princess of Monaco.

³⁹⁵ ‘Speech from the Throne of Denjong Palden Thondupo Namgyal’, available at <http://sikhim.blogspot.com/2009/04/april-4-1965-coronation-of-last-king.html> (accessed on 5 October 2016).

³⁹⁶ See, for instance, Sunanda K. Datta-Ray, *Smash and Grab: The Annexation of Sikkim* (Chennai: Tranquebar, 2013), p. 93.

³⁹⁷ Saul Mullard, *Opening the Hidden Land: State Form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ikkimese History* (Leiden: Brill, 2011), p. 186.

398 'Ainslie T. Embree (ed.), 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 Prepar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Asia Society, Vol. 3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and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 1988), p. 466.

399 Nari Rustomji, Sikkim: A Himalayan Tragedy (New Delhi: Allied Publishers, 1987), p. 10.

400 Rustomji, Sikkim, p. 10.

401 Rustomji, Sikkim, pp. 10 - 11.

402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treaty, see G.S.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The Politics of Intimidation (New Delhi, London, and Hartford, Wi: Lancer Publishers), pp. 231 - 7.

403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p. 232.

404 Datta-Ray, Smash and Grab, p. 92.

405 'Annexation of Sikkim: Demise of a Himalayan Kingdom', Spotlight on Regional Affairs, Vol. IV, Issue No. 6, June - July 1985 (Islamabad: Institute of Regional Studies), p. 26.

406 Quoted in Datta-Ray, Smash and Grab, p. 201.

407 Cooke, Time Change, p. 198.

408 Cooke, Time Change, p. 198.

409 Cooke, Time Change, p. 198.

410 Datta-Ray, Smash and Grab, p. 92.

411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entral Intelligence Bulletin: Daily Brief, 6 November 1962, declassified in 2002, p vii.

412 Nari Rustomji, Enchanted Frontiers (Calcutta, Delhi, Bombay, Mad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46.

413 Rustomji, Enchanted Frontiers, p. 146.

414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p. 129.

415 Quoted in Bajpai,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p. 130.

416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49 - 198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9), p. 247.

417 'Annexation of Sikkim: Demise of a Himalayan Kingdom', p. 27.

418 Bajpai, China' s Shadow over Sikkim, p. 143.

419 Bajpai, China' s Shadow over Sikkim, p. 142,

420 Bajpai, China' s Shadow over Sikkim, p. 153.

421 'Note given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 the Embassy of India in China' ,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Notes, Memoranda and Letters Exchang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China, January 1965 -February 1966, White Paper XII (Delhi: Manager of Publications, 1966), p. 187.

Bajpai, China' s Shadow over Sikkim, p. 129.

422 Quoted in Bajpai, China' s Shadow over Sikkim, p. 189.

423 Bajpai, China' s Shadow over Sikkim, p. 92.

424 Rustomji, Sikkim, p. 71.

425 Rustomji, Sikkim, pp. 71 -2.

426 For an account of the espionage mission, see Bertil Lintner, Great Game East: Indi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Asia' s Most Volatile Frontier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India, 2016), pp. 31 -2.

427 Duff, Sikkim, p. 85.

428 J.R. Subba, History, Culture and Customs of Sikkim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2011), pp. 67 -8.

429 For the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see Satyendra R. Shukla, Sikkim: The Story of Integration (New Delhi: S. Chand & Co, 1976), p. 86. 1976.

430 Ch' iao Kuan-hua' s Speech at the 19th U.N. General Assembly Session, Warren Kuo (ed.), Foreign Policy Speeches by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 1963 -1975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ess, 1976), p. 103. Although Ch' iao Kuan-hua (Qiao Guanhua in Pinyin) had been denounced as a 'counterrevolutionar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1960s, he was protected by Zhou Enlai and survived the turmoil. In the early 1970s, h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alks with the American Secretary of State Henry Kissinger to normaliz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Qiao was purged from his post as foreign minister

after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but remained an adviser to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431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 248.

432 Asoka Raina, *Inside RAW: The Story of India's Secret Service*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81), p. 68 and Duff, Sikkim, p. 188.

433 Raina, *Inside RAW*, p. 69.

434 Yadav, *Mission R&AW*.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2014, pp. 69 – 70.

435 Quoted in Raina, *Inside RAW*, pp. 48 – 9.

436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events in Shanghai in the late 1920s, see Bertil Lintner, *Bloodbrothers: Crime,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Asia* (Cows Nest, NSW, Australia: Allen & Unwin, 2002), pp. 35 – 40.

437 David Ian Chambers,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Historiography', *Studies in Intelligence*, Vol. 56, Issue no. 3, September 2012, p. 2.

438 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eople's Chin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p. 182.

439 Communication with David Ian Chambers, on 13 October 2016.

440 Chambers,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Historiography', p. 4.

441 Chambers,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Historiography', p. 5.

442 Chambers,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Chinese Intelligence Historiography', pp. 4 – 5.

443 Kaul explains: 'Our intelligence system compared unfavourably with that of the Chinese. They had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agents into India in general and NEFA in particular (whereas we had lagged in this respect). Their agents built up a net-work for reporting back information to the Chinese ... the Chinese often knew about our military build-up in a particular area in advance whereas similar

knowledge about them was denied us due to faulty intelligence.’ See Brij Mohan Kaul, *The Untold Story* (Bombay, Calcutta, New Delhi, Madras, London, New York: Allied Publishers, 1967), p. 438.

444 譯者注：依二〇一八年六月底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官方網站公布之機構設置，由一局（亞洲一局）負責與南亞、東南亞各國政黨及政治組織的聯絡交往，以及對該區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研究工作。

44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Report: The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ference title: POLO XLIV), December 1971, declassified in May 2007, p. i.

446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Report*, p. i.

447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Report*, pp. ii - iii.

448 Minnie Chan, ‘Mongolian report blames Lin Biao plane crash on “pilot erro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2 Sept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2017978/mongolian-report-blames-lin-biaoplane-crash-pilot-error> (accessed on 17 October 2016).

449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search Study: Chinese-Indian Relations 1972 - 1975*, September 1975, Declassified on 29 June 2004.

450 Yuwu Song,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13), p. 62. For a more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power struggle within the CCP at this time, see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Politics of China: Sixt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75 - 98.

451 Byron and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p. 409.

452 Christine Quigley, *Modern Mummies: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Human Bod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8), p. 41. Mao’s body was embalmed after his death and placed in a mausoleum in Tiananmen Square.

453 ‘The Third World Needs No Leader’, Su Wenming (ed.), *China After Mao: A Collection of 80 Topical Essays by the Editors of*

Beijing Review (Beijing: Beijing Review, 1984), p. 89. The article 'The Third World Needs No Leader' first appeared in Beijing Review, December 1982.

454 Chairman Mao's Theory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Marxism-Lenini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7), p. 53.

455 Chairman Mao's Theory of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Worlds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Marxism-Leninism, p. 73.

456 'Nathu La to open for Indo-China trade after 44 years', The Economic Times, 20 June 2006, available at 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0606-20/news/27445981_1_border-trade-trade-route-indo-china-trade (accessed on 15 October 2016).

457 Effective literacy rate in India in 2011 was 82.14 per cent for males and 65.46 for females (average 68.90 per cent), in Sikkim 87.29 per cent for males and 76.43 for females (average 82.20 per cent). See http://censusindia.gov.in/2011-prov-results/data_files/india/Final_PPT_2011_chapter6.pdf (accessed on 13 August 2017).

第六章 國民幸福指數？

不丹，喜馬拉雅山區僅存的佛教王國，香格里拉神話的縮影，這個人口少於百萬的小國家，擠在地球上兩個人口最多、彼此為區域對手的國家中間，並成功維持其獨特的文化認同。不丹地景之美令人屏息，古老佛教寺院坐落山巔，是致力於打造以佛教為精神價值，而非粗鄙物質主義為基礎的國家。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不丹國王吉格梅．辛杰．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k）提出了國民幸福指數（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一九五三年制定的不丹國歌，內容總結了這社會的精神，「出自原住民族，並有豐厚藏、蒙、印——緬移民文化涵養」⁴⁵⁸：

雷龍王國中香檀環繞
捍衛者執守宗教世俗雙重體系
堅守不變崗位之際
高貴榮光的陛下，德威遠披
我主佛法輝煌之時
和平幸福煦日將光照萬民！⁴⁵⁹

佛教長期以來即為不丹國教，所謂「宗教世俗雙重體系」指的是二十世紀初之前，一直存在政教統治的結合與分立，歷史上這套體系定義了不丹獨特的統治架構。然而在浪漫如詩的外表下，不丹卻有著動盪的歷史與難測的未來。歷經數次與英屬印度殖民政權的衝突後，一九一〇年雙方達成協議，不丹將「在外交事務上接受英國政府的指導」，而英國則承諾「不干預不丹的內部行政」。⁴⁶⁰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不丹政府與獨立後的印度也簽訂類似協議，確認不丹做為印度屬國，實際卻享有高度自主權的地位。⁴⁶¹

然而與錫金不同的是，不丹逐漸成功強化獨立地位。一九七一年，不丹在成為觀察員國三年後正式加入聯合國，接著在二〇〇七年

修訂不印條約：「不丹王國政府與印度共和國政府將在兩國國家利益相關事務上緊密合作。彼此皆不允許在領土上，進行對彼此國家安全利益有害之活動。」⁴⁶²

兩國間的特殊關係，使印度占不丹全年貨物進口量的百分之七十五，而不丹百分之八十五都出口到印度，最主要的出口貨物包含喜馬拉雅山區河流的水力發電，印度是唯一的買家。不丹貨幣努爾特魯姆（Ngultrum）的幣值與印度盧比掛勾，匯率維持一比一。在戰略位置上，不丹與中國沿著山稜分界，這裡與整個喜馬拉雅山脈沿線，是印度次大陸與西藏高原的分界。在一九四九與二〇〇七年的條約中，並未特別提及印度協防不丹；然而尼赫魯總理早在一九五八年就宣布：「對不丹的侵略行為，等同對印度本身的侵略行為」。⁴⁶³印度軍隊在哈縣（Ha）常駐的一個訓練營，印度軍事訓練團（Indian Military Training Team），就位在重要戰略地西藏春丕山谷附近。不丹也會將其軍官送到普納的印度國防學院（National Defense Academy）與德拉敦的印度軍事學校（Indian Military Academy）受訓。

同時，不丹是中國所有鄰近國家中，唯一尚未與其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但為了不得罪中國，儘管不丹信奉的佛教教派與藏傳佛教類似，卻是世上少數達賴喇嘛還未造訪過的佛教國家。一九五九年拉薩起義後，當時六千名西藏難民湧入不丹，並在「不得從事任何政治活動」的前提下獲准留在此地；但到了一九八一年，藏人被要求若不成為不丹公民就必須離開，許多人因此前往印度。

中國為了回應不丹微妙的平衡動作，也採行後毛澤東時代新的外交策略：軟性外交。近年來中國的馬戲團、特技表演與足球員紛紛造訪不丹；一小群不丹學生獲得獎學金，前往中國大學就讀；觀光業亦大幅發展。十多年前，僅有十九名中國遊客造訪不丹，二〇一五年數字成長至九千三百九十九人，占不丹全年外國訪客總數的百分之十九。⁴⁶⁴

印度憂慮地注意這些發展，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二〇一四年七月，上台兩個月的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第一

個出訪的國家就是不丹。同年稍晚，印度總統普拉納布·穆克吉（Pranab Mukherjee）也出訪不丹，強調新德里重視這個面積雖小卻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喜馬拉雅王國。會面的重要議題是討論中國與不丹建立長久關係的企圖。外交上，中國與不丹的聯繫僅有一串解決兩國邊界爭議的會談。今日，中國宣稱擁有不丹兩個區域：一塊鄰近春丕山谷的領土，以及北方一大塊土地。北京印製的一九六一年地圖上，將不丹大部分區域、尼泊爾及錫金都劃入中國版圖。中國一度認為，不丹北部與西部將近四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有爭議的。一九三〇年代，毛澤東曾公開宣稱：「中國的正確疆界應包含不丹、緬甸、尼泊爾、台灣、韓國與琉球群島。」後來這段談話從正式紀錄中刪除，以免激起鄰國不滿。[465](#)

位於喜馬拉雅高山地區的不丹，可能被視為孤立王國，但事實上這區域與外界的互動早在七世紀就已開始。當時的吐蕃國王松贊干布改信佛教，並下令建造兩座佛寺，一座位於布姆唐（Bumthang），另一座則在帕羅河谷（Paro Valley）。到了八世紀，被藏人稱為古魯仁波切 [466](#)（有時亦敬稱為第二佛陀）的佛教聖者蓮花生大士（Padmasambhava），應不丹當時諸多分裂小國的國王之請，從印度前往不丹，之後更進入吐蕃。後來古魯仁波切返回不丹時，在帕羅山谷 [467](#)與布姆唐興建新佛寺，並且將祖寺設在布姆唐。

古魯仁波切被公認為藏傳密宗大乘佛教寧瑪派（Nyingmapa）的創始人，此派又稱「舊派」或「紅帽派」[468](#)，在八世紀時傳遍不丹各地。但今日的不丹及西藏區域，當時都缺乏有組織的中央政府，地方王侯各立山頭，經常相互興戰，宗教派別間也爭奪信徒領導權。蒙古人也曾進入此區，統治域內豐饒谷地，並協助達賴喇嘛取得政權。

十四世紀，蒙古領主勢力開始衰微，經過一段無政府時期之後，最終由蒙古支持的「黃帽派」格魯派（Gelupa）成為吐蕃主要勢力，敵對教派的僧侶因此逃往東藏，或是往南前往不丹。其中部分僧侶闢建了最早的武裝寺院，稱之為「宗」（dzongs），今日仍舊分布於不丹各地。後來紅帽派的分支「竹巴」[469](#)成為主要教派，特別在不丹西

部，竹巴噶舉逐漸形成最重要的一股勢力，就如不丹史學家噶瑪彭措（Karma Phuntsho）所寫：「後世成為統治勢力及國家宗教」。470

在竹巴噶舉僧侶阿旺朗傑（Ngawang Namgyal）於十七世紀初抵達不丹前，此地並未形成中央集權的政府架構。當時為逃離達賴五世所領導勢力強大的黃帽派，阿旺朗傑進入不丹，承「夏宗法王」（shabdrung）頭銜（意為「行足禮的對象」），並屢次擊敗入侵的西藏格魯派統治者。夏宗阿旺朗傑的強大性格，在一六二七年葡萄牙耶穌會士筆下鮮明呈現。兩名葡萄牙天主教耶穌會士艾斯特法．卡塞拉（Estevaso Cacella）及喬．卡布拉（Joao Cabral）是第一批進入不丹的西方人。卡塞拉形容夏宗法王「同時是王國之主與最高喇嘛」。
471

十七世紀以來，不丹被稱為「竹域」（Druk Yul）或「雷龍之國」，強調竹巴噶舉派的傳承。不丹（Bhutan）一詞過去拼音為Bootan，字源可能來自尼泊爾語中的「菩提亞」（Bhutia）或「菩帖」（Bhotay），是印度語言中指涉「藏族」之詞。然而印歐語系中的bhot字根，相對地可能來自藏語的bod472，這是藏語與不丹方言中稱「西藏」之詞。藏人自稱bod-pa，意即藏地居民。473

為強化對雷龍王國的掌控，夏宗法王興建更多大型的碉堡：「宗」，後續成為宗教及世俗權力的中心，亦即現代不丹國歌中提及的宗教世俗雙重體系；理論上，此一體系也延續到今日。廷布（Thimphu）、帕羅與普納卡（Punakha）的大型宗寺都可溯源至第一世夏宗法王時代。根據英國歷史學者暨藏學家邁克．阿里斯（Michael Aris）所述：

每間宗寺都分成神職與世俗兩翼，前者由竹巴噶舉僧人使用，後者則處理政務及儲存人民繳納的穀物與稅收等474……他的統治有效性，從其死前獲得全國各地及鄰近印度國家、尼泊爾與數個藏地政權遣使進貢可見一斑。475

雖然屬於神權國家，世俗政府則由可能是僧侶或俗人的竹第悉（druk desi）領導。

夏宗法王理應與西藏達賴喇嘛一樣採取轉世傳承。然而第一世夏宗法王在一六五一年去世後，由於對國家影響甚巨，因此死訊遭隱瞞，對外宣稱他正閉關修行。後來第一世夏宗死訊終於公布，並展開尋找轉世靈童的工作；而敵對派系分別支持至少五個不同轉世靈童。最後，衝突在一七三〇年代不丹受西藏入侵時獲得解決。根據阿里斯所述，這是「唯一一次西藏成功入侵不丹……（然而）侵略行動的結束，事實上歸功於當時西藏喇嘛領袖的和平呼籲，而非征服」。476

當時不丹分裂成兩個國家，並各自向拉薩請求仲裁，同時也必須向當時握有西藏宗主權的中國皇帝上書請願。一七三四年，兩個陣營分別遣使前往北京朝廷。最終此事獲得和平解決，國家也再次統一。然而正如阿里斯指出：「向中國請願仲裁，意味著理論上的主權喪失。」不過與此同時，「這個舉動亦與西藏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有助於確保不丹獨立的事實。」477

接下來，在不丹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並非中國而是英國。不丹從一七七〇年代開始奪取喜馬拉雅山腳平原的庫齊比哈爾公國（Cooch Behar，今日為Koch Bihar）。478為驅逐入侵者，庫齊比哈爾的統治者向英屬東印度公司請求援助。在一七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首次衝突中，六百名不丹軍士戰死，英軍將不丹勢力逐出庫齊比哈爾堡479，因而取代西藏，成為不丹首要的外在威脅。

邊界爭議持續影響英國與不丹的關係。英國在一八二四至一八二六年對緬甸王國戰爭480中，取得了對阿薩姆地區的控制，並進一步占領平原上其他不丹的控制區域。隨著殖民擴張進入布拉馬普特拉河谷地，英不之間產生數波的軍事衝突。一八六二年，不丹軍隊劫掠庫齊比哈爾與錫金，此時英國政府已從英屬東印度公司收回印度控制權，決定發動反擊。雖然不丹曾取得幾次勝利，但衝突結果是一八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簽訂了《辛楚拉條約》（Treaty of Sinchula）：不丹人必須放棄所有阿薩姆丘陵地（Assam Duars），並以此換取每年五萬印度盧比的補償金。條約第一條同時言明：「此後英國政府與不丹政府間將永享友誼與和平。」481

失去平原為不丹的經濟帶來嚴重衝擊，並在剩餘國土中造成民生動盪。雖然轉世的夏宗法王仍是不丹的精神領袖，各省實際上由稱為「本樂」（penlop或pönlop）的世俗行政首長統治。通薩本樂⁴⁸²為傾英派，而帕羅本樂卻是傾藏派；到了十九世紀末，通薩本樂烏顏·旺楚克（Ugyen Wangchuk）在數波內戰與叛亂中擊敗對手，崛起成為最有力的領袖。

英國自然歡迎這樣的新發展，因為平定不丹邊界並非他們唯一的考量。根據美國政府研究，當時英國希望阻礙俄國進入拉薩，並且與西藏通商。「烏顏·旺楚克看到協助英國的機會，因此在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間，自願伴隨前往拉薩的英國使團，擔任協調人。」⁴⁸³當然，這使團就是榮赫鵬帶領的西藏遠征團。為感謝烏顏·旺楚克對一九〇四年簽訂《英藏條約》的貢獻，英國授予他騎士勳銜。一九〇五年，通薩本樂在普納卡宗受勳成為英屬印度帝國騎士指揮官，在場觀禮者除了當地顯貴外，還有英國駐錫金政務官約翰·克勞德·懷特。

烏顏·旺楚克一躍成為不丹最有權勢之人，至於帕羅本樂則遭到解職，取而代之的是來自同樣傾英的多吉家族（Dorji）。不丹成為現代國家的時機已經到來，當時的夏宗法王於一九〇三年去世，但轉世靈童直到一九〇六年仍未尋獲，烏顏·旺楚克因此取得整個國家的掌控權。雖然後來尋獲了兩位名義上的夏宗法王轉世：一位是身轉世，另一位則是意轉世。⁴⁸⁴在僧侶領袖、政府官員、國內重要家族領袖所組成的會議中，選出烏顏·旺楚克擔任不丹首任「竹甲布」（druk gyalpo），意思是「龍王」；第五十七任竹第悉（亦稱「德布王」[deb raja]）被迫退位。世系傳承的絕對王權取代了舊的神權國家，多吉家族則世系傳承首席部長（gongzim）一職。⁴⁸⁵

這個新體系完美符合英國需求。烏顏·旺楚克曾於一九〇六年造訪加爾各答，並與威爾斯王子會面。兩人於一九一一年在德里重逢，當時王子已繼位成為英王喬治五世，烏顏·旺楚克成為不丹國王，也是新的《英不條約》（Anglo-Bhutanese Treaty）簽署一年後，其中規定不丹對外事務由英屬印度政府掌控，而不丹享有內部自主權。⁴⁸⁶

一九一〇年條約是由烏顏．旺楚克與接替懷特為錫金政務官的查爾斯．貝爾，以及不丹當地行政官員簽署上印。貝爾同時也是駐不丹與西藏政務官，但持續駐紮在甘托克。與錫金相比，不丹在管理內部事務上有更大的自主權。

另一方面，英國開始注意到中國侵藏武力愈趨接近印度邊界。《經濟政治週刊》在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刊出普拉迪普．潘竹邦的長篇文章，批評馬克斯韋爾對於當時事件的敘述。此前馬克斯韋爾曾於同一期刊上發表文章寫道：「滿清帝國在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垂死一搏的擴張衝動，導致『權力接近印度的東北』。」⁴⁸⁷潘竹邦反駁，中國在此垂死一搏的衝動中不僅蹂躪西藏，更「開始試探鄰近公國、尼泊爾、不丹、錫金，以及內部界線外未設治的英國領土」。⁴⁸⁸英國並不擔心擁有強力軍隊的尼泊爾、已成為其保護國的錫金，或是「中國不大可能貪圖的無治無利蠻荒東北地區」。⁴⁸⁹中國入侵印度東北區域的唯一跡象，是瓦弄南方幾枚邊界標石。

然而根據潘竹邦的研究，英國卻「對不丹的可能命運相當焦慮」，雖然一九一〇年條約已正式定下不丹與英屬印度的關係，確保不丹不會自行發動任何外交行動。但更重要的是，英國希望能預先避免中國將侵藏行動延伸到不丹。後來滿清帝國在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的革命中垮台，代表了此一憂慮將不會發生。隨著中國撤出西藏高原，拉薩重掌政權，再次確認了西藏一面做為中印緩衝，另一面做為中不緩衝的角色。

在不丹與印度的親近關係下，首任國王不只增加了與山下平原的貿易往來，也引進西式學校，改善內部溝通。此一發展在繼承人吉格梅．旺楚克任內持續進行，他在一九二六年即位後，建立了更多學校、診所與道路。佛教寺院與地方政府都納入中央王室掌控；不過夏宗法王仍舊存在，也曾在吉格梅．旺楚克繼位時發動挑戰，但並未成功。

一九三一年春，當時的夏宗法王晉美多吉（Jigme Dorji）試圖奪回權力，派遣兄弟卻吉堅贊（Ckökyi Gyeltsen）帶兩位僕人，前往印

度古賈拉特邦波爾薩德（Borsad）拜訪聖雄甘地。他依指示告知甘地，不丹不再受到夏宗法王統治，向甘地請求協助。但就如邁克．阿里斯所述：「很難想像會有比甘地更不適合涉入這類陰謀的人。」⁴⁹⁰因此夏宗法王開始計畫前往西藏，並將在必要時由藏入中。根據阿里斯的紀錄：「當時有些人期待班禪喇嘛卻吉寧瑪（Ckökyi Nyima）在長期流亡後，能在中國軍隊的強力支持下返藏，所以夏宗法王此刻也想尋求協助，與國王爭奪權力。」⁴⁹¹

不丹國王發現陰謀，因此將夏宗法王軟禁在駐駕之普納卡的泰羅寺（Talo moastery）。之後夏宗法王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去世，並無法確認是遭殺害或自殺，但他是最後一任正式認定的夏宗法王。此後有好幾位號稱夏宗法王轉世者，但都居住在印度，對於不丹毫無影響力。

第一任國王在一九二六年去世前，已取得了英國的保證，旺楚克家族將持續在不丹的顯赫地位，王家世系就此建立。第二任國王吉格梅．旺楚克的統治，直到一九五二年去世前都未受到任何挑戰；在他任內，不丹與英國殖民政權的關係，順利轉移為不丹與獨立印度的新條約。一九四九年八月八日，吉格梅．旺楚克親自批准了《印度政府與不丹政府的永久和平友誼條約》。印度許下與之前英國同樣的承諾，負責不丹的外交政策，但不干涉內政。但現在部分歷史學者認為，若當時印度就與中國發生衝突（例如十幾年後的戰爭），可能不會這麼輕易同意不丹持續內政自主的要求。⁴⁹²

第三任國王吉格梅．多杰．旺楚克（Jigme Dorje Wangchuk）於一九五二年即位，持續統治到一九七二年去世為止，那也是不丹現代史上最動盪的年代。中國在一九五一年侵藏之後成了不丹的鄰居，也因此使不丹與印度關係更加緊密。吉格梅．多杰．旺楚克鼓勵印度投資小型產業與農業，此刻不丹為對抗中國侵犯藏邊，加速現代化的需求是前所未有之強烈。

奴隸與農奴遭到廢止，第三任不丹國王推動土地改革，以確保財富更加平均分配。一九五三年，不丹成立了一百三十席的國會；一九

五八年，長期由多吉家族把持的首席部長一職提升為首相（lonchen），邁向君主立憲制的第一步已經跨出。此外，不丹更加強通訊科技，打破以往孤立於世界之外的狀態，並在印度的資助下，於一九六二年興建一條連結印度邊界上彭措林⁴⁹³到首都廷布的公路。在此之前，從不丹前往印度的交通運輸必須仰賴犛牛與驢子，而這正是一九五八年尼赫魯與女兒英迪拉一同造訪不丹的方式。

直到一九五九年中國鎮壓西藏起義前，不丹都與中國維持相當友善的關係。當時，不丹長期行使半主權統治的部分西藏飛地，全都遭到中國接管。⁴⁹⁴接著湧入六千名西藏難民，中印關係惡化，不丹也因此關閉通往西藏的邊境。

在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期間，中國宣稱只要不丹「維持中立」，解放軍就不會進入不丹。⁴⁹⁵雖然部分由達旺地區撤出的印軍確實借道不丹領土，但中國避免跨越不丹國界。若真的發生衝突，微小的不丹軍隊無法對抗中國攻擊，印度勢必得協助不丹強化軍事力量，並改善由低地通往內陸的路況。

即使不丹已有諸多進步，仍舊是個接近中古時代的社會，除了印度之外，與外界幾無聯繫。不過隨著教育發展，許多不丹青年前往印度就學，主要在大吉嶺與噶倫堡等山區避暑地。當然也有人就讀顯貴的德拉敦杜恩公學⁴⁹⁶，例如多吉家族的吉格梅．巴登．多吉（Jigme Palden Dorji），他的小妹亞希格桑⁴⁹⁷嫁給第三任國王吉格梅．多杰．旺楚克，因此他也被視為旺楚克王室成員之一。

一九五二年，吉格梅．巴登．多吉受聘為首席部長，六年後職稱改為首相，因此成為不丹第一位首相；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正是他擔任不丹首相期間。根據親近友人羅斯通吉所言，他當時最深的焦慮是中國可能綁架住在印度東北邊境特區達旺附近寺院的一位六歲男孩，這位男孩是最近轉世的夏宗法王，他害怕中國會以他為傀儡挑戰不丹國王的權威。忠於國王的吉格梅．巴登．多吉告訴羅斯通吉：「法王體系（夏宗法王）已經像度度鳥一樣滅絕了……若有任何小男

孩如此不幸，被認定為潛在的法王人選，那麼不丹也能安排一場『意外』，讓他早登涅槃。」[498](#)

當時擔任東北邊境特區行政長官顧問的羅斯通吉，收到吉格梅．巴登．多吉請他搜尋小夏宗法王的緊急請求。在中國占領達旺前，小男孩被尋獲並送往西隆，接著轉往麥克羅甘己的藏人社區學習，在達賴喇嘛的庇護下安全成長。吉格梅．巴登．多吉對中國可能綁架夏宗法王的擔憂，究竟是確有其事或是猜測下的謹慎行動，則不得而知。

吉格梅．巴登．多吉決心推動不丹現代化，第三任國王也不反對。但削減國家支持宗教機構權力一事，卻激怒神職人員中的某些人。之後國王年紀漸長，與活力充沛的首相摩擦也更明顯。吉格梅．巴登．多吉更因軍車使用與強迫五十名軍官退休的政策，在軍隊中樹敵。

所有反對現代化的人（特別是傳統派）在國王與多吉家族攀升的衝突中，看到了見縫插針的機會。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日國王前往瑞士接受治療，吉格梅．巴登．多吉在彭措林遭一名軍官暗殺。整個國家陷入一九〇七年世襲王制建立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

國王由瑞士趕回不丹，密謀者在印度催促下遭逮捕，以叛國起訴，部分遭到處決，其中包含軍隊總司令暨王叔南嘉．巴哈杜（Namgyal Bahadur）。其他參與暗殺者則逃往尼泊爾。然而，這並非動亂的終結，旺楚克保王派與多吉派現代化支持者間的權力鬥爭尚未結束。主要問題也許並非王室權力的終結或削減，而是「完全脫離印度干預」。[499](#)無論如何，吉格梅．巴登．多吉的弟弟倫珠．多吉（Lhendup Dorji）繼任首相，而他連同家族成員在一九六五年遭到流放。國王本人成為首相，派任保守人士取代多吉派位置，並命同父異母的王弟擔任陸軍總司令，以此確保軍隊忠誠。危機仍未結束，一九六五年七月發生另一次針對國王的暗殺行動；不過多吉派並未涉入其中，國王也釋放了刺殺未成的嫌犯。

即使部分不丹人可能對國家高度依賴印度感到失望，但依照不丹對印度的戰略重要性來看（特別在一九六二年戰爭之後），印度很難

讓不丹走自己的路。事實上，此刻已解密的中情局報告指出：「吉格梅暗殺事件後，提供印度擴大影響力的良機。」⁵⁰⁰同一份報告說：「印度（現在）提供不丹軍事與情報訓練，特別針對反中國顛覆行動⁵⁰¹……中國……則運用不丹教派差異的管道，特別是利用友善的藏人。」⁵⁰²

各種發展不丹經濟及強化王室做為國家支柱的努力逐漸開展。在第三任不丹國王任內，藏語相關的方言宗喀語⁵⁰³成為官方語言，廷布也成為全年唯一首都。一九五五年之前，普納卡曾是首都，一九五五年後改為冬都，高山上的廷布則是夏都。隨著行政組織集中在廷布，政府效能也跟著提升。

不丹領導人在處理印度關係上，比甘托克那對充滿爭議的王室夫婦精明許多。不丹如同錫金，也追求更直接的國際連結，但為避免激怒印度，做法較為謹慎。沒多久，一九六二年，不丹加入亞洲太平洋經濟與社會發展合作計畫（Plan for Cooperativ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sia and Pacific），即一般眾所周知的可倫坡計畫（Colombo Plan）。一九六六年廷布政府通知印度，希望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一九七一年正式入聯，是不丹外交政策的重大突破。

第三任國王吉格梅．多杰．旺楚克被視為現代不丹之父。他長久以來為疾病所苦，曾遭遇數次心臟病發作，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在肯亞奈洛比接受治療，最後不治去世，享年四十三歲。第一任國王為王室定下獨特徽記：頭頂著王冠的烏鴉，代表不丹的烏鴉形守護神大黑天瑪哈嘎拉（Mahakala）。⁵⁰⁴這頂烏鴉王冠傳到吉格梅．多杰．旺楚克的獨子，吉格梅．辛杰．旺楚克手上。他在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位，成為第四代國王，登基為當時仍是獨裁王國的國王。雖然即位時還差幾個月才滿十七歲，但少年國王受過良好教育，也比前人更適應現代化的外在世界。他從大吉嶺的聖約瑟夫學院（St. Joseph's College）畢業之後，便前往英國的海瑟頓預科學校（Heatherdown Preparatory School）。英國的安德魯王子、愛德華

王子與後來的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都是他的學弟。從海瑟頓畢業後，吉格梅．辛杰．旺楚克返回帕羅就讀烏顏．旺楚克學院（Ugyen Wangchuk Academy）。

第四任國王統治到二〇〇六年一月，便讓位給兒子吉格梅．葛薩爾．朗傑．旺楚克（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k）。期間他見證了快速的經濟社會發展，奠基於外銷印度的水力發電、高端旅遊市場及木屋產業，這也讓不丹政府得以提供人民免費教育與醫療。新的中產階級興起，即使農民仍舊貧窮，但多數可以自給自足，鄉間不至於赤貧。

第四任國王引入了某種民主形式，並與印度談判簽訂二〇〇七年條約，讓不丹成為真正的獨立國家。這段期間，由於一九九〇年代初期驅逐尼泊爾裔的政策，導致不丹與尼泊爾關係惡化；印度對於在不丹南部設營訓練的東北反抗軍也深感不滿；中國更開始對這喜馬拉雅山王國顯露出新興趣。

對外在世界來說，第四任國王最知名的作為，莫過於提出取代國民生產毛額的新概念：國民幸福指數。伴隨國民幸福指數的提出，也展開強化國家認同的積極運動，制定《傳統價值與禮節條例》（Driglam Namzha），以及推廣國語：宗喀語，同時無論男女都必須穿著不丹傳統服飾，而非西式服裝。

此事並不容易，因為不丹是個充滿多元民族、人口散居各處的小國。廣義來說，不丹包含了四大主要民族，是由七個次團體組成。額朗人（Ngalops）早在七世紀左右就移入不丹，名稱意思為「最早興起」或「首先改宗」；他們與藏人相近，並在歷史早期就改信佛教，宗喀語是他們的母語。額朗人主要居住在不丹的西部與北部，也是主導現代不丹的政治文化團體。505

沙爾喬普人（Sharchops）的名稱意思是「東部人」，恰如其名住在不丹東部，是藏族與南亞族裔的混血。據信他們是在數世紀前，由阿薩姆或緬甸北部移入不丹。由於與阿薩姆的連結，除了母語倉洛語（Tshangla）之外，多數也使用阿薩姆語，甚至印地語。倉洛語與宗

喀語一樣屬於藏緬語。沙爾喬普人與邊界對面印度達旺地區的門巴人相近；他們雖是不丹國內最大的單一族群，卻逐漸為藏人與額朗人文化所吸納。

接著是不丹各地村落散居的原住部落民，大多是印度教徒，與阿薩姆區域的部落有關。有些族群被認為是不丹多元民族中最原初的住民，部分則是由印度類似部落區域帶進不丹的奴隸後裔。

第四個族群則是尼泊爾裔。他們被稱為洛昌人（Lhotshampas），名稱意思為「南部人」，多數在二十世紀初由尼泊爾及大吉嶺區域移入不丹。他們的移入，主要是為了耕作當時在山脈與印度邊界間那些由東往西、幾無人居的小片低地。尼泊爾移民將一度鮮有人跡、瘧疾橫行的不丹南部叢林區，轉變成富庶的稻田、菜園、柑橘果園及豆蔻園。高地區因此獲得食物供給，政府也能向勤勞移民徵納國家急需的稅收。洛昌人多數是印度教徒，說尼泊爾語（屬印歐語系），由於是南亞裔外表，可以輕易從人群中被辨識出來。但洛昌人無法融入第四代國王打造的新國家。許多不丹人記得鄰國錫金的命運：尼泊爾移民超過原生菩提亞人與絨巴人，國家最終永遠失去曾擁有的獨立地位。

這問題其實並非最近才發生。早在一九四二年，當時英國駐錫金、不丹與西藏政務官巴西爾·顧爾德爵士就曾警告過不丹，有關移民掌控國家的潛在危機。不丹則回應，由於新移民並未納入國民，因此「有需要時」可驅逐出境。⁵⁰⁶一九五二年，離開不丹後定居在西孟加拉邦與阿薩姆邦的洛昌人組成政黨，命名為「不丹國家議會黨」（Bhutan State Congress Party），號召創建包含尼泊爾、錫金、西孟加拉邦北部與不丹的「大尼泊爾」。兩年後，他們試圖在不丹村落撒爾邦（Sarbhong）發起「不合作運動」（satyagraha），即印度式的非暴力對抗，並擴大活動進入不丹。然而很少洛昌人響應，因為他們不希望因此舉影響自己岌岌可危的公民身分。不丹政府則透過設立國會中洛昌人的代表席次，以解除不丹國家議會黨可能帶來的危機。

不丹同時於一九五八年制訂《公民法》（Citizenship Act）解決這問題。凡是能證明自己在新法施行前就已在不丹居住超過十年者，

就能免受此法規範。進一步移民遭到禁止，但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卻在興建彭措林至廷布的公路時遇到問題。不丹希望運用本地勞力，印度卻認為不可行，不丹無法提供願意參與此類工程的勞力。印度因此引進無技術勞工，其中大多數是尼泊爾人。等到工程結束後，許多人便決定留在親族居住的南方村落。

直到一九八八年當局決定進行全國人口普查前，南方區域的非法移民情況並不明朗。人口普查理論上是為了執行一九八五年通過的新《公民法》。新法意在澄清一九五八年法案，規定僅有一九五八年前已定居不丹之家族的後續移民，才能獲得公民身分。然而整體調查卻以災難收場。首先，完整調查僅在南部進行；其次，他們在南方各區發現大量超越預期的非法移民。

問題在不丹西南部的桑契宗（Samtse，舊拼音為Samchi）特別明顯，此地距印度僅有短短的車程。不丹多數道路都是南北向，由南方印不邊界通往北方不丹內地；此外只有一條穿越全國的東西向高速公路。桑契宗鄰近噶倫堡，是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動亂受害最深的地區之一。當時一點暴力火花，就能讓北印度尼泊爾人自治區變成廓爾喀國（Gorkhaland）。毫不意外，人口普查發現桑契宗人口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成長兩倍。根據當時不丹政府的文宣所述：「最近完成的桑契宗地籍調查（同時）顯示非法土地所有權達四萬七千兩百三十五英畝，甚至超越全國面積最大的札西岡宗（Tashigang）。」⁵⁰⁷

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全不丹的合法及非法尼泊爾裔居民人數無法確知，但很可能高達總人口數（時為一百三十七萬人）的三至四成，因此激起驅逐「非法移民」的運動。在過去，尼泊爾語連同宗喀語及英語，曾是不丹三種官方語言之一，並在學校中被教授。然而從一九八九年，尼泊爾語不再是官方語言，也不被列入教學。

部分洛昌人在一九九〇年成立不丹人民黨（Bhutan People's Party），反抗傳統價值與禮節政策，並主張爭取南方人民的權利。不丹人民黨指控政府逮捕、刑虐並殺害許多涉嫌反王家運動的洛昌人。相對地，不丹政府則宣稱不丹人民黨的武裝組織（該黨確實有一些武

裝組織）燒毀學校、炸毀橋梁並暗殺村莊頭人與警察。一九九〇年九月至隔年九月，不丹政府從南方反抗者手中沒收超過兩千件的武器、手榴彈、地雷及硝化甘油炸藥。⁵⁰⁸

無論何為正確，這場暴力導致大量尼泊爾人出走，至少超過十萬人逃離不丹。然而除了中國以外，不丹唯一的鄰國印度並不想接收這群人，畢竟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印不關係，遠比洛昌人的悲劇來得重要。因此難民持續湧向尼泊爾，並被安置在尼國南部鄰近印度邊界的賈帕（Jhapa）與莫朗⁵⁰⁹縣內的許多難民營中。部分洛昌人在此與尼泊爾共產黨不同派系人物建立聯繫。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賈帕曾是尼共（毛派）主導起義之地，與邊界對側印度的拿撒爾人起義類似。在尼泊爾同志的啟發下，部分洛昌人甚至成立自己的毛派政黨。

不需多說，這類活動自然讓不丹無法接受尼泊爾與許多西方政府提出的要求：讓洛昌人回家。印度也無法忽視尼國南部難民營發出的警訊，中情局早在一九六五年就指出，洛昌人分離主義活動可能造成：

被中國利用的情況。即使中國無法直接觸及印度近旁的杜亞爾（阿薩姆丘陵地）。接觸管道之一是透過錫金，傳聞中國已在此部署特務。西孟加拉邦的大吉嶺區域約有一千名印度共產黨員，多數傾中，可用以滲透丘陵區煽動顛覆。⁵¹⁰

洛昌難民無法返家，即使不丹與尼泊爾已進行多次協商，在未來許多年中，他們仍將待在賈帕與莫朗的困苦難民營裡。至於留在不丹的洛昌人，則十分小心不涉入任何反政府行動，因為知道後果將是遭王國驅逐。

不丹的難民危機消停不久，又出現另一個與鄰國有關的問題。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一場由學生領頭的運動席捲整個阿薩姆區域，反對主要來自孟加拉的非法移民。運動中較溫和的派系最終形成政黨，加入選舉競爭；其他人則轉入地下，走向爭取阿薩姆獨立的武裝抗爭。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United Liberation Front of Asom [Assam]）的信念混合阿薩姆民族主義與左派理論，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後期的高

峰年代裡，於阿薩姆各地設有基地。甚至更有小部分跨越邊界進入緬甸，與在當地長久經營的那迦人及曼尼普爾人反抗軍合作，逃避印度軍隊的追擊。

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印度軍方在阿薩姆發動一系列行動，包含「犀牛行動」（Operation Rhino）與「金剛行動」（Operation Bajrang），迫使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退出此地，在孟加拉與不丹南部建立新營地。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與印度東北另外三支武裝力量共用營地，包含活躍於阿薩姆波多族（Bodo）平原部落中的波多民族民主解放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Bodoland）與波多猛虎解放軍（Bodo Liberation Tigers Force），以及坎塔普解放組織（Kamtapur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坎塔普解放組織的目標，是在西孟加拉邦北部與阿薩姆邦西部（亦即尼泊爾、不丹與孟加拉所包圍的敏感區域「西里古里走廊」），建立名為「坎塔普」（Kamtapur）的國家。⁵¹¹藉由將營地與庇護所建在不丹與孟加拉，這些反抗軍在「走廊」兩側都占有據點，對印度的國家安全造成強大威脅。

部分觀察者認為，不丹政府「邀請」這些印度東北武裝分子，協助他們「驅走」洛昌人。⁵¹²然而此一指控缺乏證據。事實上，這些反抗軍是在多數洛昌人離去後才移入不丹，而且營地建在偏遠森林山丘上，在洛昌人居住的南方平原之外。比較可信的解釋是，不丹缺乏驅逐他們的能力。而營地附近的部分部落民，與這些來自邊界對側的反抗軍族群文化相近，因此形成友善環境。

不丹自然承受了來自印度的壓力，必須採取行動對付反抗軍。不丹政府數次試圖透過與反抗軍領袖協商來解決問題，但毫無成果，僅剩軍事選項。不丹王軍在二〇〇三年十二月採取行動；這支軍隊接受印度訓練，裝備大多由印度提供。該次行動代號為「全面清除」，是不丹王軍首次進行的主要軍事行動，結果相當成功。十二月十五日，不丹攻下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設在薩姆德魯瓊卡爾宗（Samdrup Jongkhar）普卡通村（Phukatong）的總部。次日，十個營地遭到摧

毀，許多反抗軍陣亡。印度軍隊雖未直接參與行動，但沿著不丹邊界派駐十二個軍團，防止反抗軍往南逃竄，也用直升機協助撤離不丹傷兵。十二月底，不丹境內再也不存任何印度東北反抗軍。[513](#)

這個被不丹稱為「排除作戰」（Operation Flush Out）的全面清除作戰結束時，不丹截獲大批突擊步槍、火箭發射器、迫擊砲、通訊設備與數萬發彈藥。多數裝備是中國製，並透過所謂的「中國黑市」交易取得，經由孟加拉港口走私到不丹。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與其他反抗軍在不丹的營地雖然陷落，但仍舊在孟加拉出沒。當時孟加拉是由反印度的孟加拉民族主義黨（Bangladesh Nationalist Party）執政。

在痛失不丹藏身處後僅僅四個月，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又面臨進一步打擊，而這一次是發生在孟加拉。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向中國聯絡人下了一筆巨額武器訂單，裝運致命武器的船隻卻在四月二日抵達吉大港時遭到扣押。船運始於香港，當時船上僅有中國武器，駛往新加坡後，加入其他美國及以色列製武器。根據深受敬重的《簡氏情報評論期刊》（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報導：「貨運當時正往北通過麻六甲海峽，前往孟加拉灣中等待的兩艘拖網漁船，『卡札丹號』（Kazaddan）與『阿瑪納特號』（Amanat）。兩船將武器運往吉大港卡納普利河（Karnaphuli River）的碼頭。」[514](#)這批武器包含自動與半自動步槍、AK—47步槍、火箭推進榴彈發射器、手榴彈及大批各種彈藥。總價值估計約在四百五十萬至七百萬美元之間。[515](#)

武器運送的消息是如何被截獲，至今仍不清楚，然而《簡氏情報評論期刊》猜測「接到情報後（據了解可能是來自印度的情報），四月二日凌晨武器卸運時，遭吉大港警方與孟加拉步槍隊查獲。九輛卡車的軍火遭到扣押，但據信其中一輛滿載軍火的卡車在港警抵達前已經逃逸」。[516](#)大家對軍火流向並無疑問：印度東北地區的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波多族與那迦族反抗軍。

商業導向的新中國也許對向全世界輸出革命不感興趣，然而軍火貿易是利潤豐厚的生意，只要有買家，網絡通達的中國「私人軍火

商」就願意賣。武器確實來自中國武器製造商，例如國營的中國北方工業公司，交易可以透過中國門面上的公司，或更方便地透過香港的自由經濟與完善金融機構。泰國首都曼谷的中間人也是數個國家武器流通的管道，其中包含中國。

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面對嚴峻情勢，更多問題接踵而至。下一波挑戰是在二〇〇九年十一月，由人民聯盟（Awami League）所領導的新孟加拉政府與民族主義黨不同，對於支持印度反抗軍毫無興趣，因此逮捕了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主席阿拉賓達．拉吉科瓦（Arabinda Rajkhowa）、反抗軍副司令拉朱．巴魯亞（Raju Baruah）及其他八名武裝分子，後續轉交給印度。二〇一〇年九月，曼尼普爾聯合民族解放陣線的領袖，對外自稱「撒那．亞馬」（Sana Yaima）的拉吉庫瑪．梅根（Rajkumar Meghen），也在達卡被捕並送交印度。同時，以泰國為基地且常造訪中國的那迦反抗軍主要軍火採購人安東尼．希姆瑞（Anthony Shimray），在尼泊爾加德滿都機場被捕後轉交印度收押。⁵¹⁷

失去不丹與孟加拉藏身地後，印度東北反抗軍只剩下最後的安全天堂：緬甸西北邊陲。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與那迦、曼尼普爾同盟在緬甸實皆省（Sagaing）辛嘎倫坎迪（Singkaling Hkamti）的北方與西北山地區設有數個營地。主營設在欽敦江（Chindwin）西部支流的塔卡（Taka），部分來自中國的武器仍由雲南走私進口，經過中緬甸的曼德勒與蒙育瓦，再轉送印度邊界上的反抗軍營地。然而中國治安當局是否直接涉入其中、武器是否在中國黑市購得，則都無從得知。不論如何，這總是處於灰色地帶。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總司令派瑞許．巴魯亞偶爾訪視塔卡營地，此外總是長居雲南。

二〇〇四年吉大港武器走私雖是透過「私人軍火商」安排，但數量之大，若缺乏有力人士默許也難以成事。巴魯亞在雲南現身及參與吉大港走私事件，顯示中國治安當局並未切斷與印度東北反抗軍的聯繫，兩者關係也明顯遠超過商業交易。只要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持續以印度為基地，中國就不太可能放棄這些聯繫。除了擾亂印度

外，此舉更在印度內部留下一步棋，做為邊界談判與其他雙邊議題的籌碼。

雖然不丹只是遊戲中的小卒，但對中國並非不重要，毛澤東一度主張不丹應該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但一九七一年不丹加入聯合國後，中國在策略上改弦易轍。中情局在一九七五年中印關係報告中，分析了中國對不丹的新興趣：「不僅要探索如何煽動不丹在印度保護下的不安，更要低調展現中國對維護不丹做為中印緩衝區的興趣。」

518

一九七一年，不丹隨同印度投票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的中國席次代表。廷布與北京此刻同時在紐約聯合國派駐代表，兩國開始建立直接聯繫。中不開始互動的第一件大事，是吉格梅．辛杰．旺楚克的加冕典禮。雖然他在一九七二年開始擔任國王，但加冕典禮必須等到星象家選出的吉時。一九七四年六月二日，烏鴉王冠戴在第四任國王頭上，觀禮貴賓包括中國駐德里大使館的臨時代辦馬牧鳴。馬牧鳴造訪不丹一事，被中國官方新聞通訊社新華社形容為「兩國友善接觸的新頁」。⁵¹⁹中國賀詞中強調「不丹政府發展經濟與維護國家獨立的期望」。⁵²⁰

中情局的結論是：「無法疏離老大哥印度的不丹，對於新的中國關係輕描淡寫。印度對不丹邀中國上門雖有不滿，但明顯相信自己對這山區小國包含防衛責任在內的掌控，足以讓這次事件就此過去。」

521

一九八三年，中國外交部長吳學謙與不丹外交部長龍波．達瓦．慈仁（Lyonpo Dawa Tsering）首度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會面。次年四月，中不第一輪邊界會談在北京舉行。中國代表團由外交部副部長宮達非率領，不丹代表團則由不丹駐印大使大肖歐姆．普拉丹（Dasho Om Pradhan）率領。中不雙方於四月二十日簽訂了聯合公報，「表達對於首輪會談的滿意」。⁵²²

此後中國與不丹總共進行了二十四輪此類會談，然而進展緩慢。中國仍宣稱擁有部分不丹領土，並於一九九〇年代在爭議區域內進行

道路建設與伐木。不丹發出抗議，而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兩國簽訂《關於在中不邊境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其中載明中國重申「完全尊重不丹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523

中國對於不丹邊界的立場，可視為無意間承認麥克馬洪線，因為不丹位於喜馬拉雅山稜線分水嶺南側；但因中不邊界遲遲未正式劃定，因此中國隨時都可宣稱此議題尚未解決。更重要的是，一輪又一輪沒有結論的會談，有利於中國改善與不丹的關係，而這自然對印度不利。二〇一六年八月第二十四輪會談之後，中國外交部發聲明表示：「儘管不中尚未建交，但這不會阻礙兩國開展互利合作。不丹願不斷深化與中國在旅遊、宗教、文化、農業等領域交流，進一步提升合作水準。」524

中國應該也對不丹未接受達賴喇嘛入境而感到滿意，雖然後者的決定並不是為了安撫中國。不丹與西藏信仰的佛教雖然形式類似，仍舊分屬不同並在許多方面相互競爭的大乘佛教支派。多數接受不丹公民身分的藏人，並未對現有政教體系帶來挑戰，然而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個計畫暗殺第四任國王並燒毀廷布札西卻宗（Tashichhodzong）的陰謀被揭發，據聞許多西藏難民與一名大吉嶺藏人涉入此案。525雖然並無證據指向達賴喇嘛涉入陰謀，但由於策畫者屬於格魯派，比起不丹王室更忠於達賴。部分共謀者成功逃到印度，數十人遭到逮捕但於不久後被釋放。無論陰謀背後的理由為何，都點出不丹與藏人並非對抗中國的自然同盟。

隨著中國軟外交持續推動，新德里也謹慎觀望。然而在第四任國王任內，不丹確實重新穩固內政，同時也與其他中小型國家擴大外交領域，避免影響與印度的關係。除了印度外，僅有孟加拉與科威特在廷布設立全權外交代表團；瑞士、丹麥、瑞典都與不丹維持緊密關係；曼谷也設有不丹大使館，許多不丹家庭將孩子送來此地就學或購物。

多吉家與旺楚克家似乎已然和解，就連夏宗法王的後代也被納入新秩序中。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大型典禮上，第四任國王正式

迎娶四姊妹，年齡在二十三至二十八歲之間，這場婚禮辦在與她們私下結為夫妻的九年後。四姊妹是亞布．烏顏．多吉（Yab Ugyen Dorji）的女兒，而他是第一世夏宗法王阿旺朗傑「語」及「意」的轉世⁵²⁶，更是一九三一年神祕去世的夏宗法王晉美多吉之姪。

第四任國王婚姻故事的正式版本是，國王受預言將娶第一世夏宗法王的後代四姊妹為妻，因此國王順應預言大婚；但更可信的解釋可能是為了收編夏宗法王的追隨者。透過一次迎娶四姊妹，就不會發生其他派系利用女兒相互對抗的陰謀詭計。

四王后之一的亞希多吉．汪莫．旺楚克（Ashi Dorji Wangmo Wangchuk）在坦率描述其父親一生的作品中，意外地仔細描述她的伯祖父晉美多吉事實上是遭到謀殺。當時晉美多吉進入臥室，「他們將他壓倒在地，掐住喉嚨，踢他的下腹。夏宗法王持續掙扎，直到塞進喉嚨的絲巾讓他窒息。」⁵²⁷如此清楚的揭露，在一個世代之前還難以想像；然而今日不丹已非過往的中古時代國家。現代化的不丹享有高教育水準，以及穿越全國的優良路網。一九九九年六月引進電視與網路，正如第四世國王當時所言：「反映不丹在近年達到的進步水平。」⁵²⁸電視與網路啟用，恰與國王加冕二十五週年同慶，彰顯王室在過去數十年的經濟社會變動中已鞏固的地位。

二〇〇五年不丹通過新憲法，為選舉及更民主的制度鋪路，不丹即將成為君主立憲國家。根據憲法第二條，不丹王室是「王國與人民團結的象徵」⁵²⁹，並將持續扮演深具影響力的角色。此時，第四任國王宣布即將讓位給長子吉格梅．葛薩爾．朗傑．旺楚克，其母為三王后。二〇〇六年吉格梅．葛薩爾．朗傑．旺楚克繼承王位，第五任國王加冕典禮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於廷布的札西卻宗風光舉行。這位新任國王生於一九八〇年，在美國、英國與印度接受教育，是已經遠離中古過往歷史的新一代不丹人。

然而某些老議題依舊盤桓不去。留在不丹國內的洛昌人似乎已適應新秩序，以免有礙公民身分；部分留在尼泊爾難民營者，等待外國接納他們重新安置。美國接收了絕大多數的洛昌人，特別是在二〇〇

一年九月十一日紐約及華府遭受恐怖攻擊之後，此事並非偶然。美國法律規定每年必須接收六萬至七萬名難民，然而九一一事件後的數年皆未達到人數門檻。根據一名官員私下透露，美國必須尋求「適當的難民族群」，即是非穆斯林族群⁵³⁰，因此選項包括泰國難民營的緬甸克倫人（Karen），他們主要是基督徒；不丹的尼泊爾裔洛昌人，他們是印度教徒。這從未列入正式政策，但超過八萬名不丹尼泊爾人赴美重新安置，支持了前述假設。美國的決定是基於盡可能縮減穆斯林移民人數。

然而其他非法移民仍舊帶來問題。不丹當地英文報紙《澄清日報》（Kuensel）於二〇一六年六月十日報導：「根據國民議會立法委員會向大會提出的非法移民的相關報告指出，持續成長的非法移民，已造成國家治安的嚴重憂慮及威脅。」⁵³¹「非法移民」多指在邊境城市中幫傭的印度女性移工及印度建築工人，部分是由印度軍事訓練團與丹塔克計畫（Dantak）雇用。丹塔克計畫是印度邊境道路組織（Border Roads Organization）下的機構，專門興建不丹道路。

因此不印關係並非一帆風順。當不丹憂慮非法移民時，印度則關切中國的迷人攻勢，特別是二〇〇七年新的印不條約給予不丹更多自主時。除非中國影響超越可接受的範圍，否則印度不太可能採取行動。然而二〇一七年六月，中國軍隊帶著挖土機進入都克蘭高原（Doklam Plateau），這是靠近錫金——西藏——不丹交界的區域，被不丹與中國同時宣稱擁有。中國計畫興建跨越都克蘭高原的道路，將此地稱為洞朗，並宣稱為中國所有。進入敏感邊界區域的舉動，印度必然視之為明顯挑釁。六月十八日，印度軍隊進入爭議區域阻止道路鋪設；兩天後，不丹政府透過中國駐德里大使館向北京發出正式外交照會，抗議中國入侵。

六月二十九日，不丹再次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後者則於當日發布地圖，將都克蘭高原納入中國範圍。中國引用中英一八九〇年簽訂的條約做為支持證據，並宣稱尼赫魯已經承認；然而該條約僅定義不丹——西藏邊界的北段，而非錫金——不丹——西藏交界處。⁵³²同時

印度也派遣軍隊進入錫金，強化一般邊界防禦。邊界情勢在雙方對峙下升溫，這是一九六二年戰爭以來未曾出現的狀況。

兩位印度作者摩奴．巴拉強德蘭（Manu Balachandran）與哈利許．梅農（Harish C. Menon）在網路媒體《印度石英》（Quartz India）上發表文章，指出此議題不僅是小範圍的邊界爭議。他們認為「中國正在測試印度與不丹的關係，若印度躊躇不決，中國將展開雙臂迎接不丹，特別是不丹將外交外包給印度多年之後，如今這小國正開始追求獨立的外交政策」。533

不丹身處兩難之中。一方面，不印關係事關國家經濟、外貿與國防；另一方面，廷布也不能得罪有力的北方鄰居。八月一日，不丹駐印度大使維措．朗傑（Vetsop Namgyel）出席德里中國大使館慶祝人民解放軍建軍九十週年活動時，震驚了德里外交圈。由於不丹與中國並未建交，他在活動中現身引起高度注目。然而正如當時一名區域媒體評論員所述，此舉應視為「不丹對中國表示善意的微妙訊號」。534

危機最終於八月底解決，然而印、中以極度不同的方式，各自宣布從都克蘭高原撤軍。八月二十八日的聲明中，印度外交部表示「經雙方同意並持續加速從都克蘭對峙地點撤回邊界人員」。535另一方面，中國官方新聞社新華社則宣布，印度已將人員設備「撤回跨越的邊界……現場中國人員已證實此事，（且）中國將持續行使主權，根據歷史邊界協定維護領土主權」。536

在印度傳統友誼與中國企圖爭取更多影響力之間，不丹雖試圖保持平衡，但未來仍面對重大挑戰。此情勢將如何影響不丹內部的穩定，則仍有待觀察。到目前為止，不丹的社會經濟持續穩健成長。描述不丹發展模式時，「國民幸福指數」聽來便利又陳腐，但不丹確實成長為相對繁榮的福利國家。除了中國之外，這個喜馬拉雅山王國是印度唯一穩定的鄰居。巴基斯坦政治混亂且暴力頻傳；大眾情緒起伏與菁英之間的權力鬥爭，令孟加拉的未來迷茫難測；泰米爾人反抗運動雖於二〇〇九年落幕，斯里蘭卡仍是個未知數；緬甸在內戰與民族衝突中撕裂；尼泊爾則由一個政治危機進入另一個政治危機。隨著中

國轉型為極權統治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多數人認為正統毛澤東主義已然消逝。然而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毛澤東主義以超乎想像的猛烈力道在尼泊爾重新展開。

458 Andrea Matles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Country Studies* (Washington: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p. 253.

459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253. The website ‘National Anthem of Bhutan’, available at <http://www.himalaya2000.com/bhutan/national-symbols/national-anthem.html> (accessed on 5 November 2016) gives a slightly different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consistency’ instead of ‘constancy’, but that may be a typographical error.

460 For a complete text of the 1910 treaty, see Lyonpo Om Pradhan, *Bhutan: The Roar of the Thunder Dragon* (Thimphu: K Media, 2012), pp. 244 – 5.

461 ‘Treaty of Perpetual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Bhutan’. For a complete text of the treaty see, Pradhan, *Bhutan*, pp. 246 – 9.

462 ‘India-Bhutan Friendship Treaty (2007)’, Pradhan, *Bhutan*, pp. 260 – 2.

463 Quoted in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335.

464 Bertil Lintner, ‘China Turns on Charm Offensive for the Himalayan Kingdom of Bhutan’, *Yale Global Online*, 22 Sept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hina-turns-charm-offensive-himalayan-kingdombhutan> (accessed on 25 September 2016).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gathered in Bhutan in June 2016.

465 Thierry Mathou, 2004, ‘Bhutan-China Relations: Towards a New Step in Himalayan Politics’, *The Spider and the Piglet: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hutanese Studies* (Thimphu: Centre for Bhutan Studies, 2004), p. 392, available at <http://www.bhutanstudies.org.bt/publicationFiles/ConferenceProceedings/SpiderAndPiglet/19-Spdr&Pglt.pdf> (accessed on 15 July 2016).

466 譯者注：古魯仁波切（Guru Rimpoche），其中Guru意為「上師」，Rimpoche意為「珍寶」，因此合起來意思是「如同珍寶一般的上師」。

467 譯者注：不丹最神聖且舉世聞名的佛寺：帕羅虎穴寺（Bacho Dagchang），懸於帕羅山谷九百公尺的懸壁上，據說蓮花生大士曾騎虎飛過此地。

468 Savada, Neoal and Bhutan, p. 255: 'Following the guru' s [Guru Rimpoche] sojourn, Indian influence played a temporary role until increasing Tibetan migrations brought new cultural and religious contributions.'

469 譯者注：竹巴（Drukpa），竹為藏語druk音譯，原意為「龍」或「雷」（因為藏人認為雷聲為龍的吼叫）。十二世紀，噶舉派高僧藏巴甲熱在拉薩附近的南木建寺，據聞建寺時聽到雷聲三響，因此命名為「竹寺」（即龍寺之意）。竹巴噶舉派便由竹寺得名。後續分裂成三支，南竹巴一支進入不丹，因此不丹也稱為「竹域」，即「雷龍之國」之意。

470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255. For a more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sects and religious rivalries at the time, see Karma Phuntsho, The History of Bhutan (New Delhi, Random House, 2013), pp. 136-52. Phuntsho' s massive, 663page book is the best and most authoritativ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Bhutan.

471 Quoted in Phuntsho, The History of Bhutan, p. 224.

472 譯者注：藏語དབུས་གཙང་，漢語稱為「衛藏」。

473 Pradhan., Bhutan, p. 15.

474 Michael Aris, The Raven Crown: The Origins of Buddhist Monarchy in Bhutan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4), p. 32.

475 Aris, The Raven Crown, p. 28.

476 Aris, The Raven Crown, p. 40.

477 Aris, The Raven Crown, p. 40.

478 譯者注：庫齊比哈爾位於不丹、大吉嶺、錫金以南，孟加拉以北。一九四九年前為英屬印度統治，印度獨立後，分別併入西孟加拉邦與東巴基斯坦。

479 Phuntsho, The History of Bhutan, p. 350.

480 譯者注：英緬戰爭共有三次，此為第一次英緬戰爭。

481 For the text of the treaty, see 'Treaty of Sinchula - 1865' , and <https://bangaloregorkha.wordpress.com/documents/treaty->

[sinchula/](#)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6).

482 譯者注：通薩（Tongsa）位於不丹正中央，是不丹東西公路的關口，無論經商行軍、交通往來都需要經過通薩宗。海拔兩千兩百公尺高的通薩宗，由第一世夏宗法王所建，是掌控整個區域的關鍵，傳統上每位不丹統治者即位時，都必須在通薩宗居住一段時間。

483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261.

484 To minimize the power of the shabdrung, the druk desi decided not to recognize only one but several reincarnations of the same man. Even three reincarnations (body, mind, and speech) were sometimes referred to. See Ashi Dorji Wangmo Wangchuk, *Of Rainbows and Clouds: The Life of Yab Ugyen Dorji as told to his Daughter*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1999), p. 13.

485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262.

486 For the text of the 1910 Anglo-Bhutanese Treaty, also called the Punakha Treaty, see Pradhan, Bhutan, pp. 244 – 5.

487 Neville Maxwell, ‘Olaf Caroe’ s Fabrication of the McMahon Line’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51, Issue 32, 6 August 2016, p. 101.

488 Pradip Phanjoubam, ‘Neville Maxwell’ s “Facts” and Silences’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51, Issue No .46, 12 Novem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epw.in/journal/2016/46/discussion/neville-maxwells-factsandsilences.html> (accessed on 18 November 2016).

489 Phanjoubam. ‘Neville Maxwell’ s “Facts” and Silences’ .

490 Aris, *The Raven Crown*, pp. 121 – 2.

491 Aris, *The Raven Crown*, p. 122.

492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263.

493 譯者注：彭措林（Phuntsholing）是不丹第二大城，位於不丹西南部楚卡宗（Chukha dzong），與印度邊界城市熱崗（Jaigon）僅有一街之隔。楚卡宗是不丹的經濟金融中心，境內更有全國最大的水力發電廠，印度是唯一買主。

494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OCI No. 1105/65), 2 April 1965, declassified on 19 December 2003, p. 19.

495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 20.

496 譯者注：印度公立學校一般稱為「政府學校」（Government School），是由國家興辦提供免費教育的學校。私立學校則稱為「公學」（Public School）。一九三五年成立的德拉敦杜恩公學（Doon School）是第一所由印度人興辦的私立公學，名人校友繁多，例如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現任青年事務部部長艾亞爾、商業部長納特等社會菁英。

497 譯者注：亞希（Ashi）是不丹女性皇族敬稱，冠於姓名之前；男性敬稱為大肖（Dasho）。不丹第三任王后全名為格桑·卻登·多吉（Kesang Choden Dorji）。

498 Quoted in Nari Rustomji, *Bhutan: The Dragon Kingdom in Crisi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92.

499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264.

500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 15.

501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 16.

502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 20.

503 譯者注：宗喀語（Dzongkha）中的「宗」（Dzong）有兩層含義：一指堡壘，二指政府行政部門，特指不丹新舊首都廷布和普納卡的行政部門。「喀」（kha）字是「語言」的意思。因此「宗喀」可理解為城堡中使用的語言，或不丹官方行政部門使用的語言。宗喀語是藏語的一種地區變體，在語音和語法上幾乎完全遵循藏文傳統語音學，它跟現代藏語都源自中古藏語，因此宗喀語和現代藏語在書面形式多有相同之處，口語方面也能相互理解。一九五〇年代，在宗喀語成為國語前，不丹的公立學校一直都教授和使用丘喀語（chöke/chökey），這是以佛教《大藏經》為代表的古典藏語。此外，宗喀語與錫金語關係密切，兩種語言一定程度上可以互通。不丹（特別是農村地區）交通不便，居住分散，人口流動性小，因此語言相互接觸少。宗喀語是廷布區域使用的語言，雖衍生出數種方言或變體，但非宗喀語區的農村人口對宗喀文的識字率不高。

504 Aris, *The Raven Crown*, p. 56.

505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p. 273 - 5.

506 Sunanda K. Datta-Ray, *Smash and Grab: Annexation of Sikkim*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85), p. 51.

507 Bertil Lintner, 'Bhutan, India and the Nepalese Diaspora', *The New Asia-Pacific Review*, Vol. 3, Issue No. 2, 1997, p. 18.

508 Lintner, 'Bhutan, India and the Nepalese Diaspora' and Bertil Lintner, 'Stateless in Shangri-l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5 July 1996, p. 30.

509 譯者注：莫朗（Morang）位於尼泊爾東部邊陲，北接西藏，東接錫金與大吉嶺，南接印度比哈爾邦。賈帕為農業區，莫朗則是農產品加工及輕工業區，產品主要流向印度。

510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p. 21.

511 For an account of the insurgency in Assam, see Bertil Linter, *Great Game East: Indi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Asia's Most Volatile Fronti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4 - 203.

512 See for instance Ramtanu Maitra, 'Pakistan's Bhutan gambit worries India', *Asia Times Online*, 25 November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FK25Df03.html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and S. Chandrasekharen, 'The ULFA and Bodo militants were invited into Bhutan', 2006, available at <http://freu.blogspot.com/2006/08/ulfa-and-bodo-militants-were-invited.html>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513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Operation All Clear see '2003: Operation all Clear', 2013, available at <http://bhutannews.blogspot.com/2013/09/2003-operation-all-clear.html>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514 Anthony Davis, 'New Details Emerge on Bangladesh Arms Haul',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August 2004 (closed website, copy provided to the author by Davis).

515 Davis, 'New Details Emerge on Bangladesh Arms Haul'. For a complete list of the seized equipment, see Lintner, *Great Game East*, p. 268.

516 Davis, 'New Details Emerge on Bangladesh Arms Haul'.

517 Mithu Chaudhury, 'NIA Report Reveals NSCN(IM)-China Link', North East News Portal, 14 January 2013, <http://northeastnewsportal.-blogspot.com/2013/01/nia-report-reveals-china-link.html> (accessed on 18 December 2016).

518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search Study: Chinese-Indian Relations: 1972-1975, September 1975, declassified on 29 June 2004, p. 7.

519 Quoted in Mathou, 'Bhutan-China Relations: Towards a New Step in Himalayan Politics', p. 399.

520 Quoted in Mathou, 'Bhutan-China Relations', p. 399.

521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Research Study: Chinese-Indian Relations: 1972-1975, . p. 7.

522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49-198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9), pp. 149.

523 For the text of the agreement, see Mathou, 'Bhutan-China Relations: Towards a New Step in Himalayan Politics', pp. 410-11.

524 'China and Bhutan Hold 24th Round of Talks on the Boundary Issu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5 August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wjbxw/t1389633.shtml (accessed on 20 August 2016).

525 Rustomji, Bhutan, pp. 145-7.

526 譯者注：夏宗法王圓寂後有身、語、意三個轉世傳承世系，其中身轉世於十八世紀中葉終結，語及意轉世則持續到二十世紀。意轉世一般認為是主要的轉世傳承世系。

527 Ashi Dorji Wangmo Wangchuk, *Of Rainbows and Clouds*, p. 31. See also Norma Levine, *Love and Death: My Years with the Lost Spiritual King of Bhutan* (Kathmandu: Vajra Publications, 2011). The book is written by a Canadian woman who had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xiled (but not recognized) shabdrung who died in 2003. Some claim that he was poisoned, while the official version is that he died from cancer. He is considered by many as the last shabdrung, although some regard a young boy, born in 2003, as the newest incarnation. In early 2007, reports alleged that the boy, Pema

Namgyen, along with his parents, has been held under house arrest in Bhutan since 2005 after being invited to there from his home in India, see ‘Shabdrung’,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buddhismencyclopedia.com/en/index.php/Shabdrung>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528 ‘Bhutan TV follows Cyber Launch’,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2 June 1999, 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358230.stm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529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Bhutan (Printed at The Kuensel Corporation, 2008), p. 4. The constitution is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nationalcouncil.bt/assets/uploads/files/Constitution%20%20of%20Bhutan%20English.pdf> (accessed on 15 December 2016).

530 A US government official,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told me this in December 2014.

531 ‘Illegal Immigration Concerns NC’, Kuensel, 10 June 2016, p. 1.

532 A.S. Nazir Ahamed, ‘Did Nehru really accept the Sino-British Treaty as final word on the border issue?’ The Hindu, 5 July 2017.

533 Manu Balachandaran and Harish C. Menon, ‘Fifty years after round one, Bhutan and China are stuck in another border face-off,’ Quartz India, 4 July 2017, at <https://qz.com/1020177/50-years-after-round-one-bhutan-china-and-india-are-stuck-in-another-border-face-off/> (accessed on 13 August 2017).

534 M.K. Bhadrakumar, ‘China raps India over Doklam standoff, but dogs are on leash,’ Asia Times, 3 August 2017, at <http://www.atimes.com/article/chinaraps-india-doklam-standoff-dogs-leash/> (accessed on 13 August 2017).

535 James Griffiths, ‘India, China agree to “expeditious disengagement” of the Doklam border dispute’, CNN, 29 August 2017, available at <http://edition.cnn.com/2017/08/28/asia/india-china-brics-doklam/index.html> (accessed on 1 September 2017).

536 James Griffiths, ‘India, China agree to “expeditious disengagement” of the Doklam border dispute’.

第七章 毛主義再現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本是相當平靜的星期二。沒有人（特別是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統治圈中）會想到王國將發生任何反常之事。然而就在這天，手持斧頭、舊獵槍與土製炸彈的群眾，對尼國西部赤貧區域的羅爾帕（Rolpa）、魯孔（Rukum）及東部辛杜利（Sindhuli）的警局發動攻擊。攻擊者占領警局，搶走槍枝、彈藥與其他器材設備。

在卡巴雷（Kavre），攻擊者擄走一名高利貸，所有寫著借款人姓名的借據都付之一炬。類似事件也發生在廓爾喀縣（Gorkha），農業發展銀行當地分行遭到占領，並宣告所有借款人的債務全免。在加德滿都谷地，百事可樂工廠遭投擲汽油彈，部分建築物毀壞。全國各地出現海報傳單，鼓勵人民支持起義。尼泊爾毛派發起對抗王室的「人民戰爭」，將建立共產黨的「人民共和國」。

但起義不全然令人意外。前一年，匿名「普拉昌達」（Prachanda，意為「凶猛者」）的帕蘇巴·卡麥爾·達哈爾（Pushpa Kamal Dahal），以及巴布拉姆·巴特萊（Baburam Bhattarai）共同領導的極端基進派，與尼泊爾共產黨主流派系分裂，並指責後者是參與議會程序的「叛徒」及「修正派」。隨著極左派的分裂，尼共影響力似乎也隨著一九九四年選舉結果公布而減弱，因此政府當局發動攻勢，試圖鎮壓他們認定的左派運動餘孽。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政府向基進派重鎮羅爾帕發動「羅密歐行動」（Operation Romeo）。在十二月轉入地下前的最後訪談，巴特萊告訴尼泊爾週報《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這次的警察武裝行動，加德滿都派出約一千五百名警力，其中包含特勤部隊，在崎嶇的尼泊爾西部山區（羅爾帕），對貧窮農民進行恐怖統治。目前約有一千人遭到逮捕，其中三百人因虛構的罪名遭警方關押或被送入監獄，其他人則在嚴刑之後交保釋放。537

巴特萊在這場訪問後不久即離開加德滿都，與友人普拉昌達會合。尼泊爾共產黨（毛澤東派）就此誕生，不過其實際成立日期目前依舊不明，推測可能是早在一九九四年末，尼國西部警察鎮壓行動前就已形成。且不論組織名稱，在一九九六年二月的尼共（毛派）攻擊事件前，已經存在一個組織完善的地下毛派運動。根據普拉昌達的觀點，訴諸武裝鬥爭是「對尼泊爾共產運動中高漲的修正派一次決定性打擊。換句話說，這個偉大過程開始燃燒修正派垃圾。事實上，二月十三日起我們證明了，國際無產階級主義的真義，在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的形式中再次獲得肯定」。538

當天採取的行動明顯有經過事先詳細規劃，目的是造成最大衝擊與象徵意義。地方警察是政府壓迫人的爪牙，銀行與高利貸業者剝削貧民；以普拉昌達的角度來看，攻擊百事可樂工廠象徵承諾「將人民從直接代表帝國主義的中產買辦階級中解放出來」。539這場鬥爭如普拉昌達所說：「從二月十四日開始，蔓延全國……（同時）對抗全國各處封建勢力與受雇暴徒的行動，特別是來自農村區域，持續發動。尼泊爾的天空響徹口號，『毛主席萬歲！』『人民戰爭萬歲！』『新民主萬歲！』」540

這是一場極度惡劣的戰爭。數萬名男女在廝殺中失去生命，竟是為了追求世上多數人認為不合時宜的主張。第三世界因毛主席鼓舞而產生的起義行動，在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並不少見，然而到一九九〇年代末期與二十一世紀初還有影響力嗎？尼泊爾毛派那些華而不實的文字，讀起來也像另一個年代的事物；然而極左派與毛主席在尼泊爾政治中扎根極深。尼泊爾共產黨是尼國第一個共產政黨，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由四名尼泊爾知識青年於加爾各答成立。其中之一，普什帕．拉爾．什雷斯塔（Pushpa Lal Shrestha），或稱PL同志，成為該黨首任總書記，一般被認為是尼泊爾共產主義之父。

一九一一年，尼泊爾國王狄里布凡（Tribhuvan）即位時年僅十一歲。他在位的前幾年，尼泊爾曾經歷一段短暫的相對民主時期，當時國王僅是沒有實權的傀儡。自一八四六年起，國家就由英國的老盟友

拉納（Rana）家族世襲的首相所掌控。之後，國王透過獨立印度的支持，開始挑戰拉納家族。一場反對寡頭政權的大眾運動在一九五〇年爆發。一九五一年初，流亡印度一年並支持運動的狄里布凡國王、拉納家族與主要反對黨：尼泊爾國大黨（Nepali Congress）代表，在德里會議中達成妥協。新政府將在國王領導下成立，由尼泊爾國大黨及拉納家族分庭抗禮。國王於二月十八日返回加德滿都，二十一日宣布拉納專制統治結束，尼泊爾展開第一次民主實驗。

由於尼泊爾共產黨在推翻拉納家族上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成為合法政黨。然而當尼泊爾國大黨的武裝民兵「護衛團」（Raksha Dal）在一九五二年掀起暴動並遭到鎮壓後，尼泊爾共產黨因同情起事也遭禁止，直到四年後禁令取消，才能再次在加德滿都舉行全國大會，通過革命性黨章，鼓吹終結王室，建立共和國。這段政治開放時期十分短暫。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新任國王馬亨德拉（Mahendra）發動政變中止民選國會，解散政府，改採「評議會」（Panchayat）這個全新體系。「評議會」是以上下階級體系建立，由村莊、縣市到國家評議會，頂端則是國王。尼泊爾共產黨再次遭禁止，不過這次是所有政黨都被禁。

一九六〇年的王室政變、黨禁，以及一九六〇年代的中蘇衝突，導致尼泊爾多次共產運動分裂的開端。實際上支持王室的尼共總書記凱沙爾．榮．拉亞馬吉（Keshar Jung Rayamajhi）當時正在莫斯科參加共黨會議；而一九六一年三月，尼共在印度的達爾邦加（Darbhanga）舉行全國大會，撤除拉亞馬吉的總書記職位，次年更將他驅逐出黨。拉亞馬吉拒絕接受黨的決定，因此成立了自己的共產黨。同時，尼泊爾共產黨「主流」雖然忠於莫斯科，但普什帕．拉爾與較基進的同志們卻在中蘇衝突中支持中國。因此尼泊爾共產黨（普什帕．拉爾派）誕生，由普什帕．拉爾擔任領導，直到他一九七八年去世為止。

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受到印度拿撒爾運動啟發，賈帕縣爆發反抗事件，催生出另一個政黨：尼泊爾共產黨（馬列派）。尼共（馬列派）成立於一九七八年，在東南部平原區的比拉特那加（Biratnagar）活

動。同年，傾中運動的類似支派在東南部成立了尼泊爾工農組織（Nepal Workers' and Peasants Organization）。一九七〇年代的動亂中又浮現另一支共黨派系，是效法印度的「獨立」共產黨：印度共產黨（馬克思派），是由當時追隨普什帕．拉爾的尼共前總書記曼摩罕．阿迪卡利（Manmohan Adhikari）領軍，這支派系自稱尼泊爾共產黨（馬克思派）。

一九九〇年春，這動亂王國又陷入新一波危機。一場名為「人民運動」（Jan Andolan）的大眾起事，迫使馬亨德拉國王的長子繼承人畢蘭德拉國王同意，廢止接近絕對王權的統治。在國王最終對大眾讓步並終結舊體系前，加德滿都有超過五百名抗議者在與警方的激烈衝突中喪生。一九九一年五月，新的多黨體系成立，並舉行國會大選，而共黨各派系也由地下浮上檯面。一開始，即使是最基進的派系也參與了民主選舉程序，其代表組織，聯合人民陣線（Samyukta Jana Morcha/United People's Front）在一九九一年下議院兩百零五席選舉中贏得九席，成為國會第三大黨。當時由青年知識分子巴特萊領軍的聯合人民陣線，以「貪腐下台」及「還富於民」等不算基進的口號，吸引了許多不滿的尼泊爾青年。

然而一九九四年七月，尼泊爾國大黨組成的第一個民選政府解散國會，讓已然錯綜難解的情勢雪上加霜。同年十一月大選後，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派）領軍形成少數政府。尼共（聯合馬列派）是一九九一年由馬列派跟馬克思派的尼共聯合形成。尼共（聯合馬列派）的領袖曼摩罕．阿迪卡利成為尼泊爾新首相。尼泊爾成為除了歐洲的聖馬利諾（San Marino）外，第一個共產黨透過選舉執政的國家。

然而新的左翼政府也無法改善貧苦大眾命運、清除貪腐，執政九個月即告失敗。接著是一連串脆弱無用的聯盟，政黨間的合作是利益交換而非共同理念。重返民主之路一片混亂，一九九〇年人民運動的參與者更是挫敗無望。

雖頂著尼共（聯合馬列派）的名號，但這政黨對許多人來說確實不夠基進，比較像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並非準備帶來基進政經改革的

鬥爭組織。整個尼泊爾從一九九〇年人民運動以來，革命情緒依舊沸騰。尼泊爾基進派動向的明確指標出現在一九九二年九月，當時祕魯「光輝道路」（Shining Path）游擊隊領袖阿維馬埃爾·古斯曼（Abimael Guzmán），又被稱為貢札羅主席（Chairman Gonzalo），在首都利馬被捕，這組織自一九八〇年以來，持續不斷與祕魯政府進行激烈的武裝鬥爭。捍衛古斯曼國際緊急委員會（International Emergency Committee to Defend the Life of Guzmán）的倫敦工作人員，對收到大量來自尼泊爾的支持信件感到相當驚訝。⁵⁴¹

當時尼泊爾毛派已透過神祕組織國際革命者運動（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t Movement），與祕魯的同志接上線。國際革命者運動包含來自美國、印度、伊朗、土耳其、拉丁美洲與西歐的毛派團體，該組織期刊《贏得世界》（A World to Win）是一份內容豐富的雜誌，每年出版二至三期，刊登世界各地武裝革命鬥爭的資訊，其中包含尼泊爾。

學者史蒂芬·米克賽爾（Stephen I. Mikesell）在加德滿都的《雪山》（Himal）新聞雜誌撰文表示：

祕魯與尼泊爾之間明顯可見地緣文化類比。兩國都跨在所處大陸的山脈上，孤立村莊與高山造就廣大相異的文化傳統。兩國近期歷史上皆無外國勢力征服與占領，例如一九三〇年代的中國；卻都有大批農村原住民族受少數統治菁英宰制。因此兩國都因種族、種姓與區域因素而分裂。⁵⁴²

光輝道路游擊隊的高峰期與尼泊爾毛派武裝運動崛起期間，祕魯與尼泊爾都經歷了激烈擴大的城鄉差距。尼泊爾雖然在一九九〇年代建立民主制度，同時經濟較為開放，但薪資成長實際上停滯不前，國民生產毛額年平均成長率僅百分之二點三，這表示快速的人口成長率（百分之二點四）吃光新政府所有成就。根據加德滿都智庫，尼泊爾南亞中心（Nepal South Asia Centre）的報告，即使在首都地區，百分之七十一的財富掌握在百分之十二的家戶手中；僅有百分之三點七的國家收入流向總人口最貧困的百分之二十區間。⁵⁴³

區域差異也很嚴重。一九九〇年代，加德滿都地區每人年均收入約為兩萬一千尼泊爾盧比（約合三百一十二美元），然而西北赤貧地區僅有五千盧比，當地既缺乏道路，也沒有發展活動。外資支持的研究機構國際山岳整合發展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Integrated Mountain Development）在一份一九九七年的報告中，列出西部區域在識字率、童工、無地家戶與人均食物生產上，都是最糟糕的區域。⁵⁴⁴夏姆·什雷斯塔（Shyam Shrestha）在左翼《評估月刊》（Mulyankan）上形容尼泊爾的西北地區是「赤貧區域……主要住民馬嘉人（Magars）是非常『落後』的民族，透過前往印度擔任移工維持生活。這塊區域歷史上由小封建領主統治，直到今日，貧富之間仍保持一種中古時代關係，而這正是毛派活動的經典環境」。⁵⁴⁵

一九九〇年起義前夕，人民的廣泛不滿除了針對普遍貪腐、政治社會動盪、嘴砲政客、濫用權力而非帶來經濟成長與社會平等現象外，什雷斯塔還暗示了尼泊爾「人民運動」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尼泊爾錯綜複雜的種姓制度，以及高度多樣性的族群組成。毛派戰士主要是來自於低種姓與所謂的「落後」族群，例如山地居民蒙古族裔馬嘉人（Mongol Magars）、靠近低地狹長谷地中的塔魯人（Tharus）。毛派與其「無產階級理想」的到來，讓這些低階種姓與部落族群取得權力，統治高階種姓如巴洪（Bahuns）與切特利（chhetris），即當地的「婆羅門」與「刹帝利」種姓。尼泊爾社會中的印歐族裔上層階級，傳統上將這些人視為次等公民或者更糟。從許多毛派低階士兵的案例中不難理解，為何如此不合時宜的運動能在尼泊爾造成廣大迴響。這國家需要一場社會革命，而對許多人來說，尼泊爾共產黨（毛派）是取代古老壓迫秩序的唯一選項。

就連普拉昌達在評估頭兩年戰爭的文章中也寫道：

隨著人民戰爭發展，一種為自己權利而戰的新意識正在諸多受迫族群中蔓延，例如馬嘉族、古隆族（Gurungs）、塔曼族（Tamangs）、尼瓦爾族（Newars）、塔魯族、拉伊族（Rais）、林布族（Limbus）與馬德西族（Madhesis）……類似的……組織鬥爭浪潮

也在達利（Dalits）種姓（低階種姓族群）間快速發展並擴散。今日達利人開始反抗高階種姓印度教徒封建國家施加給他們的不人道殘暴統治。⁵⁴⁶

然而尼共（毛派）許多領袖（包含普拉昌達與巴特萊），其實都是巴洪種姓知識分子，這也與「光輝道路」高度相似，組織領袖古斯曼也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哲學系教授，而追隨者多數屬於非歐洲裔的原住民族部落貧苦大眾。同樣的脈絡令人望而生懼，同屬毛派的柬埔寨紅高棉軍（Khmer Rouge），也是受過法國教育的知識分子領導來自鄉間的貧農士兵。對都市富人恨意所驅動的力量，遠勝過意識型態。

一九五四年，普拉昌達生於喀斯奇縣（Kaski）的村莊，雖是農夫之子，仍屬巴洪種姓。這位未來的革命領袖就讀尼泊爾南部蘭姆普爾農牧科技學院，並獲得農業科學文憑。諷刺的是，他曾受雇於美國援外總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賈甲廓（Jajarkot）計畫區，此地後來成為毛派重鎮。⁵⁴⁷

巴特萊同樣生於一九五四年，在廓爾喀縣的山地區域成長，其父母與普拉昌達的雙親一樣是巴洪農民。一九七〇年，巴特萊在尼泊爾全國高中畢業考拿下全國第一名，接著前往印度求學，在昌迪加爾大學（Chandigarh University）以優異成績取得建築學士，並且在知名的德里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獲得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尼泊爾區域架構與開發落後探析：馬克思主義分析》（The Nature of Under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Structure of Nepal: A Marxist Analysis）。⁵⁴⁸他在印度求學時就成立了全印尼泊爾學生會，並擔任主席。⁵⁴⁹

他們要踏上的武裝反抗之路，始於一九九四年選前。當時聯合人民陣線重大分裂，巴特萊領導的主要團體決定杯葛選舉，而尼拉強·哥文達·維迪亞（Niranjan Govinda Vaidya）領導的較小派系則決定繼續參選，不過最終並未贏得席次。這次分裂使政府當局認定左派已趨於弱勢，後來證明這是個重大誤判。

一九九六年二月第一波攻擊之後，武裝反抗迅速被傳播到鄰近縣城，其中包含撒利揚（Salyan）、賈甲廓、卡利廓（Kalikot），以及尼國其他區域。新的口號與聯合人民陣線相對溫和的言詞或一九七〇年代的賈帕運動比較，帶有更多的火藥味：「戰！戰！戰！從頭到尾！」⁵⁵⁰

但以祕魯光輝道路為模範，並未讓尼泊爾受中國喜愛。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早起的利馬人發現祕魯首都路燈與號誌燈上吊著死狗，並寫著標語：「鄧小平，狗娘養的！」⁵⁵¹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利馬的蘇聯與中國大使館外遭汽車炸彈攻擊，主導活動的光輝道路認為莫斯科與北京的共黨領袖背叛了馬列思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光輝道路游擊隊又點燃兩個汽車炸彈，這次則是在利馬的日本與中國使館外。中國是祕魯毛派的明顯目標，而當時祕魯總統藤森（Alberto Fujimori）是日本後裔，因此被視為日本國際企業的傀儡。

普拉昌達總結尼共（毛派）「人民戰爭」一九九七年的經驗，認為武裝鬥爭的第一年已經在「包含印度的南亞革命者間」建立穩固關係，「……毛派人民戰爭獲得印度千萬人的支持，他們也正在不同邦掀起民族解放鬥爭……孟加拉與斯里蘭卡的共產革命者，也同樣支持尼泊爾的人民戰爭。」⁵⁵²

在這些據稱支持尼共（毛派）「人民戰爭」的國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國並不在其列。尼共（毛派）僅指控鄧小平將新中國領導為修正主義，而普拉昌達在自己的文章裡寫道：

在第三世界半封建、半殖民國家普遍面對剝削、壓迫與赤貧的客觀背景下，對大眾來說，除了反抗與革命別無選擇。在尼泊爾，我們首要任務是正確掌握馬列主義科學。為此，我們致力連結世界真正共產革命者發起的激烈意識鬥爭，並肩對抗毛澤東同志死後的中國反革命。以偉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大成，階級意識鬥爭的最高表現做為起點，我們將深入嚴肅鑽研。⁵⁵³

尼共（毛派）的美國支持者李．奧內斯托（Li Onesto），同時也是芝加哥《革命工人》（Revolutionary Worker）週報專欄作者，在她關於尼泊爾戰爭的書籍中也響應相同觀點，「尼泊爾毛派譴責現行中國政府，在毛澤東死後推翻並瓦解社會主義。中國政府雖明確支持鎮壓反抗行動，但也極度憂慮印度為避免毛派掌權，可能入侵尼泊爾。」[554](#)

說印度可能「入侵」尼泊爾也許有些過度。印度有其他影響尼泊爾政治的管道，例如透過與尼泊爾國大黨和其他檯面上政治人物的親近關係。中國這一方則指控尼共（毛派）扭曲毛澤東思想：「將無差別殺害平民的行為稱作人民戰爭，正是抹黑毛澤東名聲……二〇〇五年二月三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對於外媒稱尼泊爾反政府叛軍為『毛派』一事表達了憤怒。」[555](#)

中國與尼泊爾的關係，一向都以地緣政治而非意識型態為考量，中國希望打造喜馬拉雅山區策略廊道，以對抗印度在邊境區域的影響力。中尼於一九五五年正式建交，隔年八月及九月，雙方政府代表在加德滿都首次直接對談。會後，唐卡．普拉薩德．阿恰利亞（Tanka Prasad Acharya）成為後拉納家族時代中首位造訪中國的尼泊爾首相，並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舉行會談。中國同意提供六千萬印度盧比（比起無法兌換的中國人民幣，印度盧比在尼泊爾更受歡迎），協助推動尼國第一次五年計畫。[556](#)同年，尼泊爾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一九五七年一月，周恩來訪尼。由於當時中印關係尚未變質，因此中尼關係親善也未困擾印度。

一九五九年邊界爭議導致中國軍隊移往尼泊爾邊界後，中國對尼政策有了改變。中國地圖視尼泊爾領土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並宣稱聖母峰為中國所有，稱之為珠穆朗瑪峰。[557](#)當年發生西藏起義事件之後，總數超過兩萬的大批難民湧入了尼泊爾。今日多數人雖仍舊在此，還是有大量難民持續前往印度，因為環境較友善且能自由從事政治活動。

一九六〇年三月，尼泊爾首相畢許威許瓦．普拉薩德．克伊拉拉（Bishweshwar Prasad Koirala）訪北京時解決了邊界爭議，並與中國簽訂《和平友好條約》，條款之一是勘察並劃定共同邊界。次年九至十月，王室政變建立評議會體系後，馬亨德拉國王與王后正式訪問中國，會見國家主席劉少奇與總理周恩來。十月五日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尼泊爾王國邊界條約》，「締約雙方以傳統習慣邊界線為基礎，並且根據平等互利、友好互讓的原則，劃定全部邊界走向。」⁵⁵⁸

在十月十五日（國王訪問行程的最後一天）雙方簽訂協議，鋪設一條由西藏通往加德滿都的高速公路。兩國政府將各自負責興建自己境內的路段，但中國承諾將慷慨提供資金協助興建尼泊爾段。此後數年，興建團隊穿山越嶺，公路以十三世紀尼泊爾人阿尼哥（Araniko）為名⁵⁵⁹，傳說他曾將尼式建築引入西藏與中國。

這條公路於一九六七年正式開通，雖然數世紀以來舊的犛牛商旅多半沿著相同路線，這仍是第一條穿越喜馬拉雅山的高速公路。中國在西藏新建的公路系統現在不只向下延伸到印度邊界，更穿越喜馬拉雅山巔。中尼友誼橋橫跨邊境的桑科西河（Sun Koshi River），連接尼泊爾辛杜帕爾喬克縣（Sindhupalchok）柯達里（Kodari）與西藏樟木鎮。

在公路興建之前，尼泊爾一九六二年撤回駐西藏大使，改以總領事取代，藉此取悅中國。隔年一月二十二日，兩國邊界終於正式劃定。在一九六二年中印戰爭中，尼泊爾曾宣布中立，並表明不會接受任何國家入侵。尼國此訊息雖是針對中國，但仍支持中國爭取聯合國代表權，並維持與北京的關係。⁵⁶⁰一九六二年戰前，印度與尼泊爾簽訂武器協助協定，印度承諾將「為尼泊爾全軍提供武器、彈藥與設備，（並）盡速以現代化武器取代現有尼軍軍備，且就印度提供之武器設備，提供維護及替換」。⁵⁶¹

但此時尼國已經開始打中國牌，減少傳統上對印度的依賴，因為後者令許多尼泊爾人相當不安。中國明顯視尼泊爾為印度北方邊防的弱點，可用來延伸中國對喜馬拉雅山區的影響力。因此，當尼泊爾通

往西藏的公路開啟新貿易路線時，印度對此心有不滿，並在一九七〇年對尼泊爾實施邊境封鎖。雖然封鎖期不長，然而尼國經濟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一會計年度的成長率僅有百分之一點七，遠比前一年成長率百分之九點八低。⁵⁶²令印度更加苦惱的是，經過封鎖後中尼關係更形親密。

尼泊爾不像錫金，後者在外交政策上不可能脫離印度而獨立；也不像不丹有更加圓滑的折衝技巧，能在不得罪南方強鄰的情況下建立自己的認同。尼泊爾逐漸成為中印區域競爭中的馬前卒。

即使中情局支持的西藏游擊隊進駐木斯塘，似乎也未對北京共黨統治者與加德滿都王室的新友誼造成負面影響。畢蘭德拉國王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訪問中國，正是中尼在一九六〇年代與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建立的親近關係，因此尼軍一九七四年時將西藏反抗軍趕出木斯塘藏身地。同年，尼泊爾強力抨擊印度國會將錫金變更為附邦的決定，並稱印度為「擴張主義國家」。⁵⁶³中國則回報以更多道路建設計畫；一九七六年四月，尼泊爾與「中國西藏自治區」簽訂貿易協定。⁵⁶⁴

即使歷經一九九〇年動盪與廢除絕對王權後的混亂年代，無論由誰當政，中國都持續與加德滿都的當權者保持親密關係。二〇〇一年六月一日，王儲狄潘德拉（Dipendra）衝入加德滿都的納拉揚希蒂王宮（Narayanhiiti Palace），在王室每月例行聚餐中對眾開槍，導致尼泊爾情勢更加惡劣。九名王室成員死於槍殺，包含狄潘德拉的父母畢蘭德拉國王與艾許瓦莉亞王后、弟弟尼拉詹、妹妹施魯蒂與其他五名親戚。狄潘德拉自殺未遂，在六月四日傷重不治前曾短暫繼位；他死後，由馬亨德拉的另一個兒子，畢蘭德拉之弟賈南德拉（Gyanendra）宣布即位為王。

王室屠殺案後，各種陰謀論在加德滿都流傳，甚至包含了印度與中情局介入的精采版本。然而並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狄潘德拉除了對父母不滿外，是否有受到任何外力驅使。⁵⁶⁵當他持槍殺害這些家人時早已酩酊大醉，並且因吸食大麻而興奮激昂。狄潘德拉想娶拉納家族之女狄維雅妮．拉納（Devayani Rana）為妻，而她與印度瓜里爾

（Gwalior）王室也有親戚關係；然而艾許瓦莉亞王后並不贊同這段關係。屠殺事件之後，狄維雅妮．拉納為躲避媒體關注而逃往印度，現今在聯合國發展組織（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工作。

這段期間，透過一連串銀行搶劫及在控制區域的所有大城鎮（甚至國外）全面強加人民「革命稅」，尼共（毛派）成為亞洲最富裕的反抗運動者之一。根據加德滿都出版的尼泊爾文報紙《首都日報》（Rajdhani Daily）報導，即使最貧困的農民也不能免除這些賦稅，「家戶被迫依據房屋價值繳稅，而瓦頂或鐵皮屋頂的人家，比茅草屋頂繳納更多稅。反叛軍下令，非營利組織與社區組織在未取得書面許可前，不得展開任何計畫。」⁵⁶⁶

大量金錢也從國外尼泊爾人「收集」得來，特別是在印度的數百萬尼泊爾移工。移工中的主要組織「全印尼泊爾團結協會」（Akhil Bharatiya Nepali Ekta Samaj）在二〇〇二年七月因為與尼共（毛派）的關係而遭禁止。印度當局於九月七日逮捕祕書長巴姆德夫．切特利（Bamdev Chhetri），並將之遣返尼泊爾；切特利當時被認為是尼泊爾毛派在印度最重要的聯絡人。

貧困加上家鄉的政治社會動盪，迫使數萬尼泊爾人成為移工。根據報導，香港大約兩萬多人的尼泊爾社群中，存在一個小而活躍的毛派小組，並強迫收取「革命稅」。尼共（毛派）的另一種新穎做法，是向外國遊客發行販售登山許可，連同一份聲明解釋毛派成立共產共和國的努力。據估計，二〇〇二年的尼共（毛派）總收入約在五十億至一百億尼泊爾盧比之間（約合六千四百萬至一億兩千八百萬美元）。⁵⁶⁷

然而尼共（毛派）並未獲得外國政權的資金或武器協助，其軍火幾乎都由軍隊倉庫及駐站劫掠而來，部分則來自印度比哈爾邦的地下槍枝工廠。二十世紀初，毛派相關暴力已經散布到尼泊爾全部七十五個縣。魯孔、羅爾帕、撒利揚及賈甲廓等西部縣市是山區毛派的核心區域，政府勢力僅能掌控縣市中心，以及一串通往南方低地道路上

的檢查哨。即使在毛派重鎮外圍的卡利廓、代列克（Dailekh）、蘇爾凱特（Surkhet）、丹（Dang）與皮優檀（Pyuthan）等縣市，除了主要城鎮外，政府勢力幾乎不存在。

毛派接掌尼泊爾並非不切實際。然而和平協議在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簽訂，尼共（毛派）的人民戰爭突然告終，這讓多數人（特別是中國）都鬆了一口氣。⁵⁶⁸總計十年的反抗行動導致了一萬五千人死亡，超過十萬人流離失所，國家基礎建設盡成廢墟。經過內部調解人士三年的折衝談判之後，終於促成協議。尼共（毛派）的「人民戰爭」戰士將限制在聯合國監管的七個營區內；這些戰士將接受「復員」，領導人則獲得適當保護。

相對地，協議中指出：

國王將不再擁有國家權力。前國王畢蘭德拉、前王后艾許瓦莉亞及其家族成員擁有的財產，將由尼泊爾政府接管，在國家利益下透過信託加以運用。賈南德拉國王在位期間取得之所有財產（例如不同地點的宮殿、森林與國家公園、歷史與重要建築遺產等）將予以國有化。⁵⁶⁹

該協議同時訂定，應制定並執行土地改革政策：

為終結以階級、族群、語言、性別、文化、宗教及區域為基礎的歧視，並面對婦女、達利人、原住民族、少數族群（賈那賈提人 [Janajatis]）、特萊（Terai）族群（馬德西人）、受壓迫、忽視及少數族群與落後區域的問題，透過解構現行中央集權統一架構，政府應該以更包容、民主及進步的方式重新架構。⁵⁷⁰

協議並未建立尼共（毛派）極力爭取的共黨「人民共和國」，但尼共（毛派）現在可以公開活動並參與大選。尼泊爾終於獲得和平。大選在二〇〇八年四月十日舉行，尼共（毛派）在制憲議會五百七十五席競爭席次中，贏得了兩百二十席，成為最大黨。賈南德拉國王被迫於五月二十八日遜位，終結自一七六八年開始統治尼泊爾的沙阿王朝。議會決定尼泊爾將成為聯邦共和國，並於七月二十三日選出國家第一任總統拉姆．巴蘭．亞達夫（Ram Baran Yadav），一名出自尼泊

爾國大黨的醫生政治家。隨著王室終結，木斯塘的最後一任統治者晉美．多杰．帕爾巴（Jigme Dorje Palbar）也失去使用了半個世紀的王室頭銜。晉美．多杰．帕爾巴在年少時代曾支持中情局資助的游擊隊，欲將中國趕出西藏。

革命前鋒普拉昌達於二〇〇八年八月四日宣誓成為尼泊爾總理，他的內閣成員包含自己政黨、尼共（聯合馬列派）及代表南方平原本地人的馬德西人民權利論壇（Madhesi Janadhikar Forum）。巴特萊成為副總理與財政部長，另一席副總理則由尼共（聯合馬列派）的巴姆德夫．高譚（Bamdev Gautam）出任。讓尼泊爾軍方有些憂慮的是，國防部長為毛派的拉姆．巴哈杜爾．塔帕．馬嘉爾（Ram Bahadur Thapa Magar）。身為前革命派的總理向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印兩國）保證，其政黨與政府希望與大家保持友好關係，也宣示支持選舉及多黨民主制度。這些看似與早期歲月大相逕庭的表現並非無中生有；許多前同志開始懷疑，他是否也加入以前所蔑稱為「修正派垃圾」的行列。

毛派組成新政府後，中國開始重新評估尼共（毛派）。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普拉昌達在中國政府邀請下，抵達北京參加次日的北京奧運閉幕式。隨行者有擔任資訊通訊部長的尼共（毛派）成員克里希那．巴哈杜爾（Krishna Bahadur）及其他政府官員，一行人在北京停留將近一週。

尼泊爾毛派領袖應該對中國經濟發展印象深刻。他會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時說：

中尼友誼經過時間考驗。尼泊爾在地情勢正發生歷史性的變化，尼泊爾政府與人民（正）致力於國家穩定與發展，並（希望）獲得中國的支持與合作。尼泊爾將一如以往，支持中國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努力。[571](#)

二〇〇八年九月訪問紐約時，普拉昌達說明他對尼泊爾未來的願景，與一九九〇年代末期的革命語彙截然不同：「我們正進行大型實驗，不僅是為了尼泊爾或南亞，更是為了世界人民。我們共產黨人深

具彈性且動能十足，試著根據新條件發展思想。我們了解改變的動力。」 572

鄧小平思想取代了毛澤東主義，這成為普拉昌達進入主流政治後新的核心理念。他開始強調透過資本主義推動經濟成長的重要性，而非大肆讚美毛澤東的革命遠景，或高舉一九六〇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光榮。二〇〇六年普拉昌達在加德滿都與政府談判和平協定時曾受訪表示：「我們並非為了社會主義而戰，我們對抗的是封建主義。我們為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而戰。我們試著給予資本家與實業家更多利潤。」 573

中國對此自然非常歡喜。資深中國領導賈慶林向普拉昌達保證，二〇〇八年訪問中國將「對兩國及兩黨關係有正面深遠的影響」。574 過去曾譴責尼泊爾毛派為「假貨」的中國，現在希望與尼共（毛派）建立黨對黨關係。中國願意接受過去以祕魯光輝道路反鄧路線為典範的尼泊爾毛派，這並不令人驚訝。中國在後毛澤東時代的外交政策，地緣政治考量更勝過意識型態，而親近的中尼關係無疑符合中國利益。因此，若說內戰期間中國未曾與尼泊爾毛派建立聯繫，才會更令人驚訝。採取務實主義而非教條主義，這是鄧小平的指導原則。從這角度來看，他的繼承人確實踐履了相同的路線。

然而由於尼泊爾政治黨派林立的特色，普拉昌達政府的執政也不長久。二〇〇九年五月，上任不到一年的他試圖開除尼泊爾軍隊總司令魯克曼古德．卡塔威（Rookmangud Katawai），卻遭總統亞達夫反對，之後辭去總理一職。接任者是尼共（聯合馬列派）的馬達夫．庫瑪爾．尼泊爾（Madhav Kumar Nepal），他曾是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尼泊爾首屆共黨政府的副首相。

此時，尼共（毛派）已與另一個毛主義派系，尼共（團結中心 [Unity Centre]）合併，組成尼泊爾聯合共產黨（毛派）。北京政府急於和尼泊爾同志維持良好關係，邀請普拉昌達與其他毛派領袖於二〇〇九年十月訪問中國。一行人出發去北京前，普拉昌達本人說：

「這將是中尼兩個共產黨之間有史以來最高層級的會議。這次訪問不只強化兩黨聯繫，也將強化中尼長久關係。」 575

一九九八至二〇〇二年尼泊爾駐華大使拉傑什瓦爾·阿查里雅（Rajeshwar Acharya）在此次訪中後受訪表示：

確實已經展現出明顯重要性。王室廢止後，中國正在尼泊爾尋找可靠盟友，而毛派似乎願意擔任這角色。中國政策的分析脈絡，也必須考慮北京對於擴張南亞地區聯繫網絡的明顯興趣。 576

二〇一一年八月，另一位毛派，巴布拉姆·巴特萊成為尼泊爾總理。有些人對尼泊爾毛派是否揚棄革命理想存疑，而他的新經濟政策說明一切。巴特萊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小冊中玩弄尼泊爾的反印情緒，指出尼泊爾遭到「印度封鎖」，進一步指出「世界帝國主義壓迫剝削在尼泊爾的直接展現，正是印度擴張主義者的剝削與壓迫」， 577 並認為未來的道路是「接收反動階級手中的生產工具……並轉交給進步的力量」。 578

然而這些在巴特萊總理任內並未發生。現在他希望強化經濟、改善民生，並且和普拉昌達一樣強調要與兩鄰（中國及印度）保持良好關係。普拉昌達上任總理後首次出訪，是二〇〇八年九月前往印度。巴特萊在二〇一一年以總理身分訪問德里時表示：

我們誠摯感謝印度政府與人民，做為尼泊爾主要發展夥伴，在我們發展道路上的不斷支持……在尼泊爾，我們敏銳觀察到，當全球經濟停滯時，印度經濟仍持續驚人地成長。貴國已經以身作則，展現出有利政策環境支持下的領袖與決心，可以刺激出他人也能效法的經濟發展與繁榮景象。 579

同一場演講中，巴特萊也提到與中國維持良好關係的重要性：

邊界另一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也在經濟發展上突飛猛進。我們感受到兩方近鄰（印度及中國）間增加的經貿互動。我們相信跨越我國邊境的繁榮紅利，也將造福我國人民與商機。從這觀點來看，

我們認為將尼泊爾發展為兩鄰之間充滿活力的中介橋梁，共同分享榮景，將具有高度經濟價值與發展機會。[580](#)

然而毛派領袖的新方向並未受到所有人歡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普拉昌達在加德滿都一場酒會上遭前游擊隊士兵打了一巴掌，連眼鏡也摔碎了。二十五歲的攻擊者巴達姆·坤瓦爾（Padam Kunwar）遭警方架走，後來被發現遭普拉昌達人馬痛毆，倒在血泊之中。事件過後，坤瓦爾表示他之所以掌摑普拉昌達，是為了向這些背叛普通游擊隊士兵的領袖展現恨意。他們過去在山裡作戰所支持的理想，並非今日毛派擁抱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他說領袖們應該「小心大眾怒火」。[581](#)

根據部分報導，普拉昌達離開群山叢林後換得一幢紅磚豪宅，並有游泳池與羽球場。「普拉昌達同志擁有超過十億盧比的競選資金，並達成他個人的無產階級夢想。這對他的支持者來說實在是太不幸了。」前內閣部長，同時也是拉納家族主事者的帕什帕帝·舒姆什·拉納（Pashupati Shumsher Rana）在訪問中如此說。[582](#)

二〇〇六年和平協議中的一項重點，是尼共（毛派）「人民軍隊」約一萬九千名男女士兵的復員工作，但這件事一直遭到忽略。也許是因為多數人不同於領袖，都是山岳地區來的低階種姓。最初的想法是將他們編入正規軍，但遭到尼泊爾軍隊司令與尼泊爾國大黨反對，導致許多人必須自尋出路，因此這些人感覺遭到領袖拋棄背叛，也不令人訝異。二〇一六年八月，普拉昌達再次成為總理，這是一九九〇年人民起義終結絕對王權以來的第二十一屆政府。

尼泊爾長年政治不穩，導致兩個強大近鄰（印度及中國）勢必得面對直接衝突。兩國都不希望看到不穩的尼泊爾，然而各自的戰略利益卻也天差地遠。印度與尼泊爾的關係較為長久，也比中國來得深刻，就跟錫金與不丹一樣，這段關係始於英屬東印度公司。

一七六八年，廓爾喀統治者普利特維·納拉揚·沙阿（Prithvi Narayan Shah）一統尼泊爾之前，此地是小王國分立的局面。他不僅征服這些小國，也成功擊退英屬東印度公司，當時後者派遣兩千四百

人的遠征隊進入山地，援助加德滿都谷地傳統的統治者。許多英軍在抵達谷地前就敗給瘧疾，因而不得不撤兵。普利特維．納拉揚．沙阿利用宗教節慶，不受阻礙地進軍加德滿都，加冕為尼泊爾全國之王，建立沙阿王朝。該王朝至少在書面上持續統治尼泊爾直到二〇〇八年。

尼泊爾王國持續擴張領土，一七八八年占領錫金，一七九〇年代遠征西藏，因此也被迫與更強大的鄰居正面衝突。藏人向中國皇帝求援，一七九二年乾隆派兵入藏；尼泊爾轉向英屬東印度公司求助，但英國並不想挑戰擁有龐大商機的中國。中國將尼泊爾逐出西藏，甚至逼近加德滿都，尼泊爾被迫簽下羞辱的條約，失去所有西藏貿易優惠。

當加德滿都開始征服喜馬拉雅山脈以南的領土時，尼泊爾與英國再次發生衝突。一八一四年四月，尼泊爾軍隊攻擊布塔瓦爾（Butawal）警察站，並殺害十八名人員，英尼戰爭就此爆發。兩年後戰爭結束，雙方簽訂《薩加烏里條約》（Treaty of Sagauli）⁵⁸³，尼泊爾失去錫金和幾塊南方征服區域；加德滿都國王被迫接受讓英國政務官入駐首都，此舉導致尼泊爾深恐失去獨立地位。然而，英國發現部分南方區域難以統治，因而轉交尼泊爾治理，最終將之限制在大約與今日相同的邊界之內。

即使如此，國家也還談不上穩定。一八四〇年代的王室衝突，導致廓特（Kot）屠殺事件。軍隊指揮官榮．巴哈杜爾．拉納（Jung Bahadur Rana）殺害四十名朝臣，建立拉納家族的世襲首相制度，國王成了掛名元首。

接下來十年中，許多內部衝突導致中國勢力逐漸衰弱，其中最嚴重的是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之亂。加德滿都與拉薩已然緊張的關係，造成尼藏武力衝突，中國也間接受到影響。一八五六年，尼泊爾與拉薩的中國駐藏大臣簽訂條約，尼泊爾商人獲得西藏通商免關稅優惠，而藏人必須向加德滿都支付每年一萬尼泊爾盧比的貢金，尼泊爾也獲准在拉薩派駐政務官。尼泊爾放棄對北方領土的權

利，並同意尼泊爾及西藏持續做為北京皇帝的藩屬國。藏人對此條約不滿，但只能無奈接受。隨著中國持續崩解，尼泊爾與西藏開始擺脫臣服地位。此後在尼泊爾發揮主要影響力的外國由中國轉為英國；西藏也是同樣情況，雖然影響較小。584

隨著英尼關係改善，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印度軍隊起義期間（殖民政權稱之為「印度軍叛變」），尼泊爾軍隊支持英國軍隊，英國開始接受拉納政權，並返還數塊南方平原領土做為回報。尼泊爾以沙阿王朝初期國王的廓爾喀軍隊為中心，建立了一支強大軍力，軍事技巧、技術及軍工業皆效法英國模式。英國也發現尼泊爾軍隊的戰鬥能力，因此等到鎮壓完叛變，英國政府從英屬東印度公司手上接管印度後，尼泊爾成為英國軍隊重要的招募來源。

雖然英國影響力強大，尼泊爾人卻能以自己的方式維護國家獨立，這是錫金或不丹無法企及之處。尼泊爾國土較大，人口更多，拉納家族得以運用對國內事務的全面掌控，讓尼泊爾獨立於英屬印度及世界事務之外。一九三〇年代確實也曾出現過政黨，然而部分流亡至印度建立根據地，爭取較自由運作的空間。在比哈爾邦，流亡者出版一份名為《人民》（Janata）的期刊，鼓吹推翻拉納家族，支持多元種姓的民主政府。加德滿都則逮捕了五百人，指稱他們與流亡者合謀。四名領袖遭處決，其他人則判處長期監禁。

許多流亡者與印度國大黨緊密合作。一九四七年一月在加爾各答會議中，致力於推翻拉納獨裁者的尼泊爾國大黨成立。尼泊爾國大黨領袖中最重要的人物是畢許威許瓦．普拉薩德．克伊拉拉，他做為代表會見尼赫魯與聖雄甘地。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對尼泊爾反對黨來說是重大助力，因為印度並不希望維持舊秩序。拉納政權日子已近尾聲，並在之後隨國王重返高位，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大眾運動中因建立民主統治而結束。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印度與尼泊爾簽訂了《和平友誼條約》。當時拉納家族雖仍握有政權，但對國家的掌控力已大幅衰退。條約中兩國政府同意：

相互承認並尊重彼此之完整主權、領土完整與獨立……（同時）為展現印度與尼泊爾的友誼，雙方政府將於本國領土中，就產業與經濟發展之參與發展相關合約與優惠待遇，給予對方國民相同之國民待遇。[585](#)

條約也規定，印度與尼泊爾必須給予住在本國的對方國民相同權利。條約繼續規定：「尼泊爾政府得自由從印度領土或透過印度領土，進口尼泊爾國家安全所需之武器、彈藥及戰爭物資與設備。此項安排生效相關程序，應由兩國政府協商定之。」[586](#)

印度的影響力在一九五〇年代持續攀升。一九五二年，印度在尼泊爾成立軍事團，兩年後簽訂雙方外交政策聯合協定的備忘錄，更在靠近西藏邊界的哨所進駐印度安全人員。一九五二年簽訂的另一紙條約，擴大一九五〇年條約中的優惠待遇，給予印度公民移民尼泊爾、成為尼國公民的權利；尼泊爾公民也獲得相同權利。然而這紙條約卻引起尼泊爾人民不滿，他們並不想見到大規模印度移民；許多印度人也反對尼泊爾人到印度工作。對印度影響力的不滿導致尼國開始北望，尋求與中國更親近的關係。新德里提供尼泊爾高度經濟援助，同時也庇護幾乎完全流亡印度的尼泊爾國大黨。

然而在西藏高速公路興建及一九七〇年邊界封鎖事件後，印度與尼泊爾的關係再也無法回到從前。一九七八年兩國簽訂新的通商與通運權利條約，然而一九八八年尼泊爾政府與中國簽訂包含高射砲在內的軍購協定，尼、印兩國關係愈趨緊張。此時尼、中計畫將於阿尼哥高速公路以西，興建第二條通往西藏的高速公路。

根據美國學者安德瑞．沙瓦達（Andrea M. Savada）所述：

為了報復這些發展，印度將尼泊爾置於實質的貿易圍城中。一九八九年三月，正當一九七八年貿易通運權利條約即將到期之際，除了未授權貿易協議之外，印度堅持談判簽訂單一全面性條約，尼泊爾視此為扼殺經濟的明目張膽之舉。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印度宣布條約到期失效，關閉所有邊境關口，僅留入境點。[587](#)

同樣在一九八九年，尼泊爾決定讓尼泊爾盧比與印度盧比脫鉤，在此之前，印度盧比原本可在尼泊爾自由流通。而印度的報復是禁止尼泊爾使用加爾各答港的尼屬港口設備，以致來自新加坡及其他國家的石油無法運往尼國。

一九九〇年人民運動後，因尼泊爾國大黨重掌政權，兩國關係有所改善。一九九〇年六月兩國發布聯合公報，宣告恢復既有狀態，重啟所有邊界關口。尼泊爾領袖甚至說向中國購買武器的理由是「成本較低」，並建議中國暫緩最後一批送往尼國的武器。[588](#)

接踵而來的毛派起義，讓中、印兩國都難以處理。對中國來說，問題在於尼泊爾革命者以毛主席思想為領導原則所帶來的尷尬。印度則苦於自身的毛派反抗軍；後者雖根植於中印度的部落區域，但印度並不想看到兩國革命者連結。尼共（毛派）已與印度共產黨（馬列派，人民戰爭團體）建立緊密關係，後者於二〇〇四年九月與印度毛主義共產中央（Maoist Communist Centre of India）合併，組建印度共產黨（毛派）。除了從比哈爾邦的工廠取得武器外，尼共（毛派）也在印度毛派營地進行部分人員訓練。到了二〇〇一年七月，南亞的毛主義政黨組織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Maoist Parties and Organizations of South Asia）成立，其中成員包含了印度、尼泊爾、斯里蘭卡與孟加拉的毛派政黨，不丹共產黨（馬列毛派）則是「觀察員」。[589](#)

二〇〇八年之後的發展與尼共（毛派）的軟化消除了這些疑慮，同時卻也加劇中印之間爭奪對尼影響力的拉鋸戰。二〇一五年尼泊爾遭第三次邊界封鎖，印度受到譴責，此舉重挫了兩國關係。經歷數年政治角力與口水戰後，尼泊爾的制憲議會終於在二〇一五年九月二十日通過新憲法，將尼泊爾轉為由七個未命名的省所組成的聯邦國家。此舉導致馬德西人與塔魯人激烈抗爭，因為這兩個傳統上遭到邊緣化的族群，都是居住在靠近印度的南方平原。

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簡述問題如下：

關於新省界劃分、代表產生……以及公民身分相關議題皆有異議。新憲支持者……認為過度聚焦在以認同為基礎的不滿上，將威脅尼泊爾的團結、完整甚至主權。反對者的意見則根植於社會長期對尼泊爾認同的不同看法，以及尼泊爾意識的單一概念是否會對非來自山區、非使用尼泊爾語、非高階印度教社群的價值行為，造成結構性歧視。590

馬德西民間與政治團體發起的一百三十五日封鎖行動，雖贏得印度社會多數人的同情，卻是在尼泊爾大地震災後五個月發起。這場大地震造成將近九千人死亡，兩萬兩千人受傷，數萬人無家可歸，整個村落遭到夷平，加德滿都許多古老神廟也受損嚴重。中、印兩國連同許多國家提供災民協助，然而封鎖行動卻令災情雪上加霜，導致二〇一五年成為尼泊爾現代史上情勢最惡劣的一年。在這已經滿目瘡痍的國家裡，封鎖行動造成包含燃料在內的日常用品短缺。

許多尼泊爾人將邊界封鎖怪到印度頭上，因為後者確實曾批評尼泊爾新憲缺乏包容性。現在加德滿都部分政客開始指控印度煽動馬德西人。根據國際危機組織的看法：

印度內政也是因素之一。當封鎖開始的時候，一般人相信執政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透過表明比哈爾人的尼國親友利益，以此來贏得比哈爾邦選舉。這更進一步強化了馬德西人與印度人的需求，馬德西人與印度比哈爾人，根本就是一體兩面的想法。

591

印度否認指控，但毫無效果。當封鎖行動在二〇一六年二月八日結束時，尼泊爾全國的反印情緒高漲。

同一時間，中國則採取較隱微的幕後政策。中國的主要顧慮是尼泊爾內部的兩萬名西藏難民，其中部分是在一九五九年逃出的。根據專精情報與組織犯罪的德國政治學者史蒂芬·布蘭克（Stephan Blanke）刊於《簡氏情報評論期刊》的文章所述：「內部來說，西藏仍是個重要戰場。在尼泊爾，（中國）國安部成立數個非政府組織及語言學校，中國情報特務代表團經常聚會，統合對付西藏社群的行

動。」⁵⁹²《簡氏情報評論期刊》繼續引述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在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發出的新聞稿：「宣稱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公安處處長李玉泉，招募一名藏人，針對西藏非政府組織進行情報蒐集工作，後續更試圖謀殺兩名異議分子。」⁵⁹³

在官方層級上，中國協助尼泊爾成立了國立武警學院（National Armed Police Force Academy），並在辛杜帕爾喬克縣的塔托帕尼（Tatopani）成立設備精良的中國資訊中心（China Information Centre），追蹤阿尼哥高速公路沿線的反中活動。中國同時提供尼泊爾警方先進的中繼式數位無線電系統，以提升通訊能力。二〇〇二年，中國派遣軍官參與尼泊爾的「冒險訓練」；從二〇〇八年開始，尼泊爾軍方也派軍官與士兵到中國的教育機構受訓。⁵⁹⁴早在一九九九年，加德滿都靠中國大使館的協助，成立了中國研究中心，推廣中文與中國文化，尼泊爾人都可在此免費學習中文。尼中媒體論壇（Nepal-China Media Forum）是另一個長期發展尼、中關係的組織。

《簡氏情報評論期刊》裡提及由中國支持成立的非政府組織，包括由尼共（聯合馬列派）領袖馬達夫．庫瑪爾．尼泊爾成立的國際釋迦佛信徒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hakyas Buddha Faithful）。另一個據聞也接受中國援助的非政府組織名為原子（ATOM），是由尼共（毛派）中央領袖克里希那．巴哈杜爾．馬哈拉之子諾瑪爾．馬哈拉（Normal Mahara）領導。此外，還有尼中互助合作協會（Nepal-China Mutual Cooperation Society）、尼中友誼協會（Nepal-China Friendship Society），以及由尼共（馬列派）主席昌德拉．普拉克什．麥拉利（Chandra Prakash Mainali）之妻主持的非政府組織。尼中互助合作協會更進一步協助希瑪尼信託（Himani Trust）進行各種社會福利活動。⁵⁹⁵中國甚至侵門踏戶到印度的傳統勢力範圍，為畢許威許瓦．普拉薩德．克伊拉拉基金會的地震賑災方案提供協助。

在政治上，中國則積極促成尼泊爾諸多共黨派系的團結，而尼共（毛派）——現在稱為尼共（聯合馬列派）——可能是他們的首選。

二〇一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高層官員曾在尼共（聯合馬列派）領導人卡德加．普拉薩德．奧利（Khadka Prasad Oli）成為總理前與他會面，承諾提供豐厚經濟配套，協助他鞏固地位。九月奧利接任總理前，另一名尼共（聯合馬列派）的領袖伊許瓦．波克瑞爾（Ishwor Pokhrel）訪問中國，為該黨即將組織的政府尋求支持。二〇一六年五月，中國駐尼大使吳春太主持一場在加德滿都舉行的會議，奧利、普拉昌達與尼共（團結中心）的納拉揚．卡齊．什雷斯塔（Narayan Kazi Shrestha）都出席參加。當時可能會有一場內閣危機，據傳吳春太告知普拉昌達，由於奧利才剛訪問過中國，因此不適合立即下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將於當年十月訪問尼泊爾，屆時尼泊爾應由左派當政。

奧利的總理任期在二〇一五年八月四日結束。習近平的訪問行程並未如當時部分印度媒體所預測一般取消，但因為尼泊爾的政治危機而延後。十月，習近平出席了在印度果亞舉行的「金磚五國——環孟加拉灣多領域技術暨經濟合作倡議」（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South Africa and the Bay of Bengal Initiative on Multi-Sectoral Technic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當時他與奧利的繼任者普拉昌達握手致意，並承諾「將於最近的方便日期」訪問尼泊爾。⁵⁹⁶

即使一般被認為親近印度的馬德西人，也轉向中國尋求協助。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馬德西聯合民主陣線（Samyukta Loktantrik Madhesi Morcha）代表團前往加德滿都的中國大使館遞交備忘錄，表達對於新憲的抗議，希望獲得中國支持並施壓奧利政府來回應他們的不滿。馬德西人主導的政黨，尼泊爾聯邦社會主義論壇（Federal Socialist Forum, Nepal）及馬德西人民權利論壇的派系之一，都接受中國大使館資助活動，這顯示出中國總是兩方下注，避免把雞蛋放在同個籃子裡。

尼泊爾的政治始終處於混亂之中。二〇一六年七月，巴特萊與普拉昌達分裂，自行成立新黨：新力量（Naya Shakti），局勢更加混

亂。兩位毛派領袖之間的差異存在已久，知識分子取向的巴特萊並不認同普拉昌達獨攬大權的做法。然而，除了意圖建立總統直接普選制度來解決政治動盪與經常陷入危機的困境外，巴特萊新政黨的實際政策並不明晰。巴特萊同時也反對新憲，表達對馬德西人的支持，而這是受印度歡迎的立場。

即使印度仍是尼泊爾的主要外貿夥伴，並持續提供大量外援，但中國無疑已與歷任尼國政府及公民社會各界（包含政治與經濟）發展出非常特別的關係。在其他方面，中尼關係也更加靠近。二〇〇五年，中國完成青藏鐵路，連接青海省會西寧與拉薩。西寧早在一九五九年就納入中國的主要鐵路網。二〇一四年八月，路線延伸至西藏南部的日喀則，離尼泊爾邊境不遠。不斷有揣測認為路線將持續延伸到邊界的樟木鎮，甚至往加德滿都；考量到印度的敏感神經，此舉將具高度爭議性。中國也持續參與尼泊爾國內公共建設計畫，例如在印度邊境上的佛陀出生地藍毗尼（Lumbini），以及加德滿都以西從波卡拉（Pokhara）到巴格隆（Baglung）的公路建設。

尼泊爾有時被形容為「卡在兩塊巨岩之間」。尼泊爾無疑將持續強化與中國的經濟和其他關係，以實現「降低對印度依賴」的長期國家政策。然而，如同法新社在二〇一六年八月的報導指出，這仍是一條漫漫長路。「二〇一四年七月至二〇一五年六月，（尼泊爾）與印度的雙邊貿易額將近四十五億美元，這令尼中貿易額八億八千兩百萬美元相形見绌。」⁵⁹⁷但尼中貿易額正在成長，並如法新社引述智庫尼泊爾經濟論壇（Nepal Economic Forum）主席蘇吉夫·沙奇亞（Sujeev Shakya）所言：「一般感覺中國說到做到，而印度只是空談。數年來，中國因為執行公共建設的速度，在尼泊爾獲得更多信任。」⁵⁹⁸然而尼泊爾的問題是，這些計畫中多數勞工都是中國人，因此並沒有為尼泊爾創造任何工作機會。⁵⁹⁹

面對一個又一個政治危機，加上高度仰賴外援的經濟，尼泊爾很可能持續「喜馬拉雅病夫」的角色。比起任何其他鄰國，尼泊爾也可能是印度與漸趨自信的中國，在地緣政治利益上衝突最大之處。印度

尋求維持在尼泊爾的傳統影響力，並護衛喜馬拉雅山稜；中國則試圖在自己周遭建立「友善國家」，類似古代中國皇帝在帝國周圍有一群忠誠藩屬。然而印度與中國在更往東區域的迥異利益，一旦沸騰過度很可能變成公開衝突。衝突將不僅是邊界爭議，更是雙邊議題，例如布拉馬普特拉河水治理、印度洋上更寬廣的地緣政治競爭，以及面對武裝衝突時，仍舊藏身緬甸境內的中國盟友：印度東北反抗軍。

537 Quoted in Bertil Lintner, 'Nepal struggles to cope with diehard Maoist violence',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June 1999, pp. 43 - 4.

538 Prachanda, The First Glorious Year of People's War (Kathmandu: Utprerak Publications, 1998), p. 25. ., p. 25.

539 Prachanda, The First Glorious Year of People's War, p. 24.

540 Prachanda, The First Glorious Year of People's War, pp. 25 - 6.

541 Lintner, 'Nepal struggles to cope with diehard Maoist violence', p. 43.

542 Stephen I. Mikesell, 'The Paradoxical Support of Nepal's Left for Comrade Gonzalo', Himal, March - April 1993, p. 31.

543 Quoted in Lintner, 'Nepal struggles to cope with diehard Maoist violence', p. 43. Nepal South Asia Centre can be reached at http://nepalsouthasia.org/remaining_of_intro.html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See also Udaya R. Wagle,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democratic" Nepal',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and Administration,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Kalamazoo, available at <http://homepages.wmich.edu/~uwagle/IneqNepal.pdf>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544 Quoted in Lintner, 'Nepal struggles to cope with diehard Maoist violence', p. 43.

545 Shyam Shrestha, 'Nepali Cart Before Horse', Himal, September 1997, available at <http://old.himalmag.com/component/content/article/2721-NepaliCart-Before-Horse.html> (accessed on 18 December 2016).

546 Prachanda, *Two Momentous Years of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Kathmandu: Utprerak Publications, n.d.), p. 22. This book is undated, but was most probably published in 1998 (at the second anniversary of the 1996 uprising).

547 For a detailed biography of Prachanda, see, Anirban Roy, *Prachanda: The Unknown Revolutionary* (Kathmandu: Mandala Book Point, 2008).

548 The dissertation is available at <http://nepalitimes.com/news.php?id=11198#.WZFnXXcjFuU>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and for purchase here <https://www.amazon.com/Nature-Underdevelopment-Regional-Structure-Nepal/dp/8187392398>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549 For a brief biography of Baburam Bhattarai, see ‘Dr. Baburam Bhattarai’ s Biography’ , available at <http://baburam-bhattarai.blogspot.com/2010/01/dr-baburam-bhattaraais-biography.html>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550 Lintner, ‘Nepal struggles to cope with diehard Maoist violence’ , p. 44.

551 Carlos Iván Degregori, ‘The Origins and Logic of Shining Path: Two Views’ Palmer, David Scott (ed.), *Shining Path of Peru* (London: Hurst and Company, 1992), pp. 33 – 4.

552 Prachanda, *The First Glorious Year of People’ s War*, p. 67.

553 Quoted in B. Raman, ‘India & China: as seen by Maoists – part II’ , New Delhi: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15 February 2005, available at <http://www.orfonline.org/research/india-china-as-seen-by-maoists-part-ii/>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54 Li Onesto, *Dispatches from the People’ s War in Nepal* (London: Pluto Press, and London and Chicago: Insight Press Inc., 2005), p. 228.

555 Raman, ‘India & China: as seen by Maoists – part II’ .

556 *China’ s Foreign Relations: A Chronology of Events (1949 – 1988)*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9), p. 215.

557 Sanjay Kumar, *Nepal as a Factor in India's Security during Post Cold War Era* (Delhi: Mohit Publications, 2013), p. 62.

558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 216.

559 譯者注：中國稱之為中尼公路。

560 Andrea Matles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Country Studies* (Washington: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p. 186.

561 Rajeev Ranjan Chaturvedy and David M. Malone, 'A Yam, between Two Boulders: Nepal's Foreign Policy Caught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Sebastian von Einsiedel, David M. Malone, and Suman Pradhan (eds), *Nepal in Transition: From People's War to Fragile Pe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94 - 5.

562 'Over reliance on India has hit economy hard', Kathmandu Post, 22 Novem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kathmandupost.ekantipur.com/printedition/news/2015-11-22/over-reliance-on-india-has-hit-economy-hard.html>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63 Kumar, *Nepal as a Factor in India's Security during Post Cold War Era*, p. 22.

564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p. 218.

565 For a succinct account of the massacre, see Jonathan Gregson, *Blood Against the Snows: The Tragic Story of Nepal's Royal Dynasty*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2). See pp. 194 - 5: 'For a country whose history is littered with real conspiracies, it is second nature to accept anything at face value with extreme reluctance. The result is an admixture of credulity and distrust which permits no truth to be set in stone. Rather, it encourages the multiplication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an event to the point where it seems there are as many "true" variants as there are gods and goddesses in the Hindu pantheon.'

566 Quoted in Roy, Prachanda, p. 178.

567 Bertil Lintner, 'Nepal's Maoists Prepare for the Final Offensive',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October 2002, p. 37.

568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peace agreement, see ‘Unofficial Transl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onclud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 , available at http://www.usip.org/sites/default/files/file/resources/collections/peace_agreements/nepal_cpa_20061121_en.pdf (accessed on 18 December 2016).

569 ‘Unofficial Transl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onclud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 .

570 ‘Unofficial Transl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concluded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Maoist)’ .

571 ‘Chinese Premier meets Nepali PM’ , Xinhua, 24 August 2008, available at <https://marxistleninist.wordpress.com/2008/08/24/prachanda-visitschina/>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572 ‘Prachanda in New York: A Maoist Vision for Nepal’ , 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 22 October 2008, available at <http://links.org.au/node/652/7040>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73 Thomas Bell, ‘Nepal’ s “fierce one” spurns Chairman Mao and claims centre ground in peace talks’ , The Telegraph, 31 October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1532891/Nepals-fierce-one-spurnsChairman-Mao-and-claims-centre-ground-in-peace-talks.html>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74 ‘Chinese top political advisor pledges closer ties with Nepal’ , CCTV.com, 12 Octo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cctv.com/20091012/104634.shtml>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575 Quoted in ‘Prachanda makes historic visit to China’ , Lalkar, November/ Decem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lalkar.org/article/837/prachandamakes-historic-visit-to-china>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76 Quoted in Dhruva Adhikary, ‘Maoists go on pilgrimage in China’, Asia Times Online, 16 October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_Asia/KJ16Df03.html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77 Baburam Bhattarai, *Politico-Economic Rationale of People’s War in Nepal* (Kathmandu: Utprerak Publications, 1998), p. 7.

578 Bhattarai, *Politico-Economic Rationale of People’s War in Nepal*, p. 35.

579 ‘Nepal and India: Bhattarai and Singh address each other’, Nepal Monitor, 21 Dec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nepalmonitor.com/2011/10/nepal-india_bhattara.html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80 ‘Nepal and India: Bhattarai and Singh address each other’.

581 ‘Padam Kunwar suggests leaders to ‘beware of public anger’ as he admits “unlawful act’ ”,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xITPtKKS0>,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82 Quoted in Lin Meilian, ‘Maoism, borrowed and abandoned’ Global Times, 25 March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770482.shtml>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83 For details of the treaty, see Buddhi Narayan Shrestha, ‘What is Sugauli Treaty?’, mimeograph available at <https://indiamadhesi.files.wordpress.com/2008/11/what-is-sugauli-treaty.pdf>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Sagauli can also be spelled Sugauli, See also ‘Sugauli Treaty (1815) –East India Company and Nepal’ at <http://www.veergorkha.com/2012/01/sugaulitreaty-1815-east-india-company.html> (accessed on 14 August 2017).

584 For a brief account of this period in Nepalese history, see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p. 26 – 31.

585 For the full text of the agreement, se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available at

http://www.nepaldemocracy.org/documents/treaties_agreements/indonepal_treaty_peace.htm (accessed on 29 December 2016).

586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

587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182.

588 Savada Nepal and Bhutan, p. 183.

589 Se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Maoist parties and Organisations of South Asia’ , available at <http://www.bannedthought.net/International/RIM/AWTW/2001-27/AWTW-27-CCOMPOSA-Formation.pdf>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and ‘Coordination Committee of Maoist Parties and Organisations of South Asia’ , available 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oordination_Committee_of_Maoist_Parties_and_Organisations_of_South_Asia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90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 Nepal’s Divisive New Constitution: An Existential Crisis,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o.276, (Brussels: ICG, 4 April 2016), p. i, available at <https://d207landvip0wj.cloudfront.net/276-nepal-s-divisivenew-constitution-an-existential-crisis.pdf>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91 ICG, Nepal’s Divisive New Constitution, p. 23.

592 Stephan Blancke, ‘Chinese whispers—Chinese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3 July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55701947_Chinese_whispers_-_Chinese_intelligence_capabilities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93 Quoted in Stephan Blancke, ‘Chinese whispers—Chinese intelligence capabilities’ .

594 M.K. Singh, Nepal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Sumit Enterprises, 2011), p. 244.

595 This and the information in the paragraph below comes from interviews with local security officials who requested anonymity, Kathmandu, 21–3 May 2016.

596 ‘Xi Jinping “ready to visit Nepal at earliest convenient date” ’, The Himalayan, 15 Octo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thehimalayantimes.com/nepal/xi-jinpingready-visit-nepal-earliest-convenient-date/>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597 Ammu Kannampilly, ‘In Nepal’ s Himalayas, hopes of closer ties with China’ , Agence France-Presse, 25 August 2016.

598 Ammu Kannampilly, Agence France-Presse, 25 August 2016.

599 Chok Tsering, ‘Kodari Road: Implications for Nepal, China and India: Analysis’ , Eurasia Review, 1 Decem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eurasiareview.com/01122011-kodari-road-implications-for-nepal-china-andindia-analysis/>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第八章 邊疆與大洋

布拉馬普特拉河總長度將近三千公里，是世界上極長的河流之一，源於喜馬拉雅山北麓安西冰河（Angsi Glacier），穿越西藏一千六百二十公里後進入印度，往下開散為阿薩姆平原。布拉馬普特拉河接著流入孟加拉，與恆河及其他河流匯合後形成三角洲，最後注入孟加拉灣。此河在西藏稱為雅魯藏布江，在孟加拉則稱為賈木納河（Jamuna），是數億人民的生命線。因此當中國二〇〇九年在西藏興建一百一十六公尺高、三百八十九公尺長的水壩，能支持發電量五十四萬千瓦的藏木電站時，印度響起警報；此前中國一直否認任何在印度與不丹以北興建大壩的計畫。中國政府在二〇一三年一月通過計畫，於布拉馬普特拉河再建三座大壩，分別位於藏木電站上游的大古和介緒，以及下游的加查。目前中國總共提出興建二十八座水壩的計畫。

更引人注意的是，中國學者李伶在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出版的《西藏之水救中國》⁶⁰⁰書中提到，中國水利專家已針對引西藏之水進入中國中部解決旱象一事進行調查。⁶⁰¹多數中國大河都源於西藏高原，因此將支流轉向，甚至將布拉馬普特拉河水導引到長江與黃河的概念並非新創。至少從一九八〇年代起，人民解放軍就開始評估這想法的可能性。⁶⁰²雖然布拉馬普特拉河在印度段的河水，約有七成是集自邊界以南的雨水、屬阿魯納恰爾邦、錫金與不丹的支流，但中國控制三成河水的情況已足以造成印度憂慮。中國對此事的想法，從退休將領郭開接受官方報紙《環球時報》專訪的發言表露無遺，「這麼多雅魯藏布江水流入中國，實在浪費。」⁶⁰³他更宣稱印度與孟加拉因雨水過多造成洪災，因此中國若將布拉馬普特拉河轉向，三國都將受惠。

快速擴張的中國經濟需要大量電力雖可理解，但未徵詢下游國家意見之前就興建水壩，甚至可能將布拉馬普特拉河轉向，則令人不解。起初印度對中國計畫的反應相當溫和，二〇一四年三月，印度前東北區域發展部長普拉邦·辛格·葛托瓦（Praban Singh Ghatowar）

告訴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我們外交部已詢問中國並獲得回覆，河水流量將不會受影響，我們也會確保人民生活不受水壩影響。」⁶⁰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回應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所有計畫都經過科學計畫與可行性評估，對於上下游的影響都會納入全盤考慮。」⁶⁰⁵

然而許多人仍舊心存疑慮，甚至對計畫高度批判，因為中印之間並未訂定水資源分享規劃，只同意分享季風資料。中國提供的資訊不完整且經常相互矛盾，就如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所指出：「難以確認何者為真。水壩建在偏遠山谷或高山峽谷間，難見蹤影。政治、發展與環境間持續不斷的衝突，正在這些偏遠區域持續展開。」⁶⁰⁶還要納入考量的是，中國控制的河川源頭並不僅有布拉馬普特拉河，更有其他亞洲主要河流，如湄公河與薩爾溫江（Salween）。中國在湄公河上游瀾滄江興建數個水壩攔阻河水，已經對下游國家造成重大問題。另一項在薩爾溫江上游的怒江興建至少五個水壩的計畫，則因泰國、緬甸及中國非政府組織「雲南省大眾流域管理研究和推廣中心（綠色流域）」（Green Watershed）的大聲抗議而暫緩。⁶⁰⁷薩爾溫江流進緬甸後的部分河段成為泰緬邊界。

中國政府發言人稱「中國與東南亞五國（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越南）之間設有合作機制，協助協調瀾滄江與湄公河水資源永續利用與資訊分享」。⁶⁰⁸問題是，中國與下游國家所謂的「合作機制」事實上十分稀少。中國並非湄公河委員會（Mekong River Commission）成員國，這個水資源協調的跨政府組織包含了泰國、寮國、柬埔寨與越南代表，緬甸並未大量仰賴或汲取湄公河水，因此以觀察員身分出席；中國也是，然而只提供洪水期間的水位資料。中國在湄公河上游建壩時，沒有任何下游國家受到徵詢。目前中國已在湄公河上游建造了七座水壩，並計畫再建二十一座。⁶⁰⁹

中國計畫於緬甸的密松（Myitsone）興建一座大壩，位在邁立開江（Mali Hka）與恩梅開江（Nmai Hka）匯合形成伊洛瓦底江之處，而這兩條河並非源自中國。這項計畫激起了大眾抗議，二〇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登盛（Thein Sein）總統組成的半平民新政府宣布，暫緩

中緬合作的超大型水力發電計畫。造價達三十六億美元的密松大壩將是世上第十五大水壩，預估淹沒七百六十六平方公里的林地，比新加坡面積還大。⁶¹⁰密松大壩的興建計畫暫緩，象徵中緬關係開始快速惡化。在此之前，緬甸一直是中國在東南亞最忠心的盟友。

英文《環球時報》（Global Times）記者胡瑋家（Hu Weijia，音譯）於二〇一六年十月撰文主張：「印度做為布拉馬普特拉河下游國家，對於中國利用河水一事的敏感反應可以理解，然而中國不可能利用河水做為潛在武器……中印關係不應受想像出來的『水戰爭』所影響。」⁶¹¹問題是「水戰爭」已經開打；雖然並未導致武裝衝突（未來應該也不會），但這項爭議勢必將讓原本已相當緊張的中印關係雪上加霜。

印度也興建水壩來應付持續成長的電力需求，一開始是在不丹跟尼泊爾，後來則進入阿魯納恰爾邦。印度所建不丹水壩的售電營收，成為喜馬拉雅山王國的重要收入，用以支持國家發展。印度也是尼泊爾水力發電的最主要推動者，並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簽訂協議，要於尼國東部興建九十萬千瓦的大壩及電廠。在那之前三個月，印度總理莫迪才與尼泊爾簽訂第一座九十萬千瓦水壩的合約，位於尼泊爾西部。不過這些計畫並非毫無爭議，有部分政治人物與非政府組織要求終止這些計畫。⁶¹²

阿魯納恰爾邦的水力發電也充滿爭議；由於所有河流都向下流入山腳的阿薩姆低地，此地具重大發電潛力。二〇〇九年四月，印度開始在阿魯納恰爾邦上桑朗縣（Upper Siang）布拉馬普特拉河的一條支流桑朗河（Siang River）興建水壩，預計完工後將成為印度次大陸上最大型的水力發電大壩。到了二〇一〇年，當地學生組織向印度政府請願，阻止桑朗計畫與其他阿魯納恰爾邦計畫興建的水壩。政府回應這些計畫並不會取消，但是將會採取必要預防措施，以降低環境衝擊。⁶¹³

這些建在喜馬拉雅山南向河流上的巨大建築，必然將為環境帶來負面影響。然而中印的水力發電計畫間有著根本上的差異。印度是個

民主國家，這類議題可以自由討論，同時反對政府決策也是合法之舉。然而中國卻非如此，薩爾溫江水壩暫緩是少見例外，但這也是因為「綠色流域」的發起人與某些高層有聯繫，因此獲得一些活動庇護。

然而印度的優點——民主制度，也讓其容易被不必要的內部壓力影響。反對阿魯納恰爾邦建壩的行動受印度毛派利用，持續武裝反抗印度政府的印共（毛派）雖是非法團體，卻透過許多公民社會團體與其他檯面上組織進行活動。自二〇一一年起，反水壩人士阻止蘇班西里河（Subansiri River）水壩建築工程。二〇一五年四月，《印度時代雜誌》引述阿魯納恰爾邦內政局長哈利拜．帕爾第拜．喬達利（Haribhai Parthibhai Chaudhary）的話，指出印共（毛派）的上阿薩姆領導委員會「目前正在阿薩姆與阿魯納恰爾邦運作，涉嫌劫奪武器，在各地村落勒索金錢」。⁶¹⁴局長繼續談到印共（毛派）持續在阿薩姆招募訓練幹部，「這些印共幹部大肆宣傳反對阿薩姆的大型水壩。在此背景下，阿薩姆與阿魯納恰爾邦邊界已合一，成為毛派活動的新舞台。」⁶¹⁵

印度的毛派運動也許正在走下坡，也不如二十一世紀前十年那樣風風火火，但主要在中印度部落族群帶裡活動的印共（毛派），開始在阿魯納恰爾邦的部落社群中為革命語言找到新沃土。因為阿魯納恰爾邦發展快速，水力發電是經濟發展的一部分，正如古瓦哈提大學（Guwahati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阿耆．藍詹．杜塔（Akhil Ranjan Dutta）所解釋，這些計畫已遭汙染：

積極追求對企業有利的發展，最明顯的模式就是在區域中興建大型河壩。相對平等的社會已經……目睹階級分立的轉向，尤其是在政治菁英與印度統治階級合作之後……同時興起的新中產階級，如承包商、店員等，逐漸與社區脫節。⁶¹⁶

二〇一一年八月，遭到逮捕的毛派幹部向審問者透露，他們持續在洛希特與下迪邦（Dibang）谷地區域的藏身處舉行「革命會議」，這時毛派在阿魯納恰爾邦滲透的程度才為人所知。被捕毛派人士表

示，這類會議通常有一百五十至兩百名村民與幹部參與。⁶¹⁷過去數年中，印共（毛派）也與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及曼尼普爾的左派叛軍建立聯繫。根據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指揮官派瑞許．巴魯亞所說：「若毛派能對印度政府成功發動戰爭，對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是有利的。就共同敵人來說，我們與毛派有戰略共識。」⁶¹⁸從一九四〇年代反抗軍英雄伊賈姆．伊拉波特（Hijam Irabot）在曼尼普爾發起第一波革命運動開始，多數曼尼普爾叛軍都是左派。

即使如此，在阿魯納恰爾邦掀起大規模印共（毛派）起事行動的機會仍舊渺茫。就跟尼泊爾的毛派起義一樣，由於「毛主義」在中國已是過時概念，因此中國對印度毛派運動毫無興趣，更不可能支持。不過，與中國情報機構有長久關係的印度東北民族反抗軍則是另一回事。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鄧小平面向市場的改革啟動，中國不再向世界輸出革命，取而代之的是消費性商品與其他快速發展工業的產品。然而從二〇〇四年的吉大港軍火破獲事件明顯可知，中國情報機構並未放棄與印度民族反抗軍的聯繫。此一聯繫必須透過緬甸西北區域維持；一九七〇年代的那迦反抗軍，一九八〇年代的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都曾在印度軍隊行動勝利時撤退到這個區域。透過設在緬甸實皆省北部塔卡總部，向邊界對側的印度發動攻擊。

緬甸軍隊忙於應付國內其他區域的民族反抗軍，不太理會屋簷下的印度叛軍。在附近緬軍哨站放任下，二〇一四年四月，阿薩姆、那迦與曼尼普爾反抗軍在欽敦江附近的塔卡營地舉行會議。他們組成統合行動的新組織名稱十分奇特：「東南亞西部民族解放聯合陣線」

（United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of Western Southeast Asia）。此名稱著重與東南亞人民（而非印度民族）的聯繫，新聯盟主席是一名來自緬甸的那迦人卡普蘭（Shangwang Shangyung Khaplang），他已在緬甸爭取那迦部落自主長達數十年。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卡普蘭陪伴印度那迦人前往中國受訓。當印度那迦人無法維持邊界另一側的營地時，緬甸側隨即建起了聯合那迦營地。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印度那迦運動分裂，卡普蘭與穆瓦哈、伊薩克站在同一邊，兩人都曾在中國受訓。一九八〇年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成立，由伊薩克擔任主席，穆瓦哈任祕書長，卡普蘭則為副主席，然而這個聯盟注定失敗。緬甸那迦人受夠了被印度那迦人當成奴僕，因此在一九八八年將他們逐出區域，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隨即分裂為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伊穆派）及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卡普蘭派）。

失去緬甸藏身地的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伊穆派）沒有選擇，只能與印度政府進行和談，並於一九九七年同意停火。然而其主要軍火採購人安東尼·希姆瑞不顧和平協議，仍持續向中國及其他來源購買槍枝；直到二〇〇四年吉大港破獲軍火走私，才終止大批武器運入印度側那迦區域，希姆瑞本人則於二〇一〇年被捕。一九九五年希姆瑞首次造訪中國，並初步接洽中國軍火製造商北方工業公司，以及位於沿海廣東省的新利源（Xin Li Yuan，音譯）國際投資公司，後者是軍火買賣中間人。希姆瑞也常在雲南瑞麗會見中國情報官員，其中一位匿名「張艾倫」（Allen Chang，音譯）⁶¹⁹希姆瑞在泰國的軍火走私販是烏提功。「威利」·納烏倫雅特旺尼（Wuthikorn ‘Willy’ Naurenartwanich），他試圖透過此人購買大批中國製槍枝。換句話說，烏提功是中國武器「灰」市的另一名中間人，從曼谷的中國門面公司（僅知名為「TCL」）購進武器。⁶²⁰

然而買賣最後未果。希姆瑞被捕兩年後，印度政府成功說服泰國當局，將烏提功引渡到印度。⁶²¹從那時起，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伊穆派）的活動就限於偶爾謀殺曼尼普爾邦的反對者，並向那迦蘭邦的商家、政府官員、一般人民及部分地方政客「收稅」。在停火協議之下，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伊穆派）不得在區域內進行任何暴力行動；他們的軍隊限在數個營地內，多數僅能以木槍進行操練。

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卡普蘭派）也分別在二〇〇一年與二〇一二年四月，和印度及緬甸政府達成停火協議，成為緬甸境內唯一與兩個主權國家政府訂定停火協議的武裝反抗團體。從一九八〇年代

末期、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起，緬甸政府陸續與境內許多民族反抗軍達成停火協議，雖然仍和其他團體持續交戰，例如國家最北方強大的克欽獨立軍（Kachin Independence Army）。

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卡普蘭派）維持與緬甸政府的停火協議，卻於二〇一五年三月取消與印度的協議並展開突襲。東南亞西部民族解放聯合陣線游擊隊在六月四日對曼尼普爾邦昌德爾市（Chandel）的印度軍車隊展開猛烈攻擊，殺害十八名軍人，並導致十五人受傷。突襲過後，這些來自緬甸的游擊隊又退回邊界對側的藏身地。

印度政府多年來試圖向緬甸軍隊施壓，使其對從印度過去的叛軍採取行動，卻沒有任何成果；提出兩國對反抗軍採取聯合或協調作戰的建議也遭忽略。而昌德爾突襲促使印度決定自己出手解決。六月九日，印度軍隊跨過緬甸邊境，攻擊東南亞西部民族解放聯合陣線營地。

很明顯，只要印度反抗軍不干擾緬甸軍隊，後者就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根據印度媒體刊登參與二〇一五年六月跨境作戰的印度士兵證言，這次作戰是瞞著該區的緬甸軍官，以免對方事先通知反抗軍，並宣稱好幾名緬甸軍官向印度反抗軍收取保護費。緬甸政府顯然在事後才知道印度進行的跨境行動。⁶²²

然而，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卡普蘭派）究竟為何撕毀與印度政府的停火協議，則不得而知。東南亞西部民族解放聯合陣線背後的真正主腦並非卡普蘭，七十多歲的卡普蘭之所以擔任聯盟正式領袖，只是因其年長及在緬甸那迦山區的地位；真正主腦其實是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年輕又有活力的領袖派瑞許·巴魯亞。巴魯亞來自迪布魯加爾⁶²³，是一名深具領袖魅力的前足球員，從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就加入阿薩姆地下反抗運動。現今巴魯亞多數時間都在中國雲南瑞麗或其他城市。他曾在二〇〇九年十一月被目擊出現在廣州的國際貿易展上。雲南瑞麗位於緬甸木姐鎮（Muse）北方，也是不少曼尼普爾反抗軍的基地。二〇一七年六月九日卡普蘭去世，雖由一名親近的部屬柯

雷·孔雅克⁶²⁴接任卡普蘭派領袖，但東南亞西部民族解放聯合陣線的新主席尚未產生。

非中國製武器是在邊界對側緬甸克欽邦的板瓦⁶²⁵槍枝工廠中取得。板瓦所在區域是由前緬共指揮官札昆丁英⁶²⁶控制，他在一九八八年與緬甸政府和談，轉而領導當地政府認可的民兵武力。二〇一五年緬甸大選前，札昆丁英也是緬甸聯邦議會上院民族院（Amyotha Hluttaw）的議員。身為前緬共指揮官，他擁有中國人脈，但所在的部落區域中，並沒有人知道如何製作精密武器，而這正是由中國技工操控工廠內中國機械的原因。

丁英的工廠以製造自動步槍、手槍、左輪手槍與獵槍聞名，印度東北反抗軍正是客戶之一。運送槍枝的車隊沿著密支那（Myitkyina）經過孟拱⁶²⁷及玉礦產地帕敢⁶²⁸一路西行。由此開始，為避開克欽獨立軍對貨物收取現金或實物過路「稅」，槍枝運送改行小路送往辛嘎倫坎迪以西營地。中國取得的槍枝從瑞麗走私穿過中緬邊界，以卡車通過臘戍（Lashio）、曼德勒、蒙育瓦（Monywa），再送往緬印邊界。⁶²⁹

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也以佤邦聯合軍的人脈聞名，後者接受中國武裝，並成為中國的施壓手段，用以對付逐漸傾向西方的緬甸政府。據說擁有兩至三萬武力、配備精良的佤邦聯合軍將新的中國軍火留給自己，並將舊軍火轉手賣給其他反抗團體，其中包含印度東北反抗軍。由於佤邦聯合軍領袖周圍有中國安全人員常伴左右，因此若沒有中國許可，絕不可能轉賣任何東西。雖然中國支持佤邦聯合軍主要是為鞏固在緬甸內部的立足之地，但也不能排除是以這武裝團體為中間人，提供軍火給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等組織，一如已提供軍火給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及其他緬甸團體一般。

所以，中國究竟與印度反抗軍牽涉多深？多數是間接透過軍火販子居中接洽，但至少中國情治機構對軍火流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這類交易符合中國在此區域的地緣政治利益。除了庇護巴魯亞，據悉中國情治人員也曾不只一次造訪靠近塔卡的營地。

中國也許不打算讓印度東北烽火遍地，然而在緬印關係上造成摩擦與衝突，卻符合北京利益。自從二〇一一年密松大壩暫緩後，緬甸開始疏遠舊盟友中國，並與西方及印度建立更緊密的連結；緬印關係緊密對中國並不利，因此反抗軍突襲印度與印度跨邊反擊所造成的邊界不穩，反而符合中國利益。緬甸官方對西部邊界事件興趣缺缺，對中國更加有利。這讓緬甸更趨近中國，後者並未放棄改善兩國關係的希望。

由於這原因及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如緬甸自身面對的民族反抗軍等），導致緬甸極不可能同意與印度軍隊進行任何共同對抗印度東北反抗軍的行動。在官方層次上，緬甸政府與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卡普蘭派）的停火協議仍然有效。反抗軍突襲印度及印度軍隊跨境緬甸作戰之時，卡普蘭本人正躺在緬甸舊都仰光的醫院中休養。參與緬甸政府與許多武裝反抗團體和平談判的內閣成員昂敏還前往醫院探視。⁶³⁰

印緬邊界比喜馬拉雅山區更可能成為下一波軍事行動的場域。一九六二年戰後，阿魯納恰爾邦與西藏之間唯一的潛在嚴重衝突，發生在一九八六年七月。當時一名印度巡邏兵發現四十名中國士兵在松多朗朱河谷（Sumdorong Chu）蓋起類似永久建物。印度認為這處河谷屬於印度領土或位在邊界上，並派出更多軍力監視當地發展。到了八月，中國在當地蓋了一座直升機停機坪。

為了消解情勢，印度建議若中國在即將到來的冬天撤出當地，來年夏天印度軍隊將不會進入該區，但北京拒絕了此項提議。⁶³¹當時印度軍隊參謀長克里希納斯瓦米．桑達吉將軍（Krishnaswamy Sundarji）決定該是展現印度力量的時刻，因此派出一個旅進入邊界南緣的吉米塘（Zeimithang），「獵鷹行動」（Operation Falcon）就此展開。印度軍隊在俯視松多朗朱河谷的山頂上建直升機停機坪，重機槍就定位，並向附近區域派出長程巡邏。根據當時在邊界值勤的一名印度軍官回憶：「桑達吉想向中國展現，此時並非一九六二年。他想伸展肌肉，讓中國知道今日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印度軍隊。」⁶³²

當時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對於東北邊界發展有所警覺，因此於十月前往當地。然而他卻無法進入吉米塘，因為軍官表示「天候不佳」，直升機無法降落吉米塘，只能在達旺接受簡報。據聞總理說：「不錯的簡報，但我不相信。」⁶³³桑達吉卻未退縮，甚至加派更多軍力與重兵器進入當地。

到了一九八七年初，中國也調遣兩萬名軍力進入俯視松多朗朱河谷的山區，中印士兵在棒山口與其他山口幾乎可說是直接對峙，情況一直未獲緩解。直到印度外長納拉揚．杜特．塔瓦利在同年五月前往北韓首都平壤的路上中停北京。後來兩國決定八月五日於棒山口會面，以會談而非武力衝突的方式，解決邊界事件。

像桑達吉這樣由印度軍人挑戰民選政府領袖之事，實在極端少見；但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事件正是其中之一。一九九九年桑達吉將軍去世時，《今日印度》（India Today）雜誌刊出一篇訃聞如此形容他：

在歷史上地位也許是由較不為人知的「獵鷹行動」所奠定……西方外交官預測將有戰爭，拉吉夫．甘地總理的顧問指控桑達吉的魯莽必須為此負責。然而將軍屹立不搖，甚至告訴一名拉吉夫資深幕僚：「若你認為未能獲得專業妥適的建議，可以另作安排。」官員們就退讓了，中國也是。⁶³⁴

松多朗朱河谷衝突後，中國在應對印度時更為謹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拉吉夫．甘地應國務院總理李鵬之邀，前往中國正式訪問。這是從拉吉夫的外祖父尼赫魯一九五四年十月訪問北京之後，印度總理再次訪中。拉吉夫與中國高層領袖會晤，攀爬長城，並在兩日後的國宴上出現精緻蔬果雕刻，分別以龍（象徵中國）與孔雀（象徵印度）代表兩國和平。⁶³⁵也許是因為不久前的邊界衝突，印度總理獲得最高規格接待。一九六二年後，中國確實經歷許多改變，而印度也是。

拉吉夫．甘地的訪中行程，是標誌著中印關係解凍的里程碑。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回訪德里；高層互訪在整個一

九九〇年代中成為常態。一九九三年九月，當時的印度總理納拉辛哈．拉奧（Pamulaparti Venkata Narasimha Rao）訪中，就維持喜馬拉雅山區和平安寧一事簽訂協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印，兩國同意在共同邊界上執行一系列增進互信的行動。[636](#)

經過數十年衝突，中印關係終於有所改善。縱然有重大進展，但也再次清楚展現出兩國是截然不同的文明，政治體系也難相容。拉吉夫．甘地訪中時，許多人期待邊界問題有所突破，結果卻未發生。一九六〇年，中國曾提出東西領土直接互換，其中印度必須放棄西方的阿克賽欽，以此讓中國接受喜馬拉雅山稜線或麥克馬洪線做為東方邊界。換句話說，實質控制線將成為新的劃定邊界。[637](#)

對中國來說，要接受這筆買賣並不困難，因為當時中國並無人敢反對政府的關鍵戰略決策；印度卻不同，做為民主國家，領袖政客必須在選舉中面對一般大眾。任何印度政治家膽敢提議放棄阿克賽欽的既有領土，交換中國承認印度實質控制下的東北邊境特區主權，無疑是政治自殺之舉。讓問題更加複雜的是，一九八五年起，中國更在宣示中加入要求取得達旺地區。印度視此為更廣的包圍策略，其中包含入侵不丹的可能，將使印度的處境更加脆弱。[638](#)

二〇一四年十月，莫迪的新政府宣布一項計畫，將在阿魯納恰爾邦興建超過兩千公里的新道路，改善公共建設，協助發展偏遠忽視的區域。政府同時也承諾將規劃更多經費，建設學校、診所與橋梁，並改善電訊。出身該邦的內政局長奇蘭．里吉竹（Kiren Rijiju）稍後告訴《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邊界附近的人民持續向下移居到社會建設較好的地方。當地人不應被迫外移。」[639](#)然而這些路都不會通向中國。里吉竹告訴《彭博商業週刊》：「我不想連向中國，我們並沒有做任何破壞關係的事。這並非要向中國挑戰或競爭，而是保衛我們自己的領土。」[640](#)

中國政府立刻回應印度的計畫。十月十四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我們仍須確認細節。中印邊界議題是殖民歷史所留下，我

們必須謹慎應對……在有最終解決方案前，我們希望印度勿採取任何進一步讓情勢複雜化的舉動。」⁶⁴¹

二〇一五年二月，在莫迪訪問阿魯納恰爾邦首府伊塔那葛後，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劉振民說：「中國政府從未承認印度單方設立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⁶⁴²中國國家新聞社新華社也以相同脈絡報導：「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主要建立在中國西藏的三個區域：門隅、珞隅及下察隅，目前由印度非法占領。此三隅位於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及中印傳統疆界之間，一貫為中國領土。」⁶⁴³

即使中國近年來言辭不再如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那般粗魯狂猛，但其立場依舊不變，並且根本上從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西姆拉會議之後就未曾改變。然而面對印度在阿魯納恰爾邦任何醒目動作，今日的中國除了發出這類官方聲明，以及偶爾派出跨境巡邏顯示自己仍不承認麥克馬洪線外，並不可能多做些什麼。印度的邊界防禦愈趨強悍，這類侵入不過是騷動之舉。因此邊界談判的僵局很可能持續無解。

雙邊關係中比較棘手的議題是印度的西藏流亡者。一九八八年拉吉夫·甘地訪中時，中國將大半時間都花在西藏議題上。訪問結束後雙方簽署聯合新聞公報，上面寫著：「中國對一些西藏人在印度進行反中的活動表示關切。印度方面重申其政府長期和一貫的政策，即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不會允許這些藏人在印度進行反中政治活動。」⁶⁴⁴

接著中印聯合宣言的語氣更加強烈，根據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高龍江所說：

等到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李鵬訪問印度時，在最後公報裡，中國對於「關切」的表達由一九八八年公報的十四個字，延伸成四十九個字：「中國關切在印藏人持續的反祖國活動，重申西藏為中國不可分割領土，嚴禁任何分裂中國、追求西藏『獨立』之企圖與行動。」⁶⁴⁵

透過將印度的西藏活動連結到「分裂中國」，北京確實正強化對德里的壓力，而不是緩解情勢。

即使簽訂這些友誼合作宣言，雙方在處理西藏流亡者議題上差異十分明顯。對中國來說，鎮壓示威與其他形式的公眾抗議是標準程序；然而正如高龍江指出，印度只能在很有限的範圍內對言論自由施加限制，「無論如何，印度的核心政治價值是自由主義，視言論與行動自由為應然人權。」⁶⁴⁶

印度最多只能限制，卻無法禁止西藏流亡者進行政治活動，這讓全世界知道發生在西藏人故鄉的事。從一九八七年九月到一九八九年三月之間（亦即拉吉夫·甘地訪中行的前後期間），西藏受一系列支持獨立抗議事件所震動。這些抗議證明，即使在區域經濟發展之下，藏人並未比一九五九年時更支持中國統治。抗議者在暴動中遭到殺害或受傷，所有外國人（包含記者）都被逐出西藏。

其中最血腥的事件發生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根據中國官方說法，僅有十多名抗議者死於治安警力的鎮壓之下；然而一位在動亂時以中國記者協會代表身分前往西藏的中國記者，在定居法國之後告訴媒體，他握有一份公安局與西藏軍區指揮部的報告。日期是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一日，內容寫著：「三百八十七名拉薩居民死亡……多數遭到槍殺……七百二十一名傷者，兩千一百人遭逮捕或拘押……三百五十四人失蹤……八十二名宗教人士死亡，三十七人受傷，六百五十人遭逮捕或拘押。」⁶⁴⁷

除了緬甸邊界的地緣政治利益外，對於藏人、達賴喇嘛及流亡追隨者活動的關切，是中國持續與印度東北反抗軍維持關係的另一個原因。這是向印度施壓的途徑，也是中國在雙邊議題（包含水資源分享）上施力的槓桿。中國也許不會承認，但他們同意讓派瑞許·巴魯亞及其同志進入中國，接觸不怎麼黑的軍火黑市，確實足以讓印度坐立不安。更進一步讓印度惱火的是，當阿魯納恰爾邦居民進入中國時，當局持續發出以訂書針固定的簽證。

另一方面，兩國快速的經濟發展也為雙方關係創造全新局面，中印之間的貿易蓬勃發展。中國成為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也在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的架構下合作。中印雙邊貿易總額，在二〇一五至二〇一六年到達七百零七點三億美元。印度主要從中國進口電子器材、電腦硬體周邊、肥料、電子設備、消耗品、化學品與藥物原料；出口到中國的有礦產、鐵、鋼、錫、生皮、皮革、塑膠與棉花。然而在此貿易關係中，中國是主要受益者；印度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從前一年的四百八十四點八億美元，上升至五百二十六點八億美元。⁶⁴⁸中國在亞太區域逐漸強勢的經濟及政治角色，難免將招致區域其他國家的關切。南中國海爭議中，一邊是中國，一邊是其他東南亞國家與美國，引發了許多國際關注。同時中美爭奪太平洋諸島國，以及周邊廣大經濟海域的拉鋸戰也方興未艾。然而一場可形容為新冷戰的情勢正在印度洋醞釀；中國與印度的戰略利益將迎頭對上，而印度、日本、美國與澳洲的非正式結盟逐漸浮現。

中國對於打開一條通往印度洋廊道的興趣，早在一九八五年九月就已提出，當時中國正由僵硬的社會主義移向以市場為主的經濟制度。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潘奇在為官方喉舌的《北京週報》上，探討為中國西南內陸共有一億六千萬人的雲南、四川、貴州，尋求通過緬甸直達印度洋，以此打通對外貿易出路的可能性。⁶⁴⁹潘奇在文章中提及以緬北密支那及東北的臘戍為鐵路接點，伊洛瓦底江也是運送中國貨品的可能渠道。

仰光與北京的第一份邊貿條約在一九八八年八月初簽訂，數天後緬甸全國爆發民主運動。民主運動遭到鎮壓後，西方對緬甸施以制裁，中國卻為這可能在內外壓力下垮台的政權帶來貿易、借款與信貸。除了成為緬甸最主要的外貿夥伴外，北京也向緬甸輸出超過價值十四億美元的軍事設備，更承諾將升級緬甸在印度洋上的海軍設施。相對地，緬甸軍政府則讓海軍使用中國提供的設備，在關鍵的原油運輸海道蒐集訊號情資，並將之提供給北京。區域內的戰略平衡開始偏向中國。除了印度外，美國也越發關注這些發展。從緬甸海岸通往中國的油氣管道建設工程，更加深西方與印度的焦慮。

西方制裁也許不像許多觀察家所主張的，將緬甸的經濟與戰略關係推進中國手中；然而這政策確實讓中國更輕易施展對緬甸的圖謀，相對也讓西方重新思考對緬政策。美國的戰略考量，早在一九九七年六月就由安全專家暨前中情局分析師馬文．歐特（Marvin Ott）於《洛杉磯時報》撰文總結：「華府可以也必須公開譴責緬甸暴行；然而仍必須考量其他安全與國家利益議題……此刻正是嚴肅思考其他可能性的時刻。」[650](#)

並非人權與民主等議題，而是出於地緣政治考量，這才是華府對緬政策轉向的原因。同時，許多緬甸軍方強硬派也對於高度仰賴中國心生不滿。為了理解緬甸政策轉向，必須跳過二〇一〇年大選後成立的民主表象。早在二〇〇四年八月，一份認定是知名的緬甸國防綜合大學（Defense Services Academy）研究員昂覺拉（Aung Kyaw Hla）中校所寫的機密軍事文件，已在緬甸內部流傳。主題是「緬美關係研究」，三百四十六頁的內容核心主旨，在於緬甸近年仰賴中國做為外交盟友與經濟庇護，已造成威脅國家獨立地位的「國家危機」。根據這份文件，緬甸只有進行政治改革，以民選政府取代軍政府，才可能與西方關係正常化。昂覺拉建議，如此緬甸政府才有更好的條件應對外在世界。[651](#)

此建議確實成功了，雖然轉向著實費了些功夫。直到二〇一〇年十一月緬甸舉行大選，緬美關係才開始改善。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初，美國國務卿希拉蕊高調訪緬，距上次美國高層領導人訪問緬甸已超過五十年；歐巴馬總統緊接著在二〇一二年十一月訪緬。二〇一三年五月，登盛成為一九六六年以來，第一位訪美的緬甸總統。

緬甸與西方的外交互動，特別加上停止了密松大壩計畫，促使中國開始尋求搶救中緬關係的新途徑。二〇一二年，中國學術期刊上刊載了數篇文章，分析北京對緬政策的錯誤及修正建議。提議之一是在緬甸發起公關活動，改變目前中國在緬甸的負面形象，並保證協助政府的和平進程。許多國家在財務上支持和平進程，大批西方非政府組

織出任緬甸政府和平委員會的顧問，但只有中國能同時拿出紅蘿蔔跟棍子：援助、借款、貿易，以及給佻邦聯合軍的槍。

中國無法放棄新贏得的印度洋通道，因此緬甸對北京的戰略重要性無庸置疑。全世界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原油運輸都要通過印度洋，從中東油田運往中國、日本與區域內其他強勢經濟體。同樣地，亞洲工業國家與世界各地間百分之七十的貨櫃運輸，也要通過印度洋。當大西洋貨運量逐漸下滑、太平洋貨運量相對穩定時，印度洋的貨運量正在上升。這片海洋的部分區域，特別是西方的非洲之角⁶⁵²區域與東方的麻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海盜活動十分盛行，恐怖分子運送武器前往區內不同衝突地點，導致更緊密的區域合作。然而對印度洋穩定來說，存在著更根本的地緣政治威脅。除了美國外，日本與印度也不信任中國。對印度來說，一切始於諸多邊界衝突，最終導致一九六二年戰爭；日本則是數十年來持續與中國爭奪東海一串島群的所有權，日本稱為尖閣諸島，中國則稱釣魚台列嶼。

日本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由首相安倍晉三開始主政，印度總理莫迪於二〇一四年五月上台；隨著兩位民族主義者當權，戰線與結盟關係更加明顯。海軍區域合作實際上始於二〇〇七年的年度聯合軍演，一開始參與的印度、日本、澳洲、新加坡與美國，在日本外海以相對非正式的方式進行「馬拉巴軍演」（Exercise Malabar）。二〇一五年「馬拉巴軍演」升級，在莫迪與歐巴馬的同意之下加入更多參與者，美、印、日的聯合軍演則是在孟加拉灣舉行。

印度擁有區域中最強的艦隊，包含航空母艦、潛艇與超過九十種不同船艦。印度海軍此刻正進行潛艇船艦的現代化升級作業，特別是能偵測外國潛艇的船艦。中國則在區域內投資許多港口興建計畫：緬甸的皎漂港⁶⁵³、孟加拉的吉大港、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⁶⁵⁴，以及最重要的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⁶⁵⁵。瓜達爾的深水港結合一九七九年開通的喀喇崑崙公路⁶⁵⁶，連接起巴基斯坦北部與新疆地區，將給予中國西部直接進入印度洋的通道。中國基本上是個大型陸上帝國，對比國家幅員來說，海岸線相對短少；它的內陸省必須依靠周邊國家的通

道，才能與外在世界進行貿易。緬甸的皎漂港對雲南及其他西南省也是同樣功能，這些省分通往中國自家港口的距離太過遙遠。中國也計畫開闢一條從西藏穿過錫金通往加爾各答港的貿易路線，然而並未獲得印度歡迎，可能永遠無法實現。

由於緬甸政府新的外交政策，加上不願再被視為中國屬國，皎漂港設施與中國興建從皎漂港通往雲南的中緬油氣管道⁶⁵⁷的未來因此渾沌不明。中國目前多數原油供應都必須通過麻六甲海峽，興建中緬油氣管道就是為了避免受麻六甲海峽箝制。因此雖然中國持續讓武器流向佉邦聯合軍及印度東北地區，其實也不想看到另一場戰爭爆發。這是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向周邊鄰國施壓展現影響力的方式。

中國的興趣雖然看似以貿易與經濟發展為主，但以中東原油供應運輸對中國的重要性來看，也難怪北京會尋求建立防護傘，保障交通生命線。二〇〇五年，美國博斯艾倫諮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提出「珍珠鏈」概念來描述中國在印度洋的港口計畫，此刻更加入非洲之角國家吉布地（Djibouti）的奧博克港（Obock）。⁶⁵⁸中國稱這項新計畫為「海上絲路」與「一帶一路」，並重申其目的是在區域內和平推動貿易。⁶⁵⁹

中國自己承認，奧博克港計畫將成為反海盜行動基地，由中國船艦在區域內執行，並不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然而奧博克將會成為中國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中國飛機將在此部屬，瓜達爾港也設有機場。兩者結合表示中國空軍將於海外擁有更大的行動自由。美國已在區域內部署，包含吉布地與印度洋上的英國屬地：迪亞哥賈西亞島⁶⁶⁰。一九七〇年代，美國在此建立大型海空軍基地，並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中頻繁運用此島。

同一時間，印度洋上已經觀察到中國潛艇出沒，主要是在麻六甲海峽以北的安達曼與尼可巴群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印度海軍表示每個月至少遭遇中國潛艇一次。考慮到印度洋上的中國貿易與油運量，這並不令人驚訝；然而相較於二十年前中國未曾在此

出現，對這片水域來說這是全新發展。現在印、美攜手合作偵查中國潛艇蹤跡。

法國則是另一個幾乎不為人知、親近印度及美國的印度洋強權。印度洋上有兩塊法國海外屬地：馬約特島⁶⁶¹與留尼旺島⁶⁶²，因此兩島也是歐盟的一部分。此外，法國還控制較大的凱爾蓋朗島、較小的聖保羅與阿姆斯特丹群島、克羅澤群島⁶⁶³及一群馬達加斯加附近的小島。只有馬約特與留尼旺島上有永久住民，但其他島嶼都駐有法國軍隊與研究人員，凱爾蓋朗島上更設有衛星觀測站。總體而言，法國在南印度洋上的專屬經濟海域超過兩百五十萬平方公里。

這個非正式聯盟中另一名夥伴：澳洲，擁有爪哇島南方的聖誕節島（Christmas Island）及印度洋中的科科斯（基林）群島（Cocos [Keeling] Islands）。這些領土的人口加總不過三千餘人，但科科斯島上卻有一座大型機場跑道，並廣設電子監測設備。⁶⁶⁴根據報導，美國有意以科科斯島做為無人機基地，監測區域的海上交通；中國必然視此為針對性舉動。澳洲也提議允許印度海軍使用科科斯島上設備。

中國在印度洋的長期計畫尚未明朗，特別是將來會否興建更多港口，以及哪些港口將由中國軍隊實際使用。然而中國已進入印度洋的事實，在各個層面上促使印度必須提升其印度洋艦隊，並與區域內其他國家合作。雖然印度洋的情勢並不如南海或東海令人憂慮，但無疑將成為新冷戰的焦點——這個人盡皆知卻鮮少議及的情勢。

部分西方學者反駁區域內正上演新的「大博弈」。⁶⁶⁵然而正如坎培拉澳洲國防學院（Australian Defense College）的史都華．肯尼上校（Suart Kenny）指出，「新大博弈」已在「歷史猜疑與當前競爭中成形」。⁶⁶⁶這與喜馬拉雅山區的邊界爭議有關；與競逐尼泊爾、不丹及緬甸的影響力有關；與跨越邊界的反抗軍有關；與水資源分享有關；更與印度洋上的戰略對峙有關。這一次，競爭非在沙俄帝國與大英帝國之間，而是歷經漫長又複雜的暴力歷史後，由獨立印度與共產中國上演，後者已從饑荒、混亂與無政府狀態中興起，一躍成為今日世界的新經濟強權。

600 Li Ling, Xizang zhi shui jiu Zhongguo: Da xixian ‘zai zao Zhongguo’ zhanlüe neimu xianglu [Save China through water from Tibet: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Great Western Route ‘Rebuild China’ strategy] (Beijing: Zhongguo Chang’ an chubanshe, 2005).

601 Binoda Kumar Mishra, ‘China Eyes Brahmaputra Waters’, Lookeast, September 2010, p. 23. See also Marcus Nüsser (ed.), Large Dams in Asia: Contested Environments between Technological Hydroscapes and Social Resistance, available at <https://storage.googleapis.com/vjaystnboufufn.appspot.com/large-dams-in-asia-contested-environments-between-technological-hydroscapes-and-social-resistance-advances-in-asian-human-environmental-research-PDF-a9a66.pdf> (accessed on 26 December 2016).

602 Brahma Chellaney, Water: Asia’s New Battleground (Washingt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35. See also Michael Buckley, Meltdown in Tibet: China’s Reckless Destruction of Ecosystems From the Highlands of Tibet to the Deltas of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193.

603 Quoted in Buckley, Meltdown in Tibet, pp. 194 – 5.

604 Quoted in Navin Singh Khadka, ‘Megadams: Battle on the Brahmaputra’, BBC, 20 March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26663820> (accessed on 26 December 2016).

605 BBC, ‘Megadams: Battle on the Brahmaputra’, 20 March 2014.

606 BBC, ‘Megadams: Battle on the Brahmaputra’, 20 March 2014.

607 Tom Fawthrop, ‘Southeast Asia’s Last Undammed River in Crisis’, thethirdpole.net, 26 Octo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thirdpole.net/2016/10/26/southeast-asias-last-major-undammed-river-in-crisis/>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608 Hu Weiya, ‘No Need for Concern in India over China’s Blockage of Brahmaputra River Tributary’, Global Times, 10 October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10346.shtml>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6).

609 World Rivers Review,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s of China's Upper Mekong Dams', Decem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internationalrivers.org/resources/8477>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610 Bertil Lintner, Burma Delivers its First Rebuff to China, YaleGlobal Online, 3 October 2011, available at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burma-delivers-its-first-rebuff-china>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11 Hu, 'No Need for Concern in India over China's Blockage of Brahmaputra River Tributary'.

612 Ramesh Bhushal, 'India and Nepal Sign deal to Build another Mega-dam', thethirdpole.net, 27 Novem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thirdpole.net/2014/11/27/india-and-nepal-sign-deal-to-build-another-mega-dam/> (accessed on 21 December 2016).

613 Sify News, 'Assam Dam Project May Continue: Jairam Ramesh', 12 August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sify.com/news/assam-dam-project-may-continue-jairam-ramesh-news-national-kimpEcidiaa.html>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14 Prabin Kalital, 'Subansiri dam is the new theatre of Maoist activity', Times of India, 30 April 2015, available at <http://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guwahati/Subansiri-dam-site-is-new-theatre-of-Maoist-activity/articleshow/47101239.cms> (accessed on 26 December 2016).

615 Prabin Kalital, Times of India, 30 April 2015.

616 Akhil Ranjan Dutta, 'Equitable Justice Development and Rise of the Maoists in Northeast India', Wasbir Hussain (ed.), Northeast India: The Maoist Spread (Guwahati: Worldweaves India, 2014), p. 41.

617 Wasbir Hussain and Arunav Goswami, 'Maoists in Assam: Filling the Void Created by Rebels in Peace Talks And Truce', in Wasbir Hussain (ed.), Northeast India: The Maoist Spread (Guwahati: Worldweaves India, 2014), p. 108.

618 Quoted in Dutta, Equitable Justice Development and Rise of the Maoists in Northeast India', p. 44.

619 Interview with a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officer who wished to remain anonymous, 15 October 2016.

620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arms deal, see Bertil Lintner, *Great Game East: India,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Asia's Most Volatile Fronti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20 - 1.

621 Rahul Tripathi and Dipanjan Roy Chaudhury, 'Extradited Thai National Wuthikorn Naruenartwanich sent to NIA's custody till December 21', *The Economic Times*, 11 Decem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5-12-09/news/68899905_1_naruenartwanichbangkok-extradition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622 Bertil Lintner, 'Mysterious Motives: India's Raids on the Burma Border', *The Irrawaddy*, 30 June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irrawaddy.com/news/ethnic-issues/mysterious-motives-indias-raids-on-the-burma-border.html> (accessed on 10 December 2016).

623 譯者注：迪布魯加爾（Dibrugarh）位於上阿薩姆邦，布拉馬普特拉河南岸，是阿薩姆邦的第二大城，有印度茶都之稱。位於阿薩姆東緣，上控阿魯納恰爾邦，下連那迦蘭邦與曼尼普爾邦，東邊緊鄰中國雲南與緬甸北部的克欽邦。自十九世紀英國人取得阿薩姆地區以來，此地就是上阿薩姆與印度東北地區的行政與交通樞紐。二次大戰期間，此地成為英緬軍的重要軍事基地及緬甸軍民撤退的轉運基地。近年來更是印度東北地區工業、通訊與醫療產業發展的重鎮之一，也是阿薩姆邦唯二獲得亞洲開發銀行投資挹注的城市。

624 譯者注：卡普蘭派的成員主要是孔雅克（Konyak）部落那迦人，伊薩克—穆瓦哈派的成員主要是坦昆（Tangkul）部落那迦人。

625 譯者注：板瓦（Pangwa）位於密支那東北方的中緬邊界上，靠近中國雲南騰衝的猴橋口岸，是克欽新民主軍的駐紮地。

626 譯者注：札昆丁英（Zakhung Ting Ying）原為克欽獨立軍指揮官。一九六九年，札昆丁英和拉姚澤龍（Layawk Zalun）率部脫離克欽獨立軍並加入緬共。克欽獨立軍當時領導人是反對緬共的佐森（Zau Seng）。在緬共領導下，札昆丁英成立一〇一戰區（War Zone 101）展開戰鬥。一九八九年緬共瓦解後，一〇一戰區改編為克欽新民主軍，並與緬甸軍政府簽署停火協議。停火協議令克欽新民主軍的領導人收穫頗豐，透過與中國的木材、玉石及其他貨物貿易獲得大量利益。二〇〇九年克欽新民主軍改編為緬甸政府控制下的邊防部隊。二〇一二年克

欽獨立軍攻占克欽新民主軍舊轄區，丁英舊部接受收編。丁英雖是緬甸國會議員，但在二〇一二年戰事爆發後遭緬甸政府軟禁。

627 譯者注：孟拱（Mogaung）位於密支那西南五十公里，在密支那一曼德勒鐵路線上，並有公路西北通往印度，二戰時緬甸戰役的主戰場之一。附近有紅玉和琥珀等礦，為全緬甸最大的玉市。

628 譯者注：帕敢（Hpakant）位於緬甸克欽邦中北部，曼德勒以北三百五十公里，世界最知名的玉礦產地之一，自明代即有開採玉石的紀錄，翡翠產量曾一度高達世界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克欽獨立組織（Kachin 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前主席慕然布朗森（Maran Bang Seng）生於此地。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克欽獨立軍與緬甸軍政府達成停火協議後，雖然一度開放私人公司開礦，但因玉石利潤驚人，克欽獨立軍與緬甸政府軍仍持續爭奪此地控制權。

629 Lintner, ‘Mysterious Motives: India’s Raids on the Burma Border’.

630 For a picture of the meeting, see Lintner, ‘Mysterious Motives: India’s Raids on the Burma Border’.

631 Claude Arpi, ‘The Sumdorong Chu incident: a Strong Indian Stand’, Indian Defence Review, 4 May 2013,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the-sumdorong-chu-incident-a-strong-indian-stand/> (accessed on 22 December 2016).

632 Interview with retired Colonel Ashish Das, Kolkata, 26 February 2013.

633 Interview with retired Colonel Ashish Das, Kolkata, 26 February 2013.

634 Manoj Joshi, ‘Warrior as Scholar’, India Today, 22 February 1999, available at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general-krishnaswami-sundarjipasses-away/1/253281.html> (accessed on 27 December 2016).

635 Dilip Bobb, ‘Breaching the Wall’, India Today, 15 January 1989, available at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prime-minister-rajiv-gandhi-visit-to-china-marks-a-new-beginning-in-bilateral-relations/1/322962.html> (accessed on 27 December 2016).

636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7.

637 Katherine Richards, China-India: An Analysis of the Himalayan Territorial Dispute (Canberra: Australian Defence College,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2015), p. 11,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ce.gov.au/ADC/Publications/IndoPac/Richards%20final%20IPSD%20paper.pdf>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638 Richards, China-India, p. 11.

639 Quoted in Natalie Obiko Pearson, 'India is Spending Billions to Populate a Remote Area Claimed by China', 26 Octo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10-25/india-spending-billions-topopulate-remote-area-claimed-by-china> (accessed on 20 December 2016).

640 Pearson, 'India is Spending Billions to Populate a Remote Area Claimed by China'.

641 Quoted in 'China reacts to India's road construction plan, says don't complicate border issue', The Indian Express, 16 October 2014, available at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others/china-reacts-to-indias-roadconstruction-plan-says-dont-complicate-border-situation/>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42 Xinhua in China Daily, 'China "unhappy" on Modi's visit to disputed territory', 21 February 2015, available at http://usa.chinadaily.com.cn/china/201502/21/content_19630989.htm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43 'China "unhappy" on Modi's visit to disputed territory'.

644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p. 72.

645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pp. 72 - 3.

646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p. 73.

647 'Chinese Said to Kill 450 Tibetans in 1989', New York Times, 14 August 1990,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1990/08/14/world/chinese-said-to-kill-450-tibetans-in-1989.html>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48 'India'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jumps to \$53 billion in 2015-16', The Economic Times, 1 August 2016, available at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indias-trade-deficit-with-china-jumps-to-53-billion-in-2015-16/articleshow/53492853.cms> (accessed on 27 December 2016).

649 Pan Qi, 'Opening to the Southwest: An Expert Opinion', Beijing Review, 2 September 1985.

650 Marvin Ott, 'Don't Push Myanmar into China's Orbit', Los Angeles Times, 17 June 1997.

651 A copy of the document is in the author's possession.

652 譯者注：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位於非洲東北部，為東非的半島區，向東深入阿拉伯海，上接紅海，包含衣索比亞、厄利垂亞、索馬利亞與吉布地等國。

653 譯者注：皎漂港（Kyaukphyu）位於緬甸若開邦實兌港附近，面對孟加拉灣。

654 譯者注：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位於斯里蘭卡南部，西通印度西海岸、巴基斯坦、中東與非洲，東接孟加拉灣與麻六甲海峽。

655 譯者注：瓜達爾（Gwadar）位於巴基斯坦南部，鄰近伊朗，面對阿拉伯半島，控制阿拉伯海進入波斯灣的入口。

656 譯者注：喀喇崑崙公路（Karakoram Highway），又名中巴友誼公路或帕米爾公路。北起中國新疆喀什，翻越喀喇崑崙山紅其拉甫關口，進入巴基斯坦控制區，最後抵達巴基斯坦北部的塔科特（Thakot）。這是中國通往巴基斯坦及巴南港口、南亞次大陸、中東地區的唯一陸路通道，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喀喇崑崙公路對於二〇〇四年中國、巴基斯坦、吉爾吉斯與哈薩克簽訂之《四方過境運輸協議》的啟動也創造了有利條件。喀喇崑崙公路全長超過一千公里，最高點紅其拉甫關口為四千三百三十三公尺，三度跨越印度河，穿越喀喇崑崙山脈、興都庫什山脈、帕米爾高原、喜馬拉雅山脈西端，五條長度超過五十公里的冰川也發育於此區。地質情況極為複雜，雪崩、山體滑坡、落石、塌方、積雪、積冰、地震等地質災害經常發生。中巴興建公路過程中約有七百名工程人員罹難。

657 譯者注：中緬油氣管道起於緬甸西海岸皎漂港，經過緬甸若開邦、馬圭省（Magway）、曼德勒與撣邦，循滇緬公路路線，從雲南省瑞麗市進入中國，在貴州省安順市進行油氣管道分離。原油管道通往一度為油荒所苦的四川重慶，天然氣管道則南下前往廣西。

658 譯者注：位於非洲之角上方，與葉門的亞丁港相對，控制紅海與亞丁灣交接處。

659 Zhou Bo, 'The String of Pearls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China.org.cn, 12 February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org.cn/opinion/2014-02/12/content_31445571.htm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60 譯者注：迪亞哥賈西亞島（Diego Garcia）位於印度洋中央，距非洲三千五百公里，離印度最南端約一千八百公里，距澳洲四千七百公里。最早由法國占領，拿破崙戰敗後轉交英國，長期做為英國模里西斯殖民地的附屬島嶼，直到一九六五年英國將其脫離模里西斯，改納入英屬印度洋領地，然而模里西斯與英國仍持續爭議此島歸屬。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三年間，英美強迫將島上人口遷出，並在此建立大型軍事基地。此地為美國在亞太區域最重要的兩處基地之一。

661 譯者注：馬約特島（Mayotte）位於莫三比克海峽北端，介於莫三比克與馬達加斯加之間。

662 譯者注：留尼旺島（Réunion）位於馬達加斯加外海，靠近模里西斯。

663 譯者注：凱爾蓋朗島（Kerguelen）、聖保羅與阿姆斯特丹群島（St. Paul and Amsterdam Islands）、克羅澤群島（Crozet）皆位於印度洋南方，南極大陸以北，無永久居民，設有法國科研站。

664 Bertil Lintner, 'Australia's strategic little dots', Asia Times Online, 25 June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LF25Ad01.html> (accessed on 23 December 2016).

665 For an unusually naïve account of the rivalry, see, for instance, Sunniva Engh, 'India's Myanmar Policy and the "Sino-Indian Great Game"', Asian Affairs, 9 March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3068374.2015.1130307?journalCode=raaf20> (accessed on 25 December 2016).

666 Stuart Kenny, China and India: A 'New Great Game' founded on historic mistrust and current competition (Canberra: Australian Defence College,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ce.gov.au/ADC/Publications/IndoPac/Kenny_IPS_Paper.pdf (accessed on 26 December 2016).

年表

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

榮赫鵬中校帶領英國遠征軍進入拉薩。

一九〇六年

四月二十七日，《中英續訂藏印條約》在北京簽訂。中英同意不干涉西藏內政。

一九〇七年

八月三十一日，俄國與英國於聖彼得堡簽訂關於波斯、阿富汗與西藏的條約。

十二月十七日，不丹在烏顏．旺楚克之下成為統一王國。

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二年

中國入侵西藏。

一九一〇年

一月八日，不丹與英屬印度簽訂條約，不丹對外事務由英屬印度政府掌控，不丹享有內政掌控權。

一九一一年

十月十日，中國爆發共和國起義。

十月二十九日，蒙古宣布獨立。

一九一二年

一月一日，中國宣布成為共和國，清朝於二月十二日失去政權。

一九一三年

二月十三日，西藏宣布獨立。

十月十三日，英屬印度、中國與西藏於西姆拉召開會議解決雙邊議題。

一九一四年

七月三日，簽訂《西姆拉條約》。中、英同意不占領西藏。英屬印度東北區域與西藏之間劃定麥克馬洪線。英、藏簽訂協議，中國代表陳貽範僅署名。中國不承認西藏獨立，英國與拉薩建立親近關係。

一九二八年

中國成立蒙藏事務委員會，重申對兩個事實獨立國家的主權。

一九三二年

中藏爆發戰爭。中國擊敗西藏，然而後者維持事實獨立。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

中國國民政府軍隊抵達印度，加入英美聯軍，對抗占據英屬緬甸殖民地的日本軍隊。中國希望鋪設一條穿越西藏的補給路線，西藏不同意。英、美領軍的同盟國改建一條由印度東北雷多通往緬甸北部的公路。

一九四七年

八月十五日，印度脫離英國獨立。

一九四九年

八月八日，印度與不丹政府簽訂協議，重申不丹做為印度屬國的地位，但享有高度自主。

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結束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內戰。國民黨與其追隨者逃往台灣，中華民國於台灣持續存在。部分國民黨部隊撤往緬甸東北部山區。

一九五〇年

十月七日，中共軍隊進入西藏。

十一月，第一批中國部隊抵達拉薩。

十二月五日，印度總統與錫金大公簽訂協議，根據協議「錫金將持續做為印度的被保護國」。

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三年

中國在韓戰中派出「志願軍」支持北韓；印度參與聯合國支持的援助南韓行動。

一九五一年

二月，拉連瑙．「鮑伯」．卡亭少尉帶領阿薩姆步槍隊支隊進入達旺，在中國據藏後穩定印藏邊防。

五月二十三日，中國與西藏達賴喇嘛代表簽訂十七點《和平解放西藏》協議。

九月，中國軍隊控制拉薩。

一九五四年

一月，東北邊境地域群轉為東北邊境特區。

四月二十九日，中印簽訂關於西藏的協議。印度承認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周恩來訪問新德里，尼赫魯訪問北京。兩國關係逐漸親善。

九月，達賴喇嘛訪問北京，與毛澤東、周恩來及鄧小平會面。

一九五五年

四月，一群新近獨立國家在印尼萬隆聚會，發起不結盟運動。

一九五六年

二月，西藏康巴人開始反抗中國據藏。美國中情局祕密提供支持。

三月，印度東北區域那迦人爆發反叛行動。

十一至十二月，達賴喇嘛前往印度朝聖。

一九五七年

印度發現中國興建穿越阿克賽欽的新藏公路。中國也在西藏內部興建道路，包含通往印度邊界的道路。

一九五八年

毛澤東發起「大躍進」，推動中國經濟現代化，卻造成災難。

一九五九年

三月十日，爆發反對中國據藏的拉薩起義。達賴喇嘛出逃印度。同月，中、蘇開始產生分歧。

三月二十五日，鄧小平表示中國將跟印度「算總帳」，開始準備與印度一戰，派遣藏語間諜進入東北邊境特區的藏語區，調查地勢地形並蒐集情報。

八月二十五日，中國軍隊攻擊印度東北邊境特區的朗久據點，殺害兩名印度士兵。

十月二十一日，中國軍隊攻擊印度拉達克地區的空喀山口據點，殺害十七名印度士兵。

一九六〇年

六月，中蘇關係全面破裂。蘇聯從中國撤回一千四百名專家技士，取消兩百件計畫。

十月一日，中緬簽訂邊界條約，邊界隨著山脈稜線劃定，亦即麥克馬洪線。

中國開始調動數萬名軍力進入印度邊界附近區域。

一九六一年

二月，數千名中國軍隊跨越緬甸東北邊界，攻擊緬甸境內的國民黨部隊。

十月十五日，中尼簽訂協議，興建西藏通往加德滿都的高速公路，此路於一九六七年正式開通。

十一月二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德里召開會議，宣布鞏固邊界區域的「前進政策」。

十二月，印度接收果亞與西海岸上其他的前葡萄牙殖民地。

大躍進結束，高達四千五百萬人可能死於饑荒與其他問題；毛澤東受到責難。

一九六二年

六月，那迦反叛軍在喀拉蚩會見中國官員，後者承諾提供協助。

十月，麥克馬洪線附近發現中國軍隊動作。毛澤東似乎重掌大權。

十月十九日，中國開始轟炸邊界上的印度據點。

十月二十日，中國對東北邊境特區與拉達克的印度據點發動全面攻擊。達旺於二十四日陷落。東邊的基比圖遭到攻擊。

十月二十六日，尼赫魯訴求國際「同情與支持」。

十一月十六日，中國奪取瓦弄。

十一月十九日，中國軍隊抵達邦迪拉。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國宣布片面停火，開始從占領區撤軍。

一九六三年

十二月一日，那迦山地轉為那迦蘭邦，但反叛行動依然持續。

一九六四年

五月二十七日，尼赫魯在被中國背叛的憂憤中去世。

八月，中國軍隊入侵錫金的乃堆拉山口，十二月進行更多入侵行動。

十月十六日，中國進行第一次核彈試爆。

一九六五年

四月，印巴衝突導致兩國於八月開戰。巴基斯坦戰敗之後更傾向中國。

一九六六年

一月二十四日，甘地夫人成為印度總理，強化印蘇關係。

二月二十六日，印緬邊界爆發米佐人反抗行動。

五月十六日，毛澤東發起「偉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肅清任何殘存的反對者。

九月二十日，中國向錫金邊界的印度軍隊開火。

十月二十四日，第一批那迦反抗軍由印度出發，徒步穿越緬甸北部，進入中國。

一九六七年

一月二十七日，第一批那迦反抗軍抵達中國；更多那迦、米佐與曼尼普爾反抗軍陸續前往中國。

五月，受到毛澤東主義啟發，西孟加拉邦北部的拿撒爾巴利爆發農民起義。

一九六八年

一月，中國開始對緬甸共產黨提供大量軍事協助。數千名中國志願者加入當時流亡中國的緬共。緬甸共產黨占領緬甸東北大片區域。

一九六九年

三月二日，中國軍隊偷襲中蘇邊界烏蘇里江小島上的蘇聯邊防。中蘇軍隊為爭奪小島控制權發動了短暫戰爭。

一九七〇年

二月，中國支持的緬甸共產黨占領緬甸東北更多區域。

由於中國興建西藏往加德滿都的公路，印度對尼泊爾實施邊境封鎖。印度要求重審與尼泊爾的通商通運條約。

一九七一年

三月二十六日，東巴基斯坦宣布脫離巴基斯坦獨立，血腥戰爭爆發。新國家定名為孟加拉。

四月二十二日，尼泊爾東南的賈帕與其他區域爆發拿撒爾式反抗行動，導致尼泊爾共產黨（馬列派）形成。

九月二十一日，不丹成為聯合國會員國。

十二月二日，印度介入孟加拉內戰。

十二月十六日，巴基斯坦軍隊在達卡投降，孟加拉成為獨立國家。

一九七二年

一月二十日，東北邊境特區轉為聯邦直屬阿魯納恰爾區。

一月二十一日，聯邦直屬領土的前大公國曼尼普爾與特里普拉，成為獨立邦。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後成為阿薩姆邦內自治區的卡西、詹塔與加羅山地，成為獨立的梅加拉亞邦。

一九七三年

一月，錫金舉行大選。反王室派宣布選舉舞弊，反對當地統治者法王派系取得上風。

一九七四年

五月十八日，印度測試核子裝置。

九月四日，錫金成為印度「附邦」。

一九七五年

五月十六日，錫金廢除法王，舉行公投，成為印度第二十二邦。

一九七六年

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權力鬥爭展開，鄧小平重返高位。

一九七九年

四月，阿薩姆爆發稱為「阿薩姆騷動」的反非法移民運動。武裝運動者形成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

一九八三年

二月十八日，暴徒攻擊穆斯林村落，阿薩姆邦涅利超過兩千人喪生，這被視為對印度的反動，因後者在「阿薩姆騷動」中仍持續舉行一九八三年邦選舉，且甘地夫人給四百萬孟加拉移民投票權。

一九八六年

六月三十日，印度政府與米佐民族陣線簽訂協議，預備讓米佐拉姆成為印度聯邦中的完全獨立邦。

十月，印度軍隊發動「獵鷹行動」，鞏固印度吉米塘與西藏——中國的兼則馬尼之間的邊界。

一九八七年

一月，中國側以建築工事回應。緊張情勢升高，但未導致戰爭。

二月二十日，阿魯納恰爾與米佐拉姆成為獨立邦。

十二月二十七日，拉薩爆發反中抗議。抗議者在警局縱火，警察朝群眾開槍。

一九八八年

五月十一至五月十三日，印度進行一系列地下核爆測試。

八月，緬甸爆發全國性反獨裁起義行動。印度支持民主派。中國親近仰光政權。

十二月十日，拉薩爆發更多反中暴動，數人死亡。

十二月十九至十二月二十三日：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中。

一九八九年

三至四月，緬甸共產黨低階士兵叛變，黨內老毛派領袖流亡中國。中國支持兵變，並提供高端武器給新的佤邦聯合軍，但同時維持與緬甸軍政府的關係。

三月五至三月六日，中國警察攻擊西藏獨立派抗議者。根據獨立中國記者的紀錄，至少四百六十九人（包含八十二名佛教僧侶）喪生，七百二十一人受傷。

一九九〇年

九月，不丹南部發生尼泊爾裔與不丹王軍的衝突。暴力攀升，導致將近十萬名尼泊爾裔逃離不丹，多數前往尼泊爾東南部的難民營。

一九九一年

十二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訪印，印中關係開始解凍。

一九九三年

九月，印度新總理納拉辛哈．拉奧訪中。

一九九六年

二月十三日，尼泊爾爆發毛派反抗行動。

一九九八年

十二月八日，不中簽訂《關於在中不邊境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中國重申尊重不丹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

二〇〇三年

十二月，不丹軍隊將印度的阿薩姆與波多反抗軍逐出不丹南部藏身地。

二〇〇四年

四月二日，孟加拉吉大港扣押大批武器，主要為中製；武器目的地為印度東北民族反抗軍。

二〇〇七年

二月八日，印不簽訂新的雙邊協定，承諾將在「兩國國家利益相關事務」上緊密合作，但不丹獲得更多自主權。

二〇〇八年

三月，反中抗議震撼拉薩。中國政府表示二十二人死於暴動，但流亡藏人表示許多人死於抗議與鎮壓行動。

二〇一〇年

九月二十七日，那迦反抗軍主要軍火採購人安東尼·希姆瑞在尼泊爾加德滿都機場被捕，轉交印度收押。他負責跨孟加拉、泰國、菲律賓與中國的槍枝走私網絡。

二〇一一年

九月三十日，登盛組成的半平民新政府宣布，暫緩中緬在緬北合作的超大型水力發電計畫。中緬關係開始惡化。

二〇一五年

三至四月，阿薩姆、那迦與曼尼普爾反抗軍在緬北總部舉行會議，組成東南亞西部民族解放聯合陣線。武器由緬中邊界的槍枝工廠取得。

六月九日，印度軍隊跨越緬甸邊界，攻擊印度東北反抗軍營地。

二〇一六年

八月十一日，不丹外交大臣丹曲．多吉抵達北京，參加中不第二十四輪邊界會談。中國外交部發聲明表示：「儘管不中尚未建交，但這不會阻礙兩國開展互利合作。不丹方面願不斷深化與中國在旅遊、宗教、文化、農業等領域交流，進一步提升合作水準。」然而雙方仍未就邊界劃定達成協議。

二〇一七年

六月九日，那迦反抗軍領袖卡普蘭於緬甸西北營地去世。印度那迦人柯雷．孔雅克接任那迦蘭民族社會主義議會（卡普蘭派）領袖。反抗軍團體仍舊以緬甸為基地。

六月十八日，中國試圖在都克蘭高地興建道路，印度軍隊進入中不爭議的都克蘭高地。

六月二十日，不丹政府向北京發出正式外交照會，抗議中國入侵不丹領土。

六月二十九日，不丹再次抗議中國興建道路。

八月一日，中國外交部發出十五頁文件，指責印度以不丹為「藉口」，干涉中不邊界會談，衝突導致中印軍隊在都克蘭高地對峙。

八月二十八日，中印同意各自從都克蘭高地撤軍。

我讀《中國的印度戰爭》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啟訥

在《中國的印度戰爭》這部書中，作者以一九六二年印度—中國邊境戰爭為中心，對縱貫超過半個世紀的印中角力過程做了詳細的爬梳，之後還花費了很大的篇幅，呈現了戰爭結束後的南亞和東南亞政治。作者柏提爾·林納是一位記者，但這部深度專題報導型態的著作卻頗有學術氣味。歐美優秀政治記者的專業能力往往不在學者之下，這部書整體的觀點並不算新穎，但旁徵博引，比較系統地整理了一九六〇年代印中戰爭以來的研究成果，從特定的歷史視角呈現出印中衝突過程與演變，扮演了學術研究的側翼角色。其中，作者對於毛澤東在中印邊界戰爭中抱有問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和爭奪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主導地位的觀察，頗有見地；對於印度華人在戰爭當中鮮為人知的窘迫處境的呈現，也頗有獨到之處。

對於中文讀者而言，這部著作還有更進一步的價值。通常，西方學界基於自覺或其他動機，都會試圖在研究中掩飾其西方中心的視角，記者倒率直得多。本書作者並不掩飾其寫作目標，也未曾使用晦澀的後現代理論，他只是想論證在印中衝突中，中國是非正義的一方。就歷史寫作應還原史實的角度看，這個目的本身，不見得就沒有正當性，只要證據充分，論證過程得當，也會有其價值。遺憾的是，作者在為其預設結論尋找證據時，出現了很多邏輯上和證據上的缺失。讀完之後，我們也許會發現，作者的理念、取材、論證過程，大致符合西方政界的主流思維，作者這樣不加掩飾的呈現，對於中文讀者理解西方在中印關係議題上的思維，有意外的助益。

對於四分之一世紀以來更加急於脫離中國政治—文化圈的台灣主體論者，這部從冷戰時期的研究中演義出來的著作，其所抱持的殖民地現代化論、殖民主權繼承論，傳統國家無主權、無邊界論，更能引發高度的興趣，它的中文譯本在台灣出版，也許與此不無關連。當

然，台灣自然存在一些不同的聲音，但藉由此書，對於從側面了解台灣知識界內部的認知差異，也會有意外的助益。

這部書的內容事涉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冷戰與中國邊疆議題，與我的研究領域有所重疊。就我的研究所見，近代中國邊界的法律確認，主要集中在三個時段：第一階段，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末，列強透過不平等條約直接割取清朝領土；第二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做為名義上而非實質戰勝國的中國，進一步經由條約喪失從清朝繼承的領土；第三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有約十年間處在韓戰獲勝、中蘇同盟、經濟成長的狀態，除印度外，二戰前分屬英、法等國殖民地的新興亞洲民族國家基本上有意接受其與中國自清朝以來的傳統邊界；但伴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中、蘇兩個共產主義大國的反目以及毛澤東所發動的大躍進的失敗，加上西方的封鎖和台北蔣介石當局的威脅，與中國接壤的新興亞洲國家把握中國國勢減弱，亟需擺脫內外困境的機會，紛紛開啟與中國的邊界談判，迫使中國在邊界議題上基本滿足了各國的領土要求。包括本書提及的尼泊爾、緬甸在內，朝鮮、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寮國、越南等國大致都是以古代王國時期或前殖民者的領土主張為依據，得到中國的正面回應。本書的主角之一印度，也是在這一背景下，試圖讓中國接受其領土主張的。印度對自己的要求有相當的自信：不僅因為中國與印度在一九五〇年代前、中段有一段蜜月期，而且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的中國還面臨內部經濟動盪、西藏危機，外部受到西方和蘇聯集團的雙重夾擊。對中國而言，向印度讓步，將會獲得一個不結盟領袖大國的友情。然而，印度在領土和西藏議題上都越過了北京的最後底線，雙方最終結束蜜月，走向衝突。

本書作者在處理這一主題時，抱持了一些基本立場，但這些立場所顯示的，是作者在西方中心史觀下，對於非西方歷史的基本誤解。這些誤解，使得這部著作出現一些重大缺失。

一、認定「西藏是獨立國家」——挪用的國家觀

作者以理所當然的口氣宣稱西藏是獨立的國家，並據以責備（在一九一四年的西姆拉會議中）「中國並不承認西藏是獨立國家」。然而，書中這種宣示其實是特定政治立場下的政治主張，與歷史現實有相當距離。作者努力避免提及西藏與清朝之間近三百年的特殊或隸屬關係，雖然書中也不得不承認中國軍隊於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二年在西藏的主控角色，但仍不忘強調這一活動的「短暫而失敗」；書中也避免提及當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國，包括作者所在的瑞典，以及曾和西藏相互承認對方獨立的「蒙古帝國」的繼承者：「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蒙古國」在內，承認西藏是獨立國家的事實。這一寫作策略的目標，並不在於確立西藏獨立的合法性，而在於佐證中國領土主張的不合理。

作者認定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又迴避以下事實：一、西藏在清朝國家體系內長期承認自己對清朝的隸屬關係，其政教領袖統治西藏的權威來自清朝皇帝的授予，故在雙方關係中，西藏政教上層其實是受益的一方。二、西藏對自身「國家」地位的重新想像，發生在英國數度入侵之後，在西姆拉會議當中，西藏官員認定自己是獨立國家，是在西方的刺激下，反應、學習的過程；事實上，亞洲各國、各區域的民族主義思潮，都經歷了經受西方刺激，從十九世紀中後期萌發，於二十世紀勃興的過程；西姆拉會議當中西藏官員的表述，是一種民族主義主張，而非事實陳述。其實在書中，作者幾度間接承認，西藏在法律上，甚至於在事實上，都不是獨立的，原因不僅在於中國否認，英、俄也都同樣反對。

作者承襲了從一九二〇年代的日本開始，並被整個西方迅速接受的看待近代中國主權議題的公式，即「滿蒙回藏非中國」，但在領土完整議題上，採用了雙重的雙重標準，即凡涉及滿蒙回藏與「本部」行省的界線爭議，一律支持滿蒙回藏；凡涉及滿蒙回藏與鄰國的邊界爭議，一律否認滿蒙回藏的權利。在本書涉及的藏印邊界議題上，作者立足於（因尋求英印協助而有意奉送領土權益的）西藏獨立派的立場，而非整個西藏的立場。為此，書中完全隱去西藏內部的獨立派為

了獲得英國支持，不惜在領土紛爭上做出大幅讓步，全盤接受英印立場的歷史。

針對一九六二年戰爭，作者強調中方是挑釁者。但誰先攻擊，重點仍在於如何認定邊界，一九六〇年代初的印度，不斷將軍隊剛剛抵達的區域視為本國境內，當然會將已經在那裡的中國人視為入侵者。其實，作者提到中國「進攻」的幾個地點的地名都是藏語地名，等於為作者的主張做了反證。

二、認定爭議區域不是中國領土——對非西方歷史的誤解

該書認定，一九六二年中國以印度入侵為藉口出兵，是侵略行為；從歷史上看，中國從未統治過東西段任何一塊爭議區域，而爭議區域其實是不存在爭議的印度領土。然而，作者在強調中國從未統治「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直至喜馬拉雅山腳」時，卻從未清楚交代，「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直至喜馬拉雅山腳」區域在「麥克馬洪線」被創造出來之前一直處在西藏的文化政治圈之中的歷史。

書中聲稱，「遠在明確的邊界地圖成為現實前，分水嶺、山川河流就已成為國與國之間的分界；而喜馬拉雅山巔（而非南方的山腳）長久以來，就是西藏高原與印度次大陸的分界線」，這一說法是殖民時期西方帝國地理想象的產物，並不符合歐洲以外的歷史，尤其不符合喜馬拉雅區域的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狀態。西藏文化、經濟圈明顯涵蓋整個喜馬拉雅山南坡，這一點可以從分水嶺南側的尼泊爾、不丹、錫金在文化上與西藏高度一致，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屬同時又是清朝藩屬這一點上得到側面佐證（其中，錫金和尼泊爾的衝突，是由清朝調停的；十八世紀末清朝攻打尼泊爾的戰爭，也是清藏、藏尼、清尼三組藩屬關係下的產物）；而不丹以東的喜馬拉雅山南坡因地形和文化原因，又不存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小型政體，使得從達旺到瓦弄間的這塊地域與拉薩之間有著明確的歷史、文化、政治和現實連結，否則我們就不能解釋達賴六世來自這一區域的歷史。書中其實提

及，在西藏當局和達旺地方官員看來，英國探險家到達達旺，是「非法越境」。

對於台灣讀者而言，理解從達旺到瓦弄間的這塊山地與布拉馬普特拉河平原的關係，遠比西方人容易：這種關係與台灣西海岸平原、台地和中央山脈的關係很相似，清朝將區分漢人耕作區和土著居民經濟、文化區的「土牛溝」劃在山腳下而非中央山脈的山脊。清朝這樣做的原因很簡單，在亞洲，地理因素與政治界線的關係，率皆受到前現代經濟型態的影響。這種令西方人感到困惑，但對亞洲人而言無比自然的歷史所呈現的是，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到喜馬拉雅山脊這塊區域，無疑既不是印度的傳統屬地或英國殖民印度期間開拓的土地，也非蠻荒的無主地，而是由西藏當局管轄幾個世紀的土地。書中直接斷定這個區域就是「英屬印度的一部分，而非外國土地」，就像直接認定「錫金就是英屬印度的一部分」一樣武斷。

在本書極力強調的邊界議題上，可以看出作者對於近代之前的亞洲史相對陌生，不知道亞洲的主權邊界是西方人闖入亞洲後，由殖民者違背當地歷史傳統任意劃定的結果。

其實，書中曾數度無意識地提及西藏對達旺到瓦弄區域的「傳統控制權」；也曾承認，「直到一九五〇年代初期，達旺才進入印度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而直到一九五四年，武器裝備逐漸現代化的印軍才初次到達「麥克馬洪線」，書中這些內容，無異於標明印度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利用共產主義中國陷入韓戰的機會）的行動，不是行使行政權力，而是擴張。與達旺到瓦弄區域類似，書中提到印中邊界西段的阿克賽欽地區與拉達克的關係，即令做為西藏藩屬的拉達克被英屬喀什米爾控制，英國人也依照其控制範圍劃了界，但只有吃了虧的西藏遵守新界線，印度則仍不滿足，又虛擬了深入西藏的新線。

而西藏與中國的關係，一如本書列舉（但以嘲笑的口氣認定並非中國領土）的蒙古、吐瓦、緬甸北部部分區域一樣，都是清朝的臣屬，它們與清朝之間的隸屬關係或臣服關係，有一系列法律文件和統治事實的佐證，這種關係的歷史遠較美利堅合眾國建國的歷史為久。

至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清朝領土、人民遺產的繼承，則是另一個問題。但對作者而言不幸的是，這種繼承不僅來自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單方面宣示，而且得到二十世紀初期幾乎全部外國的承認，以至於日本在一九二〇年代後期宣稱「滿蒙非中國」時，遭遇到國際的譴責。直到一九四五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外蒙古才在法律上成為獨立國家。

三、判斷印、中衝突中誰是誰非——價值中心取向

作者看待西方以外的歷史，是將殖民者到來以前的歷史視為神話或史前史，殖民開始後的歷史，方被視為真實的歷史，故於不知不覺間據此建立了根植於內心的是非觀。印度長期經受西方殖民統治的歷史，使得作者在意識型態上對其有強烈的親切感。比如書中認為，「印度軍隊是遠離政治的專業軍隊」，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理想典型，則展現在虛擬士兵雷鋒的個人形象上」；在現實中，印度學界也不否認，印度軍隊更像是一支陷於內部種姓、種族和宗教等結構性衝突的僱傭軍；而雷鋒不是「虛擬」士兵，只是常識層面的資訊。以為雷鋒是「虛擬」的偶像，顯示作者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現代史的理解還停留在膚淺的層次上。作者認為「毛澤東是政治而非軍事領袖」，「形塑了游擊戰操作原則的並非毛澤東，而是朱德」；書中還宣稱，「彭德懷、張聞天與其他相關人士皆被打為『右派』與『反革命分子』」，事實上，彭、張從未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分子」，它們的罪名是「反黨集團」，這些也是性質相同的例子。作者認為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毛的地位動搖」，而這是毛發動對印度戰爭的動機，但其實，這段期間毛的地位沒有絲毫動搖。作者做出這類結論的依據，基本上還是西方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料缺乏掌握之際的研究成果。

作者又認定，一九六二年發生在喜馬拉雅山區的印中衝突，「是兩個文明間的衝突」，這一認定，從近代史的角度看，有部分合理成分，尤其是，如能連結到作者對尼赫魯、毛澤東二人對各自歷史定位的追求的猜測上，大致可以成立。然而，作者為這個結論提供的證

據，卻是「印度自始至終遵守國際法」、「印度在法理上站得住腳」，而「不論出於何原因，只要不為中國所喜的條約都被視為不平等，因此也不會遵守」。在此，作者先是忘記中國和印度在過往的兩千多年中並未發生衝突，古代中國甚至經由佛教，大範圍地接受印度文化；後來又有意遺忘印度打破國際條約，收回葡萄牙屬地（我們當然肯定印度驅逐殖民統治的正當性），吞併錫金的歷史；進而有意忽略清朝和中華民國遵守一切國際條約（包括蔣介石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過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遵守一切國際條約（包括它認定為「不平等」的和「非法」的條約）的歷史：一九六二年中國在戰勝後撤軍的結果，以及中國對名為「實際控制線」實為「麥克馬洪線」的尊重，恰好表明該國實質上遵守條約；最後，做為熟知當代國際政治的記者，作者根本忘記歐洲人制定「國際法」的重要一面，即是為他們非洲、亞洲、美洲和大洋洲擴張尋求法理依據的史實，因而不僅無法理解做為「國際法」受害者的中國，在面對印度破壞國際法的行徑時，也只能迴避。

作者也在西藏議題上譴責北京違背其與拉薩簽訂的「十七條協議」，理由是該協議規定「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變」，而北京背棄承諾。在現實中，十四世達賴方面之所以認定北京違約，是因為他們所認定的「西藏」，還包含青海省全境和甘肅、四川、雲南三省的相當一部分地區；他們將中共在這些地區進行的「民主改革」和集體化運動，視為「改變西藏制度」；而「十七條協議」遭到廢棄的契機，又恰在於十四世達賴當局的「起義」行動。作者又進一步迴避拉薩「起義」過程的歷史，先是轉換「起義」和「平叛」的先後次序，進而稱達賴喇嘛逃亡後，「後方的人民解放軍緊追不捨」。其實，當代學界（無論如何解讀）都承認解放軍奉毛之命，刻意不加追擊，放任達賴喇嘛出境這一史實。一九五九年尼赫魯當局對拉薩事變的反應，都顯示印度政府對印、藏、中之間關係的理解方式，並不像本書作者那樣簡化。

四、為了維護預設結論——雙重標準的普遍化

為證實自己的預設結論，作者的邏輯不得不常常轉移。作者在書中將印中邊界或印藏邊界一律稱為「印度東北邊界」，將爭議區域定義為「印度東北」，清楚地表明了這是一部立足於印度立場的著作，以此為既定立場，很自然地脫離了學術規範。

作者為強調「中國從未控制或統治印度東北任何區域」，陷入一系列的雙重標準陳述中。在這句表述中，作者首先需要掩蓋以下事實，即古代印度和英印政府也從未統治過布拉馬普特拉和以北到喜馬拉雅山脊的區域；與此類似事實還有，古代印度和英印政府同樣從未控制或統治拉達克以東的阿克賽欽地區。

作者承認清朝軍隊確曾到達喜馬拉雅山分水嶺以南區域，但並不提及英國人接觸這個區域的時間晚於清朝軍隊的到達時間；作者兩度承認，跨越清末和中華民國時段的「中國官員曾穿過喜馬拉雅山脈，抵達後來成為東北邊境特區的極東區域」，並「在瓦弄的東南方豎立邊界柱」、「幾個邊界標誌」，但又從不提及英印政府對該「東北邊境特區」的接觸，遠遲於中國政府「在瓦弄的東南方豎立邊界柱」。

作者承認二十世紀初英國對布拉馬普特拉河以北的山區展開軍事征服，但卻迴避展示其範圍，因為在現實中，這些征服行動並未到達由西藏當局控制或影響下的喜馬拉雅山南坡，作者只能將英印方面較中國豎立界碑晚得多的接觸行動賦予行使主權的色彩。以上做法，無一不在挑戰西方自己定義的主權原則。雙重標準至此，令人驚嘆。

作者數度強調「中國從未控制或統治印度東北任何區域」，可是又無法掩飾西藏政府管轄這一片區域的史實，於是採取以下策略：凡涉及西藏管轄紀錄，即切割西藏與中國；凡涉及中國政府在四川、雲南、青海、甘肅藏語區的政治活動，即譴責中國對西藏的干涉與入侵。凡欲證實中國有非法的領土要求時，就強調中國從不遵守條約和協議；凡欲證明中國謀求第三世界領袖地位時，又強調中國的目標不在領土。

該書在描述中印衝突的關鍵因素之一——麥克馬洪線議題上，避重就輕，略去對西藏和中國立場有利的內容，僅採用英印立場有利的

證據。

五、保有傳統色彩的中國政治思維VS進化的印度政治思維

這部著作致力於打破中國觀點，呈現印度觀點，如果不是有知識體系的偏頗和選擇性的論證，則其價值未必受到太大損害。不巧的是，本書還有一個重要的缺陷，在於作者花費了不少篇幅描述中國在共產主義建國實踐中的災難，但對印度的古代歷史、殖民史與獨立後印度的社會變遷、內外政策、戰略目標的了解與鋪陳，反而十分有限。

作者認為，印中衝突「是兩個文明間的衝突」，但作者卻未能呈現印中之間歷史的重大差異，即後者在歷史上顯著的連續性和前者的殖民經驗，這是本書在論述結構上最主要的缺失。揆其原因，在於作者對於中國古代基於「天下」觀念建立的「天下」政治秩序，和做為這個秩序一部分的「喜馬拉雅山區政治秩序」體系十分陌生，進而難以理解毛對世界革命的想像與蘇聯的不同，一部分來自他對中國古代天下秩序理念的繼承；同時，作者也未體認到印度藉著英國殖民體系完成國家整合並累積擴張能量的歷史過程。

也許，這個緣由才是這部書不斷轉移評判標準，策略性地採用採取了虛／實、褒／貶兩組寫作策略，因此降低自身說服力的思想動因。例如作者承認，「尼赫魯接納英國的地緣策略思考，因為對他來說，過去與現在是連續的」。依此邏輯，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清朝和中華民國的領土和人民遺產，其正當性當然超過印度對擴張性殖民遺產的繼承，但作者為印度無條件辯護的努力，又摧毀了這一邏輯。在阿薩姆、曼尼普爾議題上，作者同樣採取與西藏議題、邊界議題一樣的雙重標準，為印度繼承英國擴張遺產，推動內部殖民辯護，破壞了自己在西藏議題上同情弱勢的形象。

在後面幾章中，作者有意進一步地證實一九六二年戰後中國在南亞次大陸和中南半島持續擴張的態勢，但作者虛／實、褒／貶的寫作

策略卻往往為自己的目標做了反證。文中所提供的事實，反而顯示戰前戰後，中國在它與南亞的接合部採取戰略守勢，以致於對印度的要求不斷讓步的過程。如認定，「一九六〇年（中緬）簽訂協議劃界，結果對緬甸不利」，其所引用的資料來源反倒彰顯了中國為籠絡緬甸做出大幅讓步的史實。近年來，中國更承認了印度對錫金的兼併，並在邊界爭端中持續保持克制，乃至多次退讓。相反地，戰後印度的擴張仍在持續，包括全面恢復並擴大對中國所不承認，但加以尊重的「麥克馬洪線」的控制，並向該線以北進一步推進、吞併錫金、支解巴基斯坦、控制不丹外交、干涉尼泊爾事務等等。面對後毛時代的中國政治，作者依然強調其獨斷、專制，全然未能察覺到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之後的中國政府決策，已不能像一九六〇年代那樣不需顧慮民意了。

林納著作的中譯，部分滿足了中文讀者了解中印衝突議題上不同觀點的需求。正因為這部書瑕瑜並存，它能夠為讀者創造的思考空間反而更大。這部書的真正價值可能正在於此。

延伸閱讀

Adams, Barbara. 2006. *Nepal: Crisis Unlimited—Reflections from the Crucial Years*. New Delhi: Adroit Publishers.

Adhikari, Aditya. 2014. *The Bullet and the Ballot Box*.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Adhikari, D.P. 1998. *The History of Nepalese Nationalism*. Kathmandu: Romila Adhikari Acharya.

Adhikari, Pushpa. 2012. *China: Threat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Frankfort, IL: Lancer Publishers.

Agrawal, Ajay B. 2003. *India and Tibet: The Role Nehru Played*. Mumbai: N.A. Books International.

Allen. B.C., E.A. Gait, C.G.H. Allen, and H.F. Howard. 2012 [1905]. *Gazetteer of Bengal and North-East India*. New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

Appadorai, A. 1955. *The Bandung Conference*. New Delhi: The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Aris, Michael. 1994. *The Raven Crown: The Origins of Buddhist Monarchy in Bhutan*.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Arpi, Claude. 2008. *Tibet: The Lost Frontier*. New Delhi, Olympia Fields IL: Lancer Publishers.

Arpi, Claude. 2009. *Dharamsala and Beijing: The Negotiations that Never Were*. New Delhi, Olympia Fields, IL: Lancer Publishers.

Arpi, Claude. 2013. *1962 and the McMahon Saga*. New Delhi, Frankfort, IL: Lancer Publishers.

Avedon, John F. 1985. 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 London: Wisdom Publications.

Bagchi, Romit. 2012. Gorkhaland: Crisis of Statehood.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Bailey, F.M. 1945. China-Tibet-Assam: A Journey, 1911. London: Jonathan Cape.

Bains, J.S. 1962. India's International Disputes.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Bajpai, G.S. 1999. China's Shadow over Sikkim: The Politics of Intimidation. New Delhi, London, Hartford, WI: Lancer Publishers, Spantech & Lancers.

Bakshi, K.N. 2012. I was a Prisoner of War in China. New Delhi: Lancer Publishers.

Barber, Noel. 1969. From the Land of Lost Content: The Dalai Lama's Fight for Tibet. London: Collins.

Bareh, H.M. 2001. Encyclopaedia of North-East India: Sikkim. New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

Barkataki, Meena Sharma. 2011. British Administration in North-East India 1826 - 1874: A Study of Their Social Policy. Guwahati,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Barpujari, N.K. 2008. Seven Sisters: North East India Profile. Delhi: Sumit Enterprises.

Barua, Lalit Kumar. 2010. India's North-East Frontier: The Colonial Legacy. Guwahati,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Basnet, Lal Bahadur. 1974. Sikkim: A Short Political History. New Delhi: S. Chand & Co.

Basu, Gautam Kumar. 1996. Bhut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New Delhi: South Asian Publishers.

Becker, Jasper. 1996.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Bell, Charles. 1991 [1928]. The People of Tibet. New Delhi, Madras: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Bhanot, Madan. 2015. Escape from Namka Chu: A Love Story Based on India-China War 1962.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Bhattacharyya, Rajeev. 2014. Rendezvous with Rebels: Journey to Meet India's Most Wanted Man. Noida: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dia.

Bhushan, Ranjit. 2016. Maoism in India and Nepal. New Delhi,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Bhutani, Sudarshan. 2004. A Clash of Political Cultures: Sino Indian Relations [1957 - 1962]. New Delhi: Roli Books.

Bhuyan, S.K. (compiled, trans., and ed.). 1933. Tungkhungia Buranji or A History of Assam 1681 - 1826 A.D. London, Bombay, Calcutta, Mad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ista, Dor Bahadur. 2001. Fatalism and Development: Nepal's Struggle for Modernization. Hyderabad: Orient Longman.

Borah, Swapnali, Deke Tourangbam, and A.C. Meitei. 2010. Encyclopaedic Studies of North-Eastern States of India: Arunachal Pradesh. New Delhi: New Academic Publishers.

Bower, Ursula Graham. 1953. The Hidden Land. London: John Murray.

Bray, John (ed.). 2011. *Ladakhi Histories: Loc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New Delhi and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ld and Archives & Indraprastha Press.

Cederlöf, Gunnel. 2014. *Founding an Empire on India's North-Eastern Frontiers 1790 - 1840*.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65. *Intelligence Study: Bhutan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OCI No. 1105/65, April 2.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Chakravarti, P.C. 1961. *India - China Relations*. Calcutta: Firma K.L. Mukhopadhyay.

Chakravarti, P.C. 1971. *The Evolution of India's Northern Borders*. London: Asia Publishing House.

Chakravarti, Sudeep. 2008. *Red Sun: Travels in Naxalite Country*.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Chakravarty, L.N. 1989. *Glimpses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Arunachal*. Itanagar: Director of Research, Government of Arunachal Pradesh.

Chapman, F. Spencer. 1940. *Lhasa: The Holy City*. London: Readers Union and Chatto & Windus.

Chaudhury, Mithu. 2013. 'NIA Report Reveals NSCN (IM)-China Link', North East News Portal, 14 January.

Choudhary, Shubhranshu. 2012. *Let's Call Him Vasu: With the Maoists in Chhattisgarh*.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Chowdhury, J.N. 1990. *The Tribal Culture and History of Arunachal Pradesh*. Delhi: Daya Publishing House.

Coelho, V.H. 1970. Sikkim and Bhutan. New Delhi: Vikas Publications.

Craig, Mary. 1992. Tears of Blood: A Cry for Tibet. New Delhi: Harper Collins Indus.

Crossette, Barbara. 1995. So Close to Heaven: The Vanishing Buddhist Kingdoms of the Himalayas. New York: Albert A. Knopf.

Dalai Lama. 1964. My Land and My People: The Memoirs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London: Panther Books.

Dalai Lama. 1982.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Collected Statements, Interviews and Articles. Dharamsala: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Dalai Lama. 1990. Freedom in Exile: The Autobiography of the Dalai Lama. New York: HarperCollins.

Damodaran, A.K., and U.S. Bajpai (eds). 1990.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Indira Gandhi Years.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the 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

Das, B.S. 1995. Mission to Bhutan: A Nation in Transition.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Das, Gautam. 2009. China-Tibet-India: The 1962 War and the Strategic Military Failure. 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

Das, Gautam. 2013. Understanding the Sino-Indian War 1962. 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

Das, Gurudas, C. Joshua Thomas, and Nani Bath (eds.). Voices from the Border: Response to Chinese Claims over Arunachal Pradesh.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Das, Smriti. 2005. Assam-Bhutan Trade Relations 1865 - 1949: A Socio-Economic Study. Delhi: Anshah Publishing House.

Dash, Arther Jules. 2011 [1947]. Bengal District Gazetteer: Darjeeling. Siliguri: N.L. Publishers.

Datta, Saikat. 2011. 'The Great Claw of China', Outlook, 7 February. Available at <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aspx?270223> (accessed on 29 March 2016).

Dave, Shri A.K. 2006. The Real Story of China's War on India, 1962. Occasional Paper No 1. New Delhi: Centre for Armed Forces Historical Research.

De Vore, Howard O. 1999. China's Intelligence and Internal Security Forces. Surrey: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Deane, Hugh. 1987. 'The Cold War in Tibet', Covert Action Information Bulletin, No. 29 (Winter): pp. 48 - 50.

Dhar, Maloy Krishna. 2005. Open Secrets: India's Intelligence Unveiled.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Dikötter, Frank. 2013. 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5 - 1957. New York, London, New Delhi, Sydney: Bloomsbury Press.

Dixit, Kanak Mani, and Shastri Ramachandaran (eds). 2002. State of Nepal. Kathmandu: Himal Books.

Dixit, Kanak Mani. 2011. Peace Politics in Nepal: An Opinion from Within. Kathmandu: Himal Books.

Dorji, C.T., 1995. History of Bhutan. Thimphu: Sangay Xam.

Dozey, E.C. 2012.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Darjeeling District since 1835 with a Complete Itinerary of Tours in Sikkim and the District. Kolkata: Bibliophil.

Dunham, Mikel. 2004. Buddha's Warriors: The Story of the CIA-backed Tibetan Freedom Fighters, the Chinese Invasion, and the Ultimate Fall of Tibet.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 and Penguin.

Dutta, S., B. Tripathy (ed.). 2008.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Arunachal Pradesh.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Eftimiades, Nicholas. 1994.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Essex: Frank Cass.

Elleman, Bruce A., Stephen Kotkin, and Clive Schofield (eds). 2013. Beijing's Power and China's Borders: Twenty Neighbours in Asia.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Elwin, Verrier (ed.). 1962. India's North-East Fronti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win, Verrier. 1964. The Tribal World of Verrier Elwin: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win, Verrier. 2009. The Oxford India Elwin: Selected Writings. New Delh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lwin, Verrier. 2014. Democracy in NEFA. Itanagar: Directorate of Research,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Arunachal Pradesh.

Epstein, Israel. 1983. Tibet Transformed.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Faligot, Roger, and Rémi Kauffer. 1990.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London: Headline Book Publishing.

Fang, Percy Jucheng, and Lucy Guinong J. Fang. 1986. *Zhou Enlai: A Profil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Fisher, Margaret W., Leo E. Rose, and Robert A. Huttenback. 1963. *Himalayan Battleground: Sino-Indian Rivalry in Ladakh*. New York,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Fleming, Peter. 1987. *Bayonets to Lhasa*. Hong Kong,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d, Robert. 1957. *Captured in Tibet: An Epic of Endurance*. London: Pan Books.

French, Patrick. 2011. *Younghusband: The Last Great Imperial Adventurer*. London: Penguin Books.

Fürer-Haimendorf, Christoph von. 1955. *Himalayan Barbary*. London: John Murray.

Fürer-Haimendorf, Christoph von. 1962. *The Apa Tanis and Their Neighbour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Gaige, Fredrick H. 1975. *Regionalism and National Unity in Nep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ait, Edward Albert. 2011. *A History of Assam*. Guwahati,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Garver, John W., and Fei-Ling Wang. 2010. 'China' s Anti-encirclement Struggle' , *Asian Survey*, 6(3) 238 - 61.

Gautam, Kul Chandra. 2016. *Lost in Transition: Rebuilding Nepal from the Maoist Mayhem and Mega Earthquake*. Kathmandu: Nepal-Laya.

Gautam, Rajesh, and Asoke K. Thapa-Magar. 1994. Tribal Ethnography of Nepal, Volume I. Delhi: Book Faith India.

Gautam, Rajesh, and Asoke K. Thapa-Magar. 1994. Tribal Ethnography of Nepal, Volume II. Delhi: Book Faith India.

Gearing, Julian. 2000. 'Lama Wars: Can the Dalai Lama hold his divided people together—and keep China at bay?' , Asiaweek, October 20.

Gearing, Julian. 2003. 'The tale of two Karmapas' , Asia Times Online, December 24.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EL24Ad02.html> (accessed on 29 March 2016).

Gelder, Stuart, and Roma Golder. 1964. The Timely Rain: Travels in New Tibet.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Ghosh, Suniti Kumar. 2009. Naxalbari: Before and After. Kolkata: New Age Publishers.

Goldstein, Melvin C.,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benschuh. 2004.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üntso Wangy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ldstein, Melvyn C. 2007.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oldstein, Melvyn C. 2014.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3: The Storm Clouds Descend, 1955–1957.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aff, David A., and Robin Higham (eds). 2012 A Military History of China. Dehra Dun: Greenfields Publishers.

Gupta, Karunakar. 1982. Spotlight on Sino-Indian Frontiers. Calcutta: New Book Centre.

Gupta, Ranjit Kumar. 2004. The Crimson Agenda: Maoist Protest and Terror. Delhi: Wordsmith.

Gupta, Shishir. 2014. The Himalayan Face-Off: Chinese Assertion and the Indian Riposte. Gurgaon: Hachette Book Publishing.

Guruswamy, Mohan, and Zorawar Daulet Singh. 2009. India China Relations: The Border Issue and Beyond. New Delhi: Viva Books and the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Halper, Lezlee Brown, and Stefan Halper. 2014. Tibet: An Unfinished Story. London: Hurst & Company.

Hamilton, Angus. 1912. In Abor Jungles: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Abor Expedition, the Mishmi Mission and the Miri Mission. London: G. Bell & Sons. Harrer, Heinrich. 1956. Seven Years in Tibet. London: Pan Books.

Harrer, Heinrich. 1998. Return to Tibet: Tibet After the Chinese Invasion. New York: Penguin Putman.

Hazarika, Joysankar. 1996. Geopolitics of North East India. New Delhi: Gyan Publishing House.

Hoftun, Martin, William Raeper, and John Whelpton. 1999. People, Politics & Ideology: Democracy and Social Change in Nepal. Kathmandu: Mandala Book Point.

Hopkirk, Peter. 1982. Trespassers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The Race for Lhas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berman, Leo, and Paul Sweezy. 1963. 'A Fool' s Game: The China-India Border Dispute' , Monthly Review, 14 (9) (January): 465 - 86.

Hussain, T. Karki. 1977. Sino-Indian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1962 - 66. Faridabad: Thomson Press (India) Ltd.

Hutt, Michael (ed.). 2004. Himalayan People's War. London: Hurst & Company.

Jeffrey, Robin, Ronojoy Sen, and Pratima Singh. 2012. More than Maoism: Politics, Policies and Insurgencies in South Asia. New Delhi: Manohar and the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Jha, Prashant. 2014. Battles of the New Republic: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Nepal. New Delhi: Aleph Book Company.

Johri, Sita Ram. 1968.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NEFA. Lucknow: Himalaya Publications.

Johri, Sita Ram. 1969.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Ladakh. Lucknow: Himalaya Publications.

Jose, Vinod K. 2010. 'Spies in the Snow: How the CIA and Indian Intelligence Lost a Nuclear Device in the Himalayas', The Caravan, December.

Joshi, H.G. 2004. Sikkim: Past and Present. New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

Joshi, P.C. 2012. Naxalism at a Glance. Delhi: Kalpaz Publications.

Kalha, Ranjit Singh. 2014. India - China Boundary Issues: Quest for Settlement. New Delhi: 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and Pentagon Press.

Kampen, Thomas. 2000.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Copenhagen: 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Kandell, Alice. 1971. *Sikkim: The Hidden Kingdom*.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Kao, Ting Tsz. 1980. *The Chinese Frontiers*. Aurora, Ill: Chinese Scholarly Publishing Company.

Karki, Arjun, and David Seddon (eds.). 2003. *The People's War in Nepal: Left Perspectives*. Delhi: Adroit Publishers.

Karnik, V.B. (ed.). *China Invades India*. Bombay, New Delhi, Calcutta, Madras, London, New York: Allied Publishers.

Kazi, Jigme N. 2013. *The Lone Warrior: Exiled in My Homeland*. Gangtok: Hill Media Publications.

Khan, Sulmaan Wasif. 2015. *Muslim, Trader, Nomad, Spy: China's Cold War and the People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Khetsun, Tubten (trans. from Tibetan by Matthew Akester). 2008. *Memories of Life in Lhasa under Chinese Ru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imura, Hisao, and Scott Berry. 1990. *Japanese Agent in Tibet: My Ten Years of Travel in Disguise*. London: Serindia Publications.

Kissinger, Henry. 2012. *On China*. London: Penguin Books.

Kohli, M.S., and Kenneth Conboy. 2002. *Spies in the Himalayas: Secret Missions and Perilous Climb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Kohli, Manorama. 1993. *From Dependency to Interdependence: A Study of IndoBhutan Relations*.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Kumar, Niraj, George van Driem, and Phunchok Stobdan (eds.). 2016. *Himalayan Bridge*.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Kunnath, George J. 2012. *Rebels from Mud Houses: Dalit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aoist Revolution in Bihar*. New Delhi: Social Science Press.

Laird, Thomas. 2002. *Into Tibet: 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 New York: Grove Press.

Lal, Dinesh. 2008. *Indo-Tibet-China Conflict*. Delhi: Kalpaz Publications.

Lamb, Alastair. 1966.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 Volume I: Morley, Minto and Non-Interference in Tibe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amb, Alastair. 1966.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 to 1914. Volume II: Hardinge, McMahon and the Simla Con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Lamb, Alastair. 1968. *Asian Frontiers: Studies in a Continuing Problem*. London: Pall Mall Press.

Lamb, Alastair. 1973. *The Sino-Indian Border in Ladakh*.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Lamb, Alastair. 1991. *Kashmir: A Disputed Legacy 1846 - 1990*. Hertingfordbury, Hertfordshire: Roxford Books.

Lecomte-Tilouine, Marie (ed.). 2013. *Revolution in Nepal: An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War.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venson, Claude B. 1988. Dalai Lama: A Biography. London, Sydney, Wellington: Unwin Hyman.

Lintner, Bertil. 1990.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Burm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Program.

Lintner, Bertil. 2011. Land of Jade: a Journey from India through Northern Burma to China. Bangkok: Orchid Press.

Liu, Melinda. 1999. 'Tibet: China' s Kosovo?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the CIA Helped the Dalai Lama' , Newsweek (cover story, Asian edition), 19 April.

Lohia, Rammanohar. 2002. India, China and Northern Frontiers.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Luthra, P.N. 1971.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Growth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Shillong: 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

Macaulay, Colman. 1977 [1885]. Report on a Mission to Sikkim and the Tibetan Frontier 1884. Kathmandu: Ratna Pustak Bhandar.

Mac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2006. Mao' 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1974.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 - 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cFarquhar, Roderick. 1983.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Volume 2: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 - 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itra, Ramtanu. 2004. 'Pakistan' s Bhutan gambit worries India' , Asia Times Online, November 25. Available at <http://www.atimes.com/atimes/South Asia/FK25Df03.html> (accessed on 18 August 2017).

Malik, Mohan. 2011. China and India: Great Power Rivals. Boulder and London: First Forum Press, Lynne Reiner Publishers.

Mansingh, Surjit. (ed.). 1998. Indian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Marks, Thomas A. 2007. Maoist People' s War in Post-Vietnam Asia. Bangkok: White Lotus Press.

Mathema, Kalyan Bhakta. 2011. Madheshi Up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Ethnicity. Kathmandu: Mandala Book Point.

Maxwell, Neville. 1981. 'The Deadlocked Deadlock, Sino-Indian Boundary Dispute' ,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6(38) (19 September):1545 - 8.

Maxwell, Neville. 2014. China' s Borders: Settlements and Conflicts.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McGranahan, Carole. 2010. Arrested Histories: Tibet, the CIA, and Memories of a Forgotten W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cGregor, Richard. 2010.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 s Communist Rulers. London: Allen Lane.

McKay, Alex. 1997.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4 - 1947. Surrey: Curzon Press.

McKay, Alex. 2003. Tibet and Her Neighbours: A History. London: Edition Hansjörg Mayer.

Mehrotra, L.L. 1998. India's Tibet Policy. New Delhi: Tibetan Parliamentar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r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1960. Atla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India. New Delhi: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1963. The Chinese Threat.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Mishra, Trinath. 2007. Barrel of the Gun: The Maoist Challenge and Indian Democracy. New Delhi: Sheriden Book Company.

Misra, Tilottama (ed.). 2011. Writings from North-East India: Fiction.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sra, Tilottama (ed.). 2011. Writings from North-East India: Poetry and Essay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raes, Frank. 1960. The Revolt in Tibe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Mukherji, Nirmalangshu. 2013. The Maoists in India: Tribals under Siege. New Delhi: Amaryllis.

Myrdal, Jan. 2012. Red Star over India: As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are Rising. Impressions, Reflexions and Preliminary Interferences. Kolkata: Setu Prakashani.

Nair, P. Thankappan. 1985. Tribes of Arunachal Pradesh. Guwahati: Spectrum Publications.

Nanda, B.R. (ed.). 1990. Indian Foreign Policy: The Nehru Years.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and the 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

Navlakha, Gautam. 2012. Days and Nights in the Heartland of Rebellion.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Nayak, Nihar R. 2014. Strategic Himalayas: Republican Nepal and External Powers. New Delhi: Pentagon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Noorani, A.G. 2011. India - China Boundary Problem 1846 - 1947: History and Diplomac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rbu, Jamyang. 1986. Warriors of Tibet: The Story of Aten and the Khampas' Fight for the Freedom of their Country. London: Wisdom Publications.

Onesto, Li. 2005. Dispatches from the People's War in Nepal. London and Ann Arbor: Pluto Press; Chicago: Insight Press Inc.

Orton, Anna. 2010. India's Borderland Disputes: China, Pakistan, Bangladesh and Nepal. New Delhi: Epitome Books.

Osik, N.N. 1999. Modern History of Arunachal Pradesh (1825 - 1997). Itanagar, New Delhi: Himalayan Publishers.

Palit, D.K. 1991. War in High Himalaya: The Indian Army in Crisis, 1962. New Delhi: Lancer International.

Pandita, Rahul. 2011. Hello Bastar: The Untold Story of India's Maoist Movement. Chennai: Tranquebar Press.

Parmanand. 1992. The Politics of Bhut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Delhi: Pragati Publications.

Peissel, Michel. 1972. The Secret War in Tibet. Boston, Toronto: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Peissel, Michel. 1992. Mustang: A Lost Tibetan Kingdom. Delhi: Book Faith India.

Pommaret, Françoise. 1991. Introduction to Bhutan. Hong Kong: Odyssey.

Prasad, Ambika. 2011. Nehru in Parliament: On Social, Economic and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Cyber Tech Publications.

Raeper, William, and Martin Hoftun. 1992. Spring Awakening: An Account of the 1990 Revolution in Nepal. New Delhi: Viking.

Raghavan, V.R. 2013. Nepal as a Federal State: Lessons from the Indian Experience.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Raizada, Shefali. 2012. Merger of Sikkim: A New Perspective. Delhi: Swati Publications.

Raj, Prakash A. 2001. “Kay Gardeko?” : The Royal Massacre in Nepal. New Delhi: Rupa & Co.

Rajagopalan, Rajeswari Pillai. 2012. Clashing Titans: Military Strategy and Insecurity among Asian Great Powers.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and the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Ram, Mohan. 1971. Maoism in India. Delhi, Bombay, Bangalore, Kanpur, London: Vikas Publications;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Raman, B. 2007. The Kaoboys of R&AW: Down Memory Lane. New Delhi, Olympia Fields IL: Lancer Publishers.

Ramana, P.V. 2014. Understanding India's Maoists: Select Documents. New Delhi: Institute of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and Pentagon Press.

Rao, Gondker Narayana. 1968. *The India - China Border: A Reappraisal*. Bombay, Calcutta, New Delhi, Madras, Lucknow, Bangalore, London,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Rasgotra, M. (ed.). 2012. *China and South Asia: Developments and Trends*.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Rehman, Iskander. 2007. 'A Himalayan Challenge: India's Conventional Deterrent and the Role of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along the Sino-Indian borde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70 (1) (Winter): 104 - 42.

Riencourt, Amaury de. 1950. *Lost World: Tibet, Key to Asia*. London: Victor Gollancz.

Rittenberg, Sidney, Amanda Bennett. 2001.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Ronaldshay, Earl of. 2005 [1923]. *Lands of the Thunderbolt: Sikkim, Chumbi & Bhutan*. Varanasi: Pilgrims Publishing.

Roy, Anirban. '2009. Return of the Dalai Lama', *The Northeast Today* (cover story), November.

Roy, Asish Kumar. 2008. *Unfinished Revolution: The Spring Thunder and Beyond*. Kolkata: Minerva Associates.

Rustomji, Nari. 1983. *Imperilled Frontiers: India's North-Eastern Borderlands*. Delhi,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yan, Mark A., David M. Finkelstein, and Michael A. McDevitt (eds.). 2003. *Chinese Warfighting: The PLA Experience since 1949*. Armonk, NY: Sharpe.

Ryavec, Karl E. 2015. *A Historical Atlas of Tibet*.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aikia, Yasmin. 2004. *Fragmented Histories: Struggling to be Tai-Ahom in Indi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Sali, M.L. 1998. *India - China Border Dispute: A Case Study of the Eastern Sector*. New Delhi: A.P.H. Publishing Corporation.

Sarma, Amulya Chandra. 1986. *Tai Ahom System of Government*. Delhi: B.R. Publishing Corporation.

Satnam (trans. from Punjabi by Vishav Bharti). 2010. *Jangalnama: Travels into a Maoist Guerilla Zon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

Schendel, Willem van. 2005. *The Bengal Borderland: Beyond State and Nation in South Asia*. London: Anthem Press.

Sebastian, Sarish. 2015. *Bhutan: A Journey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New Delhi: Adroit Publishers.

Senanayake, Ratne Deshapriya. 1967. *Inside Story of Tibet*. Colombo: The Afro-Asian Writers' Bureau.

Shah, Alpa, and Judith Pettigrew (eds.). 2012. *Windows into a Revolution: Ethnographies of Maoism in India and Nepal*. New Delhi: Social Science Press and Orient Black Swan.

Shakaba, Tsepon W.D. 1967.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hakespear. L.W. 2004. *History of Upper Assam, Upper Burmah and North-Eastern Frontier*. Guwahati, Delhi: Spectrum Publications.

Shakya, Tsering. 1999.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London: Pimlico.

Sharma, Jan. 1998. Democracy without Roots. Delhi: Book Faith India.

Sharma, Khemraj. 2013. Gorkhas in the Wilderness: A Study in North East India. New Delhi: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Sharma, Shri Ram. 2003. India - China Relations 1972 - 1991. New Delhi: Discovery Publishing House.

Sheikh, A.G. 2010. Reflections on Ladakh, Tibet and Central Asia. New Delhi: Skyline Publications.

Short, Philip. 1999. Mao: A Lif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Shrivastava, Manoj. 2013. Re-Energising Indian Intelligence.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Siddika, Shamima. 1993. Muslims of Nepal. Kathmandu: Gazala Siddika.

Sidhu, Waheguru Pal Singh, and Jing-dong Yuan. 2003. China and India: Cooperation or Conflict? New Delhi: India Research Press.

Singh, Jasjit (ed.). China's India War 1962: Looking Back to See the Future.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Singh, K. Natwar. 2009. My China Diary 1956M1988. New Delhi: Rupa & Company.

Singh, K.S. 1995. People of India Volume XIV: Arunachal Pradesh. Calcutta: Seagull Books and Anthropological Survey of India.

Singh, M.K. (ed.) 2012. Indian Intelligence: Missing in Action. Delhi: Prashant Publishing House.

Singh, Mithilesh Kumar. 2014. Increasing Diplomatic Relation Between Bhutan and China: A Great Concern for India. Delhi: Prashant Publishing House.

Singh, Mukesh Kumar. 2011. Nepal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Sumit Enterprises.

Singh, Mukesh Kumar. 2014. Nepal in China' s Foreign Policy. Delhi: Prashant Publishing House.

Singh, Prakash. 2011. The Naxalite Movement in India. New Delhi: Rupa Publications.

Singh, Sunjoy K. 2015. Major Operations of R&AW. New Delhi: Lenin Media.

Singh, V.K. 2007. India' s External Intelligence: Secrets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 (RAW).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s.

Sinha, A.C. 2008. Sikkim: Feudal and Democratic. New Delhi: Indus Publishing Company.

Sinha, Chandan. 2013. Kindling of an Insurrection: Notes from Junglemahals. London, New York, New Delhi: Routledge.

Sinha, V.B. 1968. The Red Rebel in India: A Study of Communist Strategy and Tactics. New Delhi: Associated Publishing House.

Smith, Warren W. 1996. Tibetan Nation: A History of Tibetan Nationalism and Sino-Tibetan Relations.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Smith, Warren W. 2008. China' s Tibet?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Toronto, Plymouth, U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Stewart, Jules. 2006. *Spying For the Raj: The Pundits and the Mapping of the Himalaya*. Phoenix Mill: Sutton Publishing.

Strong, Anna Louise. 2003. *When Serfs Stood Up in Tibe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Syed, Anwar H. 1974. *China and Pakistan: Diplomacy of an Entente Cordiale*. London, Karachi,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yiemlieh, David R. (ed.). 2014. *On the Edge of Empire: Four British Plans for North East India, 1941 - 1947*.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Talukdar, Mrinal (trans. from Assamese by Deepika Phukan). 2014. *1962: Sino-Indian Conflict*. Guwahati: Kaziranga Books.

Teiwes, Frederick C. 1993.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E. Sharpe.

Teiwes, Frederick C. 2007.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Armonk, New York, London, England: M.E. Sharpe.

Teltscher, Kate. 2006. *The High Road to China: George Bogle, the Panchen Lama and the First British Expedition to Tibet*. London: Bloomsbury.

Tendhon Culture Preservation Society. 2014. *A Short Account of His Holiness' visit to Mon Tawang on his way to India in 1959*. Tawang: Tendhon Culture Preservation Society

Thant Myint-U, 2011. *Where China Meets India: Burma and the New Crossroads of Asi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Thapa, Deepak, and Bandita Sijapati. 2004. *A Kingdom under Siege: Nepal's Maoist Insurgency, 1996 to 2004*.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Thapa, Manjushree. 2005. *Forget Kathmandu: An Elegy for Democracy*.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Thapa, Manjushree. 2013. *Forget Kathmandu: An Elegy for Democracy*. New Delhi: Aleph Books.

Thapar, Romila, Nandita Haksar, and Anand Teltumbde (eds.). 2013. *Are We Sure About India?* Kathmandu: Himal Books.

Thondup, Gyalo, and Anne F. Thurston. 2015. *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 London, Sydney, Auckland, Johannesburg: Rider. By Dalai Lama's brother who served as a go-between for the CIA and Tibetan freedom fighters in the 1950s and 1960s.

Tsai Wei-ping (ed.). 1978. *Classified Chinese Communist Documents: A Selec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public of China.

Tripathi, D.P. and Deepak B.R. (eds.) *India and Taiwan: From Benign Neglect to Pragmatism*. 2016. New Delhi: Vij Books India.

Umpherston, Charles Aitchison. 2016 [1929]. *A Collection of Treaties, 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Delhi: Facsimile Publisher.

Upreti, Bishnu Raj. 2004. *The Price of Neglect: From Resource Conflict to Maoist Insurgency in the Himalayan Kingdom*. Kathmandu: Bhrikuti Academic Publications.

Van Walt van Praag, Michael C. 1987.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A history of Tibet with the emphasis on its legal status.

Verma, Anand Swaroop (trans. from Hindi by Akhilanand, Dalip Upadhyay, and Ish Mishra). 2001. Maoist Movement in Nepal. New Delhi: Samkalin Teesari Duniya.

Wang Lixiong, and Shakya, Tsering. 2009. The Struggle for Tibe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Wangchuck, Ashi Dorji Wangmo. 2012. Treasures of the Thunder Dragon: A Portrait of Bhutan. New Delhi: Penguin/Viking.

White, J. Claude. 2005 [1909]. Sikkim and Bhutan: Twenty-One Years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New Delhi, Chenna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Wignall, Sydney. 1996. Spy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A True Story of Espionage and Survival in the Himalayas. New York: Lyons & Burford Publishers.

Wijer, Birgit Van De. 2010. Tibet's Forgotten Heroes: The Story of Tibet's Armed Resistance Against China. Stroud, Gloucestershire: Amberley.

Woodcock, George. 1971. Into Tibet: The Early British Explorers. London: Faber and Faber.

Woodman, Dorothy. 1969. Himalayan Frontiers: 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 Chinese, 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 New York, Washington: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Xun, Zhou (ed.). 2012. 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 - 1962: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Younghusband, Francis. 1998 [1910]. India and Tibet: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which have Subsis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Time of Warren Hastings to 1910; With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Mission to Lhasa of 1904. Delhi: Book Faith India.

1920. Military Report on the Bhareli River Area and Tawang. General Staff, India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960. Documents on 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2. 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 (Enlarged Edition).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Assam For the Year 1921 - 22 Reprint 1984.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